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徐照華 先生

葉榮鐘及其文學研究

研究生：賴 金 英

中華民國 九十二 年 六 月

# 序 文

感謝佛祖菩薩的垂愛，讓我在離開母校二十年後，能再回到課堂上，聆聽老師們的教誨，真是無比的幸福，尤其白天身為人師，夜晚重作學子，內心的感觸更深。同時也要感謝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給我入學的機會，這三年來的日子，我當自己是塊空心的海綿，努力不懈的吸收、茁壯。一千多個日子裡，份內的工作不敢鬆懈，又急於把書唸好，我幾乎天天熬夜，雖然很辛苦，但內心卻很充實。眼看這本論文即將完成，內心的雀躍更是難以形容。

能夠完成這本論文，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太多了，系上從系主任、任課老師、同學，到湯碧珠助教、吳欣怡助理的鼎力相助；任教的台中家商，楊寶琴校長不時的關心與勉勵、主任及好同事們的加油打氣；家裡先生無怨無悔的幫我分擔家事，及接受我的牢騷，兒子與女兒的支持與協助；小學妹小薇、淑蕙常主動幫我到各大圖書館借書，還有好友魏文益先生的鼓勵，謹在此致上最誠摯的感謝。

然而，最重要、最辛苦的莫過於指導教授徐照華老師了，她顧慮到我大學讀歷史系，任教時所擔任的科目又是電腦課程，在文史不分家的原則下，她建議我寫《葉榮鐘及其文學研究》，對寫論文沒經驗、格式又不熟、文學素養有待加強的我，著實讓徐老師辛苦了，這一年多的寫作日子，尤其動筆之初，她真的費盡心思，常在百忙之中，撥出時間逐字逐句的指導我，幫我看稿修稿，也常為了隻字片語審慎推敲研究，毋寧是希望這篇論文能順利通過，分享學生的喜悅。她做學問的嚴謹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真的令我由衷的佩服與感謝。更過意不去的是下半年正值老師的休假，且師丈身體欠安，在公私兩忙之際，仍在我們需要時到校來指導我們，對她的感激，已無法用筆墨形容了。老師，謝謝您！

另外，還要謝謝施懿琳老師，初審時不辭辛苦，細心的幫我看論文，給我很大的信心；還有兩位口試委員，洪銘水老師、施懿琳老師，謝謝你們循循善誘，不厭其煩的指正與包容，才能成就了這本論文的展現，謹此一併致謝。

#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現有的研究狀況	2
第三節 研究目的	4
第四節 論文架構	5
第二章 感時憂國的葉榮鐘	8
第一節 葉榮鐘的生平	8
一、家庭背景	8
二、求學生涯	9
(一)書房、公學校生活	9
(二)兼習和歌與漢學	11
(三)第一次日本留學	11
(四)第二次日本留學	13
三、葉榮鐘的個性	14
(一)淡泊名利、樂天達觀	14
(二)執俠仗義、守正不阿	16
(三)傲人骨氣、高超志節	17
四、葉榮鐘的感情世界	18
五、與日人交往	21
(一)幼年時期的印象	21
(二)青少年時期的印象	22
六、葉榮鐘的民族自覺	23
(一)對同化會的觀點	25
(二)加入政治運動的緣由	26
七、葉榮鐘與台灣民族政治運動	28
(一)從事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29
(二)治警事件	31
(三)台灣文化協會	33
(四)台灣民眾黨	38
(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42
(六)東亞共榮協會	45
(七)郁達夫座談會	46
八、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	46
(一)記者生涯	46
(二)政治的認同	50

(三)祖國事件	51
(四)避難生活台中鄉下	53
(五)偷聽南京的廣播	55
九、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	56
(一)台人對祖國的嚮往	56
(二)建設祖國的期望破滅	59
(三)二二八事件	60
第三章 葉榮鐘的文學寫作歷程	62
第一節 葉榮鐘作品發表情況	63
一、葉榮鐘筆名的探討	63
二、葉榮鐘的寫作情形	67
(一)日據時代：(1920-1945年)	68
(二)戰後至國民政府遷台：(1945-1949年)	69
(三)封筆時期：(1950-1965年)	69
(四)退休後：(1966-1978年)	70
第二節 葉榮鐘與《晨鐘》、《南音》	72
一、晨鐘	72
二、南音	73
(一)《南音》發刊的時代背景	73
(二)《南音》發刊的動機	75
(三)《南音》的命名	76
(四)《南音》的精神及期望	76
(五)《南音》的使命	77
(六)《南音》的時代意義	78
三、葉榮鐘與《南音》	78
第四章 葉榮鐘的文學理論	81
第一節 當時的文學背景	81
一、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	82
(一)啟蒙實驗期(1920-1931年)	82
(二)聯合陣線期(1931-1937年)	83
(三)皇民運動期(1937-1945年)	83
第二節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緣起及經過	84
一、新文學觀念的萌芽	84
二、台灣新文學觀念的演進	85
(一)台灣新文學觀念的奠基者——陳炳	85
(二)萌芽期新文學的語言問題	86
三、新舊文學論戰	93
(一)第一階段新舊文學論戰	94
(二)第二階段新舊文學論戰	97

第三節 葉榮鐘新文學運動的主張	98
一、對詩的主張	99
(一)反對擊鉢吟無病呻吟的詩作	99
(二)作詩須忠於心靈的感觸	102
二、對「戲劇」的看法	104
三、白話文運動的主張	111
四、葉榮鐘對五四運動的批判	116
(一)五四新文學缺乏內容思想的改革	117
(二)五四新文學運動受古文惰性的支配成果並不可觀	118
(三)反對文學的功利目的	119
五、「第三文學」的提出	121
(一)文藝普遍化與大眾文藝	122
(二)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學	124
(三)第三文學	126
第五章 葉榮鐘的文學創作	132
第一節 漢詩	132
一、葉榮鐘與漢詩	132
二、葉榮鐘漢詩的內容	133
(一)時代的關懷	134
(二)親情的流露	147
(三)對師友的追念	150
三、葉榮鐘漢詩總評	157
第二節 散文	158
一、葉榮鐘散文的寫作背景	158
二、葉榮鐘散文的創作內容	162
(一)社會現實的批判	162
(二)對宗教的評論	165
(三)故鄉的追憶與感懷	167
(四)美國見聞錄	169
(五)民族性格的剖析	173
三、葉榮鐘散文總評	175
第六章 結論	178
第一節 研究成果	178
第二節 評葉榮鐘在台灣文化與文學上的地位	182
葉榮鐘年譜	187
參考書目	204

# 論 文 摘 要

台灣新文學的產生，是緣於日本佔領台灣，因台人不滿日人的統治，先以武裝抗爭失敗後，繼之以新文化的啓蒙，由於固有的舊文學與現代化的新文學截然不同，於是有了新文學之提倡。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目標：一方面要進行反殖民，一方面又要批判落後的傳統文化。因此二〇年代許多原來是從事政治對抗運動的文化人，在其政治社會運動的舞台遭禁時，也都陸續轉戰文學與藝術，將民族意識植根在文藝之中，此開創性功能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日據時期台灣民族運動領導者林獻堂的私人祕書、也是資深的老報人——葉榮鐘，一九〇〇出生於鹿港，一九七八年辭世，葉榮鐘未入公學校以前，先入書房念書，奠下了古典文學的基礎；他也是日本養成的知識人，不但中日文寫作能力俱佳，且具有近代的理念，由早期民族意識的熱情到晚年台灣本土意識的萌芽，由日治時期的抵抗殖民到民國時期的諷刺當道，他的文章不但文筆絕佳，且始終秉持著知識份子的良心，用深刻的觀察為台灣的歷史留下註腳。這些著作是研究日據時代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在本土意識逐漸抬頭的今日，他的文章就是最珍貴的史料，在此想透過其著作，了解當時台灣的社會及文壇梗概，並分析研究葉榮鐘獨特的文學理論。

關鍵詞：葉榮鐘 新舊文學論戰 大眾文藝 第三文學 墮落的詩人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900 年出生鹿港的葉榮鐘，是日據時代民族社會運動重要的一員，也是資深的老報人，他身兼詩人、散文家、評論家、歷史家，與社會運動家。他的一生剛好跨過台灣現代史上兩個最重要的時期，一為日本據台的殖民時代，一為國民政府時代，他不但見證了日帝的殘酷支配並剝削臺灣的實況，也目睹了國府時期不分本省、外省的人性百態。前半生他積極參與社會文化活動，為爭取台灣人的權利及尊嚴而努力；後半生他退出政治舞台，隱忍做個旁觀者及發憤著書。做為一個跨越世代的歷史見證者，他的書寫出了那個充滿動盪、不安與種族歧視的殖民生活，也寫出了戰後大部分台人在掙脫了殖民統治之後渴望回歸祖國的心理，更寫出了二二八事變後台人普遍內心的恐怖，他忠實詳盡的反映了現實的醜陋濁溷，並對當時的民族文化做檢視、做批判。雖然二二八事件及接踵而來的白色恐怖，讓他必須停止所有的民族社會運動，甚至停筆不敢寫了，並轉而進入金融界。但中輟十多年後，在「捨我其誰」的歷史使命感驅使下，他又重拾鐵筆，致力寫作，直到病危時才不得不停筆，因此他留下了豐碩的作品。其中詩歌與散文隨筆佔有很大的份量，漢詩一直是葉榮鐘的最愛，他藉詩歌作品來記錄其生活的際遇與感受，吟詠個人的悲喜與慨嘆、寫出台灣在歷史轉變時期中的一些社會現象，及殖民主的蠻橫、國府的霸權，他將當時的時代特色表露無遺。葉榮鐘的散文更是琳瑯滿目，有隨筆、論述、雜文……，不但用字清雅平順，論述鏗鏘有力，內容多樣化，對現實的批判更是一針見血，不遺餘力。張良澤說他的散文“富說理，旁敲側擊，天南地北，隨手拈來，讀之如飲陳酒”，<sup>1</sup>是成就很高的散文家，唯有洪炎秋(1902-1980)能與之媲美。在文學理論方面，他能綜合當時各方的優缺點，截長補短後，採取較為客觀持平的看法，陸續提出具有個人特色的文學觀，計有作詩的態度、羅馬字運動、戲劇觀、第三文學，以及對五四運動的看法。

葉榮鐘多重角色的扮演，形成豐富的觀察面向，加上他的著作頗豐，不論漢

---

1 張良澤〈葉榮鐘先生作品概述〉《台灣文藝》，第 63 期，1979 年 3 月，頁 207。

詩或散文都深具文學及藝術性。其文章內容包羅萬象，什麼樣的資料都有，不但可以從中了解過去台灣的種種，更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東、西方知識，值得我們去研讀、探討。然而讓我困惑的是，在台灣文壇上，談論他的資料不是很多，引徐復觀先生在「悼念葉榮鐘先生」（67.12.11 中國時報「人間」）文中說的：「台灣從事文藝工作的青年朋友談到前輩作家，而不提及葉先生，我感到有些意外。」<sup>2</sup>確實當筆者提到葉榮鐘時，幾乎都要費一番唇舌，告訴對方葉榮鐘是誰？是那一個年代的人？他參與的民族社會運動有那些？成效如何？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是什麼？何謂「第三文學」？諸如此類問題在筆者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是經常被問及的。其實在台灣文學史、報章雜誌是有人談及葉榮鐘，但重心大都放在民族社會運動方面，談及他的著作也大都是片斷的，不夠完整。所以當筆者穿梭在圖書館找尋有關他的資料時，往往是感慨萬千，因為他的資料比起同時代的其他作家來說，真的是少很多，以他對台灣文學史的付出來說，這是不公平的。

筆者選擇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家葉榮鐘作為本論文的撰述主題，就是想詳細的介紹他的一生行誼、思想，針對他與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的關連，個人獨特的文學理論及文學創作，作全面性的觀照與論析，期望研究成果能夠在台灣文學史上，還給葉榮鐘應有的價值地位，讓台灣文學的歷史脈絡更加完整。

## 第二節 現有的研究狀況

1978 年葉榮鐘病逝後，有關他的文章陸續出來，嘉許他一生傲骨的風範及在民族運動方面的功績，計有 1978.11.26 王詩琅〈不斷進步的知識人，敬悼葉榮鐘先生〉發表於《自立晚報》、及 1980 年 12 月〈葉榮鐘著《半路出家集》與《小屋大車集》〉、〈讀《台灣民族運動史》〉收錄在《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1978.12.11 徐復觀〈悼葉榮鐘先生〉發表於《中國時報》，張良澤〈葉榮鐘先生作品概述〉，黃得時〈辛酸五十年，淚血寫滄田〉，洪炎秋〈悼念葉榮鐘先生〉，林芳年〈悼葉榮鐘氏〉（以上四篇刊登在《台灣文藝》1979 年 3 月第 63 期「葉榮鐘先生紀念專輯」裡）；1982 年王大佑的〈苦悶時代裡的反省——葉榮鐘與《南音》雜誌〉收錄在李曉峰著《台灣近代人物集(一)》，1990 年 10 月戴寶村〈遠識

---

<sup>2</sup> 徐復觀〈悼念葉榮鐘先生〉《中國時報》，1978 年 12 月 11 日。



高文的政治·文化人——葉榮鐘》收錄在《復活的群像》，1997年5月施懿琳、楊翠〈鹿城三子——周定山、葉榮鐘、莊遂性〉刊載於《彰化縣文學發展史》，1999年12月洪銘水〈葉榮鐘的《少奇吟草》——跨越語言一代文化人的見證〉刊載於葉榮鐘《少奇吟草》，2000年7月24日陳文芬〈葉榮鐘全集 見證台灣近代史〉刊登於《中國時報》，廖振富〈台灣中部地區的古典詩人及其作品〉發表於2001年1月號《國文天地》、2001年4月12日〈不有真情不作詩——讀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發表於《台灣日報》、2001年7月〈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發表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2001年7月20日洪銘水〈葉榮鐘論「五四」新文學與「第三文學」的提出〉刊載於葉榮鐘著《葉榮鐘早年文集》，2001年12月8日林瑞明〈探索葉榮鐘的文學〉發表於《櫟社百週年學術研討會》，林莊生〈葉榮鐘先生〉收錄於《懷樹又懷人》，葉石濤〈舊文人·新知識份子——葉榮鐘〉發表於1998年7月的《文學台灣》，林銘章〈民國人物小傳——葉榮鐘〉發表於《傳記文學》第七十二卷第一期，陳盈達〈萬感填胸不可攔——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詩人葉榮鐘〉發表於《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這些文章的內容都以葉榮鐘為主，有的是哀悼他，有的是介紹他的文學作品或文學評論，但篇幅都不長，因此無法深入了解。

在論文方面：1986年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葉榮鐘是眾多櫟社社員之一，和他有關的內容並不多。1996年吳奕蒼《日治時期鹿港地區新文學研究》，他雖針對葉榮鐘的生平、參與民族運動的過程、文學主張這三方面來論述，但葉榮鐘只是他研究的眾多鹿港新文學作家之一，非專論，所以內容稍嫌不足，無法深入而詳細的剖析。1998戴振豐《葉榮鐘與台灣民族運動》，他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探討葉榮鐘在台灣民族運動上，實際參與的政治活動有那些，及了解葉榮鐘的思想文學論，但筆者發現他的重心是擺在民族運動上，對文學思想只是簡單的敘述而已，文學方面的著墨並不多。2000年張桂華《苦悶時代下的文學——一九三二年《南音》的文學訴求》，他以曾在《南音》發表過文論的新文學作家為主，做分析歸納，比較彼此之間的文學理論的異同，葉榮鐘是他探討的作家之一，並非葉榮鐘個人的專論。再者葉榮鐘的全集在其女兒葉芸芸的努力下，1999年年底終於申請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經費，從2000年開始陸續出版，至2002年3月年譜出版完成，才大功告成。【葉榮鐘全集】的內容包括過去已出版的書、發表過的與未發表的文稿、日記與書信以及他所保存的歷史文件資

料與照片。也就是說葉榮鐘的作品到此時才真正的具有完整性，此時來研究葉榮鐘將會更詳細，更能看出他的特色來。

### 第三節 研究目的

葉榮鐘的資料，從 1978 年至今 2003 年，在這二十多年中，談論他的作品雖然不少，但大多是片斷的，因此本論文的研究將從其幼年的求學生涯開始，到長大參與台灣各種民族社會運動的歷程，甚至到晚年退休後，孜孜不倦的寫作生涯，做深入的探討，希望對葉榮鐘的思想與行動作出新的詮釋。一般說來人物研究牽涉的範圍廣闊，尤其是跨越日據及國府兩個時期，其複雜度絕不在話下。筆者擬嘗試從他的童年開始，依時間先後的順序，將他當時所參與的台灣社會運動一一描述，並分析每一個運動的結果與影響，及葉榮鐘的貢獻。藉此也可看出昔日「跨越語言的一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在日據與國府的年代是如何受到執政者的扭曲，對日據時代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奮鬥精神更加瞭解、更有助益的。另外是民族運動的路線方面，因他和林獻堂、蔡培火、陳逢源等人是堅持合法運動的右翼自治溫和派，爲了抵抗日本政府的專橫，他們的策略是籠絡日本人中的進步分子，以爭取台灣人的權利。因此有人說他們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只想依靠文化啓蒙來合法的達成民族自決，並說他們始終使用奴隸的阿諛及哀怨叩頭的方式與日本帝國主義在打交道或相互勾結，<sup>3</sup>因此對葉榮鐘在政治上的評價並不高；甚至有人評葉榮鐘“性格保守消極，沒有雄才大略”<sup>4</sup>，對此筆者將試從民族運動的路線及認同問題，給予葉榮鐘適當的評價。

文學方面：一方面透過作者所處的生長環境、時代背景、人生歷練來觀察分析，以求明白其文學創作的的外緣因素；一方面探討作品本身的內在特性，就其所

---

<sup>3</sup> 史明著《臺灣人四百年史》（台北市：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頁701。“這些地主·資產階級派……組織一個能向總督府繼續進行「哀願叩頭的請願、陳情運動」；蕭友三〈台灣解放的回顧〉轉引自史明著《臺灣人四百年史》，頁707。“封建土地財產家·地主為了獲得民權的運動乃是：(1)以肯定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權為前提……藐視佔台灣住民大多數的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始終使用奴隸的阿諛及哀願叩頭的方式等……”；《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轉引自史明著《臺灣人四百年史》，頁534。“台北無產青年派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謂：「……此種妄動行為不外乎是承認並助長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

<sup>4</sup> 林芳年〈悼葉榮鐘氏〉《台灣文藝》，（第63期，1979年3月），頁244。藍博洲〈編後記〉《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89年，初版），頁392。“……葉榮鐘！台灣的現階段、就是像汝這樣的分子再退守霧峰、去做大地主林獻堂的忠實的守門犬。……”

表現之形式、技巧、主題加以分析討論，以明其漢詩與散文之藝術價值及特色。並為《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一書中說他只是一個文評者、是人民文學的理論者，可惜他的新文學創作不多，更因他沒有新詩與小說的創作，在台灣文學史的地位因而不高，<sup>5</sup>來作辯駁。

文學理論方面，擬從《葉榮鐘早期文集》中找出二十～三十年代葉榮鐘所寫的文章，分析研究抽絲剝繭後，歸納出屬於他個人獨到的理論見解，及特有的文學觀，進而了解當時台灣文壇的動向及特色。

【葉榮鐘的全集】，尤其是《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一直是他人研究日據時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最佳的參考資料，所以筆者擬以他的全集為主，試著從他的日記、雜文、隨筆、漢詩、年表等資料著手，再佐以同時代的其他知識份子的文學理論及著作、日據時代的報刊、雜誌及後人對他的評論資料、研究成果，互相參照，進行研究。雖然筆者自知能力有限，要突破目前的框架限制不容易，但仍希望藉此論文的整理，和筆者的個人看法，讓更多的人認識他，連帶的也能更了解日據時代台灣的種種及前人為我們所做的努力。本論文將分五章來論述，現略述各章綱領如下：

## 第四節 論文架構

第一章是「緒論」，研究動機方面先略述全文的綱領，期盼導引讀者對於葉榮鐘在民族運動上的努力給予肯定，進而認識他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接著說明本論文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及筆者撰寫本論文的程序。

第二章「感時憂國的葉榮鐘」，分兩部份來談，第一節葉榮鐘的生平介紹，從他的童年生活、求學過程，到青少年時期的工作際遇，及遠渡東瀛求學，回國後加入台灣民族社會運動，如何叱吒風雲；進而到國府時期，國民政府對台灣人的鎮壓及台灣知識份子的遭遇等。筆者將採編年方式來追述，逐一了解葉榮鐘在不同階段的所做所為，及社會環境（包括台灣民族運動）對他一生的影響。並嘗試理解他所介入的運動在時代脈絡中的意義，也藉此肯定他對台灣民族社會運動

---

<sup>5</sup> 施懿琳、楊翠〈成熟期彰化新文學的花實〉《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頁213。

的貢獻。

第三章「葉榮鐘的文學寫作歷程」，針對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知識份子的政治舞台消失，葉榮鐘也被迫轉入金融界，然而身負歷史使命感的他是如何利用退休後的歲月從事寫作的工作，為他那一代人留下歷史的見證，也為後世子孫留下寶貴的資料。本章將以葉榮鐘作品發表情況，及他與《晨鐘》、《南音》的關係做論述的主題。首先針對葉榮鐘的眾多筆名做探討，進而了解他在各個階段的寫作情形，及他與《晨鐘》、《南音》的關係。《晨鐘》是他啼聲初試，尤其珍貴。《南音》他是接生婆之一，眼看它成長、茁壯，一路上走來葉榮鐘功不可沒。加上有許多〈卷頭語〉都出自他的手筆，所以對這本雜誌的介紹較詳盡。退休後他專事著作，完成了許多的著作，如隨筆集《半路出家集》、《小屋大車集》、《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台灣民族運動史》、《美國見聞錄》……等書，現已合集名為【葉榮鐘全集】，共有九集十二卷。

第四章「葉榮鐘的文學創作」。葉榮鐘或許沒有像賴和、楊逵等人寫出一部部充滿反殖民精神的抗議文學，但他一生奔波於社會運動，所獲得的經驗與感受，全都藉由文字抒發出來，文章的內容，除了是內心的感情流露外，其致力於改善台灣人的生活，爭取台灣人脫離霸權桎梏的心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本章將探討葉榮鐘的詩歌與散文，葉榮鐘一生共創作了六百多首漢詩，筆者試著從其詩作《少奇吟草》中，將他的詩歌內容劃分成三類，「時代的關懷」、「真情的流露」、「對師友的追念」等主題，探析葉榮鐘的詩作內容與特色，以期能全面釐析葉榮鐘漢詩的關懷面向、個人情操與思想底蘊，及在漢詩壇中的貢獻與成就。在散文方面，筆者以《半壁書齋隨筆》為主，從文章的內容著眼，分析其散文創作的主题，以「社會現實的批判」、「對宗教的評論」、「故鄉的追憶與感懷」、「美國見聞錄」、「民族性格的剖析」等五部份，不但概括其基本題材，也可藉此了解他的中心思想。由於葉榮鐘的著作非常多，只能選擇性的從他的著作中找出具有濃厚片面性色彩的文章，進行分析，藉以了解文章中隱含的思想內涵與藝術特色。

第五章是「葉榮鐘的文學理論」，葉榮鐘除了在政治運動方面有實質的踐履外，在文學的創作及文學理論的主張也有其自我的一套理念及方法。談到葉榮鐘，熟悉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人，便會聯想到三〇年代的新舊文學論爭，葉榮鐘在文學方面的主張，也是本時期重要的主題之一。本論文將針對葉榮鐘在這段時

間發表的文論做分析，歸納出他獨特的文學理論，計有對詩的主張、對戲劇的看法、白話文運動的主張、對五四運動的評論，及第三文學的提出，都和新文學運動所討論的主題有關，不但可看出他個人對文學的批評意見，也可探討論戰的全貌及時代意義。

第六章結論部份。總結全文的研究成果，並評述葉榮鐘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貢獻，期待重新認識作家及其想法，並還給他在文學上應有的定位與價值。

## 第二章 感時憂國的葉榮鐘

生於二十世紀初的葉榮鐘，見證了台灣從「前現代」進入「現代」的重大歷史變遷。陳昭瑛說他具有「歷史家對雜多經驗的綜合能力，具有新聞工作者對事件的敏銳和冷靜的觀察，也具有運動參與者的熱情和詩人的觸感。」<sup>1</sup>從他所做的古典詩、評論、散文、日記、歷史著作，不但可了解其一生的所思所感及行事活動，同時也真實記錄了二十世紀前半葉台灣的點點滴滴，其著作具有不可抹滅的歷史價值，甚至二十世紀前半葉台灣人在新文學方面的評論和創作，在他的著作中都敘述詳實。他是日據時代極少數兼具新文學的理論家和創作者之雙重身分的人物。<sup>2</sup>他見證了日帝的殘酷支配並剝削台灣的實況，也目睹了國府時期不分本、外省的人性百態，研究其一生就可了解二十世紀的台灣歷史及文學的脈絡及演變。

### 第一節 葉榮鐘的生平

#### 一、家庭背景

葉榮鐘字少奇，1900年7月23日，出生於文風鼎盛的鹿港，祖籍福建泉州府。祖父葉光炳在1850年舉家由晉江縣石獅遷來台，並定居鹿港杉行街。父親葉成奇（字文奇）是開雜貨舖的小商人，常識很豐富，人緣也很好，曾當過保正；家裡原本是小地主，擁有四十餘甲的土地，每年租谷收入在一千石左右，只是在他出世後不久，家道便已中落，尤其在他祖母及父親相繼過世以後，家中的小店沒有人經營，只好關門大吉，資產被債主抵充殆盡，變賣的變賣，幾乎一無所有，就像他自己形容的“好端端的公子哥兒一下子變成一個家徒四壁的窮孩子”<sup>3</sup>，

---

<sup>1</sup> 陳昭瑛〈誰召同胞未死魂：葉榮鐘《早年文集》的志業與思想〉《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晨星出版，2002年初版），頁47。

<sup>2</sup> 陳昭瑛〈誰召同胞未死魂：葉榮鐘《早年文集》的志業與思想〉《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1，頁48。

<sup>3</sup> 葉榮鐘著〈藁兒最後的信〉《半壁書齋隨筆》（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年初版），頁270。

由於生活拮据，只得靠其母以裁製「庫錢」<sup>4</sup>和編製大甲草帽貼補家用。不過日後葉榮鐘自我檢討，常以家道早沒引為幸事，因為沒落的早，所以他尚未染上公子哥兒的壞習氣，且對貧困的生活處之泰然。葉榮鐘的家庭是典型的閩南系的台灣人，講的是閩南語，家中的食、衣、住、行和其他台灣人一樣仍延續清代的生活模式。因從小接受漢文化及語言的薰陶，他知道這是一種民族的天性，雖然生長在日人統治下，但他深深了解他是不同於日本人的。

## 二、求學生涯

### (一)書房、公學校生活

葉榮鐘的啓蒙教育相當早，因為父親葉成奇是受過官學教育的讀書人，「曾經攜過童生籠並會寫一手好字」<sup>5</sup>，受過官學教育使他有一些儒學的涵養，這種文化素養，自然影響他對孩子的教育方法，所以葉榮鐘是先入書房然後再入公學校的。<sup>6</sup>九歲那年，父親替他找了一位塾師——黃舜田先生，教他漢學，做一個「破筆仔」（啓蒙）學生。<sup>7</sup>入書房前先依傳統舉行拜師儀式，「家兄同工人給我搬了一個棹櫃和一隻椅頭，到離我家不遠的一間廟宇叫做金門館去，同時用一只小竹籠盛著兩只雞卵一個紅包和蔥等物，正式拜老師、叩響頭、滾雞卵，行禮如儀。」<sup>8</sup>上課第一天老師就替葉榮鐘取一個叫「元音」的字，此後按部就班的教他背讀《三字經》與《論語》，從此葉榮鐘上午上公學校，下午學校沒有課就到書房讀書。中國傳統書房的私塾教育，是儒家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管道<sup>9</sup>，葉榮鐘接受書房教育也等於接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儒家的倫常觀念，君臣、父子、夫

---

<sup>4</sup> 參葉榮鐘著〈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2000年），頁374。庫錢是用一疊白紙疊在木砧上，紙上面安下用紙板做的框，在框四周再用釘子固定著，然後用一支鐵鑿（末端有波紋）一記一記用木槌沿紙框的空處打透那疊厚厚的紙張，店家收回去裁作四份便成。

<sup>5</sup> 葉榮鐘著〈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361。

<sup>6</sup> 葉榮鐘著〈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364。

<sup>7</sup> 葉榮鐘〈自序〉《半壁書齋隨筆》，同註3，頁377。

<sup>8</sup> 葉榮鐘著〈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364。

<sup>9</sup> 陳昭瑛《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4月）。在1895年割台之前，儒學在台灣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除了在明鄭二十二年的統治中，儒學會以反抗滿清侵略的精神表現出來之外，在清朝統治的二百一十二年之間，由於滿清的徹底漢化，儒學之反殖民主義的性格並未彰顯，並且正是在這二百多年的期間，由於官學與民間興學的普及，儒學在台灣得到空前未有的發展，成為台灣的本土文化。

婦、兄弟、朋友的因應之道深深影響了他一生的處事行誼，更因此種文化的薰陶，使得葉榮鐘的心理早年便自然而然的種下漢民族意識的種子。同年的春季他進入中台灣頗具規模的鹿港公學校就讀，當時公學校仍有漢文功課，也編有漢文讀本，並聘用前清的秀才、舉人做講師，講授「山下有水，木下有石」一類粗淺的漢文。施家本（1886-1921）、鄭貽林等人都曾受聘在公學校擔任漢文課程，其中鄭貽林（?-?）不但教漢文也兼教書法，他是前清秀才也是全台聞名的書法家。施家本是葉榮鐘的恩師，公學校畢業後，曾送他一部《東周列國演義》，認為此書文字淺顯易讀，葉榮鐘可以用來自修漢文，且可得到一些歷史的知識。他和施家本亦師亦友的情誼，對他的漢文素養和思想啓蒙影響最為深刻，在〈詩人施家本〉一文中，他說：

他親口傳授給我們的古詩句，盡是些充滿著民族精神的作品，假使我這個人的腦筋裡有一點點的民族精神的話，也是在少年時期得到家本先生的灌輸和啟發而來的。<sup>10</sup>

由於施家本的媒介，葉榮鐘才能夠呼吸到外界新鮮的空氣，也才能接觸到時代的潮流，對他一生的影響非常大。到了四年級時，每天下課後到前清老秀才王秋田家裡開的書房學習《幼學瓊林》及《尺牘句解》，這樣的教育不但讓葉榮鐘以後出門在外能夠寫家書給母親，也讓他成為日據時代少數能用流利的中、日文寫作的作家。<sup>11</sup>葉榮鐘日文能力非常好，因他出生在日本領台（1895）以後，所受的正規學校教育是日文的，人稱之為「二世文人」<sup>12</sup>，他們之間能寫出夠水準的日文的人很多，但能寫夠水準的中文的人卻很少，葉榮鐘是這少數人中最好的一位。戴國輝曾驚奇又信服的說：

榮鐘先生並不曾在中國大陸留學，但他的中文造詣不僅不差，甚至有過於北大校友洪炎秋或北師大畢業生張我軍等人。<sup>13</sup>

和葉榮鐘同時期的二世文人，大都像吳濁流(1900-1976)，雖然吟詠並書寫漢書，

---

<sup>10</sup> 葉榮鐘著〈詩人施家本〉《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299。

<sup>11</sup> 參葉榮鐘〈自序〉《半壁書齋隨筆》，同註 3，頁 377。

<sup>12</sup> 「二世文人」多半是少年時期受過漢文教育，但因當時校方教授的以日文為主，所以他們的漢文素養不及「一世文人」，如洪棄生（1867-1929）、傅錫祺（1872-1946）、林幼春（1880-1939）、林獻堂（1882—1956）等人，但足以作文議論、吟詩遣懷。

<sup>13</sup> 戴國輝〈葉榮鐘先生留給我們的淡泊與矜持〉《少奇吟草》，（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 年 12 月初版），頁 29。



但小說都是用日文撰寫，可見葉榮鐘的中文程度相當好。一般說來，懂漢文的「二世文人」，鹿港出身的特別多，葉榮鐘在其書的〈自序〉中說明原因：

故鄉鹿港在清朝時代文風最盛，因為傳統的關係，雖在日本異質文化的統治下，各界人士仍對漢文保有一種偏好，明知弄了這種玩藝，無補於事，不過由於風氣使然，一般做為父兄的，平時還是鼓勵子弟去讀漢文。<sup>14</sup>

受傳統風氣的影響，葉榮鐘也學漢文，雖然學習的過程時斷時續，然而他肯用心，加上一生閱讀無數，終於成就他在中文方面的造詣。

## (二)兼習和歌與漢學

龍山寺的住持光明智曉和尚，是日本人中的好人，沒有優越感，不歧視台人。十七歲時，在施家本推薦之下葉榮鐘拜他為師，學習日本和歌<sup>15</sup>，光明和尚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僧侶，他和歌做得很好，是在台日人中數一數二的作家，在日本的歌壇也有相當的地位，不過他是屬於正統派的歌人，除了每年宮中「御歌始」奉敕題稍露頭角外，平時並沒有什麼活動。他除了日本和歌做得好外，漢學的造詣也相當的深，因此葉榮鐘向他學習和歌及漢學，這也是施家本叫他親近光明和尚的原因。但光明師的教法他無法適應所以離開了，繼轉赴文廟夜學，受教於莊士勳<sup>16</sup>門下，開始研讀《左傳》，由於左傳文字簡潔，句法鏗鏘，讀起來很有意思，因此引起了他對漢文的興趣，可惜他只修過十多篇，便赴日留學。由於以上的進修，葉榮鐘的漢學基礎比別人好，使其日後在文學創作上更能得心應手的原因。

## (三)第一次日本留學

出生於傳統家庭的葉榮鐘，不但接受中國傳統古典文學的洗禮，也接受了日本的新式教育，是不折不扣的台灣知識份子。1918年他十八歲那年春天，透過鹿港公學校老師施家本的引薦，受知於林獻堂(1882-1956)、林幼春(1880-1939)、

---

<sup>14</sup> 葉榮鐘〈自序(《半路出家傳》原序)〉《半壁書齋隨筆》，同註3，頁377。

<sup>15</sup> 葉榮鐘著〈詩人施家本〉《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296。「和歌」相當於我們的舊詩，每首以三十一個字構成，分為五、七、五、七、七，五句，所以俗稱三十一文字或五七句調。

<sup>16</sup> 參鍾美芳〈櫟社的成員分析〉《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下)《台北文獻》第79期，(台北市：臺北文獻委員會)，頁23。莊士勳為清朝舉人，〈台灣列紳傳〉云其人：“資性恬澹，志操清秀，震舉風塵表而不求仕，曉窗讀書，挂笏但看山耳。阿罩霧豪族林氏深慕其德，厚聘講書於霧峰學校，凡十餘年，受教者不可勝數。”他是莊遜性的叔父。

林痴仙(1875-1915)等；並曾執弟子禮，師林幼春習詩。同年 8 月，林獻堂同意給予資助赴日本留學。據葉榮鐘自述其獲得青睞的原因乃是：有一次施家本引他到萊園去遊玩，當他看到山明水秀的萊園時，無意中說：“如果能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該是一件多麼愉快的事！”<sup>17</sup>事後才知道，由於這句話，讓林獻堂認為他是孺子可教也，值得幫助，而這個機會，葉榮鐘認為：“是決定我一生浮沈的轉捩點”。<sup>18</sup>臨行前他向遠親借款五十元，以安頓寡母生計。到了日本，旋即進入東京神田正則美語學校和研數學館兩預備學校就讀，初期他和林獻堂同住，直到林獻堂與施家本先行返台，並出售其東京住宅後，乃遷往神田區的「茨城館宿舍」，和同鄉的洪炎秋(1902-1980)同住約半年，及至洪炎秋轉赴北京就學為止。<sup>19</sup>後來葉榮鐘在同鄉先輩的介紹之下，搬到辜顯榮(1866-1927)設在東京的「大和行」事務所居住，並接受辜顯榮留學資金的資助，由於同是出身鹿港，辜顯榮<sup>20</sup>對他很好，每年給他三百元的學費，在徵詢施家本的同意後，他辭退了林獻堂的資助，往後到他學成返台為止，約有一年多的時間，他都是接受辜顯榮的資助。對於曾是「御用紳士」領袖的辜顯榮，因為相處了一年多，葉榮鐘對他的個性做了最貼切的形容：

他平時極崇拜劉邦的為人，並且愛讀三國演義，所以他也有他一套的權謀術數。但是他秉性忠厚，既沒有劉邦的險詐，也沒有曹操的凶殘，他嚮往劉邦的所以然，大概是在於出身微賤而能夠白手成家這一點的共通性。<sup>21</sup>

對於不解日語、不識日文又能夠和日本的高官豪商分庭抗禮的辜顯榮，當時台灣社會對他的功過評斷莫衷一是，更有人說他是漢奸。對此葉榮鐘頗不以為然，他肯定辜顯榮對「台中中學」創設的協助；及對《台灣青年》<sup>22</sup>雜誌的創刊給予財物上的支持，雖然這兩件事在政治上和辜顯榮的立場相矛盾，因為「台中中學」和《台灣青年》雜誌都是總督府不歡迎的，所以葉榮鐘認為，辜顯榮周旋

<sup>17</sup> 葉榮鐘〈杖履追隨四十年〉《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7。

<sup>18</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81。

<sup>19</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98。洪炎秋是偷了父親的錢到日本讀書，一年多後因母親生病回台，以後才又轉至中國讀書。

<sup>20</sup> 辜顯榮號耀星，葉榮鐘尊稱他為耀翁。

<sup>21</sup> 葉榮鐘〈記辜耀翁〉《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55。

<sup>22</sup> 1920 年 7 月 16 日設在東京的「新民會」，以中、日文發行機關雜誌《台灣青年》，做為台灣民族運動的宣傳機構，它是和、漢文兼刊的雜誌，是台灣人唯一的日刊《台灣新民報》的前身，以喚起民眾覺醒、鼓吹民族意識、改善社會風氣、反對殖民政權為主要訴求，是近代民族解放運動的先聲，並扮演著引介日本知識論述給台灣知識分子的媒介角色。

於日人的上層階級只是商人慣用的交際手腕，並非真心，葉榮鐘說：

耀翁一生雖然受著日人深厚的庇護，但他的內心深處，仍然是沸騰著民族的熱血，他對於日人的態度與其說是敷衍，毋寧說是一種交易較為恰切，這中間只有利害並沒有情感。<sup>23</sup>

所以他除了為辜顯榮辯護外，也稱讚他是重視血緣、愛護鄉土，感念舊情的人。另外葉榮鐘在大和行期間，也結交了一個日本朋友，叫萩野輝也，此人精明強幹，愛好文學，葉榮鐘會對托爾斯泰和德富蘆花的作品發生興趣，就是受他的影響。

24

#### (四)第二次日本留學

1927年8月，葉榮鐘第二次接受林獻堂資助，再度負笈日本留學，進入東京中央大學修讀政治經濟學；9月開始每週四到東京帝大聽矢內原講授「台灣糖業帝國主義」課程，最使葉榮鐘印象深刻訝異的是台灣總督府的土地調查工作，竟是日本糖業帝國主義宰割榨取台灣的開始<sup>25</sup>，那段日子的教育，讓葉榮鐘看清日本人是如何的欺瞞台灣人，壓榨台灣人，也更堅定他致力於台灣民族運動的決心。其實早在1926年矢內原為了撰寫《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訪台調查時的主要嚮導兼翻譯者就是葉榮鐘，當年他接待日本權威人士的矜持，比起一些阿諛奉承者，其態度就獲得戴國輝教授的稱讚曰：

榮鐘先生不失被治方的人格尊嚴，抱持了不卑不亢的態度，確屬名不虛傳的傲骨文人之風範。<sup>26</sup>

1927年冬天，葉榮鐘、楊肇嘉(1892-1976)、呂阿墉、蔡先於、呂靈石五人當選文協分裂後重建之「東京新民會」<sup>27</sup>的理事，繼續從事民族運動的活動。該會在1928年至1930年間，陸續出版了《新民會文存》三輯，第一輯《台灣地方自治問題》，由楊肇嘉、呂晚村、呂靈石合著；第二輯包括兩篇論文，一為張梗

<sup>23</sup> 葉榮鐘〈記辜耀翁〉《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358。

<sup>24</sup> 參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02。

<sup>25</sup> 參葉榮鐘〈矢內原先生與我〉《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215。

<sup>26</sup> 戴國輝〈葉榮鐘先生留給我們的淡泊與矜持〉轉引自葉榮鐘著《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9。

<sup>27</sup> 參葉光南、葉芸芸《葉榮鐘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2002年3月初版)，頁37。

所著〈關於台灣報紙之創設〉，二為黃得時著〈同化關稅撤廢運動的提倡〉；第三輯為葉榮鐘所著的《中國新文學概觀》。除了寫作《中國新文學概觀》外，在 1928 年因看不慣詩壇的沉淪，他以「葉天籟」筆名發表了〈墮落的詩人〉，並從 1929 年 4 月開始因為討論戲劇的問題，和江肖梅、張淑子等人打了將近一年的筆墨官司。又因稍早的〈墮落的詩人〉一文引起一些無聊的舊詩人的不滿，憤而加入戰局，並寫文章罵葉榮鐘，一來一往，讓日據時代第二次的新舊文學論戰熱鬧滾滾。兩次的東京留學，讓葉榮鐘狹隘的視野和思維開闊了，他不但學到了有關政治經濟方面的學問，也漸漸有了世界觀。並開始參與台灣留日學生的政治文化活動，實際加入關懷台灣的行列，從此和台灣社會文化運動脫不了關係。

### 三、葉榮鐘的個性

#### (一)淡泊名利、樂天達觀

葉榮鐘是日據時代台灣的知識分子，不僅是寫作的文人，更是領導社會改革，對抗不合理殖民政權的中堅分子，他寫了許多文章介紹世界新思潮，推展文化活動以啓發民智，又參與組織議會請願團體，領導社會運動，為台灣人民爭取政治、經濟的自主權利。他是林獻堂的秘書，很多時候都是站在幕後的，因此很多人忽略了他，然而他不居功，甘心在幕後默默付出的精神更值得我們欽佩。戴國輝在〈葉榮鐘先生留給我們的淡泊與矜持〉一文中說：

我深覺，葉老若不是具有淡泊明志、超塵清高的品格和修養是難有上述業績留芳於世的。<sup>28</sup>

由於葉榮鐘擁有此種個性，才能讓他用笨工去作《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及《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等書，這一冊冊都是笨工所積累下來的。另外，從其日記可看出，他常默默地替林獻堂、楊肇嘉、陳炳等人代筆，發表過不少膾炙時人的佳文，他從不計較名份，因為名利富貴對他來說，和浮雲一樣。從他的詩作〈感事〉可以看出：

安貧樂道說紛紛。處世惟憑夙夜勤。秃筆一支誰可奪。餘年又欲掃千軍。

---

<sup>28</sup> 引自葉榮鐘著《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年8月)，頁9。

名利是身外之物不必強求，凡事惟有盡心盡力，手上的這支筆才是他能掌控的，往後的日子，將努力做個筆耕者，葉榮鐘又說：

假使運命可由我來選擇的話，我仍將採取到現在這一條——清寒、寂寞——的歷程而放棄富貴、榮達的另一條路。<sup>30</sup>

他認為要有富貴榮達的生活，一定要付出代價，或許是出賣靈魂、或許是改變人格，這都是他沒把握，也是他不願意的，所以他選擇讓自己一生寂寂無聞、快快樂樂，做個平平凡凡的薪水階級來過這一生。在 1977 年 10 月所寫的〈鬥癌記〉一文中他清楚的剖析了自己的個性：

我這個人，生來就沒有大志氣，更沒有創造事業的野心，所以對事物沒有「執著」心。不過這樣的性格，也有其好處，不必奴顏婢膝去求人，也無需蠅營狗苟去鑽營，緣此萬事比較看得開。<sup>31</sup>

短短數語，可見葉榮鐘性情之灑脫，及與世無爭的天性；凡事但求盡心盡力，心安理得而已。林莊生<sup>32</sup>在其《懷樹又懷人》一書中對葉榮鐘有無限的回憶：

……在他(榮鐘叔)逗留的時候，我家客廳總是談笑風生，熱鬧之至。<sup>33</sup>

或許是他樂天知命、談笑風生，凡事豁達、不加計較，因此得以“天公疼憨人”，林莊生說：“葉榮鐘是很有福氣的人，他一生遇到三次危機，每一次都能轉禍為福。”<sup>34</sup>此種豁達的個性在他晚年得悉罹患癌症時更是表露無遺。他說：

我對『死』的問題看得很淡，原因很簡單，第一是知道『死』這一關是無人能夠逃避的。第二是自己年事已高，多活幾年與少活幾年，其間相去無幾，不足計較。還有一點是多年來對世事一直站在旁觀的立場，知道這個

<sup>29</sup> 葉榮鐘〈感事〉《少奇吟草》，同註 13，頁 240。

<sup>30</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89。

<sup>31</sup> 葉榮鐘〈鬥癌記〉《半壁書齋隨筆第二輯美國見聞錄》，同註 3，頁 386。

<sup>32</sup> 從母姓，是日據時代知識份子兼民族鬥士莊垂勝的兒子。莊垂勝(1897-1962)，字遂性，號負人，鹿港人，從小就與葉榮鐘友好，二人曾一起辦過《晨鐘》、《南音》，都做過林獻堂的秘書，台灣國府時期，莊垂勝出任省立台中圖書館長，葉榮鐘任編輯組長。

<sup>33</sup> 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台北市：自立晚報社，1992 年 8 月第一版一刷)，頁 226。

<sup>34</sup> 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同註 33，頁 237。

世界已經不是老人的世界，沒有自己出頭的餘地，自然而然對事物就覺得冷漠不關心，對生活也缺少積極的意欲。<sup>35</sup>

可見葉榮鐘不但對於生沒有「執著」心，對於死看得更淡，這就是他達觀磊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生觀。

## (二)執俠仗義、守正不阿

由於葉榮鐘在公學校的成績不是很理想，連帶對課業也就不感興趣。公學校第三學年起，他開始到市場去聽講故事，內容有封神演義、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西遊記、平妖傳等，故事中的人物都是他衷心嚮往的英雄人物。除了聽講故事，他也逃學去玩，甚至第五學年以後他開始與同學打架，打架原因據他自己分析認為是打抱不平的成分居多，平時只要見到同學被欺負，都會路見不平，生出俠義之心，甚至以保護者自命，所以在公學校期間也為此和同學打了幾次架，甚至被老師處罰，相信這和他喜愛俠義的英雄人物有關。好打抱不平、執俠仗義的天性促使他日後能全心全意投入民族運動，為全台灣百姓的幸福與日人周旋，以爭取台人最大的福利。

由於家道中落，葉榮鐘到日本求學期間，曾先後接受林獻堂及辜顯榮的資助，對於他們兩人的恩情也都銘記在心。然而在對日人的態度上，他追隨了林獻堂的民族運動，而不走辜顯榮與日政府妥協的御用紳士的路線，當辜顯榮成為「台灣公益會」的會長，並極力勸誘林熊徵、李延禧、許廷光等有力者反對文化協會，且公開說：“追隨文化協會一派的行動殊非台灣人幸福所應走之路”<sup>36</sup>。對此葉榮鐘大義凜然的站起來批鬥「公益會」，並在其執筆的《台灣民族動運史》中對辜顯榮有嚴如斧鉞的春秋之筆，然而對於辜顯榮幫助他完成留學日本的愛心他不敢忘，在〈記辜耀翁〉一文中，對辜顯榮一生的為人處事，人格特質，優缺得失，秉筆直書，表露無遺。

倫理道德是文學作品的生命，做為一個文學工作者，須具有崇高的正義感，才能在作品中將倫理道德發揚光大，倘無正義感，那寫出來的作品就是枉然的。葉榮鐘本著公私分明、耿直的個性秉筆直書，不阿諛、不奉承權貴或日本政府，

---

<sup>35</sup> 葉榮鐘〈鬥癌記〉《半壁書齋隨筆第二輯美國見聞錄》，同註 3，頁 386。

<sup>36</sup> 葉榮鐘著〈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353。

做事有原則，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肯定的。

### (三)傲人骨氣、高超志節

葉榮鐘和林獻堂、陳炘、莊垂勝……等人，皆屬溫和派民族主義者，看起來溫和有加，攻力不足，有時幾乎是委曲求全不敢吶喊，因此常被衝勁有力、成事不足的熱情人士所詬病。然而外表看起來頗溫和的他們，其內心又是怎樣的呢？葉榮鐘在 1939 年 3 月 5 日的日記給我們很好的答案。這一天他帶女兒阿蓁去參加「小學校」的入學面試，受了一肚子氣難受的回來，在日記上他如此寫道：

在嚴密的警戒下，考查的繁雜是時有所聞。因事先已有覺悟，所以也不會憤慨。但看到會集在一起的父兄們卑屈的面孔，真令人難受，看到那些台灣婦女穿著奇奇怪怪的和服之媚態，更是使人作嘔。只是小孩對視學的最後一問，沒有說謊，老老實實以無言相對，是唯一的安慰。<sup>37</sup>

當天口試時，考官問阿蓁幾個問題她都能對答如流，唯獨問「日本國中最偉大的人是誰？」阿蓁無言以對，只是沉默著，這表示葉榮鐘平時的家庭教育獨缺日本精神。葉榮鐘在經過一天的折騰及受氣後，只對此事感到安慰，從這種心理反應可知他對民族的矜持是如何堅持，因此面對那些屈膝阿諛的同胞，當然會生氣並心生藐視之意。

他有一個朋友從大陸回來報告那邊的狀況時，對於這位朋友只談功名利祿，完全無視於悲慘戰爭的存在時，他內心感慨萬千。為此他自問「什麼是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他的結論是：

知識分子的特質是他有銳敏的良心，因為知識原來就有磨練良心的功用的，良心不亮的人就是有知識也不能算真正的知識。<sup>38</sup>

葉榮鐘就是秉持這個原則在教子女的，在他寫給在美國求學的兒子的信上，他告訴兒子：

……做學問最怕驕傲，兒能謙遜最使我高興。這是做人的起碼條件，有才

---

<sup>37</sup> 葉榮鐘著《葉榮鐘日記》（台中市：晨星出版，2002年3月初版），頁169。

<sup>38</sup> 葉榮鐘著《葉榮鐘日記》，同註37，頁173。

又必須有德，謙遜是八德之門，貫能循此路進發，一生必不致走錯了路。

39

在葉榮鐘身教言教並施的教育方法下，旅居美國的長子葉光南，很快地在洋人的世界受歡迎並佔有一席之地——是美國馬利蘭大學化學系教授，葉榮鐘功不可沒。葉榮鐘一生立身處世的原則：他認為一個讀書人，要以謙遜的心來做學問，將所學與現實社會結合，處處要表現對同胞人溺己溺的關懷，且要有家國之痛，身世之感，更要有傲人的骨氣和高尚的節操。有位識者曾說過：

葉榮鐘在日本是學經濟，卻無補於自己的經濟，因為他雖然爬過彰化銀行副總經理的寶座，退休下來，仍是兩袖清風。<sup>40</sup>

這不但是葉榮鐘的人物寫照，也是他一顆文學良心閃閃發亮的明證。

在絕大多數人都不敢的時代，葉榮鐘憑著對名利的淡泊、執俠仗義的精神、高超的志節、捨我其誰的使命感，以他的能力和智慧，完成了別人不敢寫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尹章義稱讚的說：

葉榮鐘「捨我其誰的自負」不只是徒托空言，而是實踐在《日據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中，在書中，我讀到日治時代台灣人的骨氣、勇氣和智慧；<sup>41</sup>

由此可知葉榮鐘受人尊崇的地方，就是其肯持續文學志節的心地，願清貧終其高風亮節的作風。

#### 四、葉榮鐘的感情世界

葉榮鐘曾對感情下了一個定義，他說：

人若不能受人愛當然是很可憫的，但不能愛人的人更可悲，所以愛才有絕

---

<sup>39</sup> 葉光南、葉芸芸主編〈家書——寫給旅美子女的信（1963-1978）〉《葉榮鐘年表》，同註 27，頁 86。

<sup>40</sup> 林芳年〈悼葉榮鐘氏〉引自《台灣文藝》，第 63 期（1979 年 3 月），頁 244。

<sup>41</sup> 尹章義〈捨我其誰的史家和客觀環境的互動〉引自葉榮鐘著《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649。



對的價值。…莫論對手的反應如何，你能憐能惜就有價值了。<sup>42</sup>

因為抱定這樣的原則，可知葉榮鐘是一個感情飽滿、浪漫，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所以在其一生雖經驗過幾次失戀，也都能恬然處之。有詩為憑：

飄零無怨貧甘受。辜負熱情太不堪。滿腹悲愁難自己。強舒淚眼望天南。  
咫尺天涯若為情。四垂羅帳十重城。異床畢竟難同夢。深夜猶聞輾轉聲。

43

相思的滋味確實不好受，感情豐富的他也吃了不少苦，但他並不因此而退縮，反而引湯鄉謀的話說：

人生須有兩副痛淚，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遇佳人。余於前者固未敢，於後者則哭之久矣。<sup>44</sup>

話雖如此，但其中有一次，真的讓他刻骨銘心，悲痛不已。對象是同住鹿港的一位富家千金，沒想到在他留日的第三年，女方竟奉父母之命嫁給了別人，他失戀了，悲痛之情，在 1929 年 9 月 7 日所寫的五十二行七言長詩（斷腸詞）序中可看出：

雲龍君（林獻堂次子）歸自台灣，余迎之東京驛，在歸寓之電車中談及故鄉事。君報謂伊母在台已將其婚事許人，而兩家於秘密裡議婚，事成已八九矣！余聞言肝腸欲裂，悲憤難已。自是以來精神恍惚，眠食頓減，數日間殆無生意。顧此滿腔悲哀又無可告語者，乃作斷腸詞以申其萬一；是亦如小兒之藉號哭以忘其痛苦者歟！」<sup>45</sup>

此詩甚長，從詩的後半段，就可見其用情之深之專：

我本無家飄泊者，卿自多情解憐才；春間識得相憐意，至今相見近百回。  
共博牙牌動徹夜，歡談竟日兩難捨；同圍爐火禦春寒，爭飲殘冰消盛夏。  
纏綿不減魚水親，繾綣每招阿母瞋；幾多言語皆堪憶，曾無顰笑不動人。

<sup>42</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90。

<sup>43</sup> 以上兩首選自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 13，頁 101 及頁 105。

<sup>44</sup> 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 13，頁 101。

<sup>45</sup> 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 13，頁 106。

動人顰笑難再睹，空憶花容妍且好；千般蜜愛似煙消，萬種歡情成懊惱。  
往事而今盡成夢，此心惻惻餘悲痛；悔向藍橋錯問津，多情竟被無情弄。  
悲懷欲寫措辭難，熱淚如泉拭不乾；風雨漫天愁似海，詩成未忍從頭看。

46

詩中他從熱戀的甜美寫到失戀的痛苦，當他追憶這段無緣的戀情時，除了湧上無限的惆悵外，也表達無產者面對舊禮教——門當戶對的無奈。他明知這個初戀的對象是日人所謂的「高嶺之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可是仍放了感情，並為她寫了很多情詩，甚至晚年返鄉看賽神，觸景生情之下，也作了感舊詩四首，其中“惱人鑼鼓正喧天，舊夢幢幢上眼前；縱使癡情仍未泯；霜華無奈已侵巔”。<sup>47</sup>可見這一段感情仍鮮活的存在他心中。葉榮鐘坦承他在乎的是曾經擁有，深信“能憐能惜就有價值”，至於能否長相廝守就看運命的支配了。若不是這樣，一切的美你將無法去欣賞熱愛。因此儘管他一生中有過幾次戀愛與失戀的經驗，甚至追求過戲姐，但都是純真無邪的，

1931年他三十一歲時，跟二十四歲出身書香門第的施纖纖女士結婚。秀外慧中的葉夫人是鹿港施錦標先生和陳謙女士的長女，下有一個弟弟施維堯，由於五歲時失怙，所以一家三口就由伯父施爾錫先生扶養，葉夫人畢業於彰化高女，曾在鹿港女子公學校執教。他們的感情甚篤，可從其1931年4月5日的日記中看出：當時葉夫人除了葉榮鐘外，另有追求者若松先生，此事引起葉榮鐘的不安與嫉妒，經過葉夫人的解釋並含淚說了“請你相信我”後，葉榮鐘才知道原來他倆皆如此深愛對方，他自己陳述說：

……我們的愛已經到了最高潮。我們的愛是淚與血所培養的。……我們互相擁抱而哭。我雖沒流出淚來，但為她、為我自己不知內心流了多少眼淚。這樣我們的愛情更堅固了。<sup>48</sup>

婚後葉夫人的身體非常不好，時常生病，葉榮鐘非常憂慮，認為這是做丈夫的責任，且堅信除非用愛情否則無法救她，所以他說：

我非要更明白地告訴她我對她的愛情，使她更有堅決的信心不可。她對我

<sup>46</sup> 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13，頁107。

<sup>47</sup> 葉榮鐘著〈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390。

<sup>48</sup> 葉榮鐘著〈第一部「自治聯盟」時代：一九三一年〉《葉榮鐘日記》，同註37，頁37。

的客氣與焦慮非解消不可。<sup>49</sup>

就因秉持著“能憐能惜就有價值”的愛情觀，葉榮鐘與妻子的感情一路走來，不但相知相惜、互相扶持，更是老而彌堅。

## 五、與日人交往

### (一)幼年時期的印象

生長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和日人接觸是件很平常的事，葉榮鐘自述其幼年時對日人的印象中提到了兩個人，一位是衛生警察——「土糞大人」，他是標準的「番仔」（台人對日人的稱呼），身材矮小，但體魄精悍頑健。兩道濃眉，滿臉橫肉，唇上兩撇凱薩鬚，目露凶光，面呈殺氣，一副尊相令人望而生畏，他一天到晚專管清掃糞便的工作，誰家不乾淨他就取締，因此台人漸次養成天一亮，就把自家門口的垃圾清掃乾淨的習慣。當時日人在台灣制定清潔法嚴厲推行，除了平日的清掃工作，還有一年兩季的大清潔，因此「對於環境衛生非常重視，各地配置衛生警察專司其事。除每年春秋兩季實施大清潔外，平日對街路的清掃或公眾場所的衛生環境，尤其是市場、屠場等極為認真取締。」<sup>50</sup>雖然日人是為著自己的衛生起見，但也因此讓台灣人養成了好習慣，對此葉榮鐘也很認同的說：

日人統治台灣期間，無惡不作，罪孽深重，但對於治安的確保，迷信的破除，和環境衛生的推行，確實有相當的成績。<sup>51</sup>

另一位是叫中島的內務警察。由於葉榮鐘的父親當過保正，較一般老百姓接觸日人的機會多，因此認識了中島，他們兩人雖然語言不通，但一談便是一兩個鐘頭，在葉榮鐘的父親去世後，中島「在靈前來一個默禮，然後轉到靈柩的頭部，合掌俯藐，默禱了約莫有半刻鐘的光景，他纔舉頭垂手。」<sup>52</sup>他的態度非常虔誠莊重。這兩位日人所表現出的深摯人情味，讓從小對日人就有「嚴厲的殖民統治」印象的葉榮鐘，著實有不一樣的感覺。

<sup>49</sup> 葉榮鐘著〈第一部「自治聯盟」時代：一九三一年〉《葉榮鐘日記》，同註 37，頁 61。

<sup>50</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60。

<sup>51</sup> 葉榮鐘〈悵惘的回憶〉《半壁書齋隨筆》，同註 3，頁 24。

<sup>52</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62。

## (二)青少年時期的印象

在 1914 年葉榮鐘從公學校畢業後，還修了一學期的高等科，因家庭經濟不容許，一時無法繼續升學，所以畢業後，經人介紹至員林的一家西醫館充任藥局生。員林盛產香蕉，由於地利之便，數月之間對香蕉的產銷問題有所認知，這不但促使他日後對蕉農所掀起的青果問題發生興趣而挺身去奔走運動，甚至影響其一生致力於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治運動。離開員林返回鹿港後，到一日本人經營的片岡病院當見習生，由於醫師娘叫他「里仔」<sup>53</sup>，使他有被侮辱的感覺——“我被她叫一聲就像被侮辱一下似的，馬上自覺你是被人欺負的台灣人。”<sup>54</sup>因而漸萌台日有別的原生對立意識，因此一年未滿即辭職返家。不過，此時“若說由此喚醒民族意識未免言過其實，但是不知不覺之中形成一種對立的意識卻是事實。”<sup>55</sup>

在 1915 年春天，葉榮鐘受僱於台中一家日人經營的撞球場——新盛俱樂部，在那兒做計點員。這期間曾爲了日本顧客指摘台人的不是，而與之爭論衝突；雖然當時的他思想還很幼稚，知識有限，分不清個人與民族的立場，更不明公私的道理，甚至還沒有明確的民族意識，卻漠然地感覺被日人差使是件很可悲的事，爲日人做工而得報酬是很可恥的，因此沒做多久就借農曆 7 月中元節返鹿港，擅自離職。另外在此年的 6 月，受中國革命思想影響<sup>56</sup>，台灣南部發生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領導的西來庵事件，也稱焦吧哖事件<sup>57</sup>，這是台灣漢人對日本最後的武力抗爭事件。葉榮鐘每天把《臺灣新聞》的漢文版記事剪貼起來，雖

<sup>53</sup> 「里仔」是由「汝阿」轉化而來的「日式臺語」，原來「清國奴」是日人對台人的賤稱，民國成立以後，清國已不存在，纔改稱「汝阿」。

<sup>54</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79。

<sup>55</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79。

<sup>56</sup> 古野直也著，謝森展譯《台灣代誌——總督府到總統府》（台北市：創意力文化，1996 年 2 月），頁 166。古野直也以爲西來庵事件主謀者余清芳，受中國革命思想影響至爲明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德開戰導致中日交涉停滯，中日兩國即將開戰的謠言傳到台灣引發西來庵事件。余清芳趁民心浮動，鼓動抗日情緒，結合義民企圖一舉控制台灣，驅逐日人。

<sup>57</sup>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 年 8 月初版），頁 138。

1915 年 8 月 3 日余清芳、羅俊、江定三人所領導之抗日革命在台南廳下焦吧哖支廳管內蜂起，先於七月七日襲擊用仙埔支廳及各警官派出所，殺日人男女三十餘人復於 8 月 3 日襲擊南庄派出所及數個派出所殺死吉田警部補以下十三人。安東總督調軍隊赴援殘殺無辜無數雖婦孺亦不能免。據官方統計，被處死刑者九百零三人，被處懲役者四百六十七人，行政處分者二百七十七人。總督府方面頗有利用此一事變抵制板垣一派之報復，故意小題大做擴大事件之嫌疑。後來日本國會以台灣當局殘殺過甚頗有煩言。安東總督乃援用大正即位頒布大赦令之機會，將宣告死刑而未執行者七百三十一人改處懲役，罷免內田民政長官及高級官更多人以塞責。

然日本警察把余清芳一派寫成罪大惡極的叛徒，但他對余清芳等人卻有很深的同情心，他之所以會有如此熱切的關心，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所謂「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吧。<sup>58</sup>不過在此工作的半年多，他的日語有了長足的進步，他的日語既準確又流利，可說不遜日人，是日據時代少數能用流利標準中文、日文寫作的作家。

1916年，他在鹿港辜顯榮所經營的「鹽務總館食鹽配運站」工作，其工作是「持鹽引向專賣支局領鹽，並率領工人到鹽倉裝鹽，然後同專賣局的官吏立會過磅」<sup>59</sup>，此工作不但辛苦，且頻受專賣局日人官吏侮辱。由於此時他內心已自然而然地對日人有了一種反抗心理，碰到富有優越感的日人就不知不覺地要去頂撞他們<sup>60</sup>，因此他曾爲了袒護鹽工而與日籍職員衝突，蒙受日人暴力侮辱。這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被用暴力侮辱，所以他更加關心去思考，台人要如何來制止日人的暴虐行爲，及台人受殖民統治的問題。最後他發現除了增強自我的力量以外，別無他法，因此萌生赴日留學的念頭。他說：

台人要如何來制止日人的暴虐，這一問題使我加強關心著意去思索。我想來想去，除去增強我自己的力量以外，別無良法。這或者就是促進我發生到東京留學的念頭也未可知。<sup>61</sup>

雖然葉榮鐘一生和日人接觸機會頗多，但隨著年紀愈長大，其民族意識愈旺盛，所以終其一生並未交到一個真實的日本朋友。<sup>62</sup>

## 六、葉榮鐘的民族自覺

出身鹿港的葉榮鐘，家人的一切生活方式百分之百是沿襲傳統閩南人的模式。從小即感受到日人的歧視、警察的壓迫，因此對日本是深惡痛絕，胸中常存一股惡氣，自覺台灣人是被壓迫的民族。台灣百姓過的是奴隸的生涯，從其十八歲時所做的詩〈望月〉可看出其內心的無奈。

---

<sup>58</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381。"縱使新聞所報導的全是事實，余清芳、羅俊等皆是為著私利私慾去煽惑他人起事的大騙子，我也似乎不能改變我的觀感。這或者就是所謂「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吧。"

<sup>59</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386。

<sup>60</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386。

<sup>61</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387。

<sup>62</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02。

傷心莫問舊山河，奴隸生涯涕淚多。惆悵同胞三百萬，幾人望月起悲歌。

63

當時他的意識裡，已有做為殖民地人民的自我認知，所以同胞的觀念非常強烈，但是中國的觀念卻很稀薄，這可能是因為他出生在日本佔據台灣以後，由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已在上一代隔絕，而且葉榮鐘受的是日本教育，對於中國的歷史文化沒有特別造詣，因此無法產生休戚與共的感覺。及至他赴日留學到東京以後，也沒有交上中國的朋友，可是中國與台灣的密切觀念卻在此時油然而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離開台灣由遠處回顧，纔能夠理解整個台灣所處的立場，也纔會對中國發生親切的感覺。事實上，辛亥革命以前，中國的存在祇是使人洩氣，它不但不能做台人的靠山，反而增加台人的恥辱，因為日本人辱罵台人的口頭禪就是「清國奴」，因此一部分到日本東京留學的台灣人，常有一種自卑感，盡可能去掩飾自己的身份，雖然其志可鄙，其心情卻是可憫的。<sup>64</sup>

最早啓發葉榮鐘民族思想的人應是施家本，他是清代名舉人施仁思(?-1897)後嗣，在葉榮鐘記憶裡“他的生活非常浪漫，但命運卻很坎坷”<sup>65</sup>，由於他有才氣，所以父老們視他為後起之秀，少年人奉他為領袖，一般市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英雄。他會告訴葉榮鐘等人歷史上的知識、國際上的情勢和祖國處境的困難。葉榮鐘曾感激的說：

我們受他這樣無意無識的影響，不但得到很多的知識，我們的民族精神也受到不少的啟發和昂揚。<sup>66</sup>

毫無疑問地，施家本親口傳授葉榮鐘等人許多古詩，如「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這些充滿了民族精神的詩句，對葉榮鐘等人的影響不可謂不大，難怪他說：

假使我這個人的腦筋裡有一點點的民族精神的話，也是在少年時期得到家

<sup>63</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 13，頁 91。

<sup>64</sup> 參葉榮鐘著〈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活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98。

<sup>65</sup> 葉榮鐘〈詩人施家本〉《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293。據葉榮鐘敘述，施家本在國語學校就讀時，因為女人的問題，被校方開除，自此就與女人有不解之緣，即使結婚也不能制止他的放蕩。

<sup>66</sup> 葉榮鐘〈詩人施家本〉《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295。

本先生的灌輸和啟發而來的。<sup>67</sup>

除了口授詩句外，透過施家本帶回來的《新民叢報》，葉榮鐘讀到了梁任公的議論和來台所作的詩篇，這些詩也讓葉榮鐘對民族精神產生強烈的共鳴。有了這些民族精神的薰陶，讓葉榮鐘有高昂的民族鬥志，也促成其前半生為民族運動不遺餘力的付出。

### (一)對同化會的觀點

乙未割台之後，日帝統治台灣，運用各種高壓手段企圖切斷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母土文化關係，加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對立，因此台胞的抗日運動，從 1895 年至 1915 年西來庵事件為止，幾乎是沒有中斷，早期台人採用武裝抗日，但始終遭到摧折擊敗，死傷無數。當時台灣的領導階級目睹日人對台人的欺負，義憤填膺；即使有滿腔的民族感情，也都束手無策。就在這種徬徨與無奈時，1911 年春梁啟超應林獻堂之邀，偕其女兒及湯覺頓來台遊歷，給他們很大的政治覺醒，梁啟超建議他們倣效愛爾蘭人對付英國的方法<sup>68</sup>，因為在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下，過去那種前仆後繼的武裝起義無濟於事，只是讓更多的台人做無謂的犧牲，必須改用非暴力的政治鬥爭，爭取台人之平等權利，甚至台灣人的民智也需要急速的提高，才能對抗日人。有了這種認知後 1914 年 11 月日本明治維新功臣板垣退助伯爵來台籌組「同化會」，就得到林獻堂等知識分子的認同。「同化會」的成立旨趣在做為台灣人與日本人同化融合的交際機關，讓台灣人與日本人有著同樣的地位及權利待遇，然事實卻不然，據葉榮鐘說：

台灣同化會，……其目的在於同化台人。所謂同化之含義，扼要言之，即要求新附之台人，對日本國家與日人同樣盡其忠誠與義務。同時對台人，予以與日人同等之待遇，俾能撤銷殖民地與本國之軛域，而分化其民族的意識與感情。矢內原教授在其名著《帝國主義下之台灣》批評同化會為『日台人同床異夢』。蓋日人所企圖者，在乎使台人對日本國家盡忠誠，而台

<sup>67</sup> 葉榮鐘〈詩人施家本〉《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299。

<sup>68</sup> 參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25。台灣近代非武裝的民權政治運動，據說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當時梁啟超曾向林獻堂建議：“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倣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爾蘭人如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免。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

人所希望者，在乎提高與日人同等之地位與待遇。<sup>69</sup>

台胞著重於「與日本同樣的權利待遇」<sup>70</sup>，然而總督府及在台的日人則意在「與日本同樣的化育」<sup>71</sup>，要求台胞「同化」，永久成爲日本的奴隸；而林獻堂等人會參與同化會的目的是企圖透過此一團體運動，使殖民政府高壓政策鬆綁一點，藉以減輕台胞所受的痛苦。由於台灣砂糖對日本本國之財政收入有貢獻，因此被台灣總督府及日本移民視爲禁臠，上下其手，據爲私有。爲了有效控制台灣，他們極力主張台灣之特殊環境，一切必須特殊化。由於板垣之同化會，是主張內台一體，與總督府之企圖背道而馳，當然不被同意。總督府站在統治威權的考量下，以「台灣民心現在尚且反叛不定而輕言同化，寧非癡人說夢」<sup>72</sup>來答覆板垣，所以板垣伯爵幾乎是被驅逐出境的，前後不過三十四天，同化會就被迫解散。<sup>73</sup>雖然如此，但它卻代表著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參與政治事務和政治動員的濫觴。此一運動失敗，對於台胞意義甚大，不但使台胞重新認識日人真面目，也引起民族覺醒，從此意會到接受新思想的重要，並啓開民族運動的序幕。他們以台中資產家林獻堂爲中心，開始推動了台灣人的民族運動，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首發其端，這也是台灣同胞非武力抗日的開始。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人接受板垣的同化論，間接地表現台灣人當時的政治傾向是採取「民權」優於「民族」的態度。這種民權意識的產生，雖不是板垣的本意，卻因他的同化會而催生。自此以後，台灣人的民族運動，由前期的「種族的民族主義」轉變爲這種「民權的民族主義」，成爲此後二十四年台灣政治運動的主流。

## (二)加入政治運動的緣由

大凡專制政治國家之反抗運動，通常都先在國外組織起來，日治時代的台灣也不例外，當時台灣民族運動的先驅者是一群東京留學生。受 1918 年 1 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十四條和平意見及提倡民族自決的影響<sup>74</sup>；同年 8 月，林獻堂

<sup>69</sup>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95。

<sup>70</sup>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市：帕米爾書店，民 74（1985）年 7 月，初版，頁 176。

<sup>71</sup>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同註 70，頁 176。

<sup>72</sup> 參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濫觴〉《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54。

<sup>73</sup>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同註 70，頁 176。

<sup>74</sup> 參葉榮鐘〈參觀威爾遜總統遺像〉《半壁書齋隨筆第二輯美國見聞錄》，同註 3，頁 228。在威爾遜的十四條和平原則發表之前，葉榮鐘坦承對日本的不滿只是對日本警察而已，此和平原則



赴日，宴請東京台灣留學生，席上針對「台灣當如何努力」來討論，施家本提出須撤廢「六三法」<sup>75</sup>，他說：“六三法是台灣人的枷鎖，我們該快快把它撤廢，我們要決行一種運動。”<sup>76</sup>因為「六三法案」是台灣特殊化與總督專制政治最有力之根據，爲了有效行動，他們組織了「六三法案撤廢期成同盟會」，公推林獻堂爲會長、林呈祿爲幹事，目的在求撤廢總督專制政治<sup>77</sup>。這是台人有意識的且又具體的民族運動，也是「新民會」<sup>78</sup>著手的第一件實際運動。1920年秋天，林獻堂爲了「台灣六三法案」撤廢運動，<sup>79</sup>邀請台灣留學生與滯日先輩百餘人聚集於神田中國青年會館的禮堂開會，討論「六三法案」撤廢問題，林呈祿等人持反對意見，認爲此一運動，無異否認台灣之特殊性，肯定所謂「內地延長主義」，因此提出停止此一運動，改以設置強調台灣特殊性的台灣特別議會。林呈祿的議論獲多數人贊同，最後決定不再進行「六三法案」撤廢運動，也不公開標榜「自治」，因爲「台灣自治」與官方所倡「同化主義」強烈對立，爲避免正面刺激官方，迂迴「台灣自治」決定改向日本國會請願設置「台灣議會」。對此葉榮鐘曾加以解釋曰：

六三法案撤廢運動，旨在否定台灣之特殊性，而台灣議會運動，則係主張

---

頒布後，除了影響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也讓葉榮鐘在思想上開了眼界，且接受一個新的國際觀。

<sup>75</sup> 參葉榮鐘著〈六三法撤廢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73-93。《六三法案》是日本帝國議會於 1896 年 6 月（明治 29 年）所通過的立法案。因號碼列在第六十三號，所以簡稱六三法案。因爲台灣新附未久情形特殊，爲便利台灣總督施政能夠因時制宜起見，得由台灣總督發佈和法律有同等效力之「律令」。也就是議會界與台灣總督的一種委任立法權，使台灣總督成了集司法、軍事、行政、立法大權於一身的封建君主，同胞的生命、自由、財產，基本人權均被破壞無遺了。台灣一切惡法，像匪徒刑罰令、阿片吸食者取締令、保安規則、保甲連坐法等都是根據此法令所頒佈的律令。它成了台灣總督專制政治之張本，經台民不斷力爭反對，至 1921 年廢止。六三法案撤廢運動是台人自主的，根據近代政治思想所發動的有意識、有條理的政治運動，也是台灣父老開始和東京台灣留學生結合的機緣。此一運動代表台人政治思想的進步，後爲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所取，它的歷史意義非常重大，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sup>76</sup> 參葉榮鐘著〈六三法撤廢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87。

<sup>77</sup> 由於台灣只是日本的殖民地，依日本憲法所賦予人民的種種保障，台灣人民非但無法享受，且在憲法所不及的殖民地施行「總督政治」。台灣總督集行政、立法、司法與軍政大權於一身，在總督府的專制統治下，台灣人民飽嚐了殖民地人民的屈辱與辛酸。

<sup>78</sup> 葉榮鐘著〈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活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105。「新民會」成立於 1920 年 1 月 11 日，是東京台灣留學生組織之團體，林獻堂是會長。該會目的，在於作爲台灣民族運動之主體，是台灣民族運動初期之活動中心，即使台灣文化協會在台成立，它仍遙爲倚輔，與台灣相呼應。難怪《警察沿革誌》說：“「新民會」之組織……實踐則站在民族自決主義之立場，對島民作啟蒙運動，同時合法的圖謀民權之伸張乃毫無疑問。”「新民會」到 1937 年，因日本軍閥之壓力漸強，始歸於自然消滅。

<sup>79</sup> 參葉榮鐘著〈六三法撤廢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89。林獻堂主張六三法要撤，他說“如得撤廢六三法，縱使需要任何犧牲，於本人亦所不辭。”

台灣之特殊性，前後似乎矛盾，但在抵制總督專制政治則一也。<sup>80</sup>

事實證明「主張台灣之特殊性」，確實阻滯了「內地延長主義」日本想要對台灣的「同化」，等到 1940 年後厲行「皇民化運動」，要「同化」台灣人，已經耽擱了二十年了。<sup>81</sup>其實「六三法案撤廢運動」和同化會一樣，是以革除日本殖民統治官僚體系對台灣人的歧視和不公平待遇為目的，都是一種對平等權力的追求。

會議當天，大會提出請願書呼籲與會的同志簽名蓋章，在林獻堂的一句「榮鐘！你先去簽罷」葉榮鐘毅然地站起來簽名加入請願的行列，自言：「這樣，我便參加了台灣民族的政治運動了」。<sup>82</sup>這是第一次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是葉榮鐘正式加入台灣民族運動的行列。

## 七、葉榮鐘與台灣民族政治運動

1921 年夏天，葉榮鐘由東京歸台，經過幾番波折後，終於在彰化溪州林本源製糖會社<sup>83</sup>當一名小職員，那時候的林本源製糖會社，表面上是林熊徵先生做社長，事實上卻是交由台灣銀行代管，實權掌控在日本人手裡，所以四、五個月後，便因他留日期間曾經參加台灣議會運動的緣故，被當局革職。所以 1922 年春，葉榮鐘便轉而擔任林獻堂的私人通譯兼秘書，並開始追隨他至各地演講，報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經過，鼓舞士氣，呼籲同胞團結，並且參加「文化協會」，從此步入政治社會運動，積極謀求改善異族統治下台灣人的命運。在他「杖履追隨四十年」<sup>84</sup>期間，林獻堂視他如己出。他是林獻堂一手栽培出來的優秀鹿

<sup>80</sup> 葉榮鐘著〈林獻堂先生年譜〉《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102。

<sup>81</sup> 王曉波著〈日據時期「台灣派」的祖國意識〉《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市：東大圖書，1988 年 12 月初版），頁 41。

<sup>82</sup> 葉榮鐘著〈杖履追隨四十年〉《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9。

<sup>83</sup> 1930 年代開始，日本政府為扶植本國的資本主義，以做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動的後盾，便透過在台的殖民統治機構，加強對台灣的土地和資源掠奪，以便藉殖民地的農業，支援日本本土的工業，以加速其成長。日本殖民機構以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的力量，利用台灣的買辦階級（漢奸、走狗），對台灣農民進行無情的剝削，在這場土地掠奪的慘劇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日本製糖資本家和台灣人買辦資本家的攜手合作，聯合對台灣蔗農採取高度的壓迫剝削。「林本源製糖會社」和「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就是典型的與殖民者合作壓榨台灣人的資本家。他們不僅剝削農民的勞力，更結合政治的力量，奪去了台灣農民的最後一個據點——土地。失去土地的農民，便等於喪失了謀生的能力，生活頓時陷入困境。有的人出外做零工，有的人留下來在糖廠的示範農場裡，直接受大資本家的剝削。整個農村經濟因此破產，農民也因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sup>84</sup> 葉榮鐘著〈杖履追隨四十年〉《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9。

港子弟，認識林獻堂是他一生的轉捩點。

葉榮鐘一生參與台灣民族社會運動無數，是其生平主軸，也是本論文的主題之一，因此特闢此章節，將其一生所參與的民族社會運動，依先後順序做一個簡單的敘述，並藉以了解整個台灣人政治運動始末，及葉榮鐘在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影響。由於每個事件的發生除了有自我的前因後果外，互相之間也都有關連，是無法一一分割劃分成爲單一事件，所以在論述時，可能會有重疊，不過這也突顯出台灣當時的政治社會在日人的高壓統治及剝削之下，日人的陰險、台灣人的無奈、民族鬥士們的熱忱、政黨間的分分合合，編織出錯綜複雜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 (一)從事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1920年12月林獻堂、蔡惠如(1881-1929)等人衡量了客觀環境、日本當局及台胞情形，認爲宜採取較爲溫和方式來推進政治運動，因此決定籌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到1921年1月30日，已經獲得178人的簽署，他們請日人江原素六、田川大吉郎任介紹人，分別將「請願趣旨」提出於第四十四屆日本帝國議會貴族院暨眾議院，這是台灣人第一次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針對台灣總督府對台灣人之統治，林獻堂等云：

此不僅為帝國治下三百六十萬新附民眾難忍之苦痛，實係不容於現代世界思潮之污點。<sup>85</sup>

他們除控訴台灣總督府對台人的高壓統治、嚴重剝削，致台人生活困苦外，並呼籲帝國議會正視此一問題，「請願趣旨」內容如下：

……對於新領土台灣之統治，務要參酌其特殊事情，借鏡世界思潮，洞察民心之趨向，速予均等種族之待遇，俾得依據憲政之常道。是即開設由台灣住民公選之議員所組織之台灣議會，使台灣眾體得一視同仁之聖旨，均霑立憲政治之恩澤，成為善良之國民以完成地理上、歷史上特殊之使命，確信為目下最大之急務。……<sup>86</sup>

<sup>85</sup> 葉榮鐘著〈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135。

<sup>86</sup> 葉榮鐘著〈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135。

請願書上鄭重的呼籲日人要秉持著種族平等的原則，讓台灣人設立自己的議會，處理台灣人自己的事物。對此葉榮鐘有詳細的說明：

這一篇請願文的內容包括下列四項重要意義：第一點承認台灣特殊事情，有特別立法的必要。第二點日本是立憲國家，台灣既為其領土，自應享受立憲政治的恩澤。第三點台灣總督掌握行政、立法的全權顯係違反憲政的常道。第四點設置民選台灣議會以便協贊台灣的特別立法及台灣預算，也就是將法律所委任於台灣總督之特別立法權，改由台灣議會去審查。<sup>87</sup>

確實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在不跟殖民者正面衝突的原則下，開創出來的妥協空間，它以追求台灣人擁有更高政治權力為目的。它是透過議會政治的方式來達成目的的，是當時日本思想界受到最多支持的理念。表面上它是依據日本帝國憲法的人民請願權而發動的合法運動，骨子裡卻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自決運動。

第一次請願成員大部分是東京台灣留學生，且請願結果只得到統治者的冷漠與蔑視，然而此舉已激起島內百姓滿腔的熱血，尤其是年輕人，更為之熱忱滾滾。因此第二次請願簽署人數就超過五百人，<sup>88</sup>且逐年增加，因此引起日方的重視及監視，知道不能等閒視之。1924年葉榮鐘當選為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代表，並於1925年2月與林獻堂、楊肇嘉、邱德金等代表赴日為議會設置運動作第六次請願，再度向日本國會請願，在東京一個多月期間，走訪日本政要，為台民請命。3月歸台後，赴全台各地演說，所到之處，盛況空前。此運動是透過議會政治的方式，以追求台灣人擁有更高的政治權力為目的，雖然獲得一些日人的支持，然而此運動發展的結果與殖民政權“衝突”是難免的，而日本議會又因受台灣總督府之策動，態度甚為冷淡，每次審議，均不了了之，葉榮鐘就以「殖民地人民滿腔熱血所換來的只是統治者的冷漠與蔑視而已」<sup>89</sup>來形容。

1934年2月1日，林獻堂偕蔡培火(1889-1983)應總督府警務局長石垣之召見，被勸停止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石垣謂：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被人稱為台灣獨立運動之準備，藉以反對地方自治制之

<sup>87</sup> 葉榮鐘著〈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135。

<sup>88</sup> 葉榮鐘著〈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150。

<sup>89</sup> 葉榮鐘著〈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148。

實施，君等何苦作此決不能成功之台灣議會運動，以阻礙將成之地方自治制乎，不如中止為愈。<sup>90</sup>

此時林獻堂、蔡培火等人鑑於時局之壓迫日趨嚴重，又對議會之請願審議狀況，頗感失望，所以歸台後他們徵求各方同志之意見，遂於 9 月 2 日議決停止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總計從 1921 年開始至 1934 年為止，「台灣議會」的請願運動一共有 15 次，歷時 14 年，雖然沒有成功，然而，它深深地影響這 20 年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保持了台灣的「特殊性」及「民族性」。在殖民地體制下，台灣議會的不能成功，只能「缺憾還諸天地」，但從民族運動的觀點視之，卻是一項成功的策略。<sup>91</sup>葉榮鐘也說台灣議會運動對台灣人來說不僅是一個合法運動，也是明智之舉，它啟發了台人的政治意識，也促進台胞團結，並提高民族意識。<sup>92</sup>

日本警務局曾針對此運動做一番檢討，他們皆認為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在台人心目中是一種民族運動，亦即一種對總督專制政治反抗運動。由於看到台灣如此多仁人志士灑熱血、拋頭顱、揭竿而起、英勇抗敵，日人深怕此種情結重蹈覆轍發生在滿洲，因此伊澤多喜男<sup>93</sup>請教蔡培火及林獻堂，統治滿洲有何妙策，並邀集葉榮鐘、陳炳、莊遂性、洪元煌、張煥珪等人討論寫出台灣統治失政之原因與實例，葉榮鐘執筆屬文，當時歸納出日本管理台灣不得人心的原因是：1.民族的歧視；2.待遇不平等；3.經濟壓迫；4.教育不平等。可見台灣議會請願活動，對日人已造成威脅了。<sup>94</sup>

## (二)治警事件

受到中國的五四運動、日本的大正民主運動<sup>95</sup>，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

---

<sup>90</sup> 葉榮鐘著〈林獻堂先生年譜〉《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137-138。

<sup>91</sup> 參王曉波著〈日據時期「台灣派」的祖國意識〉《台灣史與台灣人》，同註 81，頁 41。

<sup>92</sup> 葉榮鐘著〈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199-208。

<sup>93</sup> 參葉榮鐘著〈吳三連氏〉《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345。伊澤為日本開明政治家之一，自其胞兄修二氏以來即與台灣發生關係，他本人又曾任台灣總督，故對台人的處境甚表同情。

<sup>94</sup> 葉榮鐘著〈林獻堂先生年譜〉《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137-139。

<sup>95</sup> 大正民主運動：日本在大正年間(1912-1926 年)實施的，模仿西洋的民主，言論、思想完全開放，葉榮鐘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迄民國 15 年，這一段期間正是日本所謂「大正民主主義」的興隆期。”當時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等口號在日本喊得非常響，整個社會也開始民主化，一些民主類型的政黨紛紛出現，在日本政府當中主導日本民主化政治的推行。有這樣的社會風氣、政治的指向，所以民間就有一種自由開放的民主的風氣，民權思想達到最高潮，女權運動、勞工運動以至於少數民族的水平運動皆在此一時期發生。甚至左派也出來了，像社會主義、共產

界性的民族自決潮流、自由和平的呼聲。台灣新一代的菁英青年，漸漸地有了現代化及民族化的覺醒，他們要追求台灣的民族自決，他們對總督府所標榜的「一視同仁」、「日台如一」起了疑心。日人古野直也在〈歷任台灣總督治台成績〉中提到：

……教育水準提高也使知識份子加深對現狀的不滿，批評總督府當局所標榜的「一視同仁」、「日台如一」未落實。同為日本屬地，朝鮮的怨恨在於統治根本問題，台灣的不滿不在分離問題，而是單純對待遇上歧視的不滿，以及與朝鮮相比的不公平感。……被迫服從總督府未根據法律發號施令的法令，……「日台如一」，給台灣人一場短暫的歡喜。<sup>96</sup>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同志在進行活動時，深感組織一政治結社作為主體是必要的，於是 1922 年 12 月初，在日本成立了「台灣議會設置期成同盟」。此事台灣總督府非常不高興，雖然成立地點在日本，但在台灣還是非法的。終於 1923 年 12 月 16 日清晨，台灣總督府忽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為理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對該會會員進行全島性的大檢舉，結果會員及相關人士有 41 人被拘押，58 人被搜索或傳訊，波及的人數有一百七十餘人，造成轟動一時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簡稱「治警事件」）<sup>97</sup>。

事情發生後到處有武裝警察與便衣特務站崗巡察，張目怒視如臨大敵。葉榮鐘經偵訊後獲釋，次日，經林獻堂囑咐，他躲開日本特務人員監視，由追分站乘海線火車趕赴台北，潛訪東京《大阪朝日新聞》特派員蒲田，請其據實向東京本社報導事件真相。並請該社政治部長神田正雄聯合同情台灣的日本政要向總督府施壓，催促政府命令總督府公佈事件內容，解除台灣的恐怖狀態；又晤蔣渭水勸阻發動群眾示威，因為事件發生之時，蔣渭水擬發動工友聯盟分子，舉行群眾示

---

主義就很受當時年輕人的嚮往。此風也感染到台灣，1918 年日本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組成了「應聲會」，1920 年改為「啓發會」，後來又變成「新民會」，當時這種結社在台灣是不被允許的，甚至會受到官方的取締，所以成立的地點都放在日本。不過 1930 年後日本就開始軍國主義化，開始有了對外擴張的野心，大正民主自然被丟掉了。以上資料參葉榮鐘〈文化運動的回憶〉《半壁書齋隨筆》，同註 3，頁 210。及黃琪樁〈日據時期社會主義思想之接受與大正文化〉《20 世紀台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研討會》（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1 年）。

<sup>96</sup> 古野直也著謝森展譯〈歷任台灣總督治台成績〉《台灣代誌》（台北市：創意力文化，1996 年 2 月初版二刷），頁 278。

<sup>97</sup> 參鍾肇政著，莊紫蓉編《台灣文學十講》（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0 年 11 月初版第一刷），頁 102。日本有一個台灣單行法——治安警察法，違反治安警察法叫做治警事件。

威運動，抗議總督府的壓迫。林獻堂知悉後，深恐此舉會落入台灣總督府的圈套，致使同胞蒙受更大犧牲，故命他前往勸止，不可衝動，終於撤銷示威運動計劃。翌日葉榮鐘繼續轉赴基隆，懇託「因幡丸班輪」之台籍船員帶三件信函，在船抵神戶時投郵，寄給東京的同志（林呈祿和莊遂性）及「東京台灣青年會」，促他們向日本朝野呼籲早日解除台灣總督府的恐怖政治。由於葉榮鐘的勇敢加上機智，終於成功地將日方嚴密封鎖之「治警事件」消息傳出島外。事件的真相經過報紙的披露，台灣總督府只好停止進一步的搜捕行動，全島才漸解除恐怖狀態。此事件葉榮鐘扮演了關鍵性連絡的角色，經其奔波才得以免除災難的擴大，台灣社會因此恢復正常的狀態。<sup>98</sup>由於本案發生時正值台灣反日運動統一戰線高潮時期，故本案對於民族意識昂揚有極大的影響。

### (三)台灣文化協會

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靜修女學校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它是由蔣渭水等台灣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生所提倡的文化啓蒙運動團體，它和「台灣議會」一樣都是屬於民族解放運動團體。會中推選林獻堂為總理，林幼春為協理，蔣渭水擔任專務理事。蔣渭水深知台灣的文化是落後的；要趕上先進國家的文明，必須從文化的啓蒙、改造著手。他在文化協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辭說：

我診斷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治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治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治療的機關。<sup>99</sup>

這是政治家為台灣診斷後所開的處方箋，針對文化不良對症下藥的。從蔣渭水對知識、文化的重視，可看出文化協會所具備的時代意義。面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感受到政治地位的低落，究其原因，絕對不只是日本人在軍事、經濟上的強盛而已，劣勢文化遭受優勢文化的支配才是根本原因。台灣人對現代知識的缺乏，將無法抵擋殖民霸權論述的滲透。鑑於此，當時的知識份子已自覺必須使用文學形式來喚起民眾的政治意識，引導民眾去認識殖民體制的本質，進而了解當時台灣人的處境，文學是政治運動的輔助工具。為「謀台灣文化之向上」

---

<sup>98</sup> 參葉榮鐘著〈「治警事件」始末〉《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238-241。

<sup>99</sup> 葉榮鐘〈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330。

<sup>100</sup>，文化協會舉行多項文化活動，提升民眾對現代世界的認識。首先發行會報，推廣《台灣民報》，並從舉辦各種講習會、文化講演會，讀報社著手，進而開辦夏季學校<sup>101</sup>、文化書局、無力者大會、文化演劇<sup>102</sup>與「美台團」<sup>103</sup>……等文化啓蒙運動。文化協會對民眾文化的啓蒙不遺餘力，爲了吸收更多年青人加入民族運動的行列，蔣渭水提出了「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標語，<sup>104</sup>此舉後來更發展到領導農民組合、工友聯盟，展開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總的來說文化協會不僅刺激台灣意識的成長，對於階級意識與性別意識的開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協的成立，使台灣非武力的反殖民運動，進入一個真正全島性聯合戰線的文化抗爭時期，也是台灣本土第一個以群眾爲成員目標的組織。林獻堂是文協的總理，身爲林獻堂通譯兼秘書的葉榮鐘理所當然會參與其活動，據葉榮鐘的資料來看，他參與最多的活動是講演會，其中最令他津津樂道的有：

## 1.無力者大會

在 1924 年，葉榮鐘與林獻堂、楊肇嘉、邱德金當選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代表。當第五次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東京大吹大擂熱烈進行，文化協會領導的政治社會運動也在台灣蓬勃展開之際，御用士紳辜顯榮、林熊徵、吳昌才、李延禧等人籌組了「公益會」<sup>105</sup>，他們是受總督府利用的御用團體，6 月 24 日在《台灣日日

---

<sup>100</sup> 葉榮鐘〈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333。

<sup>101</sup> 葉榮鐘〈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342-347。文協之辦夏季學校是針對總督府差別待遇之教育政策而以實際行動來表示抗議。葉榮鐘認爲這是一種象徵性的民族教育，對青年具有啓發民族精神的作用。夏季學校是文協眾多文化活動中一項具有特殊意義的活動，林茂生曾講述夏季學校的意義：“休假非休止活動，大自然的活動是在暑天，若將夏天扣除，台人就無時間可做事，故變化就是休息！”轉引自李筱峰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市：自立晚報，1991 年 2 月第一版六刷），頁 26-27。

<sup>102</sup> 參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市：台原出版社，1993 年 6 月），頁 131-135。文化劇是台灣新劇的一種，所演劇情大都含有諷刺社會制度或激發民族意識的作用，所以台灣總督當局對其之取締與講演會是同樣的積極，演出時除了稟報劇名外，還得謹呈劇本的內容。

<sup>103</sup> 葉榮鐘〈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361-362。美臺團的活動是政治性的，是以電影活動進行民族的抗爭。文化協會舉辦講習會及講演會的活動，對於無智文盲的農民、勞工階級效果不彰，鑑於此文協專務理事蔡培火出資購買映寫機及宣傳用映畫，訓練文協會員擔任說明者，到鄉下巡迴放映，利用映象及說明使觀眾由眼睛及耳朵去接受知識，從而教化人民，並起來反抗日本的殖民壓迫，其啓蒙的效果更加切實而具體，民眾也借機接觸影像藝術，所以美臺團的電影活動可以說是一場文化洗禮，真正做到文化啓蒙的社會教育工作。

<sup>104</sup> 葉榮鐘〈革命家蔣渭水〉《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251。

<sup>105</sup>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市：草根文化社，1998 年 4 月初版），頁 295-296。總督府爲了再進一步的獲得「以台制台」的實果，於 1923 年 11 月成立「台灣公益會」，使之對抗台灣知識份子的民族解放運動，以總督府的特權份子辜顯榮及林熊徵分任正副會長。



新報》（這是屬於總督府的機關報紙）社長井村大吉的周旋下，於台灣各報及日本內地各主要報紙發表聲明謂：

本島人一部分小數者別有用心際此特別議會開會，作種種運動及宣傳，但此係多數本島人所不與聞者，緣此不日擬開全島有力者大會，鑒於時局之重大及為本島之將來，宣明所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絕非本島之輿論。

106

他們在 6 月 27 日召開「全島有力者大會」，擁護內田總督，並企圖指摘台灣議會運動是異端，非全體台人之民意。他們如此做的原因，表面上是對抗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實際上是要為內田洗刷壓迫人民請願權的污名，為其留任盡一臂之力，當然最終用意就是為了謀求個人的最大利益，而日本政府也希望藉此機會執行其奴化台灣的政策。為此，文化協會決定於 7 月 3 日下午三時，假台北、台中、台南三地舉行「無力者大會」與之對抗。台中的聚會由葉榮鐘致開幕辭，然後公推林獻堂當座長主持大會，並發表各地之祝電；再由林幼春講〈無力者之自白〉、蔡珍耀講〈知行合一〉、黃周講〈放大眼光〉，各執其論，向「有力者大會」大張撻伐。當時有千餘民眾參與此盛會，此活動讓原來是隻紙老虎的「全島有力者大會」一蹶不振，「公益會」終因台胞的唾棄無疾而終。<sup>107</sup>根據 7 月 4 日《台灣新聞》漢文版及《台南新報》日文版的記事中可看出當時的盛況：

……台中之文化協會員，亦於同日同時間，在錦町林家專祠開會。少壯氣銳之士，聚集約一千名，宏敞之祠宇，幾於無地可容。細井警察署長偕警官及通譯臨場，聽眾之中，又有高等刑事，私服混雜其間，警戒頗嚴。……

108

從參加民眾的踴躍程度來看，文化協會的努力是值得的，他們已喚醒一部分民眾，了解唯有自我充實自我努力才有機會掙脫日人的桎梏。

## 2. 辯士生涯

文化協會是以文化的啓蒙為主，宣傳工作重點放在「文化講演會」，因它具

---

<sup>106</sup> 葉榮鐘著〈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355。

<sup>107</sup> 參葉榮鐘著〈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352-360。

<sup>108</sup> 葉榮鐘著〈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359。

有強烈的宣傳作用，使”辯士與聽眾在情緒上都構成民族意識與反抗精神的共鳴作用。”<sup>109</sup>，藉以達到啓蒙的效果。講演會中擔任辯士的人都能以親切的臺語鄉音，活潑而清晰的言辭，娓娓敘說當時台灣的社會狀況，激發台灣人關心自己社會的情懷，或者慷慨陳詞，借題發揮，來教化啓蒙民眾，煽起民族意識，辯士們”儼然以志士自居，睥睨一切，徒以挑撥民族的反抗心為能事，醞釀成普遍反母國（日本）的風氣”。<sup>110</sup>在辯士的犀利言辭中，不但傳佈了新的思想與知識，也宣洩了台灣人久被壓抑的鬱卒，從而喚起抗日情操，其效果比任何活動都好，影響也更深遠。文協發軔以後，「文化講演」蔚成一時風氣，聽眾的人數也一年多過一年，據《警察沿革誌》的記載，1926年全國的聽眾人數已達112,965人。<sup>111</sup>當時文化協會的運動方針，似乎側重在鼓動台人對日人的反抗情緒，所以辯士的演講，也自然而然地要用煽動的口吻去刺激聽眾的感情。因為文協辦的每一場演講會都有日本警察在場監督，動輒橫加干涉，因此辯士只要能夠旁敲側擊用暗諷、隱喻或穿插日警聽不懂的詞句，予日人以不堪的謾罵，便可以博得滿場彩聲，至於演講詞的內容如何，聽眾並不計較。難怪《警察沿革誌》對文化講演特別重視，它說：“講演會是文化協會活動最應重視的問題”。<sup>112</sup>在一般民眾普遍知識水準偏低的台灣，文化協會的啓蒙運動，如僅藉文書則不免缺乏大眾性之遺憾，而文協能藉講演會來達成其目的是明智的，效果奇佳。葉榮鐘肯定的說”文化講演與其說是開通風氣、傳播文化，毋寧是對那些無依無靠的農村同胞發生一種打氣作用較為切實。”<sup>113</sup>此運動也開本島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的先河。

文協的文化講演會由1923年開始逐年增加，至1925年及1926年達最高記錄，二年間全島共講了三百多場次。地方的領導階層大有以舉行文化講演會次數的多寡，來做為他們對民眾服務的指標。他們利用戲院、廟宇或工廠做為文化講演的場所，所到之處都是客滿的。據葉榮鐘形容：

事實上文化講演確有攻城掠地的意義，一個地方如果曾經開過文化講演，那個地方就可視為響應文化派的地方，誇大一點來說也可以說是文化協會

---

<sup>109</sup> 葉榮鐘〈革命家蔣渭水〉《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252。

<sup>110</sup> 王曉波著〈日據下台灣的民族精神〉《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台北市：帕米爾書店，1986年11月初版），頁68。

<sup>111</sup> 葉榮鐘著〈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351。

<sup>112</sup> 葉榮鐘著〈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347。

<sup>113</sup> 葉榮鐘著〈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348。

的地盤。<sup>114</sup>

這是文化演講會的狂熱時代，也是葉榮鐘活躍於民族運動舞台的時候。1925年2月，葉榮鐘與林獻堂、楊肇嘉、邱德金赴日進行第六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返台後，為鼓勵發揚民族運動的氣勢，應各地人士的邀請，分赴全台各地遊說，所到之處，人聲沸騰，受到民眾熱烈的擁戴與歡迎。同年4月19日，葉榮鐘、莊遂性、陳虛谷、丁瑞圖陪同林獻堂赴二林講演，演講盛況空前，辯士與百姓們的互動情緒非常高昂，葉榮鐘形容它“真是如火如荼，可歌可泣”<sup>115</sup>，此次活動促成6月二林農民組合成立<sup>116</sup>，是台灣農民運動的開始。由於每次活動葉榮鐘都熱心參與學習，終於成爲林獻堂最佳左右手，從此在台灣民族社會運動上占有一席之地。同年6月7、8兩日，由於當時全台五州之一的新竹市尚未有演講會，因此文化協會的重要幹部決定進攻新竹，由台北前往的有蔣渭水、黃呈聰，由台中前往的有葉榮鐘與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洪元煌、陳虛谷、莊遂性；台南有蔡培火、陳逢源等，南北同志齊赴新竹做爲期兩天的文化演講後，很快的10月9日文協新竹支部成立，1926年10月17日文協常年大會就在新竹舉行。<sup>117</sup>

台灣文化協會從1921年創立到1927年分裂爲止，這期間台灣的民族意識發揚到了極點，它所提出的「自由」、「平等」、「人格的尊嚴」、「社會連帶關係的意識」等理念，對台灣人的影響很大。「家族制度」、「戀愛至上」等問題，更是青年男女知識份子喜愛的議題，文化協會受歡迎的最大因素是它能跟上時代潮流，不斷介紹各種新知識、新訊息給群眾。甚至文化協會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也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台灣作家的文學創作中開始有國族意識、階級意識、乃至性別意識，文協功不可沒。當時台灣作家加入文化協會者非常多，如賴和、蔡秋桐、楊逵、林越峰等，他們的作品均有反殖民思想的特色。如：

賴和擅於描繪在殖民地壓制下被屈辱人民的無奈；蔡秋桐以真實的紀錄事情卻含有「反面寫實」的嘲諷意味；<sup>118</sup>

經由知識分子對反殖民思想的傳承，日後文協雖因意見不合而分裂，甚至遭

---

<sup>114</sup> 葉榮鐘著〈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350。

<sup>115</sup> 葉榮鐘著〈杖履追隨四十年〉《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4。

<sup>116</sup> 參葉光南、葉芸芸主編《葉榮鐘年表》，同註27，頁35。

<sup>117</sup> 葉榮鐘著〈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350。

<sup>118</sup> 楊逵口述·劉依萍整稿〈談抗日時期的台灣新文學〉《文訊月刊》，第七、八期，頁157。

壓迫而解散，然文化運動與抗日意識卻更深的結合在一起。如果說台灣同胞從事抗日活動，是由林獻堂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其端的話，深入社會並具大眾影響力的就是「文化協會」。不過話再說回來，在那個階段，不論台灣議會、或是文化協會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其所努力的工作以啓蒙爲主，理論上與政治無涉。<sup>119</sup>當然也有人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協會」的活動並不感興趣，認爲他們的動作太過溫和了，如張深切就認爲「太沒出息，何必請願？有本事自己組織議會，不能則已，何必向人家搖尾乞憐。」<sup>120</sup>

#### （四）台灣民眾黨

##### 1. 文協的分裂及民眾黨的成立

1927年初，文化協會內部左右分裂後，「新文化協會」左傾，由連溫卿、王敏川等社會主義派取得主導權，他們走社會主義的路，講普羅文化，倡大眾運動，主張階級鬥爭。原來由資產階級領導，以從事民族運動與文化啓蒙運動爲主的文化協會，至此變爲以無產階級領導，主張階級民族鬥爭，標榜「期實現大眾文化」的新綱領<sup>121</sup>，並說明因無產階級、農民及都市勞動者的利害關係，是無法和少數地主資本家一致的，所以一定要分開路線。而林獻堂、蔣渭水、謝春木、蔡培火等舊有幹部不能認同新幹部的社會主義路線，所以相繼脫離並另籌備組織新的政黨。同年5月8日在台中市東華名產公司召開籌備會，葉榮鐘提議改名爲「台政革新會」，繼又改爲「台灣民黨」；5月29日成立，但6月3日就被命解散，理由是民族主義色彩太濃，又以綱領標榜期實現台灣人全體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這也是日本政府禁止台灣民黨成立的原因。<sup>122</sup>經過波瀾重疊的演變後，得林獻堂之助，因日帝礙於林氏聲望而勉強予成立更名後的「台灣民眾黨」，終在同年7月10日假台中聚英樓舉行成立大會，葉榮鐘也是創黨黨員。「新文協」指責民眾黨的成立爲：

<sup>119</sup> 葉榮鐘〈革命家蔣渭水〉《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251。

<sup>120</sup> 黃英哲〈孤獨的野人——張深切〉《復活的群像》，（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年6月），頁127。

<sup>121</sup>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同註57，頁238。新綱領主要內容是1.農村文化向上。2.增進商工智識。3.涵養自治精神。4.獎勵青年求學。5.提倡女權思想運動。6.改良婚姻制度。7.廢止吸食鴉片。8.打破迷信惡習。9.普及衛生思想。10.獎勵守時。

<sup>122</sup>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同註57，頁248-250。

違背台灣民眾利益，破壞共同戰線的台灣民眾之叛賊，本會決極力加以翦除。<sup>123</sup>

而民眾黨的內部，除了蔡培火與蔣渭水長期的不合，加上大地主出身的林獻堂和出身寒微的典型小資產階級醫生蔣渭水，由於成長背景的不同，對於民族意識的穩健和激進認同上也有差異，因此出現了以林獻堂為主的「台灣派」與蔣渭水為主的「祖國派」。「台灣派」認為：

當時台灣的人口號稱三百五十萬，這許多人，必須生於斯死於斯，無論如何，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是有極大的信心，對台灣的一切都熱烈地愛護，只要在台灣能得維持固有文化與生活，他們無論如何困難，如何犧牲，都是悉力以赴，絕不退縮。<sup>124</sup>

他們對其祖先冒險跨過黑水溝來另謀發展的台灣，所表達的認同情感，已遠超過在大陸的父祖之國了，已有強烈的、永久的依附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感情與意圖。而「祖國派」則認為：

對於民族文化有信心，但是在力量上，以為在台灣絕對不能與日本相抗衡，而將其希望放在祖國的力量上面。<sup>125</sup>

祖國派意識到台灣想和日帝對抗，後面須要有強而有力的祖國做後盾。後來民眾黨在「祖國派」蔣渭水的領導下對於現實政治的抗爭有積極的表現，對於勞工團體的領導有輝煌的成就，同時也因為勞工運動發展的結果，漸有離開民族運動的路線走向階級鬥爭的傾向，於是與民族意識較穩健的「台灣派」發生摩擦。而以林獻堂為主的「台灣派」，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想依靠文化啓蒙來合法的達成民族自決。林獻堂說：

應知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民族主義也，明乎此一切可不辨自明。<sup>126</sup>

他們想在日本統治下以合法手段來請願「台灣自治」，他們不務排斥日人，而

---

<sup>123</sup> 葉榮鐘著〈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391。

<sup>124</sup> 王曉波著〈台胞抗日民族運動的合與分〉《台灣史與台灣人》，同註 81，頁 70。

<sup>125</sup> 王曉波著〈台胞抗日民族運動的合與分〉《台灣史與台灣人》，同註 81，頁 70。

<sup>126</sup> 王曉波著《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同註 110，頁 55。

堅持台灣為台灣人之台灣，專心圖增台灣人之利益與幸福”<sup>127</sup>，傾向於「體制內改革」屬溫和派，而「祖國派」、「無產派」則企圖接近工農階級來組織全民的台灣人，以期實現「民族自決」，屬於「體制改革」是激進派。在文協左傾後，一連串的是是非非讓林獻堂大為痛心，所以決定辭任顧問一職，並於五月份偕同二公子做為期一年的歐美旅遊。他說：

跟蔣渭水交換有關民眾黨新綱領的意見，結果，我認為該新綱領偏於極左，完全以無產階級為本位，這點乃是我們所不能接受，我不想再以顧問身份與黨維持關係，所以決定辭任顧問。<sup>128</sup>

隨著林獻堂的辭任顧問，葉榮鐘也在 8 月，台灣民眾黨成立之後，再度接受林獻堂的資助，赴日做第二次的留學。<sup>129</sup>而林獻堂此時此刻的心境，在葉榮鐘的〈林獻堂先生年譜〉一文中有所記載：

左派之作風終非先生天真之想法所能左右者，後來文協新幹部鑒於先生之聲望與財力尚有利用之價值，故曾託人百方挽留先生，謂若不屈居為委員，則希能以顧問之身份予以合作，先生終不為所動。先生經此番衝擊，精神上蒙受極大之影響，以先生之心情而論，向來披堅執銳，僕僕風塵，耗財產損精神而為民族運動奔走者，均係發自悲天憫人之犧牲精神，純為服務社會、愛護民族之舉動，毫無權利之可言，更無爭奪之必要，而終有此遭遇，先生大為痛心，同時亦恍然了悟左派人士之毒辣作風，為生平夢想所不及，緣此其態度亦遂日趨消極矣。<sup>130</sup>

1931 年 2 月 18 日台灣民眾黨舉辦第五屆代表大會時，台北警察署長突然出現，向民眾黨主幹陳其昌交付「結社禁止命令」，當場為總督府下令解散，並拘捕蔣渭水等十七人。被禁的理由見〈總督府發表〉的聲明：

……黨內左右兩派時常軋轢，內紛不絕，黨內勢力漸次為強烈之民族主義者蔣渭水領導之左派所把持，運動日趨矯激，徒以反母國、反官的態度，

<sup>127</sup> 王曉波著〈台胞抗日民族運動的合與分〉《台灣史與台灣人》，同註 81，頁 70。

<sup>128</sup> 王曉波著〈台胞抗日運動中的內訌與路線問題〉《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同註 110，頁 413。

<sup>129</sup> 參葉光南、葉芸芸主編《葉榮鐘年表》，同註 27，頁 37-39。1927 年 8 月葉榮鐘入東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就讀，1930 年 5 月中旬畢業，隨即返台籌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sup>130</sup>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123-124。

阻礙內台融和。……如此以加味階級鬥爭之民族運動，如果容認其結社則違背我台灣統治之根本方針，妨害內台融和，導致影響本島統治之維持甚為明瞭。以上列之理由不得不發動嚴正之法規加以處分，此即禁止台灣民眾黨結社的所以也。<sup>131</sup>

至於已左傾屬於「無產派」的台灣文化協會的部份成員，也在此年 12 月於彰化舉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決定解散文化協會，並組織「大眾黨」。改以王敏川主張的以小市民階級的大眾團體續存，此一主張恰與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的意見吻合，於是文協改組為小市民階級的鬥爭團體，文化協會至此已完全成為台灣共產黨傘下的外廓團體，以小市民、小資產階級為中心，透過日常鬥爭去實行台灣共產黨的政策，文協正式消失。

## 2. 民眾黨的解散

1931 年 8 月 15 日台灣民族解放運動領袖蔣渭水逝世，享年四十一歲。凶耗傳出，識與不識莫不同聲嘆息，各地方陸續舉開追悼會；中部地方由林獻堂等發起，決定 8 月 23 日下午二時半在台中寺舉行蔣渭水追悼會，參列者百餘人，警察正式臨監，一切弔聯被命撤去，蔡先於、甘得中、洪元煌等致追悼之辭皆被中止，禮成後因輓聯事葉榮鐘與臨監警察發生衝突，被檢舉拘置台中州警務部留置四小時始予釋放。在獄中他有感而發，賦詩：

杯弓蛇影任批論，立得狂風見腳根。別有一端沈痛處，鐵窗默禱故人魂；  
早歲東林背禁書，已知身是釜中魚。十年苟免誠多幸，何況今朝入網初；  
明知卵石終非敵，其奈填胸熱血何。奴隸原無安樂土，監房未必苦偏多。

132

詩中葉榮鐘流露出一股不妥協的堅執意志以與殖民政權相抗，詩中「奴隸原無安樂土」，正呼應了十三年前在《晨鐘》發表的〈望月〉一文裡頭「奴隸生涯涕淚多」，也說出了台灣人的悲哀。對於渭水先生的精神，葉榮鐘說：

他對日人的惡感純係出自民族的正義感，他雖然未曾披堅執銳去革日人的

---

<sup>131</sup> 葉榮鐘著〈台灣民眾黨〉《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489-491。

<sup>132</sup> 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 13，頁 113。

命，但是他苦心孤詣、鋌而不捨的精神，為同胞爭自由而作不撓不屈的奮鬥，也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光輝。<sup>133</sup>

蔣渭水雖死，民眾黨雖亡，但同胞愛國精神不死，台灣民眾運動仍然持續進行著。

## （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林獻堂、蔡培火等在「民眾黨」為蔣渭水控制的情形下，另謀合法的自治之途，有鑑於地方自治制度乃民主政治的基礎，台灣議會將來能夠實現，地方自治制度也是非確立不可，於是萌生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計劃，並邀請在日本的楊肇嘉回國主持。葉榮鐘此時也正從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5月返台，馬上參加聯盟籌組的工作。葉榮鐘等人會脫離民眾黨成立此聯盟的原因是：

……以合法手段爭取民主制度以減少同胞之苦痛，並以淺顯之政治目標號召全台民眾冀得統一陣線，集中力量，蓋當時台灣之民族解放運動承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後，兼有日人之離間摧殘以致人心渙散，失去共同鬥爭之目標，非藉堅實之步驟與正確之目標不足以振起衰沉之民族正氣也。<sup>134</sup>

1931年8月17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台中市醉月樓酒家舉行成立大會，組織的目的在於促進地方自治制度的改革，因當時台灣所行的地方自治制度是自民國九年實施的試行性制度，理應隨民智之向上、社會之發展加以革新充實才合理，然日本當局竟將這個制度，陳陳相因，欺騙台人達十年之久，有識之士忍無可忍，乃決意展開促進改革的運動。<sup>135</sup>當天出席盟員有227人，會中推舉林獻堂、土屋達太郎任顧問，常務理事是楊肇嘉，葉榮鐘擔任書記長，並籌劃聯盟在全島24個地方舉開巡迴政談演說會，而葉榮鐘也是其中重要辯士之一。該聯盟是由舊文化協會中政治訴求較溫和的人士組成，一致認為：

欲挽救台灣今日之窮狀除政治上之解放運動而外絕無他途可循。而政治上之解決運動確信應先獲得立憲政治之基礎——地方自治公民權——為最

<sup>133</sup> 葉榮鐘〈革命家蔣渭水〉《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255。

<sup>134</sup> 葉榮鐘〈陳情書〉《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279。

<sup>135</sup> 參葉榮鐘〈急公好義的楊肇嘉先生〉《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269-270。



所以僅以實現可能性較高的「促進地方自治制度的實施」為單一目標，且為運動早收效果起見，必須超越黨派，採取全民運動，不限於民族運動的舊同志，即中立派以至於所謂御用紳士亦予延攬，日人之同調者亦均予接納，兼容並蓄大冶一爐。8月27日葉榮鐘與楊肇嘉、蔡式毅代表訪問日總督，提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宣言及決議文，要求早日改革現行地方自治制度。9月7日「地方自治聯盟評議會」選出葉榮鐘、林柏壽、楊肇嘉十五人為地方自治改革案之起草委員。10月1日總督府發表州、市、街、庄改選協議會員名單，「地方自治聯盟」以其非經由民選，發表聲明書加以抨擊。1932年2月2日，葉榮鐘與林獻堂、劉明哲、洪元煌、葉清耀等訪總督府新任總務長官平塚，提出地方自治制度實施改革建議書。1933年7月23日葉榮鐘主持「現行不完全地方制度改革促進全島住民中部大會」，並發表演說題目為「非常時期與台灣地方自治之改革」。為抗議日本人反對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制度，同時葉榮鐘也寫了〈給反對地方自治諸君的公開狀〉（刊登於1933.6.15台灣新民報）及〈駁斥地方自治改革反對論〉（刊登於1933.6.29台灣新民報）；而日人之所以持反對的理由，除了是為反對而反對外，他們擔憂一旦台灣開放選舉，日人議員人數必少於台灣人，則日本人的利益必受侵害。另外最重要的是和民族意識有關，以古賀三千人（日本民衆重要分子商工銀行董事長）為代表<sup>137</sup>，論據：

台灣人有強烈民族意識，一旦實施自治制日台人的融和必日趨惡化，故為日台融和著想不如暫時保留實施為愈。<sup>138</sup>

自治聯盟幹部鑑於當局對全島住民大會採取嚴厲取締方針，加上日人方面反對聲浪日趨嚴重，知道在「非常時」的時局下，總督府為避免內台人的衝突激化起見，勢將對自治聯盟加以彈壓。處在如此艱巨的時局下，自治聯盟只好退而求其次，決定請葉榮鐘與楊肇嘉、及台灣唯一的法學博士葉清耀三人同赴朝鮮考察地方自治制度<sup>139</sup>，研究朝鮮的先進經驗。

<sup>136</sup> 葉榮鐘著〈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529。

<sup>137</sup> 葉榮鐘著〈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545。

<sup>138</sup> 葉榮鐘著〈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545。

<sup>139</sup> 葉榮鐘著《葉榮鐘日記》，同註37，頁65。日本投降前，朝鮮與台灣均是日本的殖民地。以歸屬的時間而論，台灣在先（1895），朝鮮在後（1910），但在地方制度的建立方面來說（例如

1933年10月4日開始為期三週的朝鮮考察，途中葉清耀因腦溢血昏迷而就醫，為照顧他，楊肇嘉、葉榮鐘實際用於考察的時間僅有兩週。他們二人結束朝鮮訪問後，於10月31日繼往東京，繼續為自治改革問題奔波，直到11月中旬始返台。其實此行期間，葉榮鐘的太太大病初癒，長女又久病纏綿，因此他的心情極為沈重，能如期完成任務，難怪林獻堂的女婿也是東京新民會一員的高天成博士會說他“公爾忘私”。<sup>140</sup>

回台後，楊肇嘉即歷訪各地支部，報告朝鮮考察及在東京運動的情形，葉榮鐘撰寫〈朝鮮自治制度考察報告書〉約三萬言刊載於《台灣新民報》。為響應這些溫和派的要求，總督府於1935年修改地方自治，准許“議員半數為民選，州市有議決權，街庄則否，選舉資格限納稅額五圓以上。”<sup>141</sup>雖然如此不完全之改正，不能被接受，不過同年11月22日舉行第一次選舉投票的結果，不少聯盟推荐的候選人當選。<sup>142</sup>聯盟雖沒得到全部的政治訴求，但已達其階段性政治目標。1936年日本內外正值「超非常時」時期，對台灣人的猜忌日深，壓迫日劇，尤其對平日視為眼中釘的知識分子更是吹毛求疵、時加侮辱；加上林獻堂的「祖國事件」，全島為之震動、霎時風聲鶴唳，雞犬不寧。葉榮鐘形容說：

此時台灣天昏地黑，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般知識份子惶惶不可終日，林獻堂、楊肇嘉先後避難東京。自治聯盟於是年八月召開第四次全島大會宣佈解散。<sup>143</sup>

聯盟鑒於時局緊迫，於1936年8月自動解散，有關人員先後出國避難，或許沒得到全部的政治訴求，但已完成其階段性政治目標了，也為二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政治運動劃上休止符。<sup>144</sup>

綜觀整個日據時代台灣的解放運動，無論前期的武力抗爭時期，或是後期的非暴力的抵抗運動，在日人的壓制、歧視、榨取下幾乎沒有一件是成功的。從一

---

學校制度、帝國大學的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徵兵制的實行）往往朝鮮為先，台灣為後。此行考察的目的要研究朝鮮的先進經驗。

<sup>140</sup> 葉榮鐘著〈悼高天成博士〉《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323。

<sup>141</sup> 葉榮鐘著〈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550。

<sup>142</sup> 葉榮鐘著《葉榮鐘日記》，同註37，頁21。

<sup>143</sup> 葉榮鐘著〈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28，頁558。

<sup>144</sup> 林柏維〈認同模糊與派系分流：以1920年代文化運動的路向主張為主軸〉《20世紀台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研討會》（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1年），頁7。

封葉榮鐘寫給林莊生的信可知：

日本統制下的台灣解放運動，從結果看來，沒有一件是成功的。但對當時的民眾，尤其是知識階級喚起當仁不讓之精神，確實起了作用。如果人類的文化不以現實之成敗做準則，而以提昇的精神水準來衡量，那麼，當時的運動是有一定的歷史地位。孔子、基督、釋迦之努力，以今日之狀況看來顯然是失敗，但歷史不能無視這些先賢的精神。<sup>145</sup>

然而先賢們留下了台灣人的骨氣、勇氣和智慧，是後代子孫最好的遺產。

## (六)東亞共榮協會

日本政府鑒於日本遭受國聯制裁在東亞勢孤，為尋求中國與盟，並站在共同防範西方列強的立場上，提出了「東亞共榮協會」的想法，當然也為其侵略戰爭的行為合理化，因此派日本國內極右派健將之一的宮原武熊博士來主持<sup>146</sup>。宮原深知“台灣殖民地在促進中、日同盟上有著起槓桿的作用。這是宮原為日本著想，而有結納台灣被殖民者的戰略構想。”<sup>147</sup>，且可因台灣的關係和東亞各民族融合相處。所以宮原一反過去總督府只拉攏御用紳士的常態，改弦易轍反過來商請台灣反殖民主的社運人士來參與，並答應台灣社運人士的要求，一切從「內台融合」的族群融合做起。而台灣反殖人士經過審慎評估後看重其中可資利用作打擊台灣殖民主當局這一點，所以願意合作。因此決定由陳炘、楊肇嘉等人出來協助推行此項政策。<sup>148</sup>雙方於 1933 年 12 月 29 日在台中市公會堂成立「東亞共榮協會」，推郭東周當理事，並發行《東亞新報》周刊，葉榮鐘擔任漢文版編輯。「東亞共榮協會」發展非常迅速，昭和九年（1934）年底，會員已有萬餘人，各地分設支部。1935 年為節省經費《東亞新報》將印刷業務委託《台灣新民報》，葉榮鐘遂調往台北負責編印。1936 年因時局吃緊，「東亞共榮協會」被迫解散，《東亞新

<sup>145</sup> 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同註 33，頁 241。

<sup>146</sup> 葉榮鐘著《葉榮鐘日記》，同註 37，頁 92。宮原武熊是台中市的眼科醫生，素與台人知識份子交往，善體台人立場，但備受右派日人痛斥。

<sup>147</sup> 參盧建榮〈以筆代劍：後殖民的國族認同困境——解析張深切晚年自傳〉《20 世紀台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研討會》，（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1 年），頁 8。

<sup>148</sup> 參葉榮鐘著《葉榮鐘日記》，同註 37，1934 年 8 月 25 日，頁 83。陳炘接下這件工作後，其實其內心也是委曲頗多，除了台人部分人士的不滿外，他也曾向葉榮鐘透露，他說“他要絕對取旁觀的態度，……「內地人側」（日語：日人方面）向來在計劃上對他取敬遠的態度，”這是陳炘心灰意冷的原因之一，不過從中也可看出日人是在利用台人，絕非真心的。

報》停刊，葉榮鐘於此年底正式進入《台灣新民報》。

### (七)郁達夫座談會

割台以後的台灣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懷有濃厚的歸屬意向，以致於在新文學運動中的文藝青年，對於中國作家呈現心儀的想望。加上當時台灣的一切抗日活動已被壓抑和禁止，公學校的漢文教育、日報的漢文版即將全面遭到禁止。更因林獻堂「祖國事件」<sup>149</sup>的發生，台灣人正為日本人的橫暴憤怒不已的時候，對於中國大作家郁達夫的來訪當然是歡迎備至了。1936年11月郁達夫來台訪問，台灣新民報社舉行郁達夫座談會，此會完全由葉榮鐘一手策劃而成。出席者有黃純青及其兒子黃得時，另外還有劉明朝、蔡式毅、陳逸松、陳紹馨、郭秋生、楊雲萍、林呈祿、陳逢源等人，及日本文化傳播界人士，座談會主要內容，是有關五四以後新文學運動發展情形和郁達夫的寫作動機，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等問題，郁達夫以日語發言，第二日發言記錄由葉榮鐘翻譯成中文，和日文一併刊載於《新民報》。對於郁達夫的作品，葉榮鐘也頗有研究，他評曰：

他的作品，大抵是寫他自己的經驗，規模很少，沒有渾雄的「社會意識」，但是他那「世紀末」的氣氛，卻很能代表一部分青年的生活，他的藝術技倆也很巧妙，文字又極優婉流麗，自成風格，終不失為好作品。<sup>150</sup>

葉榮鐘主辦此次座談會，對將要蓬勃起飛的台灣新文學有正面的刺激和影響，他對台灣文化素質的提昇是不容忽視的。

## 八、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

這是日據中晚期時代，相當中日八年抗戰初期，由於戰爭關係，造成物質缺乏，使原本就辛苦的日子更加艱苦了。

### (一)記者生涯

葉榮鐘從事記者工作始於1935年，時任「台灣新民報」通信部長兼論說委

---

<sup>149</sup> 請參閱本章節第51頁(三)祖國事件。

<sup>150</sup> 葉榮鐘《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1，頁244。

員，據其自述云：

我和《台灣新民報》是自它的前身《台灣民報》的時代就發生關係，而我入社工作卻是遲至民國廿四年纔實現。<sup>151</sup>

從此展開長達十年的記者生涯，致力於傳達民意、維護漢文，並與殖民政府做「主張不妨強硬，措辭必須力求婉轉」的文字戰。<sup>152</sup>

1937年4月台灣總督府下令廢止一切報紙上的「漢文欄」。島內日人經營的《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與《台南新報》同時廢止漢文版，獨許《新民報》漢文版縮小一半，但限至6月1日全部廢止，這對以台灣人為主要讀者的《新民報》而言是莫大的打擊，該報經營日趨困難。對此葉榮鐘有詳細的說明：

……當時《新民報》已經發行日刊，但成績不甚理想。因為報紙的經營大都是靠廣告費來挹注，若只憑報份的收入是無法維持的。台灣稍具規模的生產事業，也就是說有廣告能力的公司行號都是操在日人或與總督府有密切關係的所謂御用紳士手中，他們那裡肯出錢給《新民報》來打自己的屁股。《新民報》的財政無寧說是無法克服的先天性疾患。<sup>153</sup>

由於財政的困窘，致使《新民報》的經營幾達窮途末路。1937年7月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侵略中國，12月13日南京陷落，隔年元月14日成立偽華北臨時政府，當時一些有辦法的人，已另謀高就，到大陸加入偽政府，飛黃騰達，成為新貴。葉榮鐘對此極為不恥，因而在《新民報》上刊出此為了享盡「殊榮」，不顧人間羞恥的醜態。在題為〈索居漫興〉的詩中如此說道：

張王李趙盡殊榮，京國人人識姓名，解得人間羞恥事，寧從窮巷了殘生。

154

1940年2月，《新民報》東京分社長吳三連因反對「台灣米穀管理案」<sup>155</sup>，

<sup>151</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05。

<sup>152</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08。

<sup>153</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05。

<sup>154</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13，頁138。

<sup>155</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19-422。此法案的目的，是以台灣的蓬萊米為對象，日人完全用法律硬性抑制蓬萊米的價格，不使台米售價超過一定限度。由於此法案與台人的經濟生活有著密切關係，因此，以台灣新民報社為中心，由吳三連、楊肇嘉、劉明電等人出面為此事斡旋。台灣米穀管理案的反對運動，是台人自1921年開始非武

被總督府運用壓力強迫撤職。葉榮鐘被派赴日本接替，於是學家遷往東京，本來可以在東京定居下來，但是葉夫人無法適應寒冷的東京氣候，常常生病，加以東京的食糧狀況日趨惡化，結果只滯留了一年十個月，1941年11月就搬回台灣。回台不到兩週，就發生了「太平洋戰爭」，還好他們一家人跑得快，如果仍滯留在東京，不被炸死，也會餓得半死。此時《新民報》已改為《興南新聞》，他被派為台中支局長。戰爭一開始，言論更受控制，報社已變為軍方的傳聲筒。在這種狀況下，他的工作反而變為單純，生活也就安定下來。可是好景不常，1943年2月，他受日軍徵召赴菲律賓擔任《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及馬尼拉新聞社《華僑日報》編輯次長，擔任中文版的負責人，此報是由日本軍部委託《大阪每日新聞》經營，而《大阪每日新聞》本身因沒有中文人材，轉託當時民報總經理兼主筆林呈祿幫忙，林呈祿對葉榮鐘推崇有加，他說：

現在社中漢文日文都拿得起的，除你以外更無第二人，……<sup>156</sup>

葉榮鐘礙於與林呈祿多年好友的情誼，無辭可推，只得接受。

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夜晚獨自一人，其中的孤寂非他人可以體會的，所以常是“公餘回寓，於疲倦無聊之際，常思獨酌無已。”<sup>157</sup>可看出他在馬尼拉晚上回來大概以獨酌吟詩來打發時間。在他寫給台中軍功寮的張賴玉廉的〈夜得負人讓友空便感作〉詩中有具體的描繪：

秋風蕭瑟動征襟，萬里書來夜已深。儘有真情招感泣，慚無絕業報知音。  
餘生祇合三緘口，去死猶懷一寸心。何日竟從偕隱願，峽峰頂上放高吟。

158

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那股離鄉背井遠赴異地工作的無奈與孤獨，唯有借詩酒來打發思鄉、思友的煎熬，難怪他會有「放膽文章拚命酒」<sup>159</sup>的神來之筆。總計他在馬尼拉服務一年又兩個月，於1944年4月中旬依約解職返台。馬尼拉苦悶、不

---

力的民族運動以來，最後一次的反抗。是台灣民族運動最後的博浪錘，頗有歷史的意義。

<sup>156</sup>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29。

<sup>157</sup> 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同註33，頁231。

<sup>158</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13，頁176。

<sup>159</sup> 張良澤〈葉榮鐘先生作品概述〉《台灣文藝》，第63期，1979年3月，頁208。據葉榮鐘二公子葉蔚南說「放膽文章拚命酒」是葉榮鐘的詩句，張良澤說這句話是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寫照，當時多少台灣才氣縱橫、傲骨稜然，不可一世的年輕作家，振筆於孤燈之下，而後豪飲於藝妓身旁，爾後醉臥於鐵窗下，此語充分表現了他們的本色。

安定的日子，加上與日本政府對抗 20 年的他，至此也感到個人力量的薄弱有限，因而萌生回家與歸隱的念頭，從他 1944 年 1 月 8 日寫給莊遂性的信中可看出：

……心境不寧，趣味枯燥，令人悶殺耳，興思及此，則偕隱之計真有急不容緩之感。千祈吾兄助吾一臂以遂二十年來宿願也。<sup>160</sup>

若能與兄偕隱，則事情無論如何均可將就。<sup>161</sup>

為求得心靈上的自由，因此託莊遂性在台中軍功寮替他買了一塊三、四甲的山地，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的置產。

1944 年 3 月，由於戰爭日趨苛烈，紙張缺乏並且為統制言論之需要，台灣總督府強迫台灣六份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高雄新報》、《台東新報》、《台灣新民報》（1941 年被迫改名為《興南新聞》）、合併為《台灣新報》並由《大阪每日新聞》派幹部經營。當葉榮鐘從馬尼拉回台時，以原新民報社員的資格，在該社擔任文化部長兼經濟部長。當時生活據葉榮鐘自述：

當時日人為討好台人，日台人待遇一律平等，所以每月收入甚豐。但我因轟炸所引起的斷糧的顧慮，決意帶著一家六口，一走了之。<sup>162</sup>

因擔憂轟炸引起斷糧，加上當時的《台灣新報》被控制於台灣總督府的手裡，已成為軍部的傀儡，致失去了辦報的使命和意義，所以未及光復，葉榮鐘就辭職不幹了。

總計葉榮鐘自 1935 年至 1945 年止，擔任記者工作長達 11 年，都以《新民報》為主。這是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也是台灣民族運動的言論中心，它繼承《台灣民報》的一貫精神，繼續做台灣人的喉舌，也是唯一以漢文為主的報紙。1937 年台灣軍部為肅清台灣的民族運動，目標對準《台灣新民報》，除了藉元旦時《新民報》附刊的世界地圖出了岔子百般刁難，唆使流氓揚言放火燒掉報社外，<sup>163</sup>更逼迫《新民報》廢止刊載漢文，這對《新民報》來說簡直是致命的打擊。誠如葉榮鐘所言：

---

<sup>160</sup> 葉榮鐘著·葉云云主編《葉榮鐘日記》，同註 37，頁 221。

<sup>161</sup> 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同註 33，頁 237。

<sup>162</sup>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431。

<sup>163</sup> 參葉榮鐘著〈台灣人的喉舌—台灣民報〉《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633。

《新民報》擁有大部份的漢文讀者，漢文版的存在，不但在營業上有其必要，漢文的保存，乃是台灣民族運動的一大眼目。這個使命無法達成，則《新民報》的存在，已失其大半的意義。<sup>164</sup>

日本軍部爲了撲滅台人的民族意識，於是做出此決定，這是他們一貫的技倆，他們深知要同化一個民族，從語言、文字下手是首要之務。

在新民報被禁之前，站在第一線的記者群能忍受清苦的生活，而爲台灣的民意、漢文的保存，以及台灣民族運動的種種目標善盡其職，葉榮鐘亦不例外。擔任記者十年中，他致力於傳達民意維護漢文，並與殖民政府做“主張不妨強硬，措辭必須力求婉轉”<sup>165</sup>的文字戰，尤其任《新民報》通信部長兼論說委員時，雖然每星期要寫一篇日文的社論，對一個在暴風雨時代的文筆工作者而言，其寫文章的方法，仍不偏離其對異族的反抗精神，用的是「以其矛攻其盾」的方法，即在字裡行間反映台人所受的不平待遇，對當時的處境葉榮鐘有一首打油詩可以形容：

文章價賤感難禁，其奈嗜痂癖已深。鐵筆有時揮硬論，縱無人讀亦開心。

166

從此詩可見他評論時事的豪率情勁，這也是他撰寫社論時的心境。因爲中日戰爭期間，台人夾在中間，處境之難可以想像出，難怪徐復觀曰：「葉先生和台灣許多志節之士，當時處境之艱，秉性之烈，多由這一聯詩表達了出來，因而可永垂天壤。」<sup>167</sup>當新聞記者這些年，葉榮鐘一直以《台灣新民報》爲中心，展開他的活動。雖沒他沒有參加經營，卻以一個記者身份與該報共始終。

## (二)政治的認同

台灣歷經了日本將近半世紀的統治，總督府爲了徹底改造台灣人，施政上從早期的「無方針主義」、「同化主義」、「內地延長主義」到最後的「皇民政策」，皆企圖改造台灣人，使成爲良順、休戚與共的日本人。葉榮鐘由於工作的關係和

<sup>164</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11。

<sup>165</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08。

<sup>166</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08。

<sup>167</sup> 徐復觀〈悼念葉榮鐘先生〉《中國時報》，1978年12月11日。



日本人交往頻繁，其政治上的認同如何呢？此答案在其自述「半壁書齋」命名的由來可知曉。當時葉榮鐘任《新民報》記者，「七七事變」發生，戰爭物價高漲，每百台斤的稻穀已從前僅五圓餘，漲至八圓三角，《新民報》在黃朝清出任營業局長時，不但無法像其他事業公司提高薪水，為節流之計反而減俸二成，加上長子光南的出生，使葉榮鐘倍感經濟上的壓力，為節省開銷，改賃租金較省的房子居住，並克難加蓋一間簡陋的房間做為書齋，命名為「半壁書齋」。取「半壁」的原因，乃因讀過國父「過漢口弔劉道」的七律一首，對詩中「半壁東南三楚雄」之句有著深刻的印象，當時祖國在七七事變之後，南京陷落，「偽華北臨時政府」隨之成立，整個祖國只剩下東南半壁。葉榮鐘謂：

國父的『半壁』和日本軍閥所造成的「半壁」，就成為我個人所賦與的涵義，不過我從未公開，但它卻在我意識中興風作浪，時時鞭撻我的鬥志，加強我的民族意識。<sup>168</sup>

那一段日子，是台灣同胞處境最困難的時候，無論精神或物質都是欠缺的，然而惡劣的環境，並沒有擊倒台人，反而由內心生出一種力量，一種希望，每人的內心深處都抱著強烈的反抗精神，而捱著「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苦難日子，這就是「民族正氣」吧！

他的女兒葉芸芸追述其父親對「半壁書齋」的鍾愛，為何終其一生不曾改名稱，因為：

它鞭撻著反抗的精神「我以為不論個人，不論民族，應該具有這麼一種強韌的氣質，纔不至流為『漢兒學得胡兒語，騎在牆頭罵漢人』的民族垃圾。」

169

可見日據時代的葉榮鐘，政治認同傾向於祖國，他參加台灣民族運動，反抗殖民政權，積極發揚民族精神。

### (三)祖國事件

1936年3月，林獻堂參加由《台灣新民報》董監事所組織的「華南考察團」，

---

<sup>168</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07。

<sup>169</sup> 葉芸芸〈編後記〉《半壁書齋隨筆》，同註3，頁391。

訪問大陸。沿途受到祖國同胞熱烈的接待與歡迎，在上海的歡迎會上，擔任團長的林獻堂代表致詞，內容有「林某歸來祖國」等話，被上海日本特務獲悉，由於林獻堂在當時有著代表台灣人的崇高標籤，因此返台後，日本御用報刊即對他的話大加撻伐，指斥林獻堂「非國民」。6月17日，日本右翼團體更慫恿一位日籍浪民公開毆打林獻堂，事後該浪人竟因此成名，因為一些親日媒體竟為文袒護施暴者。此事透露日人欺凌台人，但法律卻明顯偏袒肇事者，且御用媒體甚至推波助瀾想致受害者於死地，這是殖民地社會不公不義的屬性。對此事，葉榮鐘也有感而發的說：

日本軍部在國內用這一套去逼使開明的政治家，進步思想的學者以及資本家就範，已收到百分之百的效果，在台灣製造這種事件，在他們來說，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但台灣這個小天地經不起他們的一擊，霎時全島震動，風聲鶴唳，雞犬不寧。<sup>170</sup>

事發後林獻堂、楊肇嘉先後避難東京，在台灣的事就由服務於新民報的葉榮鐘來善後。此事件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單純的個人問題，事實上已對當時的社會造成影響，不但台人的知識份子與地主階級惶惶不可終日，即使總督府的官僚也莫不戰戰兢兢。他們對軍部的越俎代庖，非常不滿，但為避免無謂的麻煩，表面上也都噤若寒蟬。事件發生後，一般地主莫不以林獻堂為前車之鑑。尤其地主們在九一八事變後，因物價高漲，稅金加重，支出日漸增加，生活緊縮因此常借故推諉不繳「愛國獻金」<sup>171</sup>，經此事件後，對於「愛國獻金」的繳納，他們只能咬緊牙根，忍痛出錢。他們說：「以林某的地位聲望，尚且不免，則我們的將來遭遇還堪設想嗎？」<sup>172</sup>由此事件可看出日本軍部是此事件的策畫者，只要他們想要的一定是想盡辦法，無所不用其極，弱小的台灣人如何抵擋得了。後來台灣總督府屢次派人去勸林獻堂回來，因為日本在中國東北，揚言要建設「王道樂土」，而將以台灣人如何在「一視同仁」的政策下，受皇恩之被澤做宣傳，此時台灣人所尊敬的林獻堂不願回來，那不是很大的諷刺嗎？

---

<sup>170</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09。

<sup>171</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09。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由於日本軍部已有計畫發動戰爭，需要大量資金，所以在民國24年以後，以「愛國獻金」的名目，強迫捐款。

<sup>172</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10。

不過話又說回來，林獻堂被打，也打醒了台灣人，因為這一巴掌很結實地打在所有台灣人民族尊嚴的心坎上，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上的績效甚大。日本投降後，台灣人打日本人，不穿木屐、不穿日式浴衣、不說日語等等都與林獻堂被打這一巴掌有關。<sup>173</sup>

#### (四)避難生活台中鄉下

1945年4月初，盟軍轟炸加劇，葉榮鐘遂攜眷離開台北回台中鄉下軍功寮避難，<sup>174</sup>過一段艱苦的山野生活。他曾回憶那段日子說：

一個城裡人，尤其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獃子，落在鄉下去討生活，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自己不能生產一握菜蔬，一勺米糧，寄人籬下，想坐吃現成飯，真是談何容易。<sup>175</sup>

據葉榮鐘的回憶可知那陣子因戰爭物資缺乏，鄉下地區幾乎回復到物物交換的原始時代。因為他到鄉下時未將家人戶口遷入，所以食糧菜蔬以至於一切日用品，非藉黑市交易，是無法入手。林莊生在〈葉榮鐘先生〉一文中，對此有詳述：

最可憐的是住在城裡的白領階級。因為他們沒有生產能力，一切糧食非仰賴配給不可。而公家的配給，充其量只能供給實際需要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程度，不足之數非靠自己想辦法不可。問題是當時的農民都不願意用「公定價格」出售，如用黑市價格出售，又怕經濟警察取締，於是像雞鴨等都要用以物易物的方式。<sup>176</sup>

戰爭通貨膨脹加上日本經濟警察取締嚴格，因此鈔票交易反不及以物易物來得實際，那時衣料棉被之類的東西是最受歡迎的，為此一家人只能將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脫下來變賣，難怪他自嘲說那段日子過的是「竹筍生活」，這樣的逃難生活是他終生難忘的。在〈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一文中有對這段生活的回憶：

---

<sup>173</sup> 葉榮鐘、林快青〈林獻堂的事蹟與台灣抗日運動對談會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197。

<sup>174</sup> 參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同註33，頁232。台中軍功寮是葉榮鐘生平第一次的置產，雖然山地的經濟價值不高，但土地的擁有，給他不少安定感。

<sup>175</sup>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33。

<sup>176</sup> 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同註33，頁234。

……早上起來，我要自己去挑水，挑起來東搖西擺，好像吃醉了酒一樣。起先一段路還可以勉強支持，但到半路肩上那支竹桿真有入肉三分的感覺，那種痛楚確實難受。但是我為要活下去，也顧不得這些。因為每日在空襲警報未發出以前，你非把這工作做好不可，所以只好咬緊牙根拚命去做。九時以後，你只得呆在家裡待機，一旦飛機臨近，就得扶老攜幼入防空壕去躲避。三時以後到夜間，可說是一天的安全時間。我大概每隔一星期，就利用這段時間，踩著腳踏車到霧峰去看林獻堂先生。有時還延長路線到萬斗六山莊去找莊遂性兄聊天，同時也是去揩點油水補給營養。

莊遂性的兒子林莊生，進一步將他當時看到的葉榮鐘做了更貼切的描述：

葉先生平常西裝畢挺，我從沒有見過他騎腳踏車，所以看到他踩著腳踏車來萬斗六時，我已感到不習慣，何況聽他說每天要挑水，真是不可想像。

177

林莊生相信葉榮鐘如果沒有這四個月的「受訓」經驗，可能一輩子念念不忘〈歸去來辭〉，因為葉榮鐘一向是生活在都市裡，實際到鄉下生活才知道不是想像中的容易，也使他了解天下的事「有的可以說而不可以做，有的可以做而不可以說。」<sup>178</sup>，因此打消歸隱念頭，繼續為台灣人的權利福利作打拼。葉榮鐘本人也寫了〈疏開吟〉詩句，真實地描述當時台灣百姓躲空襲的慌亂與無奈：

北駛南飛倦鳥身，驟來籬下暫依人。苟延殘喘兇彈下，敢說農村活計新。  
天際機聲響若雷，霎時飛去又飛來。瞥看爆彈紛紛下，頓使勞人萬念灰。  
銅鑼警笛苦相摧，叱婦呼兒日幾回。若問村居何所事，朝朝待避作生涯。  
百物於今入手難。唯將蔬菜佐盤餐。灌園何與英雄事。小圃慙慙日數看。  
爭拋大廈與高樓。保障唯從地底求。設阱自囚愁不固。此方莫為子孫謀。  
朝來敵襲正堪危。過午淋漓驟雨滋。如此循環過夏季。農家何日展愁眉。

179

從詩中可見當時台灣上空的戰況是多麼的激烈，其實只要台灣遭受轟炸，日台人的利害關係應該是一致的，然而當時包括葉榮鐘在內，皆認為即使自身被炸得血

<sup>177</sup> 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同註 33，頁 236。

<sup>178</sup> 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同註 33，頁 237。

<sup>179</sup> 葉榮鐘〈疏開吟〉《少奇吟草》，同註 13，頁 177-178。

肉橫飛，只要台灣能脫離日本的統治，也是值得的。

### (五)偷聽南京的廣播

七七事變槍聲一響，8月15日，台灣軍部宣佈台灣實施戰時體制，由古莊軍司令官發表談話，他說：

島人（台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論，若一旦聞知，即予翦除。<sup>180</sup>

所以台灣各地的知識份子動輒得咎，被憲兵及特高警察干擾侮辱的事件，時有耳聞。像葉榮鐘的好友莊遂性就曾被捕，理由是：

民族意識濃厚，常作反抗言論的台中莊某，北支事變爆發後，對於南京播送的支那戰況，極表關心，這次當局發表對於收聽南京播送者將予嚴罰，莊某竟對此項處置，大鳴不平。<sup>181</sup>

日人爲毀滅台人的民族意識，推行國語（日語）普及運動，鄉下村落均設有國語講習所，晚間招集農村的青年，進修日語，宣傳政令，並置有收音機，以便收聽日軍的戰況。葉榮鐘在〈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記錄〉說：各地青年對於集會的出席甚爲踴躍，表面上是爲研習日語，實際上是因爲抗戰期間，在日帝高壓政策和新聞封鎖之下，一般台灣青年對祖國戰局的消息來源缺乏，於是他們利用研習之餘，開始偷聽祖國的廣播，葉榮鐘回憶了當時日帝利用收音機集合鄉村青年宣導政令及進修日語的情形：

青年們待集會結束，講師離去以後，他們乃利用收音機大收南京的廣播，表面上是爲參加日語進修，但事實上卻是爲著偷聽南京的廣播。<sup>182</sup>

除了收聽廣播外，青年們還私下傳閱著秘密帶進台灣的祖國書刊，並且透過知識份子傳播於一般大眾。雖然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可以看出當時一般台胞對原鄉祖國的關心程度。所以，台灣同胞雖然在戰時體制下受盡日本的高壓之苦，但是他們有信心，並且等待抗戰勝利的來臨。

---

<sup>180</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12。

<sup>181</sup> 林莊生著〈日據時代〉《懷樹又懷人》，同註33，頁6。

<sup>182</sup> 王曉波著〈「七七」前後的台灣同胞〉《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同註110，頁209。

## 九、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六百五十萬台灣人，終於結束五十年的包羞忍辱的奴隸生活，從「殖民地」的稱號下被解放開來，重歸祖國的懷抱。自九一八事件後，日人對台人的壓迫猜忌日益增加，加上太平洋戰爭的發生，台灣人不但要面臨生活上的窘境，還要時時面對生離死別、家破人亡的恐懼與無奈。台灣被「光復」後，台灣人也無條件要在一夕之間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所以光復消息一傳來，真的是萬民額手，薄海騰歡，台灣人箠食壺漿，歡迎國軍的到來，民眾們喜極淚下，舉手高呼，將五十年來的委屈盡情發洩出來，其歡樂喧囂聲足以震動天地。

### (一)台人對祖國的嚮往

日本投降，台灣終於「回歸」到祖國的懷抱了，對台灣百姓來說，這是「喜從天降」、「天大的消息」，台灣終於擺脫殖民統治的桎梏，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並按自己的理想管理自己的家園了。

#### 1.國民政府籌備會

從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0月5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首批人員約八十餘人飛抵台北為止，整整五十天，台灣出現政治真空時期，日警失去約束力，陳炳等人發起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9月初，葉榮鐘被推任為總幹事，聯繫營救滯留大陸及海外的台灣同胞，籌辦「中報」；籌備會也至各地張貼文告，勸告同胞勿擾亂社會秩序，侵害個人自由，毀害公共建造物品，以免貽害國計民生，且將無顏以見祖國同胞云云。除此籌備會也發動各地人士響應蔣委員長提倡的「新生活運動」，並呼籲知識青年組織服務隊，協力維持治安。此外還製作國旗，指導民眾練唱國歌，為歡迎國民政府預作準備。當時大家對祖國的期待，據葉榮鐘形容“無論新知舊雨，見面時莫不笑顏逐開，他們都是懷著滿腔希望和一股熱烈如火的興奮心情，討論今後應如何來建設我們的新台灣。”<sup>183</sup>這種對祖國的狂熱，是不帶任何階級性、地域族群性或其他因素，有的只是一種樸素的民族情感

---

<sup>183</sup>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36。

流露的中華民族主義罷了！<sup>184</sup>葉榮鐘說：

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無血族，亦無姻親。除文字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連繫，祖國祇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但是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sup>185</sup>

終於 10 月 5 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中將率領幕僚一行八十多人飛抵台北，台灣人民給予熱烈的歡迎；10 月 17 日，首批國軍乘坐美國運輸艦，在盟軍飛機掩護下，浩浩蕩蕩，開入基隆港。雖然這些兵士裝備簡陋，風采不揚，但大家仍給了最熱烈的歡迎，可以了解台人在異族五十年的凌壓之下，對「祖國」仍有憧憬，即使「祖國」滿目瘡痍，「祖國」的士兵形同難民，但仍不減他們對祖國的熱情，因為他們想的是：

日本鬼子再也不能欺侮我們了！他們要滾蛋了，現在，我們可以作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了！我們已經回歸祖國了。日本人走了後，我們可以接替他們的位置，配合祖國的建設來建設新台灣，讓中國成為全世界的四大強國之一。<sup>186</sup>

葉榮鐘說的很貼切：“他們五十年在異族欺凌壓迫下，盼望王師的心情是如何熱切的，於是拜天謝地，祭告祖先，也就成為他們興致勃勃的行事了。”<sup>187</sup>他們深信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可以聯手建立一個既富強又美麗的偉大中國。

## 2. 唯一的公職

1946 年春，莊遂性擔任台中圖書館館長，爭取葉榮鐘出任圖書館研究輔導部長兼採編部長。他們努力要幫助隔離了五十年的台灣同胞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化，圖書館舉辦各項演講、婦女講座、國語及國史講習會等活動，並時常舉行書畫展覽及座談會等；葉榮鐘親自講授中國史和有關政治經濟的常識，並集合知識分子開談話會，借著自由談話的機會，增進彼此間的國語能力，不過常因議題集

---

<sup>184</sup> 戴國輝·葉芸芸著《愛憎 2,28》（台北市：遠流出版，2002 年 9 月 1 日初版十三刷），頁 15。

<sup>185</sup>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445。

<sup>186</sup> 戴國輝·葉芸芸著《愛憎 2,28》，同註 184，頁 15

<sup>187</sup>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442。

中在敏感的政治經濟問題，遂引起有心人士之注意，誹謗也就隨之而起了。戰後的台中市在葉榮鐘、莊遂性、楊逵……等人的努力下，整個動起來了，鍾逸人在《辛酸六十年》中詳細的描述國府時期台中市文化界的狀況：

終戰之初，楊逵、葉榮鐘、謝雪紅、莊遂性等人都開始注意到教育民眾的重要性。葉榮鐘利用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開講「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給學生聯盟的學生灌輸「祖國文化」，謝雪紅則透過「人民協會」的組織，下鄉作街頭演講、教育農工群眾。莊遂性也每星期三、六下午四時半在台中圖書館，召開一些關心「時事與台灣前途」的知識份子座談會。楊逵則將首陽農園改為「一陽農園」，並開始發行《一陽周報》。<sup>188</sup>

台中市因為有這些人的努力，因此成為名符其實的文化城。葉榮鐘在此做了將近一年，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才離職，這是他一生唯一的公職。

### 3.台灣光復致敬團

光復沒多久，由於對大陸的語言到政治文化不了解，加上國民政府接收官僚與駐軍之素質不齊，腐敗違法、蠻橫越軌的作風令人蔑視，台灣同胞的高度熱情與期待，很快地由失望而反感了，丘念台看了憂心忡忡的四處奔走，期能做為疏解溝通官民情感之橋樑。1946年8月，他組織「台灣光復致敬團」，邀集各界知名人士到大陸去訪問，其目的是：

讓他們瞭解中央和國內同胞對台灣實有深厚的民族愛，……同時也讓中央瞭解台民的熱心愛國，以及對政府的擁護與敬意。用以加強上下的聯繫，進而疏通日據時代所遺下的長期隔膜。<sup>189</sup>

丘念台想利用內外及上下感情的交流，自然而然達到改進台省政治的目的。參加的人計有葉榮鐘與林獻堂、陳逸松、陳炳……等十五人共赴大陸訪問，從8月29日起至10月5日止；其任務是謁拜中山陵、晉謁蔣主席及各中央首長、獻金撫慰災胞，及糴縣遙祭黃陵等任務。該團團員設壇遙祭黃陵，虔誠奉告台灣已經光復並表白台灣同胞重歸祖國懷抱的興奮之情，它象徵著六百五十萬台胞的歸宗

<sup>188</sup> 轉引自林莊生著〈圖書館時代與二二八〉《懷樹又懷人》，同註33，頁62。

<sup>189</sup>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4，頁455-456。



儀式。葉榮鐘曾賦詩寫出當時的心境：

雲海茫茫路幾千，首都今日拜先賢，心香但祝邦基固，忍訴辛酸五十年。

190

這是葉榮鐘的肺腑之言，同時也代表光復初期六百五十萬台灣同胞脫離日本暴政，回歸祖國的喜悅心情。顯豁的辭意寫盡民族的鄉愁，也寫出台人對祖國的孺慕之情。致敬團 10 月 5 日返台，前後共三十七天，充分表現台民回歸祖國的心意。對於祖國，台人抱有很大的期望，因為台人受日本人差別待遇，受到很多欺負與委屈，隨著台灣光復這些通通都沒有了，台灣人不但可以當自己的主人，甚至後面還有龐大的祖國——中國，他們知道“日人的壓迫力愈大，臺人孺慕祖國的感情也就愈切。”<sup>191</sup>因此葉榮鐘等知識份子有共識——要為國家、社會盡一份棉薄之力。

## (二)建設祖國的期望破滅

光復之初許多台灣人尤其年青人，都有一份對祖國的情懷，他們除了熱衷學習祖國的語言外，也響應陳儀政府一開始就提出「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口號。沒想到陳儀來台之後，卻以征服者姿態對待台人，舉措失當，政治、經濟令人大失所望。此時台人也發現中國原來是很落後的，雖然台灣是殖民地，但各方面都比中國進步。以教育來說，台灣人在日治時代雖受到很大的差別待遇，但至少各級學校都已經齊備，受教育的人數也快速增加；教育進步，社會有了規則與法治，就不會亂來。然而在殖民地壓迫下長大的孩子，幾乎天生就有一種希求解放的心願，都希望能夠早日擺脫被人家統治的命運。所以，中國雖落後，但他們相信以台灣這片土地、人口，及各種豐富的資源，加上從統治者學來的進步尖端科技、教育制度，可以使落後的祖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強國。然而歷史的動力遠比台灣知識份子所想像的還要複雜且曲折，回歸的欣喜剎那間轉變成對國民黨統治的失望，因為國府來台接收官員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的種種敗德惡行，讓台人由熱望轉為失望，欣喜化為怨懟，甚至讓原本懷抱著素樸的民族意識台籍人士對中國產生離心意識，部分台人更因而失落了民族的自我認同感，逐漸走向「台獨」。

---

<sup>190</sup> 葉榮鐘〈南京謁中山陵〉《少奇吟草》，同註 13，頁 181。

<sup>191</sup>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4，頁 446。

### (三)二二八事件

光復不到兩年，由於國民黨接收官員的貪污舞弊，造成生活不穩定，商人囤積居奇，經濟破產，伴隨高壓的統治，人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失去安寧的心境，台灣瞬間變成人間的煉獄。此一巨大的變動和衝突，在 1947 年 2 月 28 日終於引發了「二二八事變」，事件發生時，國民政府以鐵腕鎮壓台灣百姓，以恐怖手段大肆逮捕與屠殺，當時許多菁英份子皆被逮捕，死傷不計其數。眼看台灣人經歷了一場從樂為中國人到誓不做中國人的認同大轉變後<sup>192</sup>，葉榮鐘感慨的寫下〈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一詩，描述了當時的狀況：

莫漫逢人說弟兄、聞牆貽笑最傷情。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寞、重重疑案未分明。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193

一夕之間，台灣人柔腸寸斷，回歸母國的梦想破碎了。「二二八」竟成了悲劇符號，它象徵台灣人集體的命運，也造成了族群認同上符號系統的逆轉——經過二二八殺戮與侵奪後，代表母國的中國竟轉而成爲「壓迫者」。它讓許多台灣知識分子在長期期待「解放」與「自由」後，希望幻滅了。於是，有的選擇「再解放」的道路，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直到被消滅或長期監禁爲止；有的亡命天涯，遠走他鄉，像林獻堂就藉醫病避居東京，並於 1956 年客死日本；有的歸於沈默，孤獨而痛苦的度過餘生。文學工作者不敢再關懷現實、仗義直言了，文學喪失了自尊、自信。葉榮鐘於事變之後，與館長莊垂勝(1897-1962)一起從台中圖書館被撤職；兒時的玩伴台中師範校長洪炎秋也被解職；更悲哀的是他們許多好友皆在此事件中喪生。當時幸運逃過一劫的台灣知識分子在戒嚴統治下噤若寒蟬，不再過問政事；日據時代轟轟烈烈爲民請命的民族鬥士，也從此退出社會文化活動的舞台，銷聲匿跡無所作爲，變成失語的一代。

「二二八」時葉榮鐘倖免於難，然而接踵而來的白色恐怖讓他不得不停止政治活動，不再過問政事；也封筆不敢寫文章，連寫日記的欲望都沒了。在其 1966

<sup>192</sup> 參見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小說的歷史考察〉，引自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1998），頁 46-48。

<sup>193</sup> 葉榮鐘著〈三月二日〉《少奇吟草》，同註 13，頁 183。

年元旦的日記中他寫道：

……光復以來，特別是二·二八以後這十七、八年間，極力避免欲記日記之心願，因怕庸人自擾也。<sup>194</sup>

國民黨統治期間，他閉上嘴巴，封起筆來，採無言的抗議。1948年起，在林獻堂的斡旋下，進入「彰化商業銀行」服務，歷任專員、調查科長、祕書室主任、協理、顧問等職，直到1966年才退休。退休後，他重拾鐵筆專心做一位文化人，但不牽扯政治，只是默默的寫作，這也是一種噤聲的表示。

---

<sup>194</sup> 林莊生、葉芸芸主編《葉榮鐘日記》，同註37，1966年元旦，頁269。

### 第三章 葉榮鐘的文學寫作歷程

對一個文學家來說，作品是最重要的成就與代表，讀者可藉由這些作品來了解作者的寫作動機、時代背景與心路歷程。台灣的歷史，是一部反抗帝國主義的典型史。當台灣人民面對帝國主義的挑戰而挺身應戰時，文學家們便以文學，英勇地、真實地記錄了當時台灣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悲壯經過，也可以說台灣新文學就是建築在「真、實」的層面上<sup>1</sup>。它真實的反映出與其相對應的意識型態，傳達特定的訊息，所以代表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作家們，他們描述殖民體制下的台灣人所受的災難與苦悶，更寫出當時的時代精神——反封建、反殖民的意識。生長在日據時代的葉榮鐘親眼看到殖民者的醜惡、社會的百態、百姓的苦悶、台灣人的無奈、悲哀與不滿。他除了實際參與政治社會運動外，也真實的記錄這一切，在他的文章裡我們看到他企求社會改造的熱忱，及反殖民、反封建的思想。在寫給兒子葉光南的家書中他曾提到自己熱衷寫作的原因：

余一生學無專長，事乏效績，全局盡輸追悔莫及。今後唯有努力寫作，將個人的經歷記錄下來以備將來作為歷史之側面資料。<sup>2</sup>

除了自身有興趣寫作外，他認為台灣人，在掙脫日帝的殖民桎梏後，要思如何奮發圖強，才不致被人瞧不起。所以他呼籲台灣人要努力讀書，不要妄自菲薄，台灣人是聰明的，只要肯努力，就能迎頭趕上。他說：

台灣人因為過去五十年間的歷史關係，一般人對於國文的力量較差，致受輕視而吃大虧。但我有自信，台人之才能絕不弱於任何民族，若能努力從事定有可觀。余現在不以老朽自棄，而孜孜以寫作為念者，第一是欲留一點記錄性文字以供將來修史者之參考；另一點是不願被人歧視台人為不學

---

1 參見〈戰前台灣小說所反映的農村社會〉緒論，龔鵬程著《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五期》第三段言 1920 年代，接受五四運動啟發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在反日殖民統治的民族運動的旗幟下，蓬勃地展開。在推翻舊文學的共識中，作家除了積極尋求作為文學媒介的適合語言，以期能夠使一般民眾透過言文合一，易學易懂的白話文，吸收新知識與新思潮，以擴展文化啟蒙抗日運動之外，並且要求文學的創作，應該以反映社會的現實為題材，以反帝國、封建主義為精神。

<sup>2</sup> 葉光南、葉芸芸主編〈家書——寫給旅美子女的信（1963-1978）〉1964 年 8 月 31 日《葉榮鐘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2 年，初版），頁 89。

無術之土包子。<sup>3</sup>

孜孜不倦努力伏案寫作的葉榮鐘，在“想為後代子孫留一點記錄性的文字以供將來修史者之參考”的自負與使命感下，努力地撰寫日據下的種種，為他那一代人留下歷史的見證，也為後世留下寶貴的資料。誠如林莊生說的“志於史的人大都是歸於一種使命感吧”<sup>4</sup>，這是對葉榮鐘寫作心境最恰當的詮釋。本節筆者將由葉榮鐘所用的筆名入手，期能尋找出一點他用筆名的慣性，及研究他的作品內容。

## 第一節 葉榮鐘作品發表情況

從十八歲參與《晨鐘》的編寫開始，葉榮鐘就和寫作結了不解之緣，這中間除了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讓他“輟筆將近十年之久”<sup>5</sup>，直到五〇年代末期，才又重新出發，尤其退休後，更可以說是全力以赴了。對一個生長在日據時代，受日本教育、留學日本的老報人來說，留有二百餘萬字的中文遺稿，作品體裁涵蓋散文、隨筆、社論、文論、文評、漢詩等等，除了令人驚奇、讚嘆外，更想一睹他的文章，了解其寫作過程，及作品內容。

### 一、葉榮鐘筆名的探討

日據時期，由於日本總督府對思想的嚴格控制，因此報刊雜誌的作品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如有不妥之處就要“食割”<sup>6</sup>後才能放行。作家們為了避免當局找麻煩或為了隱藏真實身分，所以一名作者同時擁有，或使用多個筆名發表作品的情形很多。再者當時由於文化水準不夠，百姓投稿的意願不高，為了使刊物內容看起來精彩，並製造投稿踴躍的場面，因此編輯者與支持者往往也是運用此種方法。從葉榮鐘早期的作品中我們發現他的筆名非常多，計有「葉榮鐘」、「蒲牢

---

<sup>3</sup> 葉光南、葉芸芸主編〈家書——寫給旅美子女的信（1963-1978）〉1964年8月31日《葉榮鐘年表》，同註2，頁89。

<sup>4</sup> 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台北市：自立晚報社，1992年8月第一版一刷），頁241。

<sup>5</sup> 葉光南、葉芸芸編〈編輯報告〉《葉榮鐘年表》，同註2，頁11。

<sup>6</sup> 黃春成〈談談「南音」〉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初版），頁340。刊物中如有「食割」，則須將全部的刊物，提交警察署，點檢全部的部數，在該署將被禁止的部份，逐冊剪除後，方許運回發行，萬一如部數有短少時，那就麻煩了。

生」、「大江」、「蒲牢」、「葉天籟」、「掃雲」、「奇」、「擎雲」、「凡夫」、「一葉」、「少奇」、等筆名，現將依其寫作先後的順序，將所用之署名與發表的作品條列如下：

- 以本名「葉榮鐘」發表的作品有：

〈求之於己〉（原文日文）、〈談談昭和新聞〉、〈爲「劇」申冤——讀江肖梅氏的獨幕劇〉、〈關於羅馬字運動〉、〈敬覆淑子〉、〈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戲曲與觀眾——答紫鴉女士〉、〈中國新文學概觀〉、〈《先發部隊》第一線讀者投書〉，計 9 篇。

- 以「蒲牢生」發表的作品有：

〈地方自治和知識階級的任務〉、〈好榜樣，強烈的刺激——觀看文學座的「陳夫人」〉（原文日文），計 2 篇。

- 以「大江」發表的作品有：

〈關於新黨組織問題〉（原文日文），計 1 篇。

- 以「蒲牢」發表的作品有：

〈殘喘——從「祈雨」談到「祭政一致」〉、〈殘喘——「神風」號與「雷震子」〉，計 2 篇。

- 以「葉天籟」發表的作品有：

〈墮落的詩人〉，計 1 篇。

- 以「掃雲」發表的作品有：

〈掃雲精舍隨筆〉、〈文藝時評——和尚與娶妻〉、〈文藝時評——論斷髮〉、〈文藝時評——文藝時評的態度〉、〈文藝時評：關於布袋戲——讀林炳耀氏的〈台灣人形劇調〉〉、〈編輯後言〉〈第一卷第七號〉、〈編輯後言〉〈第一卷第八號〉，計 7 篇。

- 以「奇」發表的作品有：

《南音》發刊詞、〈〔卷頭言〕：「大眾文藝」待望〉、〈〔喫煙室〕獻堂先生亦會錯誤〉、〈〔卷頭言〕：前輩的使命〉、〈〔喫煙室〕C 判事的疑問〉、〈〔卷

頭言〕：勿講假話〕、〔卷頭言〕：人類的呼聲〕、〔卷頭言〕：作詩的態度〕、〔卷頭言〕：智識分配〕、〔卷頭言〕：「第三文學」提倡〕、〔卷頭言〕：再論「第三文學」〕，計 11 篇。

- 以「擎雲」發表的作品有：

〈文藝時評——屈話就文〉、〈文藝時評——關於魯迅的消息〉，計 2 篇。

- 以「凡夫」發表的作品有：

〈歸到她的懷抱裡去！〉，計新詩 1 首。

- 「一葉」發表的作品有：

〈「會面」結婚論〉，計 1 篇。

-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身分發表的作品有：

〈給反對地方自治諸君的公開狀〉（原文日文）計 1 篇。

- 沒有署名作者的作品有：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趣旨書〉、〈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宣言〉、〈自治聯盟之聲明書〉（原文日文）、〈台灣地方自治制改革的建議案與請願書〉、〈台北支部設立問題與舊民眾黨的解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全島代表大會大會宣言〉、〈駁斥地方自治改革反對論〉（原文日文）、〈教育問題〉（原文日文，是手稿）、〈對本島人社會待遇的改善〉（原文日文，是手稿）、〈關於嘉南大圳的各種問題〉（原文日文，是手稿）、〈關於製糖會社的各種問題〉（原文日文，是手稿）、〈「藝」的練達是先決問題〉、〈《台灣民間文學集》可以給予高評價〉（原文日文）計 13 篇。

- 代人執筆的作品有：

〈關於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代楊肇嘉執筆）、〈自治運動的進展〉（代楊肇嘉作）、〈台灣地方自治制改革案〉（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作）、〈台灣地方自治制改革要項〉（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作，且分四次連載）、〈呈給總督的——關於地方自治及其他的建議書〉（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作，且分四次連載）、〈朝鮮地方制度觀察報告書〉（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作）、

〈爲保全公共建造物事勸告同胞兄弟〉(代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作)、〈爲救濟滯日台僑呈湛侯秘書長書〉(代林獻堂執筆)、〈慶祝光復大會開會理由〉(代慶祝光復大會主席張煥珪作)、〈爲呈請中央政府設法救援在日台僑事〉(代林獻堂執筆)、〈亟請台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委員書〉(代林獻堂執筆)、〈「中報」創刊緣起〉(代林獻堂執筆)、〈被徵海外傷亡少年追悼會祭文〉(代林獻堂作)、〈被徵海外傷亡少年追悼會弔辭〉(代林獻堂作)、〈被徵海外傷亡少年追悼會輓聯〉(代林獻堂作)、〈台灣經濟建設的原則〉(代陳炯作)、〈陳博士新彬先生弔辭〉(代莊遜性執筆)、〈林獻堂氏代表台灣光復致敬團一行發表談話〉(代林獻堂執筆)、〈台灣光復致敬團鳴謝狀〉、〈台灣光復致敬團「祭黃陵文」〉(代表台灣光復致敬團執筆)、〈關於本省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建言書〉(代林獻堂執筆)、〈呈請省政府修大戶餘糧收購辦法〉(代林獻堂執筆)、〈關於補助台民產米成本之陳情書〉、〈爲籲請政府寬貸徵收米糧以蘇民困事敬陳〉、〈台中縣參議會請求救濟米荒呈文〉、〈招設台灣基督教大學(假稱)緣起〉、〈呈爲三十六年度一、二期大戶餘糧收購問題，擬具挽救辦法敬希案納由〉、〈林獻堂致陳誠建言書〉(代林獻堂執筆)、〈政治改革芻議〉(代羅萬車執筆)，計 29 篇。

以上這些文章目前都收錄在《葉榮鐘早年文集》中，統計結果除代人執筆 29 篇，及沒有署名作者的 13 篇外<sup>7</sup>，用最多的是「奇」，有 11 篇，其次是「葉榮鐘」9 篇，「掃雲」7 篇，「蒲牢生」、「蒲牢」、「擎雲」各 2 篇，「大江」、「凡夫」、「一葉」各 1 篇，另有 1 篇是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身分發表的。經歸納分析後，發現最早刊登在報上的文章，尤其是參與筆戰時的，一律用本名「葉榮鐘」發表，應該是以示負責、敢做敢當吧。唯有〈墮落的詩人〉，原來只是單純的公開指責舊詩人，不知會捲入漩渦，要打筆仗，因此是用「葉天籟」筆名發表，大概是以「天籟之聲」來反諷舊詩人無病呻吟、毫無內容意義的擊鉢吟吧！

---

<sup>7</sup> 參葉芸芸〈編後記〉引自《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2 年初版)，頁 397-399。葉芸芸整理葉榮鐘文稿時，對沒有署名的文章，考證手稿的方法有三種，一是參考葉榮鐘本人的日記；二是從林獻堂的日記及林獻堂在日本期間與葉榮鐘的往來信件中找尋相關資料；三是請教會擔任《台灣新民報》與《興南新聞》編輯的施維堯(葉榮鐘的妻弟)，他也提供許多有關的線索。〈教育問題〉與〈對本島人社會待遇的改善〉二篇就是從葉榮鐘 1934 年 10 月 7 日的日記中查證出的。除此之外，他們也會從文章手稿的字跡及文章的內容來判斷。像〈關於製糖會社的各種問題〉一文，就因代林獻堂執筆的秘書群中，只有葉榮鐘曾有在製糖會社基層工作的經驗來斷定是葉榮鐘寫的。



在《南音》的卷頭言及「喫煙室」等文，用「奇」署名，因為《南音》是葉榮鐘等新文學作家在台灣抗日運動全面遭受彈壓，八面碰壁時的一種求出口期的期待，他們渴望用文學來突破這個苦悶的時代。葉榮鐘很在乎，也很用心要辦好這份雜誌，所以用他的字「少奇」的「奇」來署名，應該是想在混亂的當時，出奇制勝吧！「文藝時評」前面篇用「擎雲」，後面3篇用「掃雲」，擎雲應有一柱擎天之意，原本對《南音》寄以厚望，然而隨著日人的刁難，經營日益困難，應是祈求能夠掃掉陰霾，早日重見天日吧！〈殘喘——從「祈雨」談到「祭政一致」〉、〈殘喘——「神風」號與「雷震子」〉應是專欄，固定用「蒲牢」的筆名；唯一的一篇新詩用「凡夫」為筆名，是否影射詩中禁不起誘惑的男子，在酒醒之後，意識到自己的懦弱，有著無限的悔意，恨自己的庸俗，無能，與平凡。

葉榮鐘有這麼多筆名，大都用在《南音》裡，「蒲牢」、「掃雲」、「奇」、「擎雲」、「凡夫」、「一葉」輪流用，多的時候，一期還曾刊登4篇他的文章，<sup>8</sup>其中又以「奇」與「掃雲」用最多。筆者研究結果，原因應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為使刊物內容精彩，並製造投稿踴躍的場面，可見當時的編者多麼用心，也看出葉榮鐘處心積慮為提高台灣人的文化水準所作的努力。

綜觀葉榮鐘這些文章，有關政治內容的幾乎都是代人執筆，計代楊肇嘉、林獻堂、陳炘、莊遂性……等人，其中以林獻堂的最多。當然葉榮鐘是林獻堂的秘書，替林獻堂代筆是正常的，然而從中也可看出葉榮鐘腳踏實地的性格，他是一位不爭功、默默做事的好秘書，難怪林芳年在〈悼葉榮鐘氏〉一文中說：“林獻堂幕下有幾位幹練的幕僚，但找不出像葉氏那樣穩紮穩打可靠的機要高手”。<sup>9</sup>所以林獻堂“臨終喚小名”<sup>10</sup>，這不但是他深受林獻堂的信任，也可看出他與林獻堂亦父亦子的感情。

## 二、葉榮鐘的寫作情形

寫了一甲子文章的葉榮鐘，是本省文化界資深的老報人，也是早年新文學運

<sup>8</sup> 這是在《南音》〈第一卷第三號〉，有「奇」〈卷頭言·前輩的使命〉、「擎雲」〈文藝時評〉、「奇」〈C判事的疑問（喫煙室）〉、「凡夫」〈歸到她的懷抱裡去！〉共有四篇。

<sup>9</sup> 林芳年〈悼葉榮鐘氏〉轉引自《台灣文藝》，第63期（1979年3月），頁244。

<sup>10</sup> 葉榮鐘著〈灌公年譜編成感作〉《少奇吟草》（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年初版），頁217。

動的先驅者、民族運動的健將。當林獻堂秘書的四十年間，舉凡本省重要的事情，重大的變故，葉榮鐘幾乎都參與了。豐富的經驗、成熟的思想，流暢的中、日文，加上高度的熱忱，他不但是多產的作家，作品的內容更是豐碩，值得我們來探究。由於他的作品很多，筆者將分三個階段來討論：

### (一)日據時代：(1920-1945 年)

1920 年在東京求學時，他發表了最早一篇文章〈求之於己〉於《台灣青年》，是用日文寫的，此後他的文章就常出現在報章雜誌了。尤其二十～三十年代的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期間，他也加入戰局，因此寫了一系列辯論性的文章，計有：〈墮落的詩人〉、〈爲劇申冤——讀江肖梅氏的獨幕劇〉、〈關於羅馬字運動〉、〈敬覆淑子〉、〈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戲曲與觀眾——答紫鵲女士〉等，都發表在《台灣民報》上。葉榮鐘文筆很好，所以常受林獻堂、楊肇嘉、陳炳等人之託代爲執筆，寫一些有關政治、社會制度的文章，這些作品大都發表在《台灣新民報》上。有關文學理論的文章，或文藝性高的文章，就刊登在《南音》上，計有：「卷頭言」、「文藝時評」、「喫煙室」等屬文藝氣息較濃的短文；另外還提出「大眾文藝」、「第三文學」、「屈話就文」……等獨特的文學理念。《南音》前後出版不過 11 次，葉榮鐘的文章就佔了 22 篇，不可謂不多。除此之外，1935 年開始報人生涯後，每週至少要寫一篇日文的社論，內容更多樣化了，但據葉芸芸說：

雖然在他斷斷續續的日記中出現過一些社論的題目，但是並沒有任何手稿或剪報保留下來。因此只好將這些有目無文的列入【存目】，……<sup>11</sup>

由於當時沒有刻意收藏，因此很多文章都散佚了，否則就能讓其琳瑯滿目的文章，更加璀璨。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光復初期，在台灣島內所發生的點點滴滴，葉榮鐘是見證者，他把戰前戰後，時局的動盪，人民心情的感受，時而高昂，時而跌宕忠實的記錄下來，這是他寫作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台人滿懷憧憬的投入祖國懷抱之後的種種事實，以及本省同胞在這新環境下的看法，他都全盤托出。除了

---

<sup>11</sup> 葉芸芸〈編後記〉引自《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7，頁 398。

清楚明白的呈現台灣歷史的轉折點外，也讓我們體會跨世代台灣人民的悲哀。

## (二)戰後至國民政府遷台：(1945-1949年)

戰後涵蓋的是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至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前。這段期間所寫的大都是有關當時之政治時事的文章，如：〈為保全公共建築物事勸告同胞兄弟〉、〈為救濟滯日台僑呈湛侯秘書長書〉、〈關於補助台民產米成本之呈請書〉……到〈林獻堂陳誠建言書〉等，皆是代林獻堂、羅萬車等人執筆，寫一些政治建言書給陳儀、陳誠，或有關單位及人員。不過建議歸建議，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的他，早已對政治寒心了，並視官宦為畏途。葉芸芸說：

……代彰化銀行董事長羅萬車寫提【國民黨第一次陽明山會議】的政治改革芻議；諷刺的是，這也是一篇政治建言書，而他本人卻早已視官宦為畏途。<sup>12</sup>

因此在 1948 年蔣介石欲聘任他為省參議員時他辭退了，接著他也婉拒民社、青年兩黨監察委員的提名。究其原因，應是對執政者的失望與無言的抗議吧。因為要寫好這些建言，必須深入了解執政者的態度，及當時的社會種種，再針對百姓的需求來寫，然而越是投入，越發覺當時執政黨的所做所為和百姓的意願期許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即使他接受了這些職務，也只是虛名而已，這和他淡泊名利、高超志節的本性是不相吻合的。為了明哲保身，只有急流勇退，再度當棄材，不但不再過問政事，也封筆不敢再寫文章了。

## (三)封筆時期：(1950-1965年)

1950 年到 1965 年是葉榮鐘所謂的封筆時期，表面說是封筆，其實他仍舊在寫，只是沒發表而已。1949 年林獻堂以治病為由，離開他所愛的台灣，遠赴日本，<sup>13</sup>這對葉榮鐘來說，影響應該非常大。加上當時動亂不堪的環境，葉榮鐘為

---

<sup>12</sup> 葉芸芸〈編後記〉引自《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7，頁 397。

<sup>13</sup> 參葉榮鐘、林快青〈林獻堂的事蹟與台灣抗日運動對談會紀錄〉收錄在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 年 8 月)，頁 198。對於林獻堂赴日，除了醫病，應還有其它因素，林快青說“獻堂先生是一位有良心的智識份子，或許以他的尺寸衡量當時台灣的情形，發覺到與他原來所想像和憧憬的有所不同，所以失望地離台寓居日本，但他還是時時刻刻以台灣為念。”

了安全起見，只能將內心的不滿與無奈訴諸文字，藉著漢詩來發洩自己的情緒，從〈憂患〉、〈五十誕辰感作〉……到〈左營四首〉，處處可見葉榮鐘感國憂時的詩句，從“風氣已隨旗色改，危機重挾鼓聲催。天心民意誰當諒，失措晴空一響雷。”<sup>14</sup>、“華誕騰歡到草萊，荒村處處壽堂開。野人無與廟堂事，端為尋詩探勝來。”<sup>15</sup>、到“猶有丹心難自己，藉詩聊作不平鳴。”<sup>16</sup>寫盡了葉榮鐘內心的憂傷與感慨，這 15 年對葉榮鐘來說，是百般的憤懣與無奈，又不得不隱忍，寫文章竟是最好的渲洩方法。然處在這樣複雜奇怪的社會，即使寫文章也必須小心翼翼，以免惹禍上身，在〈光復前後〉這篇文章完成時，他對兒子說：

最近寫好一篇〈光復前後〉的文章，約有兩萬字。因時間經過未久，牽涉甚多，且有頗為刺激的描寫，故未敢遽為發表，恐犯忌諱。<sup>17</sup>

這段文字是這 15 年葉榮鐘心情的最佳寫照。停筆期間他有詩作 130 餘首，大多集中在 1962 年以前。1962 年他開始著手寫隨筆、評論社會陋習、記錄民俗文化、文物評傳、先賢傳記，這些文章分別收錄在《半壁書齋隨筆》及《台灣人物群像》中。1965 年更由台中市中央書局整理出版《半壁書齋隨筆》第一輯《半路出家集》。除此之外，他也替 1956 年逝世於日本的林獻堂編《林獻堂先生榮哀錄》、《林獻堂先生紀念集》，1963 年又替羅萬車先生編《羅萬車先生哀榮錄》，1964 年 9 月開始寫《彰化銀行六十年史》，著作不可謂不多。寫作的日子雖忙錄，但他的生活極感充實，至感愉快。

#### (四)退休後：(1966-1978 年)

葉榮鐘確信“「知識是力量」；而且學海無涯，活一天學一天是知識份子份內之事。”<sup>18</sup>因此不管是日據高壓統治時代或是國府戒嚴時代，混亂的時局，動輒得咎的情況，他發現閉門讀書是明哲保身之道，尤其 1966 年自彰化銀行退休後他更以讀書來排遣時間，他說：

---

<sup>14</sup> 葉榮鐘〈憂患〉《少奇吟草》，同註 10，頁 187。

<sup>15</sup> 葉榮鐘〈恭逢 蔣總統六八壽誕〉《少奇吟草》，同註 10，頁 203。

<sup>16</sup> 葉榮鐘〈索居漫興三續〉《少奇吟草》，同註 10，頁 221。

<sup>17</sup> 葉光南、葉芸芸主編〈家書——寫給旅美子女的信（1963-1978）〉1964 年 8 月 31 日《葉榮鐘年表》，同註 2，頁 88。

<sup>18</sup> 葉光南、葉芸芸主編〈家書——寫給旅美子女的信（1963-1978）〉1964 年 8 月 31 日《葉榮鐘年表》，同註 2，頁 89。

世事混亂，心情沈悶，除用閉門讀書外，無法排遣。這是過去讀書人處亂世的老路子，不意余行年六十七始摸到這一條生活的隘路，雖覺為時過晚，但也無可奈何。<sup>19</sup>

除了讀書，他也專心著作，這是他另一個寫作高峰期。首先為彰銀完成了《彰化銀行六十年史》（此書是 1964 年 9 月開始撰寫，1967 年完成，1968 年出版），保留了台灣早期金融發展及戰後經濟發展的史料。從他的日記中，我們可看出退休後的他，過的日子雖平淡但充實，據葉芸芸說：

他不僅認真地讀書、寫作、給子女寫信、與朋友交遊；他的生活也從不脫離泥土與勞動，……他認真而且滿心歡喜地生活在每一分每一秒，津津有味地品嚐體驗每一剎那。而他對生命的信念，他的愛情、親情、友情也都紮根在生活中的每一步伐。<sup>20</sup>

那段日子他本著文化人的精神，致力於筆耕的工作，他寫散文、評論、傳記及回憶性文章，尤其是《台灣民族運動史》（1967 年 5 月開始撰寫，1970 年 3 月完成）的編寫，是他憑著捨我其誰的精神、堅忍的毅力、高度的智慧，排除萬難，獨自完成的鉅著，不但是他的傳世佳作，也是千古不朽的名著。這段寫作生涯一直持續到 1978 年 11 月 2 日，因食道癌病逝為止，真可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來形容，他的遽逝，也是我國文壇莫大的損失。他的好友黃得時為紀念他寫了一首詩〈辛酸五十年，淚血寫滄田〉，內容是：

鹿津才子志嶽然，負笈東瀛捷足先。奮為產胞除暴政；追隨灌老鬥強權。  
駐顏有術春長在；養性唯茶火活煎。一卷新編民族史，斑斑淚血寫滄田。

21

此詩短短 56 個字，寫盡了葉榮鐘的一生，從負笈東瀛到追隨林獻堂從事民族社會運動；詩中點出了葉榮鐘淡泊名利，與世無爭的個性。黃得時說葉榮鐘是「民族鬥士」，他的書是“一卷新編民族史”，他用“斑斑淚血寫滄田”，道盡了作者一生的際遇及其所處時代的悲哀。

<sup>19</sup> 葉光南、葉芸芸《葉榮鐘年表》，同註 2，頁 96。

<sup>20</sup> 葉芸芸〈關於父親的日記〉引自《葉榮鐘日記》（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2 年初版），頁 1213。

<sup>21</sup> 黃得時〈辛酸五十年，淚血寫滄田——我與民族鬥士葉榮鐘先生〉引自《台灣文藝》，第 63 期（1979 年 3 月），頁 225。

葉榮鐘一生的作品非常多，經其兒女及友人費時多年的整理及奔波後，終於在 1999 年年底申請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經費，從 2000 年開始陸續出版，至 2002 年 3 月《葉榮鐘年表》出版，才大功告成。【葉榮鐘全集】的內容包括過去已出版的書、發表過的與未發表的文稿、日記與書信以及他所保存的歷史文件資料與照片、年譜。日文部份也請葉笛與林莊生幫忙翻譯成中文，並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協助整理。全集分成九集十二卷，計有：《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兩卷、《台灣人物群像》、《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半壁書齋隨筆》上下兩卷、《少奇吟草》、《葉榮鐘日記》上下兩卷、《葉榮鐘早年文集》、《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葉榮鐘年表》。

## 第二節 葉榮鐘與《晨鐘》、《南音》

這是兩份和葉榮鐘很有淵源的刊物，《晨鐘》是他青少年時代的作品，也可說是他文學的處女作；《南音》他是接生婆，是他和一群文學愛好者，共同催生的；《晨鐘》讓他啼聲初試，《南音》讓他發揮所長，這兩份刊物對葉榮鐘的影響很大，值得我們一探究竟的。

### 一、晨鐘

葉榮鐘十八歲（1917 年）時，不知道是誰先提議，他與好友洪炎秋、莊垂勝等成立《晨鐘》雜誌，每月發行一冊，用大小不一的紙寫成，然後裝訂，並無公開發行，參加的人數從最早的五、六人發展到後來三十餘人，當時的鹿港青年以加入「晨鐘」為榮，它是一個年輕文人爭相加入的社團。每人寫一兩篇作品，內容、字數不拘，彙集裝訂成冊後傳閱，前後一共發行了六、七期。文字有漢文有日文，內容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葉榮鐘對此有詳細的形容：

起首的五六個同仁，每人寫一兩篇作品，彙集裝訂成冊，照順序每人限三天閱完，遞交其次的同仁傳閱。字數既無限制，紙張也無一定規格，所以有一篇長達兩千字的大作，也有兩百字的小品。文字有漢文有日文，有的

用鋼筆有的用毛筆，真是五花十色，應有盡有。<sup>22</sup>

《晨鐘》在當時的鹿港頗有影響力，一些揭發社會弊病的作品，曾引起社會的騷動，可由洪炎秋刊在《晨鐘》的打油詩看出「鹿江父老真堪笑，為個晨鐘打籬笆。」<sup>23</sup>葉榮鐘本身也有一首詩〈中秋望月〉在當時非常有名，今已收錄在其《少奇吟草》中。

傷心莫問舊山河，奴隸生涯涕淚多。惆悵同胞三百萬，幾人望月起悲歌。

24

詩中充滿了被殖民統治的悲哀，而文字簡淨有力，卻字字都是血淚，可謂道盡台灣同胞的悲慨。《晨鐘》雜誌的內容，因為只有葉榮鐘、洪炎秋……等少數人在寫，稿源不充裕，因此發行了六、七期後就無疾而終了，也沒有流傳下來。不過據葉榮鐘的回憶，它的內容應該也是有民族意識的思想及社會風氣的批判思想包含在裡面，當然也包括他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思想。

## 二、南音

《南音》是 1931 年葉榮鐘與賴和等人創辦的雜誌，是以提昇台灣的文化與生活內容為宗旨，由於該刊物許多引人省思的卷頭語，如：「大眾文藝」、「前輩的使命」、「作詩的態度」……，均出自葉榮鐘的手筆，其中尤以「第三文學」的提出，是他獨樹一幟的主張。加上《南音》的發刊正處於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轉型的關鍵時期，它是探索 1930 年代台灣人政治抗日運動及新文學運動的一扇窗口，它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所以筆者將針對《南音》的時代背景、發刊的動機、命名、精神、使命與目的，與時代意義做探索。

### (一)《南音》發刊的時代背景

日本統治台灣只是一味的橫徵暴取，鞏固其優勢地位而已，決無幫助台人提升文化之理；於是面對世界文化和異族凌逼，知識分子唯有振奮其志氣，維持其

---

<sup>22</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13，頁 387。

<sup>23</sup>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13，頁 389。

<sup>24</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 10，頁 91。

尊嚴，藉自身之力量，提升文化水準，以為對抗殖民統治者之憑藉。誠如林仲輝所說的：

倘同胞能合群策群力，以謀發展，各以啟牖民智為己任，文化向上為前提，闡其精英，恰乎民治，亦何難與之對壘周旋，抗議差別對待乎？……，設吾輩能以思想克復強權，智力打勝蠻野，彼為政者雖欲以武力政治加諸於我，亦有所不能。<sup>25</sup>

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唯有民眾提昇文化水準，用思想克服強權，才有機會和強權對抗。從 1920 年代啟蒙的抗日政治社會運動，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趨強硬，以及對島內政治社會運動的彈壓，只要能喚起民眾意識有組織性的運動，到了 1930 年代初，都一一崩解，其中以左翼運動所受到的彈壓最為強烈，左翼政治運動者開始受到監視、逮捕、審判。1931 年台共更遭到大檢舉，其合法性漸漸喪失。此時政治社會的舞台上只剩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了，但由於勢單力薄，在總督府的彈壓氣勢下，也逐漸退縮了。到了 1932 年，日本軍閥得寸進尺更是猖狂，台灣到處一片混亂，其情形就像葉榮鐘在《南音》〈發刊詞〉所形容的：

台灣的混沌既非一日了，但是有史以來當以現代為第一，目前的台灣可以說是八面碰壁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以至於社會上各方面，不是暮氣頹唐的，便是矛盾撞著，在這混亂慘淡的空氣中過日的我們，能有幾個不至於感著苦痛？<sup>26</sup>

《南音》的發行，就是在左翼政治運動受挫後，台灣「八面碰壁」時，重新出發的一種運動，他打著大眾文藝的旗幟，替受壓抑的台灣民間文學找尋宣洩的出口。因為它沒有清楚的階級立場，所以被當時的文評家定位為具有布爾喬亞色彩的文學雜誌。<sup>27</sup>然而《南音》的影響是深遠的，因為它的開風氣才有後來的《先

---

<sup>25</sup> 林仲輝〈訪代議士永井柳太郎氏有感〉《台灣青年》第一卷第二號，漢文之部，頁 21。轉引自許俊雅〈文化傳統與歷史選擇—談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的文化內涵〉《台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台北市：南天書局，民國 86 年初版），頁 3。

<sup>26</sup> 葉榮鐘〈《南音》發刊詞〉《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7，頁 259。

<sup>27</sup> 陳芳明〈現代性與本土性：以《南音》為中心看三〇年代台灣作家與民間想像〉，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清華大學國際會議廳，新竹，1998.11.21-22，頁 76。



發部隊》、《第一線》等繼續朝民間文學的整理工作推進。

## (二)《南音》發刊的動機：

由於葉榮鐘等人鑑於台灣當時收載文藝作品的園地太少，想學習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的精神，向黃春成提議創辦文藝雜誌，為台灣文藝多闢些園地。葉榮鐘獲得黃春成的首肯後，隨即徵詢一些新文學作家的意見，他們都表示願意加入，經過研商後《南音》決定依葉榮鐘與黃春成「大冶一爐，以求個人最後之勝利益我民生」的想法，“凡屬文藝作品，不論反對與主張，儘量登載”。<sup>28</sup>當時參加的新文學作家，計有陳逢源、賴和、周定山、張煥珪、莊遂性、張聘三、許文達(1900-1968)、葉榮鐘、洪標、吳春霖、郭秋生、黃春成等十二位。他們都是知識份子，曾在三〇年代參與過政治運動，直到 1931 年台灣總督府解散所有的抗日組織之後，他們才全力投入文學運動。葉榮鐘在《南音》發刊詞中說的很清楚：

我們幾個傻朋友，伶俐不足以忸舞昇平，志氣不足以奔走運動，膽量不足以實行自殺，笑啼皆不敢，左右作人難，想來想去只好絞些腦汁，寫幾編不三不四的文字，談幾句不關痛癢的閒話來消消愁悶，解解鬱憤，這樣無聊的極思，就是本誌發刊的動機。<sup>29</sup>

知識份子沒有伸展的舞台，內心的憂鬱、沉悶、苦悶，是可想而知的，為了消消愁悶，他們十二人籌組了南音文藝報。為了避免無謂的犧牲，或引來檢閱者的囉嗦，《南音》採用深文曲筆的方式來編輯此份雜誌，認為最佳的寫作方式是：

應痛罵日人處，最好，不必即刻劍拔弩張，直搗黃龍，惹翻檢閱者的神經；與其作無謂的犧牲，何如運用含蓄的筆法，使讀者稱快，而檢閱者惘然，較為得策。<sup>30</sup>

他們是以承認日本帝國的統治為前提，爭取內台如一，沒有差別待遇的殖民地統治，台灣人民與日本內地人民，都能享有相同的權利與義務。如此不但台灣漢文

<sup>28</sup> 黃春成〈談談「南音」〉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6，頁 336。

<sup>29</sup> 葉榮鐘〈《南音》發刊詞〉《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7，頁 259。

<sup>30</sup>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起源〉《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98 年 11 月再版第二刷），頁 22。

化可以保留下來，且可利用此時機培養台灣本土人才，為將來脫離日本帝國統治做準備。這是十分穩健的作法，《南音》就是依循這個原則來作的。

### (三)《南音》的命名

雜誌原本擬命名為「雜菜麵」，然而林幼春認為「雜菜麵」的名字雖善，但過於滑稽，恐讀者誤會是在嬉戲，以致辜負作者的苦心，所以決定依林幼春之意命名為「南音」，並請寫了一手好字的莊垂勝負負責揮毫。陳昭瑛以為取名「南音」乃是承繼著屈原的精神，「南音」是楚聲，是中國南方長江流域楚國特有的音樂，是擷取《左傳·成公九年》楚囚鍾儀奏「南音」的典故；這也意味著台灣文學是屬於中國文學大傳統中「南方」的一個支脈，強調台灣文學的精神與屈原的愛國之忱、亡國之哀有所呼應。<sup>31</sup>「楚囚」一詞更是日據時代的台灣詩人在寫古典詩歌時自況之語，比喻生活在殖民地台灣的作家如同坐日人牢。《南音》的創辦如黃得時所說的：「對於暮色沉沉的台灣文學界，發出了南方特有的雄音。」<sup>32</sup>

《南音》由黃春成擔任發行人，社址設在台北黃春成家中<sup>33</sup>，採半月刊方式，從 1932 年元旦開始發行。但隨著期數增加，檢閱麻煩也接踵而來，致第七期開始由張星建接辦，並移師至台中。《南音》前後共出了十二期，其中第九、十、十二期因為刊登反日作品遭受日當局禁止，雖然後來第九、第十兩期修訂後合刊發行，但第十二期就被查禁了，不過比起當時其餘的雜誌它的壽命算是長了。剛好此時《台灣新民報》改為日刊，該報副刊可以取而代之，《南音》也就壽終正寢了。

### (四)《南音》的精神及期望

葉榮鐘用「奇」的筆名在《南音》發刊詞中對南音獨特的精神，說得非常清楚：

---

<sup>31</sup> 參陳昭瑛〈誰召同胞未死魂：葉榮鐘《早年文集》的志業與思想〉《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7，頁 58-59。

<sup>32</sup> 黃得時〈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6，頁 301。

<sup>33</sup> 因台北的檢閱，表面上雖嚴，其實較別的地方，略為寬鬆，而黃春成給日人的印象良好，未參加過黨派，或藉酒鬧事，加上他家有藏書，喜漢籍的日本文人，多少可以利用，擋擋檢閱的箭牌。

……我們相信台灣今日人心，其所會離散墮落者，勿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上的困迫，不如意確是一大原因。然而從來我們的精神生活上在很長的期間，缺少思想的訓練和文學的涵養這一層，也是不可蔑視的一大病根，在這百不如意的環境裡，要想提高一點點台灣的文化，向上我們的生活，除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而外，實在是少有辦法的，所以本誌在做同人自己表現一些牢騷之外，還期待牠能做個思想知識的交換機關，盡一點微力於文藝的啟蒙運動，這樣的工作我們亦自知很消極、很迂遠的勾當，然而在這百不可為的情勢下，也算是一種「歌以當哭」的辦法吧。<sup>34</sup>

他期望借著《南音》「做個思想知識的交換機關，盡一點微力於文藝的啟蒙運動」。對文學有興趣的志士仁人，大家共同努力，利用文學來啟蒙教養民眾，推動文化運動，進而改善民眾的生活，讓台灣的民眾多一點文學的素養。

## (五)《南音》的使命

在〈發刊詞〉裡身為主編的葉榮鐘很清楚的說出它的二個使命是：

第一就是「怎樣纔夠使思想、文藝普遍化」……就是有甚麼方法或是用甚麼工具和形式來發表，纔能夠使思想、文藝浸透於一般民眾的心田，這是本誌應當努力的一個使命。

……缺少發表的機關便缺少刺激，缺少刺激自然作家就缺少興味去構想、執筆了。因此同人心願提供這一片小小的園地給大家利用，還想講究種種的方法去鼓勵作家，以期所貢獻於我台灣的思想、文藝的進展。這就是本誌應當奉行的第二層的使命。<sup>35</sup>

「怎樣才能夠使思想、文藝普遍化」、「有什麼方法或是用什麼工具和形式來發表，才能夠使思想、文藝浸透於一般民眾的心田」是《南音》兩個具體的使命，所以他接著在第一卷第二號的〈卷頭言：「大眾文藝」待望〉中提倡符合這些條件的大眾文藝。

---

<sup>34</sup> 葉榮鐘〈《南音》發刊詞〉《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7，頁259。

<sup>35</sup> 葉榮鐘〈《南音》發刊詞〉《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7，頁260。

## (六)《南音》的時代意義

《南音》異於日治時代其它文學雜誌的地方在於它並非中、日文併刊，而是單一中國白話文雜誌，它帶動了文藝園地從報紙轉向文藝雜誌的契機，雖然它只出了十二號，但往後繼之而起的雜誌非常多。雖然它曾被當時部分人士譏評是：「資本階級的娛樂刊物，是霧峰派的小噱嘍」<sup>36</sup>、楊行東在《福爾摩沙》創刊號中更評它為「腐心於風月花鳥的貴族文學」，<sup>37</sup>但此雜誌對於 1931 年以後的台灣文藝界，有其特殊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因為繼《南音》以後，台灣知識份子才開始出版有意識、有組織的文學團體與文學刊物，對台灣新文學來說是重要的關鍵。葉石濤先生說這年之後台灣文學進入了「成熟期」<sup>38</sup>、王詩琅用「本格化時期」<sup>39</sup>來形容台灣文學發展的蓬勃盛況。

《南音》是第一個文藝雜誌，它從過去專注政治社會轉向注重純文學的刊物，較特別的是雜誌上刊登了「懸賞創作募集」廣告，以重金公開徵求小說、戲曲、詩歌，和春聯等。這種向民間尋求文學資源的努力，是殖民地知識份子在尋求文化主體重建時的一項龐大工程，在三〇年代有其一定的意義，除了可以建立彼此的相互認同外，也可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

## 三、葉榮鐘與《南音》

《南音》是在政治、經濟、社會各面碰壁的困境下，為台灣抗日運動指出一條左右翼能聯合統一的、超越階級的新文學路線。它是為「文學的啓蒙運動」而創刊的，目的是要盡一點微力於文藝的啓蒙運動，使生活於混亂慘淡空氣中苦悶的台灣民眾，得以領受思想、文藝的薰陶，借以提昇文化及精神層次。它的創辦，不但為台灣文學界提供新的文學園地，也奠定了葉榮鐘為台灣新文學大家的歷史

---

<sup>36</sup> 黃春成〈談談「南音」〉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6，頁 341。

<sup>37</sup> 黃得時〈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6，頁 304。

<sup>38</sup> 葉石濤著〈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2000 年 10 月），頁 38。

<sup>39</sup> 參陳芳明〈現代性與本土性：以《南音》為中心看三〇年代台灣作家與民間想像〉《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頁 74。本格化時期就是說建立自身文學的專屬特色，走出屬於自己的一個新世界。

地位。從《南音》多篇出自他手筆的卷頭語可看出當時台灣文學的特色、他對文學的基本看法，及台灣文學未來的走向。

《南音》每期的〈卷頭言〉，除了第 11 期是郭秋生所寫的外，其餘都是葉榮鐘的傑作，可知葉榮鐘是實際的編輯者。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他闡明該刊創立的動機與宗旨，是要以文學消解時代的苦悶，提高台灣文化，使人民生活向上昇揚，以《南音》做為思想交換站與文藝啓蒙機關，以藝文來潤澤苦悶者，使思想文藝普及化。葉榮鐘強調的是娛樂慰安，是風土人情，是藝術化的人生的文學思想，它的目標就是要讓文學與社會相互結合起來——“希求整個社會的進步發達已是現代的潮流，何況像台灣這樣，文化程度較低的地方，自然要比別處痛感其有普遍化的必要。”<sup>40</sup>這是葉榮鐘對《南音》的期許，也是對啓蒙運動的支持。他希望透過《南音》的發行，讓作家有發表的園地，從而刺激更多的作品出現，「以期有所貢獻於我台灣的思想文藝的進展」。<sup>41</sup>並養成新的作家與思想家，也因此催促了第二代作家的誕生。「鹿港三子」<sup>42</sup>周定山(1898-1975)、莊垂勝、葉榮鐘就是透過《南音》的媒介，而與新文學運動做了極為密切的銜接。第二號〈「大眾文藝」待望〉開始到第三號〈前輩的使命〉、第七號〈知識分配〉、第八號〈第三文學提倡〉、第九、十號〈再論『第三文學』〉，這是葉榮鐘響應台灣新文學運動，針對如何提昇台灣人的知識水準所提出的具體方法。他強調文學是超越階級的，過去的文學被限制在士紳知識階層，一般大眾的參與均是被動地，現在又因普羅文學而被限制在無產階級，這些觀念都是偏狹的。文學不該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可以享受的，而是「大多數人」都可以擁有的。文學不再是特殊階級的專有物，它是接近大眾的；文學不是沒有生命的藝術，是生動活潑的屬於全民的文學，是立足於「台灣的特殊文化」及「社會意識」的文學。他鼓勵知識份子站起來，走入社會，進入基層，將高遠的理想，化做實際的行動，去指導民眾，如此才是明智之舉。他也呼籲舊文人擔負起搜羅史實的使命，站在台灣特殊歷史命運上去從事文獻工作，葉榮鐘此舉，也等於是將舊文學納入新文學，將一直以來的新舊文學加以整合。葉榮鐘大眾文藝的提倡，強調文藝普遍化的訴求，是全民的、超階級的，也是其他《南音》成員的共識，它展現了站在右翼去顧應左翼

<sup>40</sup> 葉榮鐘〈《南音》發刊詞〉《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7，頁 260。

<sup>41</sup> 葉榮鐘〈《南音》發刊詞〉《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7，頁 260。

<sup>42</sup>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 5 月)，頁 207。鹿城三子是周定山、葉榮鐘、莊遂性。

的特質，也為右翼運動者重申其為全民眾謀福利的理念。不但使台灣社會的心靈能趕上世界文明的潮流，也阻止了殖民文化的蔓延與擴張，對提升台灣人民的文化信心有正面的意義。更值得一提的是葉榮鐘在對「貴族文學」與「普羅文學」都有意見時，提出了超越階級的「第三文學」，他試圖從右翼及左翼突出重圍，走「新中間路線」，他特別強調台灣的特殊文化及社會境遇，此論的提出在三〇年代不但是獨樹一幟，且為日後台灣文學界提供了方向性與指導性。

第四號〈勿講假話〉與第五號〈人類的呼聲〉前後呼應，寫出葉榮鐘對戰爭的感慨與厭惡，在“有力者們正在橫吹那戰征的軍笛而多數的國民亦正跟著他們在亂舞著”<sup>43</sup>時，為了避免民眾盲目的跟隨及人民的幸福，他強調「避戰」的必要性。甚至為了讓後世子孫知道戰爭的殘酷及禍害，他呼籲作家們將戰爭的事實真相寫出，公諸於世，期能達到避戰的效果，由葉榮鐘對戰爭的厭惡，就能明白為什麼終其一生都是右翼溫和派的支持者。為此他誠懇的希望“台灣的詩翁詩伯以及文宗漢學等等大方先輩，為著教訓後進的起見，多作些傳世的大文字，但是不可說假話”<sup>44</sup>，能用作者真實的感情和思想來寫，如此的文學才有價值，才有意義。為強調此一寫作的理念，他接著在第六號〈作詩的態度〉就很不客氣的對「言之無物」的傳統詩作、傳統詩人大加撻伐，並具體地提出正確的作詩方法。

除了卷頭語外，葉榮鐘也在《南音》發表了一些藝文性的作品，甚至新詩〈歸到她的懷抱裡去〉，《南音》讓葉榮鐘發揮所長，也讓我們看到葉榮鐘對文學的喜愛與執著。他在《南音》一系列的文學理論與主張，可看出他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在引導台灣人走向現代化，又不致迷失本土性，其對台灣文學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就新文學運動來說，「台灣文學」的整體性概念之樹立，葉榮鐘功不可沒；對台灣文學整體觀之成立，有其推波助瀾的重要地位，他在南音社裡扮演的角色值得我們肯定。

---

<sup>43</sup> 葉榮鐘〈卷頭言——人類的呼聲〉《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7，頁282。

<sup>44</sup> 葉榮鐘〈卷頭言——勿講假話〉《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7，頁280。

## 第四章 葉榮鐘的文學理論

二〇年代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台灣的中間點，此時的台灣在社會內部變化以及外在思潮的衝擊下，面臨一個轉型期。受日本殖民地教育的第一批台灣知識分子，在接受世界各先進國家思想的洗禮之後，視野開闊、憧憬自由民主，希望以其所學的新知，企圖展開新文化運動，從而更新精神層面，帶領台灣人掙脫次等國民的標記。由於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新文學運動推展，更加富有曲折性。從文學的觀點來看，台灣新文學理論的提倡者，始終保有漢文化的自覺，以抗衡官方推動的日本文化；然而也因傳統文學的固步自封，無法跟得上時代進步的潮流，所以他們援引中國五四文學革命的成果及介紹西方近代文學思潮，促成台灣文學形式與內容的變化，以迎向新的時代。

葉榮鐘除了在政治運動方面有實質的踐履外，在文學的創作及文學理論的主張也有其自我的一套理念及方法。他或許沒有像賴和、楊逵等人寫出一部部充滿反殖民精神的抗議文學，但他一生奔波於社會運動，寫出許多的文章，其致力於改善台灣人的生活，爭取台灣人脫離日人統治的心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畢竟，在不同的治體下，以各種方式求生存，原是台灣人四百多年來椎心泣血的「共業」！本章所要研究的就是在台灣民族運動上葉榮鐘主張文學應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功能？承載何種責任？

### 第一節 當時的文學背景

一種文學運動的產生與政治運動的產生是一樣的，必須有賴於客觀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定的客觀條件，運動就不可能產生、蓬勃起來，因此要了解一個運動的產生一定要先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風貌。誠如林瑞明所說：

文學是動態的、精神的文化現象，無可避免地與時代的現實發展相互干涉；文學內容與形式的變化，各有其複雜的過程，一部分是內在的藝術性求變化所促成，另一部分則是外在的，因社會的、思想的和廣義文化的變

動所導致。<sup>1</sup>

一個文學運動的產生其外在因素佔有主導性的決定作用，今天要研究葉榮鐘的文學理論之前，一定要先了解日據時期台灣文壇的動向及演變，才能明白葉榮鐘文學理論所蘊含的時代意義。

## 一、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

從乙未至今雖已一百多年了，真要劃出新文學運動的濫觴應從二〇年代台灣第一代的現代知識份子誕生算起，在這約八十年的光景，一般學者稱之為台灣新文學史，它可劃分成三大階段：1.日本統治的殖民時期（1921-1945年），2.戰後的再殖民時期（1945-1987年），3.解嚴至今的後殖民時期。以葉榮鐘為主的背景研究將放在第一個階段（1921-1945年）。此階段的台灣文學史又可細分成：1.啟蒙實驗期（1920-1931年）、2.聯合陣線期（1931-1937年）、3.皇民運動期（1937-1945年）。<sup>2</sup>

### （一）啟蒙實驗期（1920-1931年）

這是台灣作家摸索語言使用與文學形式的萌芽階段，也是文學運動附屬於政治運動的關鍵時期。<sup>3</sup>台灣的知識份子，他們接受日本殖民者的現代教育，已經能夠「放眼世界、心懷故土」，開始伸出觸鬚去瞭解世界的政治形勢。在國內，他們見證了1915年焦吧咩事件；在國際上1917年俄國革命成功的消息、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民族自決原則，驚醒了留日學生的台灣民族意識，他們知道弱小民族有要求解放、爭自由、反橫暴，謀和平的權利，所以高唱「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sup>4</sup>更知道1919年中國的民族主義示威——五四運動，這次啟蒙運動給留學中國的台灣學生帶來相當大的震撼、鼓舞與影響，從反帝、反非理

---

<sup>1</sup> 林瑞明〈自序〉《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與研究論集》（台北市：允晨文化出版，民國82年8月初版），頁III。

<sup>2</sup> 參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第十五卷第十期，（1999年8月），頁167-168。

<sup>3</sup>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第十五卷第十期，（1999年8月），頁167。

<sup>4</sup> 胡民祥〈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8月，頁216。「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主張的原型應是在於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一族群區隔，產生社會分化的效應，有利於社會運動的展開，是「台灣人意識」凝聚的開始，也是以「台灣人認同」來反擊同化成爲日本人的社會趨勢。



性傳統之精神，一直到追求自由、民主、科學等精神，皆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目標工作。另外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sup>5</sup>，日本的大正民主等，對台灣新文化運動的展開，都有其或多或少的影響。因此雖然武力抗爭隨著焦吧哖事件的落幕而消失，但代之而起的是受過近代思想洗禮的文化運動、啓蒙運動、政治運動。

## (二)聯合陣線期（1931-1937 年）

聯合陣線期的文學運動，是從 1931 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 1937 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為止。爲了配合日本軍國主義的實施，台灣總督府開始鎮壓台灣內部的政治組織，一些抗日團體被迫解散，但爲了繼續爲台灣人謀福利，他們轉而投入文學運動。此時期的作家已經意識到必須拋開個人意識形態或政治信仰，而以日本殖民者爲共同的敵人，大家集結起來採取聯合陣線的方式，以文學團體形式批判殖民體制，以團體的力量專注在文學作品的經營，進行使命式的文學抗爭，文學運動不再附屬於政治運動之下，反而有取代政治鬥爭之勢。「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台灣文藝協會」、「南音社」，以及「台灣文藝聯盟」，都是文學史上聯合陣線的具體實踐。另外是信仰社會主義的左翼文學也崛起了，左翼作家賴和、楊逵……等人，已將社會主義思想與文學結合，並在三〇年代蓬勃發展起來。

## (三)皇民運動期（1937-1945 年）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也進入戰時體制，日本政府強徵台灣青年充當大陸戰地軍伕，這是日本軍閥完成其大陸政策的第一步，也是台人受難最慘的一年。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升高，台灣總督府發佈禁用中文的命令，廢止所有報紙的中文欄，連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新民報》，也須廢止漢文欄。且隨著戰爭情勢的緊張，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人在台強制推行「皇民化運動」，那是日帝深知台灣同胞與祖國有血濃於水的民族之情，爲了毀滅台

---

<sup>5</sup> 三一獨立運動：1919 年 3 月 1 日，在韓國發生以天道教爲中心的全國性民族運動，漢城市中各學校學生數千人首先集中於公園，然後擁至美國領事館、朝鮮總督府等，與會人員齊唱「大韓獨立萬歲」，所以此運動又叫「萬歲事件」。此次被日本軍隊殺死的人數有 7909 人，被檢舉的嫌犯多達兩萬人。此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其影響非常廣大，尤其給予東京台灣留學生的衝擊極爲深刻，因爲韓國與台灣同爲日本的殖民地，論歷史台灣居先，而政治的地位台人反爲落後，台人對日本政府之政治的要求，大都向韓國民眾看齊，所以韓人的獨立運動予台人，極大的刺激。以上資料參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 年初版），頁 316。

人的民族意識，消滅台灣的固有文化、風俗習慣而定的。另外是皇民文學的提倡，日本要求所有作家支持國策、協力戰爭，必須用日文創作，而以軍事武裝為後盾的「皇民文學奉公會」，不僅有權力檢查作家的思想，還可以指派作家從事宣揚國策的創作，也規定部份作家參加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皇民文學完全藐視作家的自主性，與獨立人權，所以實施後有些作家進行迂迴的抵抗，有的則虛與委蛇，有的則傾斜靠攏，許多作家更在這場文學其名、政治其實的運動中受到傷害與欺壓，他們只好停筆，並將自己麻痺在醇酒婦人間。

當中文被禁時，只有一個例外，就是漢詩欄被留下來，對於漢詩日本人不但反對，甚至還帶有鼓勵的性質，<sup>6</sup>特別是歌頌日本戰爭，這樣的漢詩反而是受到日本官方歡迎的，所以漢詩一直到戰爭結束以前仍然是通行無阻的。

## 第二節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緣起及經過

整個台灣新舊文學的論爭，嚴格說起來應是由 1924 年張我軍的〈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開其端，至 1937 年七七事變，日本嚴禁漢文的使用，而告一個段落，短短的一、二十年，在歷史的洪流中真的是微不足道，然而由於台灣特殊的殖民環境，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更加富有曲折性，雖然葉榮鐘參與文學論戰的時候，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已進入第二階段了，<sup>7</sup>但爲了了解其理論主張之精神特色，我們還是要從整個文學的演變過程來探討。

### 一、新文學觀念的萌芽

一個國家社會會有文化轉型，一定是經歷一段漫長的醞釀改變後才會產生，

---

<sup>6</sup> 參鍾肇政著莊紫蓉編《台灣文學十講》（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第一刷），頁222。日本人喜歡漢詩的原因是日本人多半是從小唸漢學的，特別是維新以前，漢學是他們學問的基礎，幾乎也是學問的全部。明治時期一些日本做官的，都會諳幾句漢詩還會作詞。由於來台日本統治階級大多具有中國古文學和古詩的涵養，推崇中國古文學，他們常吟古詩並藉此述懷，因此跟台灣的古詩人多有酬和之作

<sup>7</sup> 依據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頁414-439。文中將台灣新舊文學之爭分成三期，第一期是1924年11月21日張我軍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開始，一直到1925年8月26日張我軍發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爲止，第二期是1925年至1940年間；第三期是指1941年至1942年發生的有關「台灣詩人七大毛病的論爭」。然筆者認爲此分期不是很理想，第三期據廖漢臣自己也說只是一場舊文學陣營的內訌而已，當然就不能算是新舊文學的論戰了，所以筆者認爲此論戰只須分第一期與第二期兩階段即可。

在日本帝國主義力量還未延伸到台灣之前，台灣文學界是傳統漢詩的天下，在步調較緩慢的農業社會，它是盛行的、適用的；等到淪為殖民地之後，整個社會發生劇烈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觀念，已不能適應新的環境，取而代之的，是新文學觀念的產生。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軔，可追溯至 1920 年，那是新興知識份子開始領導抗日的政治運動之後，才有新文學觀念的提出。對此連溫卿有精闢的解釋，他說：

形成台灣新文化運動的基調、底流、思想，就是台灣人的反日民族自決，民族主義思想，綜合起來也可以說台灣新文化運動始終是和民族解放的政治運動合在一起，有不可分的關係。<sup>8</sup>

此種民族觀念，一直到日本人投降，皆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蘊藏在從事新文化運動的工作者的腦海裡。

## 二、台灣新文學觀念的演進

在異民族統治下的台灣人，民族情感傾向文化母國——中國，<sup>9</sup>當中國發生「五四運動」時，台灣也受到影響。楊雲萍於〈台灣小說選序〉一文中曾說：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是受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運動與成就所影響，所促進。既是台灣的運動，當然保持了多少的台灣的特色。<sup>10</sup>

楊雲萍承認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受中國新文學的影響，但他仍重視自己台灣的本土特色，是較持平中肯的說法。

### (一)台灣新文學觀念的奠基者——陳炘

台灣最早提出新文學理論的當推陳炘<sup>11</sup>，1920 年 7 月 16 日他在《台灣青年》

---

<sup>8</sup> 張維賢〈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253。

<sup>9</sup> 即以漢人體系為中心的族群認同，台灣從明、清以來，陸續有漢人從中國移來，因而立足於「漢民族」這個血統關係上，乃以「中國」為認同的符碼。台灣雖然歷經了多次的政權轉換，就歷史認同來看，「中國」基本上是認同的主體，因為有著相同的血脈關係。

<sup>10</sup> 楊雲萍〈台灣小說選序〉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204。

<sup>11</sup> 陳炘，清光緒十九年（1893 年）生於大甲，1922 年日本慶應大學理財科畢業後赴美深造，入

創刊號上發表了〈文學與職務〉，文中對於台灣舊文學加以批評：

言文學者，矯揉造作，不求學理，抱殘守缺，只務其末。雖文學猶存，而其偉大之作用，殆不可見矣。<sup>12</sup>

並感嘆當時的台灣「有文章而無作用，有學術而無思想；文學自文學，思想自思想」<sup>13</sup>導致文化停滯、思想束縛。他肯定「文學者，乃文化之先驅」<sup>14</sup>，認為文學的職務不單只是啓發文化，還負有傳播文明思想，鼓吹人道感情，促進社會革新之使命。因此他倡導自覺的文學，因為：

當以傳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之感情，促社會之革新為己任，始可謂有自學之文學也。<sup>15</sup>

他公開指控舊文學是「有濃麗之外觀，而無靈魂腦筋，是死文學」<sup>16</sup>，認為有感情、有思想的文學，才是活文學。它必須用淺顯易懂的活文字來撰文，才不會妨礙思想感情的發抒與傳達，因此建議採用中國提倡的新文學、白話文，他說：

近來民國新學，獎勵白話文，無非有感於此耳。……文字取用平凡，作者乃得自由發揮其所抱之思想其懷之感情。閱者雖文人學士，亦能領略其思想感情，文學方有效用，如斯之文學，乃可謂盡其職務者也。<sup>17</sup>

由此可見整個台灣新文學觀念的奠基者是陳炳莫屬了，因為他的文章裡除了批判舊文學外，也將新文學的內容、目的、功能、任務表露無遺。

## (二)萌芽期新文學的語言問題

文字是傳達感情，疏通意志的最好工具，在推動台灣新文化運動上，文字是不能忽視的。然而台灣語許多是有音無字，書寫會有問題，加上當時台灣人文盲

---

哥倫比亞大學研習經濟，是台灣人中第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博士。返台後，得林獻堂等人財力支持，獲資金二百五十萬圓成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任專務取締役（常務董事），據傳說1948年前後被害。

<sup>12</sup> 陳炳〈文學與職務〉《台灣青年》創刊號（1920年7月16日漢文之部），頁42。

<sup>13</sup> 林瑞明〈台灣新文學運動理論時期之檢討 1920-1923〉《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1996年7月，初版），頁004。

<sup>14</sup> 陳炳〈文學與職務〉《台灣青年》創刊號（1920年7月16日漢文之部），頁41。

<sup>15</sup> 陳炳〈文學與職務〉《台灣青年》創刊號（1920年7月16日漢文之部），頁42。

<sup>16</sup> 陳炳〈文學與職務〉《台灣青年》創刊號（1920年7月16日漢文之部），頁42。

<sup>17</sup> 陳炳〈文學與職務〉《台灣青年》創刊號（1920年7月16日漢文之部），頁42。

非常多，如何有效提出一種大眾都能適應，且能在最短時間內學會的文字是非常重要的。他們想若是使用日語，幾乎等於是默認殖民統治的合法性；如果要使用古典漢語，卻又無法迎接新時代的挑戰。在這種兩難的考量下，知識份子遂有改革語文之議。此時適逢中國大陸五四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為寫作工具，白話文的提倡讓台灣作家在語文的改革上有了遵循的方向。也有人說台灣民眾日常生活所習用的是台灣語，若要符合當時世界文學大眾化的傾向，用台灣語的語彙來書寫較為適當，因此有人提倡台灣話文。除此之外，還有人提倡易學易寫的台灣羅馬字。以下分別簡述之：

## 1. 中國白話文論

五四運動不但是抗日的政治運動，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其目標之一，便是廢止文言文，建立民眾易讀易寫的共同語文白話文，進而創造健全的國民文學。台灣的白話文運動就是受此運動影響展開的，當時參與的知識份子很多，像黃朝琴、黃呈聰、張我軍……等人，很努力的欲讓中國白話文學成為台灣新文學的主流，並擔負起改革社會生活、啟蒙教養民眾的職務。葉石濤說：

五四運動的語文改革主張，促使台灣真正覺醒，產生規模宏大的抗日民族文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sup>18</sup>

學習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不但喚醒台灣文學界，也帶動台灣新文學運動。

### (1) 陳端明

繼陳炳之後，陳端明是最早主張使用中國白話文的，1922年元月他在《台灣青年》四卷一號發表了〈日用文鼓吹論〉<sup>19</sup>，認為台灣要進步就得使用白話文。他說：

白文之利，第一可以速普及文化，啟發智能，同達文明之域。第二意義簡易，又省時間，稚童亦能道信，自幼可養國民團結之觀念，其影響於國家

---

<sup>18</sup> 葉石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文學界雜誌社，民國82年，再版），頁20。

<sup>19</sup> 此篇原發表在《台灣青年》三卷六號上，因該期被禁，才又重刊於四卷一號。

不少，有此種種之便，故白文行見必更盛行於世，非偶然也。<sup>20</sup>

他認為白話文有啓發民智，普及文化的功能，因為知識越落後，所受殖民的支配就越深化，唯有語文普及，才能凝聚共識，自然能提升抵抗殖民的力量。

## (2)黃呈聰

1923年元旦《台灣青年》(第四卷第一號)刊登黃呈聰用白話文寫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極力提倡白話文。他探究台灣文化遲遲不進的原因：

……在我們的社會上沒有一種普遍的文，使民眾容易看書、看報、寫信、著書，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曉得，社會裡面的黑暗，民眾變成愚昧，故社會不能活動，這就是不進步的原因了。<sup>21</sup>

他深信唯有普遍看的懂的文字，百姓才能吸收新知，台灣社會才能發達，並認為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因而極力鼓吹台灣也用中國白話文。他說：

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背後沒有一個大勢力的文字來幫助保存我們的文字，不久便受他方面有勢力的文字來打消我們的文字了，……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國的白話文，漸漸接近他，將來就會變做一樣，…大家若是這樣想，就我們的台灣雖是孤島，也有了大陸的氣慨了！<sup>22</sup>

爲了讓民眾跟得上時代的潮流，他建議台灣使用中國白話文，民眾有了知識以後，才能抗拒日本的殖民統治，可見黃呈聰觀念裡的白話文運動已有強烈的去殖民意味<sup>23</sup>，白話文普及化，是一種思想解放，也是一種朝向現代化的象徵，國家要走向富強，就必須先追求文化的現代化，對改造台灣，他有著強烈的使命感。

## (3)黃朝琴

---

<sup>20</sup> 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5。

<sup>21</sup>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6-7。

<sup>22</sup>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15。

<sup>23</sup> 陳芳明先生〈初期新文學觀念的形成〉《聯合文學》第十五卷第十一期，第 179 期，(1999 年 8 月)，頁 163。

1923 年元旦《台灣青年》(第四卷第一號)刊載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他認為中國及台灣文化長期受外族愚民政策的制約，因此文化生產力降低，中國已發現此弊端，並從事思想與語言的改革，只一水之隔的台灣也應該覺醒。他說：

……看像本家的中國，尚且知道改用白話文，區區的一台灣，仍然守著他，豈不是做個漢文的守舊派嗎？<sup>24</sup>

所以他勸台人，不要寫日文，不要用古文，要用中國白話文來寫信、演講……，以達成教育普及的目的。葉榮鐘說：“黃朝琴與黃呈聰，他們這兩篇論文，開台灣白話文運動之先河。”<sup>25</sup>，他們兩位正式將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成效介紹到台灣，這是提倡改革台灣文學最早的論文，因此這兩篇文章被譽為《台灣文學革命的先聲》。<sup>26</sup>為了達到實質上的效果，他們還創設「白話文講習會」，並擔任講習會講師，教授白話，對台灣白話文的推行是不遺餘力的。

#### (4)台灣民報

受白話文的影響，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林呈祿、蔡惠如、黃呈聰、黃朝琴等人，於 1923 年 4 月 15 日創刊《台灣民報》，它以中文為主，是日治時期唯一由台灣人擁有與經營的報紙。在殖民政府高壓統治下，《台灣民報》是台灣人政治、文化活動的推手，也是台灣民眾唯一的喉舌。它控訴台灣總督府的苛政，提高台人的民族意識，促進同胞的團結，傳播祖國的固有文化，輸入白話文，對台灣人的思想、文化的啓蒙有很大的幫助。其創刊宗旨“不外乎是啟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的民氣，以謀台灣的幸福。”<sup>27</sup>並明確的定位在：

……用平易的漢文，或是通俗白話，介紹世界的事情、批評時事、報導學界的動靜、內外的經濟、株式(股票)糖米的行情、提倡文藝、指導社會、

---

<sup>24</sup> 黃朝琴〈漢文改革論〉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30。

<sup>25</sup>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年初版)，頁 184。

<sup>26</sup> 古繼堂〈白話文運動和新舊文學論爭〉《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市：文史哲出版，1996年10月初版三刷)，頁 28。

<sup>27</sup> 引自史明〈台灣人的「抗日」與台灣人意識(後期)〉《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市：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年4月)，頁 498

連絡家庭與學校等……與本誌並行，啟發台灣的文化，……<sup>28</sup>

這份報紙是用白話文書寫，除設有「文藝」專欄，每期刊登有關文藝論文和作品外，也開闢「應接室」一欄，由超今（黃朝琴）主持，專為指導白話文的寫作而設的。除此，林呈祿更在台南市成立白話文研究會<sup>29</sup>，歡迎有志研究白話文者入會，響應者不少。台灣白話文運動自此正式進入軌道，起步前進。

## 2.羅馬字的提倡

葉石濤曾說：“語文是抗日民族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sup>30</sup>，由於白話文和日文是屬於新一代知識份子的表達思想工具，都有貴族化的傾向，離民眾現實生活很遠，很難讓廣大民眾接受。所以如何改革舊語文，找出一套口語化的白話文，易學易寫，為此有人提出用羅馬字來解決。

### (1)蔡培火

台灣推行以羅馬字做為書寫工具的主要人物是蔡培火，他既是社會思想家，也是基督徒，台灣北港人。他看到當時台灣百姓不識字者非常多，就說：

拙自昔有一心願，即以白話字消盲，俾吾同胞克同登文化彼岸。<sup>31</sup>

他企圖改善台灣人語言有音無字的現象，認為台灣人之語言若能有字，就能吸收世界思潮，吸收新思想，因此他提倡用拼音文字的羅馬字為教育工具來幫助大眾吸收新思想新文化。這是「台灣羅馬白話字」，原是基督教會用以普及聖經的羅馬字，是以 22 個英文羅馬字母拼綴，譯成閩南語口語的表音文字，再以幾個特殊符號來區別聲調，用來教導一般民眾閱讀經典、傳播福音的。例：

“新台灣與羅馬字的關係”就寫成 Sin Tai-Oan Kap Lo-Ma-Ji e Koan-He

---

<sup>28</sup> 葉榮鐘〈台灣人的喉舌—台灣民報〉《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年初版），頁 618。

<sup>29</sup> 參葉榮鐘〈台灣文化協會〉《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同註 28，頁 619。此白話文研究會的會址在台南市東門町一丁目一〇五番地，是陳逢源住宅。只要是該報讀者，有志研究白話文的，均可入會。

<sup>30</sup> 葉石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灣文學史綱》，同註 18，頁 25。

<sup>31</sup> 林莊生著〈蔡培火先生〉《懷樹又懷人》（台北市：自立晚報社，1992年8月第一版一刷），頁 282。



“世間如一條大溪流”就寫成 Se-Kan Si Chit Teau Toa Khe-Lau

他認為台灣羅馬字易懂易學，很快就能得心應手，自由自在，寫些文章書信，進而提高見識，使思想水平達到標準，如此台灣社會才會進步。他說：

好得（幸虧）有這種羅馬字幫助我們，如果我們能夠懂得這羅馬字，那麼要再學習國語漢文不要老師，看書就可以自修。……從羅馬字得到很多的智識，很大的學問。……這樣一來我們台灣的教化，一定可以大大的振興，眾人的精神也可以充實些及向上些，台灣自此可以大大的進步了。<sup>32</sup>

雖說拋棄漢字用羅馬字拼音是語言發展的趨勢，是符合科學需要的，然而蔡培火的羅馬白話字主張，因超越時代、社會背景，以致受到多方面的阻撓，包括父祖之國意識的歷史包袱，所以始終未能真正起飛。<sup>33</sup>

## (2)張洪南

支持蔡培火的張洪南也於 1923 年 5 月 10 日在《台灣》發表〈被誤解的羅馬字〉，文中就羅馬字的優點說：

文盲的存在，不特是他自身的不幸，甚且會影響於社會一般的文化的進步，因此，如果要促進文化的平等發達，……簡易的「羅馬字」為最捷徑吧。<sup>34</sup>

張洪南考慮到台灣下層社會的民眾大部分是文盲，為了讓他們很快識字，因此贊成用羅馬字。他除了肯定羅馬字，也針對一般人對羅馬字有誤解找出原因，第一是台灣人視羅馬字為外國字不適用。第二是認為羅馬字是基督教信徒使用的。第三以為文盲才需要學羅馬字。再者，當時懷有強烈民族思想的知識份子，認為羅馬字台灣白話文是由羅馬字脫胎出來，雖然簡便易學，但不使用漢字，在意識上，總覺得台灣文化似乎沒有根源，就無法發揮反對日本同化主義的抵抗力量。尤其

---

<sup>32</sup> 參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72。

<sup>33</sup> 胡民祥〈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同註 4，頁 222-223。

<sup>34</sup> 參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74。

當日人極力要廢止漢文時，有心人士為保留中國固有文化，尚且想盡辦法對付，假使羅馬字運動成功，則日人就可坐享其成，消中國文字於無形。這也就是中國白話文學派寧可改造母語——台灣語，也要保持完整的漢文、漢字的原因，所以羅馬字運動，除了基督教的信徒外，似乎沒有擴大到其他的階層。

### 3.台灣話文運動

繼「羅馬字運動」之後的是「台灣話文運動」。中國白話文對大多數的台灣人來說，和外國話是一樣的，根本無法做到「我手寫我口」，所以進步非常慢。因此有人起來推行「台灣話文建設運動」，強調保護台灣自己語言的重要性，並且主張把台灣語文字化。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連溫卿，1924年10月1日，他在《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十九號，發表了〈言語之社會的性質〉，他說：

言語和民族的敵愾心是一樣的，言語的社會性質，就是一方面排斥他民族的言語底世界優越權，一方面要保護自己民族的獨立精神，極力保護自己族的言語。<sup>35</sup>

他認為言語是社會文化的象徵，它的起源與民族的起源相同，都是為了自身的存在而產生的。他警覺到台灣話若消滅，則台灣人亦有隨之消失的危機，因此提倡「台灣話文」。同年10月11日他又發表了〈將來的台灣語〉，文中提出改良台灣話的主張，建議利用台灣慣用的語言加以改良，因為有本土特色的語言，才能生動地傳達作者的意念，也才能符合世界各國文字口語化的真正精神，並保有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對此陳芳明認為他的觀點“似乎暗藏著提倡台灣民族主義的意味”。<sup>36</sup>這對當時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的台灣知識界來說，也引起不小的震撼。

其次提出這問題的是台灣歷史家連橫，他見日本貶抑台語，恐台語日趨消亡，連帶台灣人士的民族精神也將不存，因而於1929年11、12月連續在《台灣民報》發表〈台語整理之頭緒〉及〈台語整理之責任〉等文，呼籲大家起來保存台灣語。他認為：

余以僂民，躬逢此阨，既見台語之日就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

---

<sup>35</sup> 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7，頁483。

<sup>36</sup> 陳芳明〈初期新文學觀念的形成〉《聯合文學》第十五卷第十一期，（1999年9月），頁164。

一謀發達，遂成台語考釋，亦稍以盡厥職矣。<sup>37</sup>

況且“台灣之語，高尚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sup>38</sup>台語源自中國，高尚典雅，非當代中國白話所可望其項背。他認為身為台灣人有責任起來整理、保存台灣語，因此致力於研究台灣語的工作。從1931年1月《三六九小報》第卅五號起連載「台灣語講座」，探討台語辭彙，且編了《台灣語典》一書；又於1932年前後撰寫〈雅言〉，所談仍以台語為中心，亦連載於《三六九小報》。<sup>39</sup>當台灣話保存論提出後，立刻有中國話文派提出了反對論，如張我軍在連溫卿的文章發表後，立即提出〈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主張：“……欲依傍中國的國語來改造台灣的土語。換句話說，我們欲把台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語。”<sup>40</sup>他反對用台灣話的原因，是因“我們日常所用的話（指台灣話），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沒有相當的文字。……我們的話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sup>41</sup>，所以他提倡用中國的國語來改造台灣的土語，因而引發了中國話文與台灣話文的論戰。

事實上，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語文改革論，並沒有成功。無論中國白話文、羅馬字、或台灣話，最後都阻擋不了日本語文。台灣作家日語、白話文、台語同時並行，不過，經過此次語言運動後，中國白話文終於紮根於台灣，<sup>42</sup>台灣作家漸漸以白話文為主流語言，同時中國白話文的定位也帶來了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勃興。而此種紛亂的現象，正可證明殖民地知識份子尋找文化主體時的困境。<sup>43</sup>然而它也加濃了台灣文學的民族色彩，抗拒了入侵者的異化和誘惑。<sup>44</sup>

### 三、新舊文學論戰

---

<sup>37</sup> 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85。

<sup>38</sup> 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85。

<sup>39</sup> 參鍾美芳〈詩鐘、擊鉢吟與櫟社活動〉《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下）》，第 79 期，《台北文獻》（台北市：臺北文獻委員會），頁 66。

<sup>40</sup>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102。

<sup>41</sup>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102。

<sup>42</sup> 葉石濤〈戰前的台灣小說〉《國文天地》16 卷 5 期，2000 年 10 月，頁 11。

<sup>43</sup> 參陳芳明〈初期新文學觀念的形成〉《聯合文學》第十五卷第十一期，頁 164。

<sup>44</sup> 古繼堂〈白話文運動和新舊文學論爭〉《台灣小說發展史》，同註 26，頁 29。

## (一)第一階段新舊文學論戰

在清朝統治時代，台灣文學只有老式的舊詩詞而已，且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然而從陳炯對舊文學的批判，及對新文學的鼓吹之後，到了 1930 年代初期，台灣文學變成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的交流點，受現代知識洗禮的知識分子，並不排斥日本人引進的資本主義，他們知道透過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台灣才能變成現代社會。不過台灣作家擔心過度的引進現代性的知識，除會造成傳統文化的沒落，更令人擔心的是：所謂現代性，它“隱藏了極為細緻的殖民支配性格”。<sup>45</sup> 所以當他們抗拒殖民者的外來文化的同時，也回頭尋找屬於自己文化的根，卻又發現本土文化無力抵抗，雖然他們很愛中國傳統的詩詞文化，尤其他們小時候都受過它的薰陶，可是後來卻發現所學的四書五經、唐宋詩詞等已不符時代所需，更由於它的食古不化，加上封建社會留下來的落伍的道德觀念，導致它成了台灣進步的絆腳石。大致說來，三〇年代的台灣作家在追求新文化、新文學的創造之際，也意識到重建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在強調本土性的基礎上，台灣作家積極對舊詩形式進行批判，因為舊詩是瀕臨落後的、死亡的，因此知識份子公開向舊文學——傳統漢詩挑戰。

對傳統漢詩首先發難的首推張我軍<sup>46</sup>，鑑於當時日人對於台灣文化是採取懷柔政策，對於島內舊詩人的活動，則保持著寬容的態度，於是島內的詩社，如雨後春筍般接踵而出，他們藉著詩社組織作逢迎拍馬的憑藉；這些詩人的泥守古典、愁鬱消沉，或沽名釣譽等狀況，讓張我軍憂心忡忡，加上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他覺悟到台灣文學界必須進行改革，所以 1924 年 4 月 6 日，他在北京寫下了轟動一時的名文〈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sup>47</sup>文中對台灣青年在舊詩上做一些無益的鑽研提出嚴厲的批評，他說：

諸君怎的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應用於社會，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台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

<sup>45</sup> 陳芳明〈現代性與本土性：以《南音》為中心看三〇年代台灣作家與民間想像〉《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1998.11.21-22，清華大學國際會議廳，新竹，頁 73。

<sup>46</sup> 張我軍 1902 年出身台灣板橋，1921 年到廈門服務，並於 1924 年遠赴北京學習北京話。

<sup>47</sup> 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作於 1924 年 4 月 6 日，同年 4 月 21 日刊載於《台灣民報》二卷七號。

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想出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sup>48</sup>

該文旋於 4 月 21 日發表在《台灣民報》，這是引起台灣文學界「新舊文學論戰」的導火線。他希望有志的台灣青年能多讀有用的書，培養自己的實力，實際運用於社會，千萬不要和舊詩人一樣偏離文學的正途，不追求真正的文學，只是藉詩的名義向日本當權者酬唱示好。他認為舊詩只剩下文字遊戲的空殼，已經失去文學的精神，也失去了生動的創造力，對年輕一代的誤導已造成戕害，有志的台灣青年千萬不能學他們。

繼張我軍之後，台南鹽水港人張梗<sup>49</sup>的〈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於 1924 年 9 月 11 日起連載於《台灣民報》，文中他直接擷取世界近代文學觀來批評中國的舊小說，並鼓勵青年應有獨創的勇氣，在台灣新文學的萌芽期，張梗是少數不依賴中國新文學觀念的人，廖漢臣認為這可以看做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先聲。<sup>50</sup> 同年 11 月 1 日還有署名為「前非」者發表〈台灣民報怎麼樣不用文言文呢？〉在《台灣民報》上，作者說明白話文與文言文的不同及主張今後寫文章應該採用白話文，他說：“淺顯易曉的白話文，俾使家家誦讀，人人知曉！是欲拯人民在這黑暗束縛之中！引人民到光明自由的路！這是吾本報區區之用意也。”<sup>51</sup>

有了他們的響應，加上治警事件的發生，張我軍深切的感到文學改革的必要性，於是在 1924 年 11 月 21 日用「一郎」的筆名在《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廿四號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針對當時一些媚日的舊詩人，批評他們不知詩為何物，竟以詩做為沽名釣譽的工具，因而“把一班文士的臉丟盡無遺，甚至埋沒許多有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活潑潑的青年。”<sup>52</sup> 並就世界文學思潮的演變，從日本文壇及中國文壇的革新運動與進展，說到台灣文學界的不思長進：

---

<sup>48</sup> 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55。

<sup>49</sup> 參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同註 31，頁 243。張梗原畢業於台北醫專，在鹽水港行醫，因為愛好文學，再度去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部，是《新民會》重要成員之一，惜 35 歲就去世，遺一子，名張東亮，就是葉榮鐘之女婿（葉葵葵之丈夫）。

<sup>50</sup> 張維賢〈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258。

<sup>51</sup> 前非〈台灣民報怎麼樣不用文言文呢？〉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62。

<sup>52</sup> 一郎（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63。

還在打鼾酣睡的台灣的文學，卻要永遠被棄於世界的文壇之外了。台灣的一班文士都戀著壟中的骷髏，情願做個守墓之犬，在那裡守著幾百年前的古典主義之墓。<sup>53</sup>

他用如此激烈的態度，對墮落的舊文人施以嚴厲的撻伐，激怒了原本緘默的舊詩人。1924年11月，首先由連雅堂藉為林小眉《台灣詠史》作跋的機會，間接的反駁張我軍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連雅堂說：

今之學子，口未讀六藝之書，目未接百家之論，耳未聆離騷樂府之音，而囂囂然曰，漢文可廢，漢文可廢，甚而提倡新文學，鼓吹新體詩，秣糠故籍，自命時髦，吾不知其所謂新者何在？其所謂新者特西人小說戲劇之餘，丐其一滴沾沾自喜，誠陷井之蛙，不足以語汪洋之海也。<sup>54</sup>

連雅堂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視為兩個對立面，強調尊崇傳統，鄙夷西方；他認為新文學只是拾西方文化之餘唾，全然置中國文學於不顧。張連的論爭揭開了台灣第一次「新舊文學論戰」的序幕<sup>55</sup>，接著張我軍又陸續發表了〈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sup>56</sup>對舊詩人展開嚴厲的攻擊。

張我軍除了批判台灣舊文學外，也積極地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始末，更對胡適的「八不主義」<sup>57</sup>與陳獨秀的「三大主義」<sup>58</sup>等文學理論詳加解說。「白話文學的建設，台灣語言的改造」<sup>59</sup>是他為新文學運動努力的具體目標，他“欲把台

<sup>53</sup> 一郎（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64。

<sup>54</sup> 引自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16。

<sup>55</sup>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同註 25，頁 198。

<sup>56</sup> 〈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原載於 1924 年 12 月 11 日《台灣民報》二卷廿六號。〈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原載於 1925 年 1 月 1 日《台灣民報》三卷一號。〈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原載於 1925 年 1 月 11 日《台灣民報》三卷二號。以上三篇都收錄在李南衡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

<sup>57</sup> 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82-83。胡適的八不主義是 1. 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學。2. 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學。3. 不用典。4. 不用套語爛調。5. 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6. 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學。7. 不摹倣古人。8. 不避俗話俗字。

<sup>58</sup> 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87-88。陳獨秀的三大主義是 1. 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2.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3.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sup>59</sup> 張我軍著〈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語……把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與中國語合致的。”<sup>60</sup>他認為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是密不可分的，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爲了提倡以白話爲寫作的工具，張我軍寫了一本《中國國語文作法》<sup>61</sup>，幫助台人學寫白話文。

歸納起來張我軍主要的爭論重點在文言與白話之爭、舊詩格律的束縛與解放之爭及文學內涵的貧乏與創新之爭，他的理論除了一些食古不化的老學究外，大部份的青年思想家也都認同。不過葉石濤深入研究後發現：

張我軍論評的主要特徵，在於把台灣新文學視作整個大陸文學的一環，並不考慮當時的台灣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這一個政治性的事實。<sup>62</sup>

他認為雖然台灣文化沿襲自中國大陸，然而二百多年來由於台灣獨特的地理環境、人文風情，政治因素，也應該會發展出自己的主體特色來。

據廖漢臣新舊文學論戰的分法，第一期肇始於 1924 年 11 月張我軍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止於 1925 年 8 月 26 日張我軍的〈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參加論戰的人在新文學陣營中，除了張我軍外，還有張梗、前非、懶雲（賴和）、蔡孝乾、張維賢等人，他們以《台灣民報》爲堡壘，展開反擊，聲援張我軍。至於舊文學陣營的攻擊者，除了連雅堂外，還有悶葫蘆生、赤崁王生、艋舺黃衫客、鄭軍我、蕉麓、一吟友等，他們以《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黎華報》爲堡壘，紛紛發表意見或肆其謾罵。<sup>63</sup>

## (二) 第二階段新舊文學論戰

大致說來，第一期的論戰，新文學以充滿清剛之氣與蓬勃的力量佔優勢，反觀舊文學陣營內的戰將雖多，但自始至終，都是「僅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個個敗陣下來。因此，第二期的論戰，舊文學陣營的戰將，受了攻擊，多深溝固壘，不敢出來迎戰，只是乘著新文學陣營的鬥士不注意時，虛張聲勢一下而已，

---

7，頁 99。

<sup>60</sup> 張我軍著〈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102。

<sup>61</sup> 此書又名《白話文作法》是張我軍於 1926 年 2 月在台北自費出版。

<sup>62</sup> 葉石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灣文學史綱》，同註 18，頁 31。

<sup>63</sup> 參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21。

因此第二階段的論戰，雙方的論調，沒有那麼激烈，只是互相挖苦而已。依廖漢臣的分析第二期的新舊文學的論爭，指的就是 1925 年至 1940 年間，發生的一連串的小官司。不過此階段的論戰和以往的不同，以往論爭內容是在於提倡白話文和排斥文言文，這一次的攻擊，則在於排除一般舊文人的劣根性。<sup>64</sup>據筆者觀察並非如此，以張我軍爲主的第一次新舊文學論戰，所提的幾篇文章內容來，都不是單純的談談文學載體——語言問題而已，而是針對時弊深入談到文學對社會的價值、責任，及實用性，並反對談八股，或無病呻吟。嚴格來說，第一個階段的討論較爲熱烈，第二階段舊文人已缺乏還擊的力量了。

### 第三節 葉榮鐘新文學運動的主張

原本致力於民族社會運動的葉榮鐘，此時會捲入論戰的原因是：1926 年 11 月中，有兩位日本詩人國分青崖和勝島仙坡來台，當時號稱能詩的上山總督在報上刊登詩作歡迎之，結果有一些台灣舊詩人在報上作詩與總督唱和，「共襄盛舉」發表了一些作品。此舉引起葉榮鐘、陳虛谷(1896-1965)等人的不恥，首先由陳虛谷於 1926 年 11 月 21 日在《台灣民報》132 號發表〈駁北報的無腔笛〉，他抨擊那些舊詩人是「狐媚詩人」——“徹首徹尾，帶著一種野狐的氣味。一見了，便令人聯想到你們的品性是何等虛偽劣賤！”爲了巴結新任的上山總督，寫了許多敬和瑤韻的詩，極盡諂媚的能事，嚴重地污染了藝術的純淨，糟蹋了詩人的品格，其行爲令世人不齒。經他的指摘，北報的「無腔笛」啞然無聲了。但是，一般舊詩人的痼疾，不易矯正，言不由衷的歪詩，仍日日散見各報上，「擊鉢吟會」反而變本加厲，風靡全島。爲了這群，葉榮鐘於 1929 年元月 8 日在《台灣民報》上用葉天籟之名發表〈墮落的詩人〉，對一般舊詩人日趨墮落的現象展開激烈的攻擊，正式加入新舊文學論戰。

葉榮鐘雖是舊文人出身，但是本身自覺性相當高，加上天生即具抗議意識，因此在新、舊文學論戰之初，即已悟知舊文學的缺失，而能接受新文學思想，遂轉而對保守、固陋的舊文學陣營進行批評。繼〈墮落的詩人〉之後，他又陸續在各報章雜誌發表一些文論，不但內容具有多元性，且能針對時弊，寫出有建設性

---

<sup>64</sup> 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28-430。



的文章，表現當時的時代精神。其中詩、戲劇、白話文運動、對五四的探討，及第三文學的提出，都和新文學運動所討論的主題有關，以下將就這些理論分別探討之。

## 一、對詩的主張

葉榮鐘幼時受過漢學薰陶，熟諳舊文學，及長又接受新思潮的洗禮，透過他對詩的主張，我們可以了解作為一個跨越新舊文學領域者，對傳統詩的創作觀，及正確的寫作漢詩的方法，並進一步探究其異於傳統文人之處。從他所寫的〈墮落的詩人〉、〈作詩的態度〉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葉榮鐘對詩的認知及主張。

### (一)反對擊鉢吟無病呻吟的詩作

擊鉢吟是古代文人自恃才力，彼此爭奇鬥異，在詩壇上留下佳話，流傳至後代變成詩社活動的一種方式，詩社可藉其增進詩會的熱烈氣氛。櫟社曾大力提倡擊鉢吟，使擊鉢吟風靡全台，林痴仙曾就擊鉢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說：

提倡擊鉢吟乃是做為一種手段，藉以為讀書識字的楔子，目的在於保存漢文。<sup>65</sup>

連林幼春也堅信“透過擊鉢吟可以對抗日當局同化政策”<sup>66</sup>。他們期望台胞利用擊鉢吟在殖民統治下做認識漢字、能讀漢書的工具。甚至當時提倡新文學的張我軍亦認為擊鉢吟有其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一是養成文學的趣味。二是磨練表現的工夫。”<sup>67</sup>然而發展至後來竟變質成應酬、頌揚的工具，並不是因為內心有所感懷而作。當然這和日本殖民者有意地籠絡台灣舊詩人，致使詩社林立，擊鉢吟會相與唱和有關，他們由吟風弄月墮落到與日本政要唱和，歌功頌德成了他們唯一的功能與意義。葉榮鐘認為照當時台灣詩社的現狀，很難產生藝術上有價值的詩。因為這些詩社的主要事業，不是開擊鉢吟，便是課題徵詩，他們作詩所用

---

<sup>65</sup> 參鍾美芳〈詩鐘、擊鉢吟與櫟社活動〉《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下）》，《台北文獻》第79期，同註39，頁81。

<sup>66</sup> 參鍾美芳〈詩鐘、擊鉢吟與櫟社活動〉《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下）》，《台北文獻》第79期，同註39，頁81。

<sup>67</sup> 參鍾美芳〈詩鐘、擊鉢吟與櫟社活動〉《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上）》，《台北文獻》第78期，同註39，頁289。

的無非是矯揉造作，與無病呻吟這類的死文字，是沒有內容沒有感情的。葉榮鐘引他的老師林幼春說的：

山歌或可成詩，但是現在的擊鉢吟則斷不是詩。<sup>68</sup>

山歌是樵夫漁夫心有所感所唱的，擊鉢吟卻是無病呻吟缺乏真情實意，只為應酬交際而做，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難怪他會說，台灣詩社林立只不過是一種「閒人變把戲」的存在。這些詩作是用來沽名釣譽的，並沒有反映出傳統詩人對人生、社會、藝術的心境。<sup>69</sup>甚至被一些舊文人拿來做阿諛諂媚，換取現實利益的工具。他感慨的說：

他們不但阿附權力而成為權力者的幫閒，甚至惡用文學以為獲得權力的工具，這是對文學絕大的侮辱。……他們平時，鑽營名利之不暇，那有批評政治，指摘社會風氣的恆心。<sup>70</sup>

葉榮鐘清楚本土文化良莠摻雜，不可全盤接受，擊鉢吟就是腐敗的本土文化，一定要改革。除葉榮鐘外，新興知識分子張火軍、賴和、陳虛谷等人也都先後寫文章針對「擊鉢吟」做過評論。

早年跟隨鹿港才子施家本學漢文作漢詩的葉榮鐘，曾加入鹿港的傳統詩社大冶吟社<sup>71</sup>，1941年更加入櫟社，以詩自晦。因本身與舊詩社的接觸頗多，深解傳統詩社的弊端，由他來評論舊詩是最恰當不過的。他和其他新文學作家一樣，堅持真誠的文學創作態度，主張「以舊形式傳達新思想」，認為真正的好詩應在於內容而不在於技巧，對於「擊鉢吟」的作詩態度，也持相當批判的態度。1929年1月8日他以葉天籟之名在《台灣民報》上發表了一篇〈墮落的詩人〉，徹底的批判了舊詩人的人格與詩格。他挖苦地說：

這些『墮落的詩人』，似乎個個都是李太白的高徒，有了酒喝，馬上就有詩可吐，要是席間再有了『紅裙侑酒』，他們的詩興恐怕要高潮到了不得

<sup>68</sup> 參葉榮鐘〈〔卷頭言〕作詩的態度〉《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晨星出版，2002年初版），頁284。

<sup>69</sup> 參葉榮鐘〈前輩的使命〉《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68，頁270。

<sup>70</sup> 葉榮鐘著〈近感五則〉《半壁書齋隨筆》（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年初版），頁105。

<sup>71</sup> 施懿琳·楊翠〈日治中、晚期彰化地區傳統文學之發展〉《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頁255。

了。<sup>72</sup>

文中對抨擊舊詩人人格的腐化，極盡冷嘲熱諷的能事，因為這批「墮落的詩人」<sup>73</sup>作詩的興致是來自「酒」及「紅粉佳人」，他們隨著社會的改變，早已不屑以吟唔為能事了。他諷刺的說這些「墮落的詩人」已經跳出他們的「象牙塔」到街頭去和民眾握手，變得很「社會化」、「世俗化」，這些逢迎拍馬之事早已成為他們最關心的事情。他們可以詩社的名目派代表去弔喪、賀喜，還可以連袂去為他們平素視為「村夫俗子」的田舍翁開「擊鉢吟」祝新居落成。<sup>74</sup>

這是一篇火藥味濃厚的文章，全文用「倒反」的修辭技巧，將舊詩人的墮落事跡，一一指出，且批評得體無完膚。他感慨台灣的詩壇三十年來，老的老、死的死，僅存的也都守著沈默，不作聲，以致台灣詩壇沉寂了一陣子，好在有這群極富「職業意識」及「組織性」的墮落詩人毅然崛起，才使台灣詩界又忙碌起來。對此葉榮鐘以嘲諷諷刺的語氣寫道：

請設想這班墮落詩人，一旦嗚呼哀哉，……第一、迫在目前的總督閣下的《年頭感賦》叫什麼人去《敬和瑤韻》呢？……第二、對著以『九間仔』為中心而散佈於全島的所謂「鶯鶯燕燕」叫誰去贈詩呢？<sup>75</sup>

他譏評墮落的舊文人，只會向總督閣下「敬和瑤韻」，或向全島「鶯鶯燕燕」們贈詩，儘做一些沒有生命，沒有個性的詩，只為巴結權貴、出出風頭而已。他也非議墮落詩人泥守格律、濫用典故、為文造情，不知變通，缺乏創意。他們作詩並不是因內心有所感懷之故，而是為應景應酬，只是一味抄襲前人詩句，只要提到「感懷」詩就說「守株待兔誤平生」、「肯將壯志付東流」；「有贈」詩就說「好事偏逢折磨多」、「恨不相逢未嫁時」，一成不變如套公式一樣。這只是文字的堆疊，絕不是真情流露的上乘之作，是引不起讀者的共鳴的。他認為不管是頌德詩或祝賀辭，最重要的條件是要出於「自由心靈」，絕不受不純的野心所支配，而是要忠於自己的藝術心靈。好的詩作不能作大言壯語無病呻吟，應以白描手法，真實地反映時代、刻畫疾苦，讓內心的情意自然流露，如此才是好的詩歌，換言

<sup>72</sup> 葉榮鐘〈墮落的詩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83。

<sup>73</sup> 葉榮鐘〈墮落的詩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83。文中稱「墮落的詩人」據葉榮鐘說：台灣還有幾位值得尊敬的人，為避免玉石同焚起見，特地贈以這個名稱。

<sup>74</sup> 葉榮鐘〈墮落的詩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83。

<sup>75</sup> 葉榮鐘〈墮落的詩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84。

之，能建立在生命與個性之上的文學作品才是上乘之作。他嚴厲批判那些只為著巴結權勢、博得妓女歡心，充滿酒色權勢的詩作，是沒有靈魂的空腔虛調，既無生命，亦無個性，可謂詩人的「詩之手淫」<sup>76</sup>，好的文學家應真誠地傾聽自己的靈魂之聲。在其〈作詩〉一詩中說得非常清楚：

詩如鴛侶對談心。不吐真情感不深。一戒至今嚴自守。未曾無病作呻吟。

77

因此終其一生作詩，皆秉持這個原則。葉榮鐘文學的根柢新舊兼長，由他來批舊詩人，引經據典語語中的，讓對手無法還手。況且文章中他也極盡嬉笑怒罵，頗能盡其罵人的藝術，且罵得頭頭是道，使一般舊詩人，氣也不得，恨也不得，只好咬著牙根，一聲不發。

## (二)作詩須忠於心靈的感觸

〈墮落的詩人〉中前半部偏向以嬉笑怒罵的方式譏評舊文人的墮落；後半段則轉而積極陳述自己的創作觀：

做詩本是一件頂好的事，但是須有真的靈感，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sup>78</sup>

他認為文學創作是在心靈世界的映顯，是作家心之所不容已的自然吐露。當創作的欲望鼓動時，就如同滔滔江水，排山倒海，無法扼抑。因為是血和淚的結晶，所以能夠深深地打動讀者的心靈，引起他們的共鳴。詩人想作什麼題材的詩都可以，重要的是作者作詩時的心境，絕對要有真感情，不受外物的支配與干擾，他引用廚川白村的文藝批評觀說：

文藝是純然的生命表現，是可以離開外界的抑壓強制，立於絕對自由的心境去表現個性的唯一之世界。忘卻名利，除去奴隸根性，由一切的羈絆束縛解放，然後纔夠成立文藝的創作。<sup>79</sup>

<sup>76</sup> 葉榮鐘〈墮落的詩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86。

<sup>77</sup> 葉榮鐘〈作詩〉《少奇吟草》（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年12月初版），頁 172。

<sup>78</sup> 葉榮鐘〈墮落的詩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85。

<sup>79</sup> 葉榮鐘〈墮落的詩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85。

強調詩人能拋棄所有的牽絆，本著絕對自由的心境、忠於自己純真的情感，如此就能寫出有變化、有感情的好詩來。如果你是自然詩人，就該先去“詠嘆阿里山、日月潭的莊嚴美麗”；如果你是敘事詩人，就要去描寫“「領台」前後的慘狀”；如果你是敘情詩人，就該把“採茶的姑娘、彈琴的妓女的生活寫成纏綿悱惻的作品，教讀者陪她們洒一掬同情之熱淚。”<sup>80</sup>否則就如他引袁隨園說的：

若今日所詠，明日亦可詠之，此人可贈，他人亦可贈之，便是空腔虛套，陳腐不堪矣。<sup>81</sup>

內容空洞、無病呻吟、僵化陳腐，斷不是好詩。他堅持用真誠的態度，將「詩情」與「心情」密切的結合，如此寫出來的詩才能感人肺腑。

對於舊詩人的陳腔濫調與墮落，他一向都毫不客氣的給予批評，1932年5月25日他又在《南音》第一卷第七號，以「奇」的筆名發表了〈作詩的態度〉，再度批判了詩人們的擊鉢吟，認為擊鉢吟不足以維持漢學，島內的詩人把詩當作漢學的全部，有「盲人評象」<sup>82</sup>之嫌，「擊鉢吟」決不是「詩」的全部。他明白的舉出擊鉢吟的缺點是：

因為擊鉢吟便是這樣「言之無物」的詩的極致。擊鉢吟是不能要求有「內容的詩」……所以做那指題限韻的擊鉢吟，根本的就不是詩了，……但是時代是不斷地進展著，沒有生命的是要被遺棄的。<sup>83</sup>

他強調詩人應該做有「生命」、有「個性」的詩，此詩不但要大眾化，且是「為生活而藝術」的，其內容是以現實生活中眾人的生命、生活為對象，會之以「心」，將內在的情感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

做詩本是一件頂好的事，但是須有真的靈感(Inspiration)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纔行。……，忠實於你的心靈的感觸，由這樣的境地寫出來的纔夠成詩。<sup>84</sup>

好詩就是將內在的悲喜、驚奇、禮讚等感情毫無掩飾的，用有音節的文字表現出

---

<sup>80</sup> 參葉榮鐘〈掃雲精舍隨筆〉《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57。

<sup>81</sup> 葉榮鐘〈墮落的詩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85。

<sup>82</sup> 葉榮鐘以「擊雲」筆名發表〈文藝時評——維持漢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66。

<sup>83</sup> 葉榮鐘〈作詩的態度〉《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283-284 頁。

<sup>84</sup> 葉榮鐘〈墮落的詩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85。

來，所以葉榮鐘重視詩的內容更甚於外表的形式聲韻，這點在〈作詩的態度〉一文中說的非常清楚：

我們可以知道「詩」是生出來的，是要有「情動於中」的內容的。……把「詩」的內容用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所以人應該先有「內容的詩」然後纔有「形式的詩」。<sup>85</sup>

因此他排斥使用深僻典故的貴族詩，並致力於平易率真的平民詩。他又進一步的認為除了寫出有內容的詩外，做爲一個詩人最重要的條件在於批評的精神，他說：

詩人如果對人生、對社會、對政治沒有熱烈的批評精神，莫論格調多高，文字多優美，也沒有文化的意義可言。<sup>86</sup>

葉榮鐘認為真正的詩人，當具有最纖細的神經與最敏銳的感情，能以細膩柔軟的心靈，去觀察大眾生活的面相，去撫觸整個時代的脈息，去傾聽生民百姓的心聲，去記錄他們的生活內容，寫出他們深植於內心隱微難爲人知的傷痛，那是出自內心深處的真誠及源於創作的自由心靈，”祇覺詩成如吐梗。胸中壘塊一時消。”<sup>87</sup>；如果只是用來歌功頌德、阿諛諂媚，作爲求聲名、干厚祿的工具，或是只用來吟風弄月、歌舞酬唱，則將爲有良知的詩人所不齒。

## 二、對「戲劇」的看法

新文化運動是民族解放一支軍，而新劇運動又是這巨大的潮流中的一支流。<sup>88</sup>新劇重要乃因戲劇能達到文藝大眾化的效果，張深切曾說：

演劇是藝術的最高峰，容易使大眾了解，尤其是容易使不識字階級看得來，可以說是實現藝術大眾化的最有力的藝術。<sup>89</sup>

文化運動是一切運動的基礎，在全體民眾沒有完全覺醒以前，任你社會運動家、

---

<sup>85</sup> 葉榮鐘〈作詩的態〉《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83。

<sup>86</sup> 葉榮鐘〈釋台中文化城〉《半壁書齋隨筆》，同註 70，頁 313。

<sup>87</sup> 葉榮鐘〈與幼岳論詩〉《少奇吟草》，同註 77，頁 225。

<sup>88</sup> 張維賢〈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252-253。

<sup>89</sup> 〈第一回台灣全島文藝大會記錄〉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159。

政治運動家如何鼓吹，都是無濟於事的，唯有叫起全體民眾徹底的覺醒才是良方，所以非借文化運動之力不可，其中又以戲劇的效果最好。葉榮鐘深知透過演劇，從舞台上喚醒民眾和文盲是可行的，所以對於當時社會上一些有關戲劇的作品非常關心，對於不妥的除了給予批評外，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新劇運動的興起，除了欲改革舊戲之外，應是受到中國如火如荼的文明戲運動及日本明治開化時期政治劇之新演劇的影響。最早是由日本人引進的，大約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sup>90</sup>不過，真正的萌芽發展要等到台灣留學生與中國接觸頻繁後。台灣人戰前的新劇運動，大抵是依附在近代台灣的民族、社會運動中而興起的，屬於文化運動的一部份，對此蔡培火在〈我在文化運動所定的目標〉有詳細的說明：

文化運動第二層的工作，就是直接對待群眾，喚醒他們自覺，供給他們種種的材料，使他們的人格發展強壯起來，是等要緊的，這是文化運動中心的目標。要做這層工作的手段，卻有種種，譬如演說、演劇、音樂……可以直接刺戟群眾的人格發憤活動起來……<sup>91</sup>

最初是由一群無政府主義的青年，以戲劇為媒介，投入社會文化運動，開了新劇運動的先河。其後，則配合台灣文化協會的民族運動，扮演文化宣傳與戲劇改良者的腳色。它的工作是直接喚醒人們的自覺，讓群眾的人格發憤活動起來，張深切曾說“唯有演劇纔能達到文藝大眾化，如果閉卻了演劇，則台灣的文化是難能進展”<sup>92</sup>，這一席話貼切的說出了當時台灣留學生為什麼會熱衷戲劇的原因。像陳若虛就曾受廈門通俗教育社的影響，於1923年放假歸台時，與彰化留日學生組織「鼎新社」公演獨幕笑劇〈社會階級〉及社會劇〈良心的戀愛〉<sup>93</sup>。據呂訴上在〈台灣新劇發展史〉中說，這是台灣最早含有政治運動性的文明戲劇團，其成立的宗旨是：

提倡新藝術，促進新劇的實現……另一目標是本省人為著要抵抗日本帝國

---

<sup>90</sup> 張維賢〈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265。

<sup>91</sup> 蔡培火〈我在文化運動所定的目標〉《台灣民報》第 138 號（昭和二年一月二日），頁 10。

<sup>92</sup> 〈第一回台灣全島文藝大會記錄〉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158。

<sup>93</sup> 參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下），同註 71，頁 573。

主義而藉此社教活動作掩護。<sup>94</sup>

新劇如此身負重任，在當時民眾娛樂極為饑饉的台灣，它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當時的演藝界，正處於新舊劇過渡，青黃不接的時期，舊劇的內容和當時的生活意識差得太遠，已不能滿足觀眾，只能藉著一些較低級的，屬於感官的刺激把戲來勉強維持觀眾的興趣，更遑論教化了。然而“那樣奇怪的「把戲」是一時的變態，沒有什麼深牢的根據，時候一到自然而然地就會煙消雲散的。”<sup>95</sup>而新劇運動又是空雷無雨，還未形成一種有力的運動。當時雖然有人看出缺失知道非改革不可，但大多是曇花一現，還沒付諸行動就消聲匿跡了，對此葉榮鐘憂心忡忡的說：

台灣的演劇是這樣的糟糕，所以關於演劇改良的問題正是千頭萬緒極為複雜。直截講下去幾乎全部都要改良的，劇本、表演音樂、舞台等等無一非大大地改革不可。<sup>96</sup>

他明白的指出舊劇的缺失在於內容的空虛，而新劇的毛病在於形式無味，要讓演劇發揮其娛樂、教化的功能，一定要改良。理想的戲劇演來要讓觀眾得到慰藉和共鳴，進而提昇觀眾的生活意識。葉榮鐘認為要改良演劇“第一要先從俳優的「藝」入手”<sup>97</sup>，只要演員的表演能融入劇情，表情肢體動作豐富，演技自然、生動，就能吸引觀眾的目光，有觀眾演劇才能成立。

1929年4月19日葉榮鐘讀了張淑子的獨幕短劇〈草索記〉及江肖梅的獨幕劇〈病魔〉後，有感而發寫了一篇文章〈為「劇」申冤——讀江肖梅氏的獨幕劇〉發表於《台灣民報》上，他說：

顧「劇」是藝術中最綜合的、最具體的一種——因為是如此，所以最艱難。

「劇」在敘述一段事件須含有和小說同樣的文學的效力，在排演的時候俳優的舉止動作須含有雕刻的美的效力，俳優與舞台、背景和光線尤須含有繪畫的美的效力，俳優說白的抑揚頓挫要含有音樂的美的效力，俳優的動作又須含有和雕刻、繪畫不同的舞蹈的美的效力。「劇」是這樣複雜的條

<sup>94</sup> 呂訴上〈台灣新劇發展史〉引自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下)，同註 71，頁 573。

<sup>95</sup> 葉榮鐘〈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46。

<sup>96</sup> 葉榮鐘〈「藝」的練達是先決問題〉《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309。

<sup>97</sup> 葉榮鐘〈「藝」的練達是先決問題〉《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310。



件所構成的藝術，勿論其中須待演出者和俳優之力者固多，總是劇作家若非將這種種的要件置在考察之內，是不能描寫出真的「劇」的世界，何況獨幕劇又是劇中最難工妙的一種。<sup>98</sup>

文中他提出自己對戲劇的看法，他認為一齣好的戲，劇情的編排要像小說一樣具有文學的魅力；演員在舞台上表演時，舉手投足間不但要有雕刻的美，甚至要與背景燈光融為一體，如此才能表現出繪畫的美；說白的聲調要如音樂般有旋律的美、肢體動作也要優雅表現出舞蹈的律動美，如此這齣「劇」才算完善，並達到真、善、美的境界，才能吸引觀眾的目光。因此葉榮鐘認為「劇」是藝術中最具綜合性的、最繁複具體的，也是最艱難的一種。本此原則，對於江肖梅的〈病魔〉一劇，他批評道：

為著「劇」的前途計，不得已要在這裡恭恭敬敬地對他那篇獨幕劇〈病魔〉抗議一句，聲明牠絕對不是「劇」來替「劇」申箇冤枉。<sup>99</sup>

葉榮鐘除了指責江肖梅用“糊塗的文字”<sup>100</sup>寫出的〈病魔〉在文字上沒有文學的美，在舞台上展現的美感也沒有預期的效果，和新劇背道而馳外，並大聲疾呼對文學有興趣的朋友共襄盛舉，多寫些有價值的、能吸引觀眾的劇本，來為台灣的演劇界添些光彩。沒想到「功效未見，禍患先萌」<sup>101</sup>，原來此文刊出後隨即引起張淑子不滿，並作〈讀報質疑——致問葉君〉刊登在5月9日《台灣新聞》上，他反駁葉榮鐘的批評，並謂其心思錯亂、精神不定，開始與葉榮鐘展開了一連串有關戲劇的筆戰，從論戰的文字中可明顯的看出葉榮鐘下筆犀利精湛，對戲劇有獨到的研究與觀點，並非皮毛而已。在〈敬覆淑子〉文中，他強調文學有其單獨存在的價值感，他反對「文以載道」，他說：

倫理是倫理、文學是文學，合倫理性的論文未必然就有文學的價值。<sup>102</sup>

他認為張淑子的錯誤就是太拘泥文學是否能做為宣傳道德的工具，捨本逐末，忽

---

<sup>98</sup> 葉榮鐘〈為「劇」申冤——讀江肖梅氏的獨幕劇〉《台灣民報》（第二百五十九號）昭和四年五月五日，頁九。

<sup>99</sup> 葉榮鐘〈為「劇」申冤——讀江肖梅氏的獨幕劇〉《台灣民報》（第二百五十九號）昭和四年五月五日，頁九。

<sup>100</sup> 葉榮鐘〈為「劇」申冤——讀江肖梅氏的獨幕劇〉《台灣民報》（第二百五十九號）昭和四年五月五日，頁九。

<sup>101</sup> 葉榮鐘〈敬覆淑子〉《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5。

<sup>102</sup> 葉榮鐘〈敬覆淑子〉《台灣民報》（第二百六十三號）（昭和四年六月二日），頁七。

略了戲劇的真諦；接著他又批評張淑子不但不懂新文學，連教養常識都缺乏。葉榮鐘的用心，引起南屏、陳虛谷等人的肯定，並針對此次的筆仗，為文聲援他，像南屏在《台灣民報》發表一篇〈勸告榮鐘君〉肯定葉榮鐘的用心，他說：“你為了台灣島，掃盡一班假斯文的心志是很可嘉的。”<sup>103</sup>當然也有負面的聲音出現，之前在〈墮落的詩人〉一文中被罵的咬牙切齒的那群舊文人，更借機鼓噪洩恨，肆意中傷。同年7月4日有自署施華鼓寫了〈致葉榮鐘書〉刊登於《台灣新聞》，文中他諷刺葉榮鐘說：

回憶十年前，同學詩於施家本先生之門，足下因少年負氣，深以不得掄元為恥，棄而不為，此亦楚項羽之學書不成，去而學劍之意，竊為足下前途慶。及入霧峰，見某富翁組織吟詩會，又覺技癢，自請加入，奈詩有別材，非關學也，不意每月課卷，又擯尊作於孫山之外，足下痛恨詩人，倘從此始乎？<sup>104</sup>

其實施華鼓並沒有掌握葉榮鐘等新文學家反對舊文學的真正用意，只是滿口胡謔，說葉榮鐘是因學詩不成而遷怒於舊詩人，才會寫出〈墮落的詩人〉及〈為劇申冤〉來發洩心中的怨恨，此乃子虛烏有之事，難怪葉榮鐘置之不理。

後來葉榮鐘又於同年7月21日、7月28日、8月4日、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分六次連續在《台灣民報》發表了〈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一文，回應江肖梅具體指教的要求，並在這篇文章中完整地表達出他對戲曲的看法。他認為好的戲曲成立的基本條件：第一就是要能登上舞台表演的，他引日人菊池寬的話說：

不能在舞台上演的戲，是和不能抽煙的煙管、不能汲水的水杓一樣，極端來講，那樣戲曲完全沒有存在的價值。<sup>105</sup>

一齣好戲不但能上台，更要有吸引力，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為了達到演出的效果，演員的說詞、動作、背景和光線的色調都要經過周詳的設計，各環節的搭配

---

<sup>103</sup> 南屏〈勸告榮鐘君〉《台灣民報》（第二百六十七號）（昭和四年六月三十日），頁四。

<sup>104</sup> 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7，頁435。

<sup>105</sup> 葉榮鐘〈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台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一號）（昭和四年七月廿八日），頁二。

必須天衣無縫。就像日人岸田國士說的：

戲曲是要傳布人的靈魂的最韻律的聲響，劇的美是由說白、動作之最韻律的排列中生出來的。<sup>106</sup>

藝術強調以「美」為生命，事事都不能離開「美」，戲劇是藝術的一種，所以舞台上的一切，都要講求美感。

葉榮鐘又認為只要是文藝作品，都要有一個「主題」(Theme)，如此才能很清楚地表達作者所要傳達的訊息，尤其是戲劇“因為要在一定時間中使觀眾領會具體的概念的，所以主題尤要明截深刻。”除此還要“有一套出人意表又是最合人情的議論，來教觀眾設身處地發起深省”。總的來說一齣成功的戲是明截深刻的主題加上動人的情節，並散發出小說般的文學氣息，能如此才能夠引人入勝，維持觀眾的興趣。

除了以上的條件，葉榮鐘認為好的演員還要具有「人間性」，要能揣摩劇中人的性格、及心理，如此演來才能逼真生動，他說：

越是好的作品，性格的描寫、心理的跳躍越是明截、越是生動。<sup>107</sup>

強調現代劇劇中人的性格描寫要靠人物的對話來表現，所以台詞的編寫拿捏非常重要，句句都要帶著性格的閃光、心理的陰影才行，如此才能準確的表達出劇中人物的性格與心理的反應。誠如日人能島武文所說的：

戲曲是要描寫「人間」的，「人間描寫」不外是性格與心理的描寫哩。<sup>108</sup>

可見性格和心理的描寫，是決定一齣戲成敗的關鍵。大家如此用心的編排一齣戲，都是為了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因為戲曲是不能離開觀眾而超然獨立的。成功的戲，會依一定的脈絡進行，不但會讓觀眾充分理解劇情，看完還會對它產生心有戚戚焉、餘韻猶存的感覺。至於一齣戲的結局，當然是越自然越好，且要對觀眾有一個完整的交待，如此才算是好的戲曲。

---

<sup>106</sup> 葉榮鐘〈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台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一號)(昭和四年七月廿八日)，頁二。

<sup>107</sup> 葉榮鐘〈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四〉〉《台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三號)(昭和四年八月十一日)，頁九。

<sup>108</sup> 葉榮鐘〈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四〉〉《台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三號)(昭和四年八月十一日)，頁九。

除了江肖梅的辯駁之外，南京大學的台灣留學生紫鵑女士，也在《台灣民報》上刊登了一篇〈「戲曲成立的諸條件」的商榷——致葉榮鐘氏的一封信——〉和葉榮鐘討論有關戲曲的價值與觀眾的理解等問題，她質疑的問葉榮鐘：

藝術運動已超過了民眾運動長足而進，藝術運動無論如何半刻都不容其停頓的，所以雖是民眾的感受力如何的薄弱，鑑賞力如何的浮淺，藝術的本身，換句話說就是戲曲的本身似乎不應該降低了牠的價值去俯就民眾的。

109

對藝術關心且有濃厚興趣的紫娟女士，認為「藝術至上」，不能爲了迎合觀眾，而降低劇本水準，對此葉榮鐘不以爲然，他說：

戲曲是不能離開觀眾而獨立的，所以我想今後戲曲的最理想的形態應該是要包含娛樂的分子和藝術的價值（教化的分子在內）的，一面使觀眾會達到娛樂的目的，另一面又能提高他們的趣味、洗煉他們的情操。……無產階級派的演劇運動很可以做我們的榜樣，……他們指示我們的有兩個問題，第一是應當怎樣去攝取舊劇的精髓來補救新劇的枯澀無味的形式，……第二是要如何降低劇本的程度去和大眾妥協，……演劇是民眾吸飲詩人想像中的活動力和熱情的無料食卓！演劇是涵養民眾的趣味和品性的社會的學校！所以我們不必去以那些坐在「象牙之塔」裡打盹的所謂高級戲曲為希罕了。<sup>110</sup>

他認為能兼顧人民的趣味和品性的戲劇才是好劇。高級的藝術、深奧的思想對一般百姓來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與其高高在上，不如俯就民眾，才能發揮演劇的效果。

戲劇是人生的縮寫，也是文化的表達，明白其重要性的葉榮鐘認為理想的新劇是能使觀眾得到慰藉和共鳴，也能提高觀眾的生活意識。除了表面上有其娛樂效果外，更能達到潛移默化的教育目的。他提倡新劇之餘並沒有捨棄舊劇，他認為新舊劇各有優缺點，應互相調節取捨，舊劇的歷史較悠久，經過多次的演變，自有其含蓄的精粹，足以彌補新劇的缺陷，新劇運動的指導者，若能拋棄嫉惡的

---

<sup>109</sup> 紫鵑女士〈「戲曲成立的諸條件」的商榷——致葉榮鐘氏的一封信——〉第二百七十八號（昭和四年九月十五日），頁八。

<sup>110</sup> 葉榮鐘〈戲曲與觀眾（下）〉《台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三號（昭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頁九。

感情，虛心平和地用新的眼光來攝取舊劇的長處，則新劇運動的前途自會現出一道光明來，如此才能創造一種內容豐富，形式優美的真的新劇。

### 三、白話文運動的主張

台灣話在歷史的演變中，變成有話無字的方言，甚至口耳相傳的結果，一些不常用的詞彙會因沒有文字保存而慢慢消失，為了解決台灣有話無字的問題，有心人士，提出很多建議，葉榮鐘針對台灣白話文運動提出了「羅馬字運動」。1929年在日本留學的葉榮鐘看到早期提倡「羅馬字運動」的蔡培火從日本回台，為了提昇台灣人的知識水準，蔡培火再度下定決心，繼續其運動，除了賣力的在宣傳，還計劃編作「羅馬字課本」，甚至寫了三首的宣傳歌，然而一般人的反應卻是冷淡不堪，並沒有任何迴響，為此葉榮鐘有感而發的在5月12、19、26日，連續三天在《台灣民報》發表〈關於羅馬字運動〉<sup>111</sup>，葉榮鐘首先針對台灣當時的言論界做了以下的批判，他說：

第一是少有發議論的人，就是有議論可發的人也似乎不肯輕易發表，……  
第二是偶有發議論的人大多是有近視眼的傾向，不是「捨己之田以耘人之田」的「無聊家」，就是「觀瀾失海，數木忘林」的「事小主義者」。<sup>112</sup>

他痛批這些保守緘默的人，呼籲他們為了全島知識水準的提昇，莫再緘口不言。葉榮鐘深知台灣社會知識水準低落，緣於教育不普及，百姓不識字，文盲很多，尤其是台灣話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百姓只靠口述，不能書寫；加上中國傳統的漢字是象形文字，雖美但不好學，且其發音和台灣話也不同，須先了解其意，再翻成中國白話文來寫，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和外國文字沒兩樣，因此急待一種簡單又快速的文字來解決此一問題。葉榮鐘清楚文字運動對一個國家追求現代文明過程的重要性，他相信唯有好的文字，才便於汲取新知，發展人格，而羅馬字台灣話是最好的選擇，所以在文中首先就文字的進化過程說：

大凡從來使用著「象形文字」的現代文明的後進國，要追上先進國的文明者，在他們的文化運動上一定要經過「文字改革運動」這個階段，運動的

<sup>111</sup> 這三篇分別刊登在《台灣民報》，第一篇是昭和4年5月12日第260號，第二篇是同年5月19日第261號，第三篇是同年5月26日第262號。

<sup>112</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68，頁189。

目標又大多是欲採用「表音文字」的「羅馬字」來代替從來的文字的，這是因為象形文字很難學習，很難驅使牠來做表現的工具，所以欲圖教育於短期間普及者，自然對牠會生出改革的要求。

而後徵引中國、日本、土耳其及阿剌伯諸國的「羅馬字運動」來談。接著又言及台灣的教育情形說：

現在的台灣不但無產大眾全部是文盲無智，就是所謂小市民階級的大多數也是目不識丁的，學校教育的普及遲遲不振，社會教育更不足道，……「大眾教育」的問題，老早就成了我們島內文化運動的目標，和各種解放運動的先行條件了，可惜從來少有人們論及具體的解決方法，這也許是初期的運動摸不著頭腦，逼於目前的利害，無暇顧及這樣遠大的計劃的緣故。現在我們的解放運動已經入了一定的軌道，這個問題自然也就成為燃眉的急務逼著我們去解決了。<sup>113</sup>

他知道不但要喚醒民眾，還要給予知識，但要用什麼方法才能讓民眾能很快的吸收學會，且能得心應手的使用呢？過去白話文沒有受到一般人的支持，是因為對此問題最有貢獻力量的知識份子，由於自己已有表達能力，所以體會不到那些不能用文字表達的人，他的困難點在那？雖然很努力的在推廣中國白話文，但效果不彰，因他們無法了解學中國白話字對不識字的百姓來說是何等的困難。因此如何找出一套讓不識字的民眾，能在最短時間內學會，並能很快的運用的方法，可是當務之急，對此葉榮鐘建議採用蔡培火提倡的羅馬字，他說：

蔡培火氏所提倡的羅馬字運動，當然不失為我們討論研究的對象了。<sup>114</sup>

葉榮鐘雖然提倡羅馬字，但那只是一時權宜之計，他知道羅馬字不能取代本國原有的文字或語言，學習羅馬字的目的是將羅馬字當做一種輔助工具，想藉著識字來改善島民的生活，進而學習一般普通的語言文字，幫助台灣人達到文明彼岸的一個過渡性的必要工具，所以他說：

蔡培火氏提倡的羅馬字運動不是主張廢漢字而代以羅馬字的，似乎是要利

---

<sup>113</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0。

<sup>114</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1。

用羅馬字來做識字的手段的。<sup>115</sup>

利用羅馬字來識字，協助民眾脫離文盲來說，不失為治標的好方法。林莊生也曾就其讀過用羅馬字寫出的信件說出其感覺：

讀羅馬式的白話文寫出來的文章有如錄音帶轉播出來的話，既生動又翔實，其中的語感、語意，很多是國語的白話文傳達不出來的。<sup>116</sup>

葉榮鐘很坦白的對「羅馬字運動」抒述自己的意見，他說：

我對於羅馬字運動完全是一個門外漢，……對這個問題我雖然不能一一指摘其可否的所在，卻也不是全無意見的。就中使我平時最懸念的一點就是台灣話的標準語的問題。<sup>117</sup>

除了表明自己對羅馬字的不熟悉外，他又就台灣話的標準語的問題，提出兩個觀點：第一是語數的補充，第二是言語的統一。三十年來台灣隨著時代的演進，所得到的新的經驗很多，衍生出許多新的名詞、新的意思，卻沒有適當的言語來表達，因應此問題，他提出了語數的補充。他說：

現在的台灣話已經不足以寫成文章來表現我們所要表現的意思了，因為三十年來我們隨著外界的變遷，所得到的新的經驗很多，再由這很多的新經驗結合而造成的意思也一發多了，然而我們所用的工具（言語）還是三十年來殆沒有進化的台灣話，所以一旦要把牠寫成文章的時候便會感著種種的為難處。”<sup>118</sup>

爲了讓台灣話跟上時代潮流，更生動，一定要大大的補充語數，如此寫文章才不會有問題。其次是言語統一的問題，他有感於台灣雖是彈丸似的小島，因屬於移民社會，百姓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省份，加上地方上的方言又多，差異性頗大，導致同一件事或同一種東西，發音不同，用詞也不同。蔡培火的《白話字課本》中就舉了一個例子：手的「拇指」，就有「大頭姆」、「大部姆」、「指頭姆」、「大匏翁」等等不同的稱法，如果不將這些發音統一，就不能成爲普遍的言語，當然

<sup>115</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0。

<sup>116</sup> 參林莊生著〈蔡培火先生〉《懷樹又懷人》，同註 31，頁 281。

<sup>117</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1。

<sup>118</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1。

就無法寫成通行的文章。鑑於此，他語重心長的說：

這個問題若不能解決，羅馬字運動是不能順調發展的。不但羅馬字運動上有解決牠的必要，進一步來講，為著台灣話自身的「完全」和「正確」也是萬不可看過的。<sup>119</sup>

因此，他強調在推動「羅馬字運動」以前，語數的補充和言語的統一，是刻不容緩的，他接著提出了如何整理台灣話的方法。

葉榮鐘把整理台灣話的方法分成兩種，一種是固有的言語，一種是從來所無的言語。他建議若是固有的言語則採用“最通行的為標準”<sup>120</sup>，即採用中國最通俗、最口語化的北京話；至於從來所無的言語，即過去沒有的詞彙，則：“一概採用在中國通行的言語或是翻譯的成語。”<sup>121</sup>因為當時的台灣完全是一片文化沙漠的曠地，處在饑荒的狀態，要滋培它，不是一本教科書就能解決，一定要藉由文學的作品來滋潤方能收效，因此他建議移入中國的作品，採用中國通行的成語。然而它不是照單全收，是有條件、有限制的，葉榮鐘說：

我們採用中國的成語須抱定一個確然的態度，就是要步步踏在台灣的實地，立在台灣人的立腳點，意識我們是台灣人，纔不致有「矯角殺牛」的矛盾。若有同義異稱的，自然要從我們用慣的去稱牠，……因為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台灣人有台灣人的風俗習慣，雖說是同文同種原是一家也終是各人有各人的特徵。<sup>122</sup>

雖然他主張借助中國文學滋潤台灣，但前提是要站在台灣的本位上，意識我們是台灣人，仍舊要保有台灣人的特色，萬萬不可忽視台灣的主體性。遇到同義異稱的言語，一定要以我們原來習慣的為主，例如我們已經有「自動車」的名詞，就不必學中國人說「汽車」。

葉榮鐘也意識到言語的進步不是靠幾位言語學的專家即可，真正有力有效的利器還是要靠文學作品，台灣要造成一種標準語，除了移入中國文學之外，也要創造屬於台灣人自己的新文學，藉由文學的創新，才可解決台灣標準語的問題，

---

<sup>119</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2。

<sup>120</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2。

<sup>121</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2。

<sup>122</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2。



才能達成大眾教育的目的。爲了一併完成這些目標，他說：

我希望島內或島外有筆力的同胞趕緊站起來，立在我們自己的立腳點，多多採用台灣話來做詩、做文、寫小說、編劇本，一來可使台灣話漸成爲完全正確的言語，來解決這個全島的重大問題，二來也可在這沙漠似的台灣，種些樹木、栽些花草、湛著清泉、吹著涼風來潤潤大家乾燥無味的生活，驅逐那些偽詩、偽文、偽小說、偽戲曲出境，也不失爲一件極有意義、極痛快的事。<sup>123</sup>

爲了達成此一目標，1930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合之士，努力催促《南音》的誕生，因爲《南音》不但提供作家創作的機會，也提供民眾觀賞的園地，葉榮鐘他不只是理論者，也是實踐者。

再者對於寫作時的文字用語，葉榮鐘認爲作者在寫作時要注意「修辭的美」，他用擎雲的筆名在《南音》發表的〈文藝時評——屈話就文〉文中說的很明白：

社會的進步當然是由粗野而優美，由亂雜而統一的，就是言語也是這樣。……不管是有學識與無學識，講話總須向著「修辭的美」這一路進來纔算是有進步的。所以對於台灣話文的建設問題，在這樣的見地也有略加考察的必要，就是對於「屈話就文」和「創設新字」的關係似乎也有多少參酌的餘地的。我以為若非萬不得已者則屈話就文亦是未可厚非的，因為與其說「屎學」，不如說「便所」之爲也。<sup>124</sup>

他認爲好的文學作品要注重「修辭的美」，即寫出來的作品要給人統一、優雅和簡潔的感覺，所以當面對不雅台灣語時，葉榮鐘提出了「屈話就文」的理論，“寧可稱「廁所」為「便所」，也不願稱之為「屎學」”。<sup>125</sup>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葉榮鐘的「屈話就文」在當時是異類是創舉，因爲主張「屈文就話」的莊垂勝、郭秋生等人認爲文學既以現實生活中的大眾爲主體，就應該將他們日常生活中最真實、最純樸的一面表現出來，若「屎學」是一般大眾的用語，即使粗俗不文雅，但它是最能代表台灣人的文化，才有台灣人的味道，如果文縷縷的說「便所」那就無法忠實的描繪出台灣人的本色來。在此筆者是非常認同葉榮鐘的論調，因爲

<sup>123</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3。

<sup>124</sup> 擎雲（葉榮鐘筆名）〈文藝時評：屈話就文〉《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65。

<sup>125</sup> 擎雲（葉榮鐘筆名）〈文藝時評：屈話就文〉《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65。

如果單單就提倡鄉土文學來說，忠於本色有其必要，然就提升文化的水準來說，還是要慢慢的由粗野走向優美，如此才叫進步。

葉榮鐘對白話文如此大力提倡，除了不客氣的批判台灣言論界的漠不關心，也提出了具體的主張，無非是希望台灣人能站在台灣的本位，用標準語建立屬於台灣自己的文學，並以大眾教育方式，普及每個國民、每個角落，進而抵抗日本文化入侵台灣，為保存及重建台灣文化而努力。

#### 四、葉榮鐘對五四運動的批判

中國的五四運動對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有其一定程度的衝擊，造成許多人只要是屬於五四的產品就趨之若鶩。葉榮鐘支持新思想、新文學，但他並不盲從，尤其五四運動後，一般文學家對五四所提出的理論及論調多是推崇備至，且競相模仿。然而葉榮鐘對中國新文學理論，並非全盤接受，他對大陸文壇的評介，有褒有貶，時有獨到的見解。從他寫的《中國新文學概論》一書中可明顯的看出。

葉榮鐘用中文撰寫的《中國新文學概觀》，是一本鮮為人知的著作，此書是葉榮鐘在第二次赴日留學期間所寫的，1929年11月7日夜半脫稿於日本「高圓寺精舍」<sup>126</sup>，1930年6月，由「東京新民會」出版，原書為《新民會文存第三輯》，這是台灣人所寫第一本有關中國新文學的著作，時值台灣第二階段的新舊文學論戰，此書寫成自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且當時在中國除了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外，有關這方面有系統的專書，也鮮有人寫，它是葉榮鐘返台帶給台灣文學界的見面禮。此書篇幅不大，約三萬多字，書中很扼要的介紹中國大陸「五四運動」十年來的狀況，藉此引發他對台灣文壇的期盼，<sup>127</sup>因為1919年的「五四運動」，從抗議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的不公到批判北洋政權的懦弱，進而延伸為文化運動，帶動了整個中國新文學運動，正如台灣從「議會請置運動」到「文化協會」的啓蒙運動，相似之處頗多，可做為他山之石。此書內容不多，對大陸

---

<sup>126</sup> 參洪銘水〈葉榮鐘論「五四」新文學「第三文學」的提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0。葉榮鐘自跋曰：「1929年11月7日夜半脫稿於冷雨淒迷的高圓寺精舍。」高圓寺位於東京西郊「高圓寺南」驛站南端四丁目處，周圍成一市區，當年有「浪人街」之名，為中國人以及來自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人和朝鮮人留日的聚集之地。此地名正確位置，是洪銘水老師根據藩閩日文的資料，親自到日本實地調查出來的。

<sup>127</sup> 參洪銘水〈葉榮鐘論「五四」新文學與「第三文學」的提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4。

文壇的評介，有褒有貶、言簡意賅，把新文學運動發生的原因和經過以及一些作家和作品，加以提綱挈領的解說，時有獨到的見地，雖簡陋淺薄，但卻可貴。黃得時曾稱讚曰：

用現在的眼光看起來，儘管有點簡陋淺薄，但是在五十年前的台灣，已經有了這樣著作出現，實在是很難能可貴的。<sup>128</sup>

對於黃得時的讚美，葉榮鐘風趣且自謙的說：

那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時代所寫的，實在太幼稚，真是慚愧之至。<sup>129</sup>

葉榮鐘此書，主要引用的材料來自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他將五四運動十年之間出現的四百多種白話新聞雜誌、三百多位新文學作家，八百多種作品，四百多種外國作品的翻譯，提出他的觀察並批評其不足之處。他這本書共分五部份：1.序說。2.文學革命的演進。3.新文學作品。4.文壇的派。5.結論。今筆者僅從〈序說〉這部份來探討葉榮鐘對五四運動的成敗得失，如何提出其獨到的見地：

### (一)五四新文學缺乏內容思想的改革

五四運動努力的重點之一就是白話文的推廣，葉榮鐘認同胡適說的白話文學非這幾年的產物，也不是少數人倡導的功勞。而是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寫書了，能有今日的成績是進化的結果。他引胡適在《白話文學史》的小引中所說的：

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不是這三、四年來幾個人憑空捏造出來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是有歷史的，是有很長又很光榮的歷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國語文學乃是一千幾百年歷史進化的產兒。……現在有些人不明白這個歷史的背景，以為文學的運動是這幾年來某人提倡的功効，這是大錯的。我們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做書了；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講學

---

<sup>128</sup> 黃得時〈辛酸五十，淚血寫滄田〉引自《葉榮鐘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2年初版），頁178。

<sup>129</sup> 黃得時〈辛酸五十，淚血寫滄田〉引自《葉榮鐘年表》，同註128，頁178。

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小說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話的戲曲了；

130

而這個白話如今被稱爲“國語”，就是五四運動努力提倡的「白話文運動」的「白話」，所以葉榮鐘說它不是新創，只是接續而已。由於白話有這樣的歷史背景，再借由「言之不文，行之最遠」<sup>131</sup>的白話小說——《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的媒介，此運動的推行猶如順水推舟，很容易就達到目的地。但就「新的文學」的內容來說，就沒有預期的效果，他說：

文學革命當然不是僅把那些「之乎者也哉」的字面換上「的麼罷了嗎」就夠的。內容的思想和技術也非有一番的變化不可，可惜在革命前殆沒有人注意到，這一方面的工作全然付之缺如。文學革命前期的作家，如梁任公、林琴南諸先輩雖曾極力紹介西洋的新文學，但因不是有意義的運動所以沒有多大的效果。任公先生是政論家而不是純粹的文學者，……對於文學上的努力不可謂不多，但是始終抱著利用的態度，對文學自身完全沒有改革的意識。<sup>132</sup>

葉榮鐘對中國五四運動一針見血說出其弱點與不足之處，也就是缺乏內容的思想和技術方面的改革，這仍是未來要努力加強的地方。

## (二)五四新文學運動受古文惰性的支配成果並不可觀

五四運動後的十年之間作家、作品、新聞雜誌，甚至外國翻譯作品，多如過江之鯽，成果看似非凡，然葉榮鐘並不以爲然，他認爲“量雖多質卻未必一定是好的”<sup>133</sup>，原因是：

在這短短的十年間，能夠開拓了那麼廣泛的新地域，收穫了那麼多數的新作品，實在是大可以自豪的。……量雖多質卻未必一定是好的。在那汗牛充棟的作品中，除起兩三部的傑作外，盡是粗製濫造的文學水平線下的作品。結局新文學運動也是和新政體運動一樣，名實不能相符。形式上虛

<sup>130</sup> 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18。

<sup>131</sup> 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18。

<sup>132</sup> 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18。

<sup>133</sup> 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17。

具蔚然的大觀，內容卻依然是漆黑一團。……「新的文學」至今猶沒有堅牢的位置，還是動搖不定，往往要受舊文學的惰性所支配。這是因為「古文」已經有了很久的歷史，而新文學卻完全沒有一個預備的期間可以訓練作家的思想和技術所致的。<sup>134</sup>

會造成此因素，乃因“新時代的作家們不曾有過一個預備的時期可以把文學的觀念徹底的清算，而把握文學上的確然的新見解”，<sup>135</sup>結果“新文學運動也是和新政體運動一樣，名實不能相符。”<sup>136</sup>他認為新文學界如沒有一種有力的主流，作家們左顧右盼不能抱定堅確的信仰去從事創作，是不可能寫出好作品，他反對新文學的作者盲目模仿西方，一面又因舊文學的餘毒未脫盡，作家仍要受古文的束縛，寫出來的作品，好像改纏足一般，行來總不自如，要能寫出廣為流行的偉大傑作是不容易的，他並舉林琴南為例說明：

琴南先生是很有文學天才的人，他對文學上的工作也非常的大。……但他是古文最後的擁護者，根本的沒有改革文學的意思。……他的文學又是用古文寫的。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他白費了許多寶貴的精力和光陰，結局對新文學運動殆沒有所裨益。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呵！<sup>137</sup>

葉榮鐘犀利的評論林琴南，說他花費如此多的時間去翻譯沒有文學價值的作品是令人惋惜的，也說明了葉榮鐘對文學質的重視。他認為古文終究是已死的文字，無論你怎樣做，都只能供給少數人賞玩而已，不能行遠，不能普及，就失掉文學的意義了，為了讓新文學推廣開來，質精應重於量多。

### (三)反對文學的功利目的

葉榮鐘認同胡適所論的文學革命不只是把文言改為白話就夠了，而是要在「內容的思想和技術上」徹底的改變。再者葉榮鐘也非常強調文學的純粹性，他曾針對此點批評梁啟超的文學觀，梁啟超是近代中國維新運動的重要人物，也是文學家，極力推薦西洋的新文學。對於他的「小說救國論」，並沒有學者提出質

<sup>134</sup> 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17。

<sup>135</sup> 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19。

<sup>136</sup> 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17。

<sup>137</sup> 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19。

疑，然葉榮鐘不客氣的指出其盲點。他說：

任公先生是政論家而不是純粹的文學者，他以小說有四種支配人道之力；……他雖然知道小說有偉大的感化力，卻是把它當作轉移道德、宗教、政治——所謂移風易俗或是鼓撫士氣——的工具看待，而不曾用純粹的文學眼光去觀察。<sup>138</sup>

葉榮鐘反對梁啓超利用小說的感化力，當作轉移道德、宗教、政治的「小說救國論」，他主張用純粹的文學眼光去看待文學。他肯定梁啓超「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成就，但也批評梁啓超在「為藝術而藝術」這方面的不足。因為：

一件作品必須先「為藝術而藝術」，進而才談得上「為人生而藝術」。世上絕無繞過藝術而直探人生和人性的「藝術」作品。<sup>139</sup>

葉榮鐘認為梁啓超對文學“始終抱著利用的態度，對文學自身全沒有改革的意識”<sup>140</sup>，梁啓超這樣的論調對新文學運動是沒有裨益的。

最後葉榮鐘也對「五四」前後的大陸中國文壇做了一個總評，他認為革命前期的作家，因為缺乏文學革命底意識的行動，無法做新文學運動的基礎工事。新時代的作家們還來不及將舊文學觀念徹底的清算，就陷入新文學的改革運動，面臨突然蜂湧而至的文藝思潮，如：自然主義、新浪漫派主義、紅色文學、黑色文學……等，當然會措手不及、目眩神搖，進而競相模仿，造成今日五花十色的文壇。由於文學界沒有有力的主流，加上舊文學的餘毒仍在，要能寫出偉大的作品是不容易的。他認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缺乏創意在於思想的混亂及生活上精神的失調。對此他說：

我想這是因為現代中國的社會思想混亂到於極點，作家失掉了精神生活的重心，徬徨於思想的歧路，沒有堅確的信仰，沒有一貫的精神，可以從事創作使然的，我們在這樣的觀點很明白的可以看出現代中國作家的「時代的苦悶」。<sup>141</sup>

<sup>138</sup> 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18。

<sup>139</sup> 陳義芝編《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99年初版），頁 331。

<sup>140</sup> 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19。

<sup>141</sup> 葉榮鐘〈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41。

當然他也肯定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和價值，他說：“二十世紀是「民眾的時代」，是「國際文化的時代」”<sup>142</sup>；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形式與內容。中國新文學欲推翻貴族的舊文學，就要去清算舊時代的傳統，要建設屬於平民的新文學，就要去接受新時代的思潮。五四新文學運動實施至今，雖然只有十歲，但它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大家肯朝著一定目標，不計個人的利益得失，往前努力，它終有成功的一天，因為：

中國的民族是偉大的，中國的歷史是久長的，我們何須汲汲於現在，更何須失望於將來。時間！時間自會解決她的一切！不但新文學運動是這樣，就是中國的各種運動也莫不可作如是觀！<sup>143</sup>

由此書我們可看出葉榮鐘具有相當先進的文學觀點外，更有意義的是反應了一個生活在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知識分子，能立場超然地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給予最客觀的解讀與評論。對一個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來說，能以流暢的中國白話文來寫這本書，非常不簡單。可敬的是，寫此書之前，他要閱讀多少祖國書籍，才能有如此的功力。更由於想見先賢苦懷故國之思，促使他在冷雨淒迷的夜半仍振筆疾書，可見其「祖國精神」是濃烈的；當然其勤學更是受人肯定的，他的好友黃得時曾說：

葉先生好學不倦，並且很喜歡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通過台北的某書店向東京誠文堂新光社訂購一套《東洋文化史大系》，書名雖用「東洋」兩字，其實寫的都是中國的事情，我也訂了一部。我們一有空就互相討論中國文化的問題，增加不少的見識。<sup>144</sup>

在二、三〇年代台灣的新舊文學論戰中，葉榮鐘刻意地在他留學東京的最後一年間撰寫此書，總結中國五四運動十年來新文學運動的經驗，為台灣文壇提供一面鏡子，其用心與意義，值得我們肯定。

## 五、「第三文學」的提出

1932 葉榮鐘連續在《南音》第八號（1932 年 6 月 15 日）及第九、十合刊（7

---

<sup>142</sup> 葉榮鐘〈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55。

<sup>143</sup> 葉榮鐘〈中國新文學概觀〉《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56。

<sup>144</sup> 黃得時〈辛酸五十，淚血寫滄田〉引自《葉榮鐘年表》，同註 128，頁 183。

月 15 日)的「卷頭言」上發表〈第三文學提倡〉及〈再論第三文學〉，主張以台灣歷史文化特質為本位的「第三種文學」，它是超越「貴族文學」與「普羅文學」，具有台灣主體特色的文學。在台灣文學界，此論的提出可說是獨樹一幟，因為他的「第三種文學」強調超越階級，文學不再被限制在士紳知識階級，或被限制在無產階級裡，葉榮鐘試圖走出「新中間路線」，走出其獨特的風格。在談論第三文學的特色之前，我們要先了解「文藝普遍化、大眾文藝」，因為它與台灣主體文學深具關連性。

### (一)文藝普遍化與大眾文藝

1927 年「台灣文化協會」成員因意識形態左右分裂之後，左翼抗日運動成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主流，他們提出了「文藝大眾化」的訴求，企圖使文學不再是士紳知識階級所獨享，它要讓台灣現實社會所有的百姓都能擁有。尤其 1930 年初抗日運動遭到全面的彈壓時，文學成為抗日運動的主流，反過來帶領政治社會抗日運動、文化運動，並負起啓蒙、教養民眾，為民眾謀福利的任務。屬於右翼自治派<sup>145</sup>的葉榮鐘知道如果執意用政治來改革台灣的話，絕對會「碰壁」，因為此時，凡能喚起民眾意識的有組織的運動都一一崩解，只剩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然而相對於當時主流左翼抗日運動，堅持合法運動的溫和派自治者，反而被指為背離台灣大眾者，是台灣啓蒙運動啓蒙教養台灣大眾精神的背離者，他們只得一再退縮，再加上 1930-1931 年發生世界性經濟恐慌，面對如此多重的苦悶，葉榮鐘在《南音》〈發刊詞〉中說出當時的環境：

台灣的混沌既非一日了，但是有史以來當以現代為第一，目前的台灣可以說是八面碰壁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以至於社會上各方面，不是暮氣頹唐的，便是矛盾撞著，在這混亂慘淡的空氣中過日的我們，能有幾個不至於感著苦痛？<sup>146</sup>

為了重振右翼民族主義自治派的聲望，及順應時代潮流，葉榮鐘企圖以文學

---

<sup>145</sup> 以蔡培火、林獻堂、葉榮鐘等人為主是溫和派，在抗日政治局勢與思想上的作風與左翼完全不同，他們一向堅持合法運動，蕭友三認為“自治聯盟不外乎是封建土地財產家·地主為了獲得民權的運動……以肯定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權為前提……藐視佔台灣住民大多數的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始終使用奴隸的阿諛及哀願叩頭的方式等”轉引自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同註 27，頁 707。

<sup>146</sup> 葉榮鐘〈《南音》發刊詞〉《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59。



來突破這種苦悶，他意識到可以用文學來救國，文學不再是特殊階級的專有物，它應該要接近大眾、提供大眾以娛樂與慰安的。他拋棄過去所帶有的資產階級性，站到大眾立場上重新審視，檢討台灣過去十年來的新文學運動，而提出了以大眾為主體的「文藝普遍化」理論，以相應於左翼所提的「文藝大眾化」，他說：

怎樣才能夠使思想、文藝普遍化……怎樣纔能夠使多數人領納得思想和文藝的生產品……就是有甚麼方法或用甚麼工具和形式來發表，纔能夠使思想、文藝浸透於一般民眾的心田，”<sup>147</sup>

在這到處碰壁的時代裡，他提出「文藝普遍化、群眾化」，希望藉由文學能夠“在這些迷朦苦悶的人們的心靈上，添一點文藝的潤澤，給一點生活上的慰安”<sup>148</sup>他認為文學不該只是少數人所擁有，所可以享受的，他期待文學真正落實在現實社會大多數人手中，希望台灣全民眾都能擁有文字、文學能力，每一個人都能看、能讀、能寫，大家可以隨心所欲的依自己的思想感覺來表達，為達成此目標，他接著又在《南音》第二號的卷頭言中提出了〈「大眾文藝」待望〉，為其所主張的「文藝普遍化」訂出了寫作的方向。

早在 1929 年 5 月葉榮鐘所寫的〈關於羅馬字運動〉一文中他就已注意到台灣的文盲問題，且知道這是一個燃眉急務，他說：

現在的台灣不但無產大眾全部是文盲無智，就是所謂小市民階級的大多數也是目不識丁的居多，學校教育的普及遲遲不振，社會教育更不足道，何況現在所謂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自身的內容尚有吟味的必要的呢？在這種種的條件之下，這箇「大眾教育」的問題，老早就成了我們島內文化運動的目標，和各種解放運動的先行條件了。<sup>149</sup>

如何喚醒民眾，教育民眾成為急待解決之務。葉榮鐘認為要達成啟蒙教育民眾的目標，文藝一定要普遍化、通俗化，他援用日本當時流行的大眾文藝的觀念，認為大眾文藝是“寫給一般文化的教養較低的大眾去鑑賞的通俗文藝”<sup>150</sup>，此文藝是以現實社會中的大眾為主體，以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大眾為讀者、為對象。他知

<sup>147</sup> 葉榮鐘〈《南音》發刊詞〉《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60。

<sup>148</sup> 葉榮鐘〈《南音》發刊詞〉《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60。

<sup>149</sup>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190。

<sup>150</sup> 葉榮鐘〈（卷頭語）：「大眾文藝」待望〉《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63。

道唯有採取這種方法，才能使文藝接近大眾，使面臨陰慘困逼環境的台灣多數人得到必要的娛樂與慰安。文藝的內容要以大眾的生活為題材，要能接近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大眾思想與經驗的文學，這樣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與共鳴，他解釋大眾文藝的特色是：

牠的發生原因，自然是根據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因為文學已不是一部分特殊階級的專有物，牠若是對於全體的社會與人生無所寄與就沒有意義的。所以文藝一發，要接近大眾，供給大眾以娛樂和慰安，使彼等切實地去觀照他們自身的本相、思想和感情。藉以涵養大眾的趣味和品性給他們的人生能夠藝術化，那末文藝非更為通俗化不可。<sup>151</sup>

他認為文學不再是特殊階級的專有物，應該是接近民眾，能夠提供他們娛樂與慰安的。此時合乎此條件，能夠擔負起這個重責大任的應是小說，“尤其是以情節做中心的「大眾小說」最有興味可以引人入勝的。”<sup>152</sup>因為這種小說有曲折的情節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隨著情節的變化一直讀下去，自然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不過小說的內容與背景不能離讀者太遠，必需以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民及其生活為主體，以台灣這塊土地上的風土、人情、歷史、時代為背景，它是生動活潑有生命的藝術，是全民的文學，且不屬於任何特定階級的，一切的思考都以台灣及台灣人為主體，如此才是真正台灣人的「大眾文藝」。葉榮鐘強調此時重建大眾文藝有其時代的意義，它不但可以喚醒台灣社會的大眾，加強知識的吸收，以便趕上世界文明的潮流，且可阻止殖民文化的蔓延，開始注意屬於台灣人自己的文化。

## (二)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學

葉榮鐘指出，台灣原有的通俗公案俠義小說，因為時代背景相去久遠，不容易喚起大眾的共鳴；而新的小說又大都是無視讀者興味的虛玄之作，且作者大都是中國作家，所寫的作品與台灣環境不同，心境異離，不容易引起台灣人的共鳴。因此葉榮鐘呼籲有文學能力的知識份子，在從事文學寫作時，所寫的內容要以台灣人熟悉的人、事、物為主，寫出台灣人自身的大眾文藝。至於如何寫才能使文藝

---

<sup>151</sup> 葉榮鐘〈(卷頭語)：「大眾文藝」待望〉《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63。

<sup>152</sup> 葉榮鐘〈(卷頭語)：「大眾文藝」待望〉《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64。

通俗化？什麼才是最佳的題材呢？他說：

……待望以我們台灣的風土、人情、歷史、時代做背景的有趣而且有益的大眾文藝的產生。好在這一方面材料在過去的歷史正是不遑枚舉的，譬如開闢時代的鄭氏父子的事跡、滿清時代的朱一貴、林爽文的反亂，劉銘傳、唐景崧的經略，領台當時的情形，和當時活躍過的柯鐵虎、林少貓等事跡以及三十年來的各種事件，莫不是絕好的資料，台灣的新進作家們探一探這樣的寶庫如何？這份豐厚的遺產是祖先用血淚積下來的啊！<sup>153</sup>

葉榮鐘摘取民間抗日英雄柯鐵虎、林少貓等事跡做為歷史記憶，為大眾文藝的內容，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是何等勇敢，他顯然是採取以民間想像來對抗殖民者的國族想像。<sup>154</sup>日據時代殖民者對台灣人的教育都是以日本歷史為主，即使有論及台灣歷史之處，也必然是用日本人的觀點來解釋，台灣歷史主體早已被抽換，很多的民族集體記憶都被邊緣化，甚至已漸被塵封。葉榮鐘主張整理台灣歷史做為大眾文藝的材料，顯然有助於重建台灣文化的主體。然而台灣原本的文化也是良莠不齊，如何去蕪存菁，鑑於此，他寫了一篇〈前輩的使命〉呼籲前輩詩人文人，為台灣的文學盡點心力——「整理過去的文藝」，葉榮鐘明白的告訴他們該如何做：

他們若能夠將他們豐富的經驗做手段忠實地去追尋過去文藝的來路，則他們的前途尚有洋洋境地啊！譬如搜集我們台灣開闢以來之詩，這卻不必問其成自台灣人之手與外省人之手，祇求牠是寫出台灣的鄉土特色——人情、風俗、歷史、名勝——其次就是搜羅史實，這也不問牠野史口碑，苟能夠傳達一些古人的事跡，或是歷史上的事實夠了。這樣的事業正是現在台灣所欠乏而又是青年人做不到的，他們若能把這一方面的事業做得好，便算是完畢他們對於這時代所負的使命了。<sup>155</sup>

文中他指出“過去的文藝”，就是台灣開闢以來的詩文作品，其內容是深具台灣鄉土特色的人情風俗、歷史、名勝等，這種文學才是具有台灣文化的主體特色。

---

<sup>153</sup> 葉榮鐘〈(卷頭語)：「大眾文藝」待望〉《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64。

<sup>154</sup> 陳芳明〈現代性與本土性：以《南音》為中心看三〇年代台灣作家與民間想像〉《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同註 45，頁 80。

<sup>155</sup> 葉榮鐘〈卷頭言：前輩的使命〉《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70。

它是潛藏在民間的民族集體記憶，既然是全民的、超越階級的，也不分其出自台灣人或外省人，是新文學或舊文學，新知識分子或舊文人，只要他們能站在台灣這塊土地，針對台灣人所擁有的特殊性去從事文學寫作，去提出台灣人共同的思想與要求，就是屬於台灣人的大眾文學。對大眾文藝的提倡，葉榮鐘不遺餘力，爲了讓台灣文學更鄉土化、大眾化、平民化，他在大眾文藝之外，又提出了定義更爲明確的「第三文學」。

### (三) 第三文學

對於《南音》這本書，楊行東在《福爾摩沙》創刊號中譏評它是「腐心於風月花鳥的貴族文學」，<sup>156</sup>也有人譏評它是：「資本階級的娛樂刊物，是霧峰派的小嘍囉」<sup>157</sup>。雖然《南音》成立之初就一再強調不屬於任何文學派別：

這個小小雜誌發刊的動機雖然是由幾個同人發起，但是目的卻是為著台灣的思想文藝方面效一點微力的，所以我們絕對不敢以這個機關自私，也不敢有所偏倚，苟能增進台灣新思想、新文藝的發達，無論是那一派的作品，在可以登載，和紙面的收容力所許容的範圍內，都是無任歡迎之至的。<sup>158</sup>

面對他人的誤解，及對文藝大眾化的推行，葉榮鐘提出超越階級的「第三文學」論，他認爲文學既不是過去貴族階級所支配，也不是近人宣傳的「普羅階級」所佔有。他強調文學應以台灣全民爲立場，不帶有任何階級意識，它是台灣人共同記憶的全民文學，是超越階級界線的，只有這種文學才是台灣文學的進路。他批判「普羅文學」在台灣的強勢，也批判「普羅文學」的偏頗與狹隘，他說：

過去的社會的支配者是一些貴族和富人，所以當時的「人」是指屬於那階級或是比較接近他們者而言的，一般窮人在他們的眼中並不像人。不但對於「人」的見解是如此，就是一般文化現象亦莫不然。若不合於他們的文化便成野蠻的陋習了。文學當然也逃不出這個桎梏，若不是所謂貴族文學便不成文學了，但是曾幾何時，滄海桑田，時代已經變遷了，據說現代是

---

<sup>156</sup> 黃得時〈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304。

<sup>157</sup> 黃春成〈談談「南音」〉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341。

<sup>158</sup> 葉榮鐘〈《南音》發刊詞〉《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60-261。

無產者的世界了，所以非「普羅」不是人，非「普羅文學」也不是文學了，這是「普羅階級」的金科玉律絕對不容擬議的，敢擬議，就要蒙反動的罪名了。<sup>159</sup>

他認為普羅文學不將非普羅階級的人視為人，一如過去的貴族、富人不將其它人視為人一樣，只要不贊成普羅文學者就成了反動份子。葉榮鐘很懷疑台灣是否真的有普羅文學？也懷疑台灣的無產大眾真的能夠吸收普羅文學的作品？他說：

自「普羅文學」的議論發生以來，我們台灣曾否有過真正的「普羅文學」麼？這是很疑問的，試問「吃阿爸的飯」，「開阿爸的錢」的，由幾卷小冊子榨出來的就算「普羅文學」麼？排些列寧、馬克思的空架子，抄些經濟恐慌資本主義第三期的新名詞也是「普羅文學」麼？……「竹竿搵屎長掛臭」的文字也說是「普羅文學」，「普羅文學」就真要完了。……然而台灣的無產大眾到底有幾個能夠消納他們的作品呢？<sup>160</sup>

他質疑「由幾卷小冊子榨出來」、「排些列寧、馬克思的空架子，抄些經濟恐慌資本主義第三期的新名詞」就算是普羅文藝，就自稱是左翼作家。他試圖打破台灣新文學因為政治立場階級問題而帶來的狹隘性，強調台灣文學不應限定在某一個特定的階級，那牠又該立腳在那裡呢？葉榮鐘說：

然則當來的台灣文學應當立腳在那一點呢？這就是我所要提倡的第三文學的根據，據我想來，一個社會的集團，因其人種、歷史、風土、人情應會形成一種共通的特性，這樣的特性是超越階級以外的存在。所以台灣人在做階級的份子以前應先具有一種做台灣人應有的特性。第三文學是要立腳在這全集團的特性去描寫現在的台灣人全體共通的生活、感情、要求和解放的，……<sup>161</sup>

「第三文學」的提出是葉榮鐘企圖建構台灣的集體性文學以超越普羅文學，他認為台灣文學應超越一切階級羈絆，將台灣人視為一個全集團，包含並超越所有的階級，它的特性是“腳立台灣的大地，頭頂台灣的蒼空，”<sup>162</sup>台灣有自己獨特的

<sup>159</sup> 葉榮鐘〈(卷頭語)：「第三文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91。

<sup>160</sup> 葉榮鐘〈(卷頭語)：「第三文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91。

<sup>161</sup> 葉榮鐘〈(卷頭語)：「第三文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92。

<sup>162</sup> 葉榮鐘〈(卷頭語)：再論「第三文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94。

文化、獨特的社會境遇：

……我們台灣既說是相續了一份漢民族四千年的文化的遺產，培養於台灣特殊的境遇之下，兼受了日本文化的洗禮。自然相信我們台灣必定也有我們台灣特殊的文化。……第二就是我們的社會境遇。我們所過的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諸生活和所受的特殊的教育與教化等等莫不是足以形成我們特殊的社會狀態，構成我們的社會意識的。這樣的事實是我們耳聞目睹日日都經驗著的。<sup>163</sup>

而這種「特殊」，是異於祖國的特殊，原來台灣和祖國有著相同的民族血緣文化，但後來因政治上的殖民處境，發展出不同的經濟、文化、社會等，而有了屬於台灣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命運，”這個運命是我們先天的所註定的，我們只好這條路上跑”。<sup>164</sup>只要是生活在台灣這塊地理領空，以特殊歷史命運、特殊文化、社會為背景的台灣人，都是隸屬在這個全集團裡。他並且強調只要是屬於這個集團內的「台灣人」，都可以在此背景之下去從事文學工作，他說：

第三文學須是腳立台灣的大地，頭頂台灣的蒼空，不事模倣，不赴流行，非由台灣人的血和肉創作出來不可。<sup>165</sup>

只要你是站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頭頂台灣的蒼天，寫出反映台灣民眾生活情感，歌唱民眾生活歷程中的艱辛、憂患、快樂和飛翔，那是台灣人共同的感情與要求，就是「第三文學」：

「第三文學」是要立腳在全集團的特性去描寫現在的台灣人全體共通的生活、感情、要求和解放的。……「第三文學」就是立腳在這貫通四百萬同胞的集團的特性所派生出來的共通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意識啦。<sup>166</sup>

葉榮鐘的「第三文學」不受任何階級的牽絆，它是屬於台灣全體民眾的，是從台灣的山川、氣候、人情、風俗所孕育出的，是台灣特殊文化所醞釀出來的，葉榮鐘堅信在這四百萬同胞一起生活的地方，一定有民間的共同記憶與情感。

---

<sup>163</sup> 葉榮鐘〈(卷頭語)：再論「第三文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93-294。

<sup>164</sup> 葉榮鐘〈(卷頭語)：再論「第三文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93-294。

<sup>165</sup> 葉榮鐘〈(卷頭語)：「第三文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92。

<sup>166</sup> 葉榮鐘〈(卷頭語)：再論「第三文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93-294。

總之，葉榮鐘期望台灣整個文學界不分新舊、不分階級，都投入建設台灣的新文學——第三文學，建立一個不帶階級觀的、自由的、多樣性的文學，他說：

這樣的文學才有完全的自由，才有完全的平等，進一步也纔可以寄與世界的文學界，所謂世界的文學一定不是像「味之素」去統一一切的味道。有著深刻雄偉的北歐文學，還須有纏綿悱惻的南歐文學纔能夠形成光彩陸離的今日的世界文學呢！<sup>167</sup>

如此的文學觀，才不致把台灣的特殊性神秘化和絕對化，而成爲本土意識的文學烏托邦的「味之素」！第三文學是可以進軍世界文壇的，它不從屬於中國白話文學，也不限制於無產階級的自由的文學，它就如同日本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所說的：

文藝純然是生命的表現，是完全脫離外界的抑壓，強制，立在絕對的自由的心境，表現個性的唯一世界。忘卻了名利，丟掉了奴隸根性，擺脫了一切的羈絆、束縛，文藝上的創作才能成立。<sup>168</sup>

第三文學是由具有台灣人特性的作家所寫的有關台灣本土特性的文學，是自由的文藝、大眾的文藝，也是台灣人共同記憶的全民文學。

另外要注意的是，稍早在 1930 年的「伍人報」上黃石輝發表了〈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中提到：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sup>169</sup>

如此的說法和葉榮鐘第三文學所說的乍看之下很類似，其實不然，兩者還是有很大的差別。因爲葉榮鐘對於貴族文學或普羅文學，都保持疏離的態度，他是從全民的立場出發來談文學；而黃石輝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來提倡文藝大眾化，以

---

<sup>167</sup> 葉榮鐘〈(卷頭語)：「第三文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92。

<sup>168</sup> 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32。

<sup>169</sup> 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88。

普羅階級為其創作的鵠的，他說：

……不管你是支配階級的代辯者，還是勞苦群眾的領導者，你總須以勞苦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sup>170</sup>

黃石輝認為過去的古文以至白話文都是貴族文學，和勞苦大眾是絕緣的，所以他提倡的大眾化文學是屬無產階級的普羅文學。

更值得注意的是，葉榮鐘提出「第三文學」的同一階段，大陸的胡秋原等人也提出「第三種文學」<sup>171</sup>，他們認為藝術至上的「第三種人」，只是「死抱住藝術不放」，主張「一切政治勢力Hand off Arts」<sup>172</sup>，在當時貧窮落後的中國這種人是不能存在的。然而「第三種文學」的支持者認為“在中國社會中除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文學以外，顯然還存在著其他階級的文學，可以不是無產階級的，同時又是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sup>173</sup>這表示「第三種文學」是可以單獨存在的階層，可以有屬於自己獨立的藝術王國，可見胡秋原、瞿秋白等人所謂的「第三種文學」是帶有階級性的，和葉榮鐘所提的是不一樣的。

對於葉榮鐘能跳脫階級來談第三文學，郭秋生評論說：

『第三文學提倡』是奇君這回的新主張，以為當來的台灣文學，應超越布爾普羅兩階文學，集中於『台灣人』這回共通點的第三文學，對不對望大家檢討看看。又『當來的台灣文學是什麼』？這個問題的解決，或能發見到新台灣運動的指導原理，有心於新台灣的思想家文人，齊起來吧！發表你們的抱負高見。<sup>174</sup>

---

<sup>170</sup> 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引自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同註 7，頁 488。

<sup>171</sup> 參洪銘水〈葉榮鐘論「五四」新文學「第三文學」的提出〉《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41 註 8。大陸的「第三種人」最早是由蘇汶在 1932 年 3 月提出，他強調文學的藝術性而提出「第三種人」的困境，引發瞿秋白、魯迅、周應起、胡秋原等人的討論。洪銘水先生強調蘇汶此篇文章比葉榮鐘早 3 個月在大陸提出，葉榮鐘是否事先看到蘇汶的文章，是有待考證，至於其他人的文章就晚於葉榮鐘。

<sup>172</sup> 參施淑〈文協分裂與三〇年代初臺灣文藝思想的分化〉《兩岸文學論集》（台北市：新地文學，1997 年），頁 25-26。

<sup>173</sup> 王宏志〈政治對魯迅研究的影響——從 1988 年北京的「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名人評價問題座談會」談起〉轉引自張桂華《苦悶時代下的文學——1932 年〈南音〉的文學訴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6 月），頁 122。

<sup>174</sup> 芥舟〈南音〉《南音》，第一卷第九、十合刊號，頁 14。



總而言之，葉榮鐘的第三文學是超越貴族與普羅，甚至超越自身原有的立場，立足於全民的特性，「去描寫現在的台灣人全體共通的生活、情感、要求和解放的」，並以「全集團的特性」描述台灣文學的根本精神及發展方向。它為處在八面碰壁的苦悶時期的台灣抗日運動，找出一條聯合統一的新文學路線；也替右翼的大眾文學論述提供一個新的視野和幅度，它談的是全集團的特性與意識。它要求自由平等，但也重視地域文化特性的文學主張，它不曾標榜民族主義，但卻含有弱小民族文學的政治訴求，堅持民族解放的理想，也落實了右翼運動者為全民謀福利的理念，葉榮鐘〈第三文學提倡〉與〈再論第三文學〉，便是反覆討論這樣的看法。”……知識階級喲！到民間去！去！去！去！去分配們的智識給你的鄰人！給你的鄉里！這是新台灣建設的捷徑！”<sup>175</sup>，葉榮鐘相信唯有普及民眾知識後，才能提高民眾文化，進而增進民眾幸福，因此他也鼓勵知識分子下鄉，到民間去，到農村去，深入基層，將自己的知識分給鄰人、鄉里，切實地去指導，別拘泥於高遠的理想、毋惑於玄虛的批評，以身作則去指導民眾，如此才能提昇台灣的文化水準，這也是他文學主張的重要論點。由於立論切中殖民地台灣的境遇，其說服力似乎不可顛破，因此沒有遭受到重量級的左派的有力攻擊。而事實上台灣於 1980 年後一些作家已接續創造出這種獨具台灣特性的文學，像林央敏提倡的「台灣民族文學」<sup>176</sup>就和葉榮鐘的「第三文學」是前後相呼應的。<sup>177</sup>

綜觀葉榮鐘的文學理念，可說具有「生命力」與「民間性」兩項特質；他站在人民與土地的立場，認為文學是靈魂的產物，是生命的謳歌，文學的藝術性固然重要，然而文學的內涵更不可忽視；文藝不是某些知識階層所特有的，它應該屬於全體人民，屬於大地的；藝術的功能不在於作者能否自娛，而是要發揮其娛樂大眾並啓迪大眾之功效。

---

<sup>175</sup> 奇（葉榮鐘筆名）〈智識分配〉《葉榮鐘早年文集》，同註 68，頁 286。

<sup>176</sup> 宋澤萊〈論林央敏文學的重要性——繼黃石輝、葉榮鐘之後又一深化台灣文學的旗手〉《台灣新文學》，第 8 期，（台中市：台灣新文學雜誌社，86 年 8 月），頁 231。台灣民族文學：凡是反映民族真貌的文字都是民族文學。因其反映出民族真貌，所以在文學作品中，可以探索出這個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識與社會共相，這裡所謂的「社會共相」是就全體而言，其特具的性質是統一的，即凡是反映該民族的生活的任何作品都將具有某種共同職責。相對於別的民族的文學來說，此一質素就成為該民族文學的特色。

<sup>177</sup> 宋澤萊〈論林央敏文學的重要性——繼黃石輝、葉榮鐘之後又一深化台灣文學的旗手〉《台灣新文學》，第 8 期，同註 178，頁 231-232。

# 第五章 葉榮鐘的文學創作

## 第一節 漢詩

### 一、葉榮鐘與漢詩

出生在日據時代的葉榮鐘，自幼接受日人的新式教育，成為新文學從事者。因時代使命感的驅使，他加入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前半生一直在為爭取殖民權力而奮鬥，然而他一輩子都沒有忘懷幼時所學的傳統文學——漢詩。早在十八歲少年時代他就與洪炎秋、莊垂勝等好友刊行《晨鐘》而享詩名，中年時又加入以標榜民族氣節，在異族統治底下自甘為棄材的櫟社。<sup>1</sup>他的女兒葉芸芸說：“父親情所獨鍾的是文學，……無論如何，詩是父親一生的寄情感事所在”<sup>2</sup>，雖然當時像葉榮鐘或其餘的中國新文學工作者，都曾執筆批判了舊詩的弊病，但他們冷嘲熱罵的是那些沽名釣譽，不能做平易率真之詩的墮落詩人，對於傳統詩歌的功能，他們很清楚而且能有效的掌握。葉榮鐘早年曾和林幼春與傅鶴亭(1872-1946)兩位大師學詩，因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40年葉榮鐘被報社派去東京接任分社長時，利用公餘的時間，加入「東京詩友會」，和詩友陳虛谷、甘文芳、謝溪秋……等人，常於林獻堂在日本巢鴨購置的「雨聲庵」聚會吟詩<sup>3</sup>，而這段日子他也常跟腳受傷正在療養的林獻堂同遊同詠，更加深了他作詩的功力。1942年，適逢櫟社招收新社員，在林獻堂的推薦下葉榮鐘加入櫟社成為正式的社員，利用業餘從事吟詠，聊以寄情之餘還可維繫漢文於不墜。葉榮鐘非常愛詩，從1918年所寫的〈望月〉到1978年〈三連兄賢伉儷金婚蒙贈紀念冊詩以賀之〉為止，六十年間的苦吟結果，共寫了六百多首詩，全部收錄在《少奇吟草》中，採依時

---

<sup>1</sup> 參鍾美芳〈第三章櫟社的組織與活動〉《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上)》，《台北文獻》第78期，(台北市：台北文獻委員會)頁252。櫟社成立於1901年(明治34年)，為霧峰林家下厝的林朝崧(字後堂，號痴仙)首創，以不材之木相號召，取「櫟社」為名，林痴仙說：「吾學非世用，是為棄材；心若死灰，是為朽木。今夫櫟，不材之木也，吾以為幟焉。其有樂從吾遊者，志吾幟」。葉榮鐘是在1942年加入櫟社的。

<sup>2</sup> 葉芸芸〈編後記〉引自葉榮鐘《少奇吟草》(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年12月初版)，頁263。

<sup>3</sup> 參施懿琳〈彰化應社研究〉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主辦，《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一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1994.11.25-27，清華大學國際會議廳，新竹，頁12。

繫年的方式編排。他本著「不吐真情感不深」、「不有真情不作詩」的原則寫詩，堅信在真情流露時才有靈感，寫出來的詩才能感人肺腑。對此其子女形容：

先君諸作，無不出自輪囷肝腸，悲歡憤慨，發乎衷誠，有血有淚，快語快論，情濃意真，思周理直，故人警歎，躍然楮表，益覺其心聲之彌足珍貴也。<sup>4</sup>

葉榮鐘情真語真，不拘泥、不雕飾的詩句，處處給人情濃意真的感動。莊幼岳在〈《少奇吟草》原序〉中對他的作品也給予非常貼切的批評：

……先生性情中人，富國家民族思想，以之發為心聲，直抒胸臆，不主宗派，不泥成法，興之所至，率爾操觚，工拙寧計，要之一本真情，便符風人微旨，固不必雕章鏤句，刻意求工始尚也。<sup>5</sup>

情真語真，一直是他寫詩的特色，他寫作的風格與吟風弄月專事應酬的舊詩人不同，用字淺白、較少用典，有時也刻意不受格律的限制。只要是日常生活裡的人、事、物，能引起共鳴的往往都是他入詩的好題材，這也是他寫詩的精髓所在，藉由這些詩作我們可了解葉榮鐘的生命歷程、心靈世界，乃至他所走過的時代。他本著櫟社社員堅貞的民族志節，對日本殖民統治做最嚴厲的批判和反抗，是《少奇吟草》這本書的基本精神。

## 二、葉榮鐘漢詩的內容

出生清末，及長接受日治時代進步的近代化教育的葉榮鐘，既有舊文人的風骨，也有近代台灣知識份子的民主、科學的體認，因此有反帝、反封建的強烈志向，加上他一生豐富而曲折的社會經歷，使其詩作內容與時代脈動息息相關，觀其詩作除了可以一窺其內心世界，亦可看出其人其詩與近代台灣之密切關係。身為櫟社社員的他，帶著尖銳的近代台灣知識份子的理性、批判和質疑，寫出對殖民體制的控訴、對知識份子的批判、對國運的感嘆，及對二二八事變的傷痛。更有為數不少的詩句是對妻子、兒女、孫子們親情的流露與關懷；當然也還有對師恩的感激與追念。

---

<sup>4</sup> 葉榮鐘〈編印小啓〉《少奇吟草》，同註2，頁261。

<sup>5</sup> 莊幼岳〈《少奇吟草》原序〉《少奇吟草》，同註2，頁259

## (一)時代的關懷

### 1.對殖民體制的控訴：

生長在日本領台時期的葉榮鐘，受抗日不屈的一世文人——洪棄生(1867-1929)、施天鶴(1870-1949)、許夢青(1870-1904)等人的影響，以身爲漢人，能作漢詩爲榮，因此很早就萌生故國原鄉之思，在其十八歲時所寫的〈望月〉詩中就見出端倪。因緣際會之下，跟隨林獻堂步入政治社會運動後，更看清統治者對台人的摧殘與剝削，因此對日人隱晦的諷諭，不時的出現在其詩篇中，如：

齊女新愁唱怨詞。聲聲猶帶舊時悲。南方酷日渾如火。珍重高棲最密枝。  
(〈新蟬〉)<sup>6</sup>

酷日驅人勢欲燔。薰風也自到荒村。躬耕豈合英雄事。祇愛茅廬避世喧。  
(《夏日田家雜詠》)<sup>7</sup>

煎砂爛石欲何如。蒲扇長揮暑不除。熱血豈容炎日下。此身端合廣寒居。  
(〈大暑〉)<sup>8</sup>

第一首詩，葉榮鐘因蟬起興，藉由蟬聲唱出日人統治下台人內心的怨恨，在惡劣的環境中莫可奈何，只有學習餐風飲露的蟬，暫避密枝，靜待良機出現。綜觀這三首詩，皆以「酷日」代表統治者日本，生活在太陽旗下的台人，面對日人苛酷的統治，恣意的欺壓，如曝曬在炎炎夏日之中，這種耨熱的煎熬，不但百姓苦不堪言，連有志之士也須暫時躲避、忍耐酷熱，等待適當時機再出來行事。

隨著日華戰爭的開始，日本對同是漢族的台人的壓迫也日趨嚴重，連當時的新文學也遭受統治者極大的限制，文人只能以舊體詩來抒發心中對執政者的不滿、悲憤，以及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控訴，因此強烈且犀利的批判精神在葉榮鐘的漢詩中表露無遺。

狂風怒雨撼瀛洲，大好江山任踐蹂；畫棟雕樑惜不得，無家我亦有餘愁。

<sup>6</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2，頁93。

<sup>7</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2，頁94。

<sup>8</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2，頁95。

日人猶如「狂風暴雨」，毫不保留的橫掃「中國神州」，風雨襲擊後的江山，滿目瘡痍，任人踐踏，雕樑畫棟不再美麗了；滄海桑田之變，讓台人頓失依靠，到底要何去何從呢？悲痛的是：“誰憐補屋細民憂”<sup>10</sup>。葉榮鐘感於台人的渺小、無助，因此鞭策自己，決定負笈東瀛求學增強自己的力量，期望他日能為同胞盡心盡力。1931年當他從日本二度留學回來，看到整個家園仍飽受殖民者無情的壓榨，予取予求，全不顧台人死活，感慨萬千之餘只能透過詩作來抨擊執政者的苛刻。

東瀛本是好山河，其奈頻年宰割何。寄語操刀當道者，羸羊殘血已無多。

11

昔日美麗的家園，若非日本軍人的黷武好戰，怎會殘缺破碎呢？在殖民統治者連年的兇暴蹂躪及貪得無厭的橫徵暴斂下，似羸羊的台人已枯瘦慘白，所剩無幾了。抗日意識鮮明的表現在他的詩作裡，其詩作展現出的批判精神比起陳虛谷、吳濁流、楊守愚等同世代文人，要強烈、犀利得多。<sup>12</sup>

可恨的是統治者並不以擁有台灣為滿足，其侵略的觸角更延伸至對岸的中國大陸。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對中國展開有計畫的侵略，讓一水之隔的台人，本著同根生的情誼，更是憂心忡忡，葉榮鐘有感而發寫了〈聞燕北戰事〉：

風雨飄搖大九洲，杞天未陷鳥先愁。釜魚身世難自拔，也替人來抱隱憂。  
誰遣生涯作楚囚，教人啼笑兩無由。高樓袖手渾難已，熱淚盈眸未敢流。

13

沈鬱的詩風中，他以棄地遺民的心情，痛苦的寫出殖民國像一場暴風雨橫掃自己的文化母國——中國，然而身為釜中魚的我們，自身都難保，徒有滿腹的憂愁，也是愛莫能助，除有同病相憐之憾，更有楚囚相對之嘆，且礙於統治者的淫威只能將眼淚往肚裡吞，不敢表現出來。在日本軍部高壓統治之下，動輒得咎的台灣

<sup>9</sup> 葉榮鐘〈暴風雨，其二〉《少奇吟草》，同註2，頁96。

<sup>10</sup> 葉榮鐘〈暴風雨，其四〉《少奇吟草》，同註2，頁96。

<sup>11</sup> 葉榮鐘〈時事感作，其一〉《少奇吟草》，同註2，頁112。

<sup>12</sup> 廖振富〈不有真情不作詩—讀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台灣日報》民國90年4月12日。

<sup>13</sup> 葉榮鐘〈聞燕北戰事〉《少奇吟草》，同註2，頁114。

知識份子，眼看同胞被戕害，然而在充滿狐假虎威的現實環境中，感慨有志難伸，滿腹的無奈，只得忍氣吞聲，收起鋒芒，一日復一日迷糊過生活。在〈寄遂性兄〉詩中，他語重心長的說：

淒迷風雨怯清瞿，病後漸知惜此軀。曲筆陷人謠市虎，假威到處逞城狐。  
看天忍淚知無益，末世危言亦太迂。一策傳君須記取，鋒鋸斂盡學糊塗。

14

受異族統治下的台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的確沒有全然的生存尊嚴可言，爲了生存也只有採取因應之道，他們知道在何時要做表面虛應，裝糊塗，在何時應持守行爲分際。然而他們最終目標還是要抗日，還是要保存漢文化的傳統，這是日治時期作爲被殖民者不得不採取的應變手法。1937 年在日本軍部統治下的台灣，面對高壓與強權，知識份子的力量更是渺小，就像籠中鳥：“牢籠有恨，搏翮志難酬”<sup>15</sup>，插翅難飛、有志難伸，只能過著隱忍的生活。1938 年 9 月葉榮鐘〈生涯〉一詩，生動地描繪出包羞忍辱、草間偷活的心情：

生涯如此何堪戀。妄想登仙豈盡愚。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  
河山興廢誰能料。身世安危未可圖。萬事唯憑天派遣。得糊塗處且糊塗。

16

“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寫出了日本當局強徵台灣人民爲軍夫，而百姓仍須夾道忍淚歡呼的無奈和悲痛。難怪徐復觀會說“葉先生和台灣許多志節之士，當時處境之艱，秉性之烈，都由這一聯詩表達了出來，因而可永垂天壤”。<sup>17</sup>確實生活在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身份上始終擺脫不掉「認同危機」，日本／中國／台灣的多重擺盪。面臨的是雙重焦慮的情境，一方面來自於民族上的認同焦慮，即台灣／中國的血脈認同，一方面來自於統治國的認同焦慮。明知道當時所歡送的軍人是要到大陸去殘殺同根生的同胞，然而在高壓統治階級的監視下，卻不得不強忍淚水高呼萬歲，內心的矛盾、焦慮、無奈、掙扎，令人痛心疾首，悲苦異常，此時麻痺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裝糊塗，做個看不見的鴛鴦。處在這種非

<sup>14</sup> 葉榮鐘〈寄遂性兄〉《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26

<sup>15</sup> 葉榮鐘〈籠鳩〉《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24。

<sup>16</sup> 葉榮鐘〈生涯〉《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28。

<sup>17</sup> 徐復觀〈悼念葉榮鐘先生〉引自《葉榮鐘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2002 年 3 月初版），頁 164。

常時期，除要忍受物資匱乏的窘困外，精神上沒有出口恐怕才是最大的煎熬。而這種心靈上的磨難除了寄情於「詩」外，好像也別無他法，所以 1937-1943 年短短七年間，葉榮鐘寫了將近 150 首詩，佔其一生詩作的四分之一。葉榮鐘一生遇到如此的情景不知凡幾，他能用如此悲憤妥切的文藻來表達，可見他的中文造詣非常深。從這些詩作中，我們可看出他對文化與種族的祖國——中國，始終都有一股難以割捨之情愫，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有強烈的不滿，他堅持民族意識之操守，令人敬佩。

## 2.對知識份子的批判

葉榮鐘除了譴責日人的暴虐無道外，也呼籲台人要莊敬自強，自力救濟，尤其是有能力、有才華的知識份子，目睹同胞被欺壓，一定要挺身而出，為國家為社會盡心盡力。生在日據時代的葉榮鐘，在飽嚙家國之痛後，針對被異族統治所發出的感嘆，在《少奇吟草》中隨處可見：“國憲公權已不存，自由平等那堪論”<sup>18</sup>、“錦繡江山誰是主，蟬鳴鴉噪不勝悲。而今用武無餘地，轉悔吾生太後時。”<sup>19</sup>感嘆江山的易主，心中再多的吶喊與不願，徒換滿腹的愁思與無奈，讀書人義憤填膺，卻無計可施，只能慨嘆生不逢時。

可悲的是有部分不肖的舊文人，為了名利趨炎附勢，向殖民政府阿諛諂媚，以換取現實利益，毫無骨氣可言，為此葉榮鐘毫不保留地作詩予以嚴厲的批評。

舉世爭食肉，同胞任炭塗。卻忘因狗尾，累代長稱奴。（〈歲暮感作〉其四）

20

舉世顛連競避秦，解懸誰憫到斯民。莫言名士多於鯽，半是高樓袖手人。

（〈時事感作〉其四）<sup>21</sup>

他強烈抨擊那群重利忘義的知識份子，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無視苦不堪言的同胞，忘卻昔日被稱為「清國奴」的恥辱，只會空言理想、搖尾乞憐，或是袖手旁觀，無法將所學付諸行動，改善同胞的生活；更甚者為了名利，主動向日本執政

<sup>18</sup> 葉榮鐘〈時事感作 其三〉《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12。

<sup>19</sup> 葉榮鐘〈草山途上〉《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12。

<sup>20</sup> 葉榮鐘〈歲暮感作〉《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09。

<sup>21</sup> 葉榮鐘〈時事感作 其四〉《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12。

者屈顏奴行，甘心做一個背負著出賣自己同胞罪名的台奸。葉榮鐘在〈〈索居漫興〉其二〉一詩中，對貪圖虛名的人極盡嘲諷之能事。

張王李趙盡殊榮，京國人人識姓名。解得人間羞恥事，寧從窮巷了殘生。

22

1937年7月日本侵略中國，12月13日南京陷落，翌14日成立了偽華北臨時政府。台灣人之中，有人攢進偽政府，飛黃騰達，成為新貴。葉榮鐘感嘆這些忝顏媚日的無恥之徒，爲了得到更多的享受，主動投懷送抱與日本執政者妥協搖尾示好，表露出一副趨炎附勢、殘民自肥的走狗形象。葉榮鐘認爲理想的知識份子要擁有梅花般的傲人風骨與氣魄，在嚴寒的冬天仍是屹立不搖，一枝獨秀。

瘦骨能無受損傷，年來風雨太猖狂。梅花氣魄如名士，獨抱孤芳對夕陽。

23

讀書人面對強權的統治，應學習嚴寒氣候中的梅花，不畏嚴冬中的霜雪，越冷越開花。在混濁的亂世中，要能出污泥而不染，即使眾人皆醉我仍要獨醒，面對殘破的家國，更要有堅持忠貞的民族志節。葉榮鐘本身對日人就常流露出一股不妥協的意志”明知卵石終非敵，其奈填胸熱血何。”<sup>24</sup>身處殖民統治下的他，雖思有所作爲，然面對強大統治者的政治壓力，個人的力量何啻以卵擊石？雖無奈但義憤填膺，永不妥協，並且對逢迎權貴之徒，極其鄙視。

### 3.對國運的哀嘆

葉榮鐘既是詩人也是志士，從小因家境貧窮必須替日人工作，感受到台人與日人明顯的不同，而萌生民族意識。及長由於投入民族社會運動，南北奔波，更能看清現實社會的一切，因此在其詩作中處處可見感國憂時之情。身爲台灣人的他面對滿目瘡痍的家園，唏噓不已，不禁感慨原來美麗的蓬萊仙島，如今安在哉？”蓬島已非乾淨土，靈花何地一揚芬”<sup>25</sup>、“蓬島塵氛堆積久，合應一洗付

<sup>22</sup> 葉榮鐘〈索居漫興〉《少奇吟草》，同註2，頁138。

<sup>23</sup> 葉榮鐘〈春日遊萊園 其二〉《少奇吟草》，同註2，頁145。

<sup>24</sup> 葉榮鐘〈監房中 其三〉《少奇吟草》，同註2，頁113。

<sup>25</sup> 葉榮鐘〈詠靈芝〉《少奇吟草》，同註2，頁95。



洪流”、<sup>26</sup> 輕砂難築壘，污水竟成流。宜哉蓬萊島，年年事叩頭。”<sup>27</sup> 蓬萊本是傷心地，生作男兒鑄更差。”<sup>28</sup> 這是飽受殖民政府壓迫的心聲，詩句中難掩悲憤的情緒，及對日人強烈的批判。

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心理上仍以大陸作為自己的祖國，因此，對日本的侵華行為深感憂慮，然而面對強大的統治者，只能將無奈之情寄託在詩詞中。

側身天地嘆蹉跎，一事無成鬚欲皤。入座難塵拚命酒，繞樑且聽莫愁歌。  
肝腸破碎年未甚，風雨支離夜轉多。此夕歡娛非易得，雄心甘付管絃磨。

29

詩人感嘆自己年華漸逝，卻仍一事無成；眼看日本侵華行徑日趨嚴重，而抗日行動卻回天無力，志士內心的無奈與焦慮，唯有借著詩一吐胸中哀時感憤之積鬱，借著醇酒澆去心中塊壘，在這苦悶的時代裡，難得須臾的歡娛，姑且苦中作樂，借著歌舞給自己短暫的麻痺。在不滿日政權之餘，最渴望的便是殖民者的崩潰瓦解，以消解台民的困厄。在 1939 年除夕所寫的〈除夕感懷〉詩中即暗寓盼望日人戰敗之意。

忍淚還微笑，緘愁一欠伸。瓦全應有說，留眼看芳春。<sup>30</sup>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台人對回歸祖國的期待，是日趨濃厚，所以在亂世中，也都本著瓦全性命的心情，期待芳春的到來。這不但是葉榮鐘個人內心的期盼，也是台人的期待。葉榮鐘解釋這種情感“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正似川流歸海，絕無考慮選擇的餘地。”<sup>31</sup>

由於在日本殖民時代受盡各種壓迫及剝削，對祖國的態度基本上是異常期待的，然而詩人敏感的特質令他擔憂，當台人面對素未謀面的祖國，由於沒有實際的接觸與了解，憑藉著只是文化認同與想像，這樣一個漠然的觀念，在新政府接管之後，台灣又會變成怎樣的情形呢？一旦脫離敵人的魔掌，對不可知的未來，

<sup>26</sup> 葉榮鐘〈暴風雨〉《少奇吟草》，同註 2，頁 96。

<sup>27</sup> 葉榮鐘〈歲暮感作〉《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09。

<sup>28</sup> 葉榮鐘〈閨中雜詠〉《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11。

<sup>29</sup> 葉榮鐘〈蓬萊閣聽曲〉《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29。

<sup>30</sup> 葉榮鐘〈除夕感懷〉《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44。

<sup>31</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2000 年），頁 424。

反會悵然若失，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滿腹的悽愴之感油然而生。葉榮鐘在〈乙酉八月十五日〉詩中充分寫出台人複雜矛盾的心情：

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復轉悽然，三軍解甲悲刀折，萬眾開顏慶瓦全。  
合浦還珠新氣象，同床異夢舊因緣，莫言宿怨終須散，餘地留人與改悛。

32

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期間，台人忍辱包羞受盡欺凌壓迫，好不容易僥天之倖，能夠重見天日。然而喜悅的背後，卻是最深沉的無奈與擔憂，因為時局波濤詭譎，台人對投入祖國懷抱是好是壞，完全是未知數，葉榮鐘寫出了台灣人極端無助的心境：

我們對於祖國只有觀念而沒有實感，這個漠然的觀念，將來在新的統治機構下，會變成怎樣的現實呢？因為我們對祖國的實情隔閡無知，一旦脫離敵人的錄扣，反會惘然自失而有淒然的感覺。<sup>33</sup>

對祖國的陌生，及對未來的不可卜，台人的茫然與無奈充斥心頭，詩人的矛盾及憂慮並非多餘的。然而，比起日本政府，台灣人還是認同「祖國」的，在〈遊太湖橫雲公園〉詩中很清楚地看出葉榮鐘對回歸中國的喜悅：

水碧山青天蔚藍。天然圖畫人秋酣。今朝領略江南好。瀨戶日光不足談。

34

這首詩是以眼前的美景起興，1946年葉榮鐘隨著「台灣光復致敬團」前往中國，遊覽江南時，看到美麗的風景，不禁喜從中來，直說日本的瀨戶內海如何與中國的江南比擬，此詩表面上是寫景，實際上是表達復歸祖國的喜悅，而這也是戰後大部分台人在掙脫殖民統治之後渴望歸屬的普遍心理。

〈哀哀美麗島〉是葉榮鐘對原鄉台灣的嘆息，成稿於1961年，由於當時政治氣候的關係不敢發表，直到2000年再次整理出版時，才加入《少奇吟草》中。這首詩寫出了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與滄桑：

<sup>32</sup> 葉榮鐘〈乙酉八月十五日〉《少奇吟草》，同註2，頁181。

<sup>33</sup>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31，頁447。

<sup>34</sup> 葉榮鐘〈遊太湖橫雲公園〉《少奇吟草》，同註2，頁182

哀哀美麗島，吾人之故鄉；西臨台海峽，東面太平洋。恰如一撮土，拋至海中央；幅員雖侷促，物產甚饒豐。草木四時綠，稻穰兩季黃；天惠招凱覲，涎垂列諸強。荷蘭身手好，捷足先登堂；鄭家踵其後，撫有海南疆。生聚與教訓，三代繼稱王；無何明社屋，剃髮異冠裳。杌隍兩百載，義旗幾度揚；烏合雖不濟，氣焰頗囂張。清廷棄弗惜，日人獲寶藏；經營不遺力，崛起雄亞東。同胞受宰割，終日心惶惶；環顧無援手，身世劇淒涼。八年沐血戰，故土幸重光；滿望歸懷抱，悠悠來日長。何意不旋踵，禹域沒洪浪，本曾得喘息，飽受池魚殃。焚琴復煮鶴，百怪恣橫行；衣冠多魍魎，道路滿豺狼。港風肆披靡，海派復猖狂；芝蘭淪糞土，雞犬做堂皇。人心既大變，法令豈能防；劫財與姦殺，日日盈報章。何從救角爛，標語視仙方；未聞修破漏，先事漆門牆。大難橫眉睫，笙歌處處颺；對此長嘆息，憂思結中腸。<sup>35</sup>

座落在台灣海峽中間的台灣，原來是草木茂盛、物產豐富的島嶼。它的美麗竟招人覬覦，曾幾何時它成了傷心之地，變成一塊受創心靈的土地。”哀哀美麗島”道出了美麗寶島台灣四百年來的滄桑與無奈。從荷蘭人據台開始，經歷了鄭成功父子的經營，再到清廷的建省與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人的命運何其乖舛。日本人知道台灣是無盡的寶藏，努力開發竭盡能事剝奪，他們以台灣做為南進的據點，對台人的欺壓剝削，日趨嚴重。本以為八年抗戰勝利後，台灣人就有好日子過，不料國民政府來後，台灣的社會竟”百怪恣橫行”，處處充斥著怪現象，魍魎當道、豺狼橫行，人心不古，目無法紀，劫財姦殺，作奸犯科之新聞，每日皆有所聞。台灣幾成人間煉獄，讓人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將痛心憤懣之情，吐露在詩句之間。更悲哀的是，陳儀等執政者對台灣這塊土地不帶感情，無視百姓戰後困苦的生活，甚至藐視台人說：「台灣被日人統治五十年，只有低級人，沒有高級人員」。<sup>36</sup>他們在乎的只是「文化重建」運動，如何去「日本化」以達「中國化」，所以他們積極地推行國語運動及宣揚三民主義建設台灣的必要性。他們沒有憂患意識，有的只是剝削與享樂，因此隔江猶唱後庭花，一味的粉飾太平、夜夜歌舞昇平，一切的假象，再再令詩人痛心疾首，但也莫可奈何，除了嘆息還是

<sup>35</sup> 葉榮鐘〈哀哀美麗島〉《少奇吟草》，同註2，頁257。

<sup>36</sup> 林莊生、葉芸芸主編《葉榮鐘日記》（台中市：晨星出版，2002年3月初版），台灣光復致敬團旅行日記，頁245-246。1946年9月5日日記記載：中宣部副部長許孝炎、彭部長致辭時說的。

嘆息。這首詩用強烈的字眼寫出葉榮鐘對執政黨的憤怒與不滿，是台灣百姓對當權者蠻橫霸道的控訴。同是「鹿城三子」的周定山對此詩漫評為「筆致清順，而寄慨遙深。末段聲色俱厲，慨當以慷。」<sup>37</sup>

#### 4.二二八事件的傷痛

戰後，台人終於達成重返「祖國」懷抱的願望，卻因執政者的貪污舞弊，令台人失望與不滿，心情由極度的歡欣，轉變成悲痛、無奈、矛盾的複雜情緒。光復不到一年半，在 1947 年初，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白色恐怖」，接踵而來的是國民政府對台人施以鐵血鎮壓，對菁英份子的恐怖捕捉及大屠殺，一連串的事件讓台灣人錯愕、震驚，進而對祖國產生澈底的失望，此一事件對台灣文化界勿寧是晴天霹靂。回溯日據時代因為日本當局對台灣舊詩的寫作還抱持著相當寬容的態度，再加上統治者對漢詩的素養極其有限，因此這階段的作品中還是有許多抗爭意識極強，明顯地反映時局的作品。然「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後，面對和自己同樣具有漢文素養的執政者，大多數的台灣作家對國事不再熱衷了，從此退出社會文化活動的舞台，且為了保全性命大都噤聲不語。即使有任何反映時局之作，也都以相當委婉的手法，含蓄地表達。「二二八事件」讓充滿祖國夢的葉榮鐘悲痛異常，不但祖國夢想幻滅，更有著無限的悲哀，他感嘆的用筆寫出這個充滿仇恨、忿怒與恐懼的年代。

莫漫逢人說弟兄，閱牆貽笑最傷情。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寞，重重疑案未分明。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38

光復之初，台灣人欣喜若狂，全心全意要回歸父祖之國，卻不曾意識到，與祖國隔離五十年之久的自己，由於語言問題以及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事實，已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中國人。台灣人在日本與中國之間「兩面不是人」的「孤兒意識」鮮明的凸顯出來了，<sup>39</sup>「兄弟」一詞應是台人一廂情願的說法，無怪乎長官公署的接收政策，沒有充份地關懷及容納台灣人而在政治權力結構中給予相應的

<sup>37</sup> 葉榮鐘〈哀哀美麗島〉《少奇吟草》，同註 2，頁 257。

<sup>38</sup> 葉榮鐘〈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83。

<sup>39</sup> 呂正惠〈被歷史命運播弄的人們——論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引自陳義芝《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99 年初版），頁 9。

地位。國民政府歧視台人，作威作福，讓大陸來台的人士在機關中、工廠裡，擔任高級職位，對本地人才卻置之不用，造成台灣人失業率遽增，生活發生問題，內心的憤怒不平油然而生；加上貪官污吏的貪瀆事件，煙酒專賣的獨霸，不法行爲相繼產生，米糧外溢所造成的米荒，國民政府“予求予取擅威福”的霸道，讓本是同根生的台人，在忍無可忍之下，終於釀成難以收拾的悲劇。“閱牆貽笑最傷情”，誰也不願意看到兄弟反目成仇，然而太多的欺壓與不平，終於造成這道歷史的傷痕。更可恨的是“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執政者對罪魁禍首的包庇、對事實真相的隱瞞，再再讓詩人痛心疾首。

槍聲繁密雨聲聞，事出無心有意間。謠詠紛紜三市虎，輿情顛倒一街山。  
莫言攻守皆兒戲，直把肝腸動八蠻。誰起龍蛇搖地軸，罪魁功首屬紅顏。

40

陳儀政權展露征服者的猙獰面目，運用「權謀術數」來修理台人，是非顛倒、謠言滿天飛。整個事件的發生看似無心、偶然，但事件的擴大卻是「有意」的。3月2日台中市民響應支援台北市民，以實際行動解除台中市及近郊的軍政機關的武裝，並加以接收控制，而外省籍的公務員也被集中看管，整個中部地區的抗爭活動就是由左翼的謝雪紅帶領的。事發後，葉榮鐘眼看大勢已去，爲保命也只好辭去他一生唯一的公職，有詩爲憑：

河山光復甫經年，世道人心劇變遷。談虎有人皆色變，攫鱗無士不身捐。  
莫愁讒間工如蠹，祇恐貪污行似羶。保住頭顱稱萬幸，一官值得幾文錢。

41

國民政府如「虎」的淫威，讓人驚懼、不安，“談虎有人皆色變，攫鱗無士不身捐”，誰要攫了陳儀的逆鱗，就會遭到秘密逮捕、槍殺；遇有反亂嫌疑的人士，也都要加以拘捕，當局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遺漏其一。台灣人對執政黨的貪婪殘酷與鎮壓事變時的凶狠毒辣，雖有極深的憎恨與惶恐，但在國府戒嚴高壓體制下，除了偶爾私下吐露幾句憤懣之詞外，只有噤默不語，不敢聲張。“保住頭顱稱萬幸，一官值得幾文錢”：葉榮鐘明白，此時靜默無言，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

<sup>40</sup> 葉榮鐘〈三月二日〉《少奇吟草》，同註2，頁183。

<sup>41</sup> 葉榮鐘〈步讓友書感原韻〉《少奇吟草》，同註2，頁184。

事件發生後，看清現況的知識份子不再出聲了，他們敢怒卻不敢言。較消極者，只能在政治箝制下，過著醉生夢死、自求多福的生活，或是學習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掛冠求去。像葉榮鐘的好友莊遂性，二二八事變時，正好擔任省立台中圖書館的館長，事情發生時，他被逮捕了，後幸獲釋放，但他從此高唱「歸去來兮」，退居斗六鄉間經營「大同農場」，過著「晴耕雨讀」的隱遯日子，不再過問世事了。較積極者，也只能以含蓄、隱微的手法來抒發內心的苦悶。葉榮鐘在此次事件雖倖免於難，但鑑於日治時代與之來往密切的眾多好友、文化人、作家在此次事件中死的死，逃的逃；且接踵而來的五〇年白色恐怖的政治肅殺氣氛，更迫使他不得不停止政治活動，躲在金融機構的象牙塔裡避難。然而他並沒有因此忘懷台人所受的委曲與苦難，在「捨我其誰」的正義感驅使下，他選擇用“史家之筆”<sup>42</sup>寫出這個時代的真相及哀痛。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將何去何從，已無法預料了，整個政治氣氛是令人驚恐無奈、害怕的。葉榮鐘的詩作中，反映了台人對國民政府的失望、不滿，更透露出人們內心的不安與自危。此時期的詩作大都是隱微的諷喻詩，如 1950 年 6 月 28 日作的〈五十誕辰感作〉：

守分安貧五十春，今朝自祝亦自瞋；文章嚮往清新意，朋友唯求道義親。  
除卻圖書無長物，只知箕帚是家珍；駸駸歲月催人老，酬世微忱訖未伸。

43

五十歲的他，眼看年華漸老去，雖壯志未伸，然而外界的風風雨雨已不容他再過問了，現在的他在乎的只是圍繞在他身邊的親情、友情及詩書。1950 年夏天他又藉〈霪雨兼旬小園花草狼藉不堪〉詩作，一吐他內心的感受與寄望：

連宵雨打又風吹，滿目瘡痍亦可悲；猶有宿根摧未了，春來還可競芳菲。  
飄紅墜紫遍東籬，憔悴庭花慘不支；剩得劫餘三兩朵，牆根猶托可憐姿。  
索居苦雨悶生時，卻為殘紅賦小詩；便即化泥香不減，流風餘韻繫人思。  
蕪穢寧甘冷眼窺，得時蔓草正蕃滋；栽培畢竟非容易，缺葉殘支慎保持。

<sup>42</sup> 林莊生著〈葉榮鐘先生〉《懷樹又懷人》（台北市：自立晚報社，1992 年 8 月第一版一刷），頁 238。

<sup>43</sup> 葉榮鐘〈五十誕辰感作〉《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88。

本組作品是由四首七絕構成的，葉榮鐘藉詠物以寄情，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像那連夜肆虐的暴風雨，將台人摧打如滿園的花草殘敗不堪，然而台灣人不會倒下來，因為：“猶有宿根摧未了，春來還可競芳菲”，葉榮鐘相信台灣人的肉體是受難了，但堅毅的精神不會因險惡的時局而低頭，只要春天來了仍會綻放出美麗的花朵，吐露芬芳的氣息。“便即化泥香不減，流風餘韻繫人思”：那些已死於非命的台灣菁英份子，他們遺留下來的精神典範永存後人心中。“栽培畢竟非容易，缺葉殘支慎保持”：雖然目前礙於局勢，無法迎風招展，然而有志之士，只要不氣餒，內心保有那份為台灣打拚的心，等到適當的時機仍舊有撥雲見日、揚眉吐氣的一天。

二二八事件後，葉榮鐘轉任彰化銀行，從此視官宦為畏途，所以 1948 年蔣介石聘他為省參議員時他推辭了，接著又婉拒民社、青年兩黨之聯合提名為監察委員。葉榮鐘寧願作棄材，也不願接受政治籠絡的心情，在他 1965 年所寫的七絕〈孤樹〉中表露無遺。

喬木孤高顧影哀，無情風雨漫相催；斧斤逃得誠多幸，苟活何妨作棄材。

從他的心境可以看出日據時代轟轟烈烈為民請命的志士，在回到祖國懷抱後，因現實環境的關係，都銷聲匿跡無所作為，甚至為了活命只能變成失聲的一代了。這首詩他採用櫟社傳統的作詩方法，即表面上以詠物為主，實際卻以曲折隱晦來表達其思想感情，這種保守性完全是當時政治環境下的一種保護色。在日據時代葉榮鐘因不願侍候殖民主，作「棄材」是自己有意的選擇；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台初期，是欲為所用而不被用，做「棄材」是被動的，<sup>46</sup>但二二八事件後，拒絕官聘，寧願做棄材明哲保身，已經轉為自願的。葉榮鐘這段時間的心境轉變，雖然耐人尋味，但應可理解。

對葉榮鐘及與他同時期的知識份子而言，日據時代，他們抵抗異族殖民統治，精神上依恃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肯定，特別是儒家思想；政治上，追求的

<sup>44</sup> 葉榮鐘〈霪雨兼旬小園花草狼藉不堪〉《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88。

<sup>45</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 2，頁 233。

<sup>46</sup> 參洪銘水〈《少奇吟草》—跨越世代的見證〉《少奇吟草》，同註 2，頁 62。

是西方近代議會民主政治的理念。戰後初期，他們這群具有現代市民意識的社會精英份子，天真的以為隨著光復就可以結束台灣人苦難的日子，然而祖國政府官僚接收台灣後所表現的腐敗，以及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蠻橫暴烈，無異全盤否定他們前半生的執著與付出，這是他們情感上無法接受，現實中又不能不屈服的無奈。葉榮鐘在 1943 年所作的〈夜得負人讓友空便感作〉詩中的“餘生祇合三緘口，去死猶懷一寸心”<sup>47</sup>，最能代表此時知識份子對祖國政府的絕望與無力感。

葉榮鐘 1974 年所寫的作品〈感事〉組詩，時值戰後戒嚴時期，此詩以全體台灣人的命運為關切焦點，流露出強烈的台灣意識：

送虎迎狼四百年，斯民命運實堪憐。揮戈抗暴流鮮血，斬棘披荊闢美田。  
只望兒孫能挺立，何期兄弟竟相煎。嗟余齒髮垂垂老，解脫端宜待後賢。

48

“送虎迎狼四百年，斯民命運實堪憐”，他感嘆台灣在短短四百年間歷經多次的政權更迭，連本是同根生的國民政府也和其他的統治者一樣，對台灣人來說都可以虎狼視之，送走了日本這隻猛虎，迎來的卻是國民黨這隻豺狼，四百年不斷送虎迎狼的日子，台灣百姓是何其可憐啊！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句話，較諸先前孺慕情深寫下的“雲海茫茫路幾千，首都今日拜先賢，瓣香默禱邦基固，不訴辛酸五十年。”<sup>49</sup>不但有今非昔比之嘆，從中更可看出台灣文學已從「孤兒意識」轉變到「台灣主體意識」。“揮戈抗暴流鮮血，斬棘披荊闢美田”：昔日先民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必須揮動干戈抵抗暴力，甚至流出腥臊之血；也為了生活往往披荊斬棘，開闢良田；“只望兒孫能挺立，何期兄弟竟相煎”：如此辛苦的耕耘，無非是希望子子孫孫能安居樂業，過著安穩的日子，沒有想到這一切的努力，竟在二二八事件時兄弟互相殘殺，損失殆盡，“嗟余齒髮垂垂老，解脫端宜待後賢”：詩人感嘆自己年華已逝，縱然有滿腔的熱血，也是心有餘力不足，台灣要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只有寄望後代子孫了。這首詩表達了詩人對歷史無限的感傷以及對下一代台灣人的期許，那種歲暮途窮之感讀來不覺愴然。除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外，“生死難忘唯一事，同胞何日網羅除。”<sup>50</sup>、“世事不堪明眼視，何

<sup>47</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76。

<sup>48</sup> 葉榮鐘著〈感事〉《少奇吟草》，同註 2，頁 242。

<sup>49</sup> 葉榮鐘著〈南京謁中山陵〉《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81。

<sup>50</sup> 葉榮鐘著〈六十感懷〉《少奇吟草》，同註 2，頁 213。



妨曠曠過朝朝”<sup>51</sup>、“偌大天空無去處，偏來掩月蔽光輝。”<sup>52</sup>也都點出戒嚴時期，台灣言論行動的不自由，這是台灣人的悲哀，也是葉榮鐘轉而投入金融界的最大原因。

從以上詩作可以看出原本在日治時期，極為強烈的民族意識，在戰後由於對“父祖之國”美夢的幻滅，逐漸萌生鮮明的「台灣主體」意識。研讀《少奇吟草》有助於辨析日治迄戰後台灣文學精神的傳承與思想意識的轉變。<sup>53</sup>

## (二)親情的流露

洪銘水老師是研究葉榮鐘的權威，他在〈葉榮鐘的《少奇吟草》—跨越語言一代文化人的見證〉一文中，對葉榮鐘的漢詩有其獨到的見解，尤其在葉榮鐘的感情方面，他寫出葉榮鐘較浪漫的一面，但對其家人談論較少，所以筆者在「真情的流露」這一部份，就是針對他與家人的感情為主，以補洪老師之不足。

### 1.對妻子的款款深情

葉榮鐘的詩作，對妻子的情感表達，是常見的題材，詩歌中有許多令人動容的作品出現。葉榮鐘與夫人施纖纖是在 1931 年 4 月結婚的，剛結婚時他寫了《題纖君柳蔭雙燕交舞刺繡圖》一詩，表達自己對婚姻生活的期許。

衝風冒雨更何愁，祇願于飛到白頭。不羨紅樓棲息穩，柳蔭交舞自優遊。

54

“衝風冒雨更何愁，祇願于飛到白頭”：是葉榮鐘對妻子的承諾，他相信只要兩情相悅，即使風吹雨淋，也要比翼雙飛直到白頭偕老。葉夫人出身富裕的家庭，且受過良好教育，“不羨紅樓棲息穩，柳蔭交舞自優遊”：句中透露施纖纖女士對感情的執著，不羨慕富貴人家的享受，寧願和兩袖清風的葉榮鐘廝守一輩子。由於妻子的身體不好，而他又經常爲了民族社會運動“長年浪跡江湖上”<sup>55</sup>，所

<sup>51</sup> 葉榮鐘著〈病眼〉《少奇吟草》，同註 2，頁 214。

<sup>52</sup> 葉榮鐘著〈中秋夜月被雲掩〉《少奇吟草》，同註 2，頁 216。

<sup>53</sup> 參廖振富〈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2 卷，（台中：東海大學文學院，2001 年 7 月），頁 353。

<sup>54</sup> 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11。

<sup>55</sup> 葉榮鐘〈示內子〉《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12。乃 1931 年作品。

以對妻子的疼惜與關懷，就常流露在詩作中。1933年6月的〈示病妻〉，更可看出葉榮鐘對妻子的愛憐：

人如美玉命如絲，誰遣顛連臥繡帷。瘦盡腰肢悲阿母，衰殘顏色怯癡兒。  
兩情能洽貧何怨，一息猶存病可醫。我未成名卿未老，迴紅轉綠豈無期。

56

葉夫人從年輕時身體就不好常生病，從《葉榮鐘日記》中不時可看到葉夫人受病痛之累的記載。從1931年結婚後葉榮鐘一直奔波於社會運動與報社間，加上經濟狀況也不是很好，無法常伴身旁給她最好的照顧；可是葉夫人從沒怨言，反而是無怨無悔的為家庭奉獻，因此葉榮鐘對妻子的操心、疼惜常表露在詩詞文字之間“人如美玉命如絲，誰遣顛連臥繡帷”；妻子容貌姣好，惜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常臥病在床，葉榮鐘對她的感情非但不受影響，反而安慰妻子，“兩情能洽貧何怨，一息猶存病可醫”；只要夫妻恩愛，生活苦一點又何妨；“迴紅轉綠豈無期”：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治癒的機會。

看到妻子拖著瘦弱的身影，為著家事而操勞，憐惜的、愧疚的詩句時有所見，如“料得細君廚下立，定將搗飯餵癡兒。”<sup>57</sup>“憐伊嫁得窮夫婿，井臼親操骨似柴”<sup>58</sup>、“白頭偕隱他年計、敝帚猶珍此日情。強飯加餐相共勉，同留老眼看昇平。”<sup>59</sup>。他倆歷經了殖民統治、國民政府、二二八事件……等動盪的時代，然困厄的日子，讓他們患難與共的真情，更深厚更堅固，“人生有限情無限”：人生雖短暫，只要夫妻鸞鶼情深，如此的人生當無憾也，他常寄望與妻子白頭偕老，共看太平盛世的到來。葉榮鐘晚年不幸罹患癌症，手術後葉夫人悉心的照顧他，感動之餘寫下了〈病後〉一詩：

病後扶持感老妻，起居動作賴提攜。老來竟學時麾態，把臂並肩過路西。  
貧賤夫妻亦夙緣，相親相敬更相憐。即今華髮垂垂老，恩愛未應讓少年。

60

<sup>56</sup> 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2，頁115。

<sup>57</sup> 葉榮鐘〈江原途上懷歸〉《少奇吟草》，同註2，頁119。乃1933年作品。

<sup>58</sup> 葉榮鐘〈索居漫興〉《少奇吟草》，同註2，頁138。乃1939年作品。

<sup>59</sup> 葉榮鐘〈銀婚有感〉《少奇吟草》，同註2，頁138。乃1956年作品。

<sup>60</sup> 葉榮鐘〈病後〉《少奇吟草》，同註2，頁256。

葉榮鐘對妻子的疼惜，情深意重，在離婚率如此高的現今，不但令人羨慕，也足以做為年輕夫妻的表率。葉榮鐘前半生叱吒風雲地奔走社會運動，如此的血性男子，私底下還是有其溫柔體貼的一面，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葉夫人的賢淑，才能讓夫妻的感情老而彌堅。在古典詩中，葉榮鐘與女性的互動相處，顯然較能跳脫傳統大男人立場，不再將女性視為次等、從屬的「第二性」，而能給予相當的尊重和疼惜<sup>61</sup>，所以有關兒女私情的詩作在《少奇吟草》中佔了不少篇幅。

## 2.父子情深

除了對伴侶的深情之外，葉榮鐘對於兒女的疼愛也盡化做筆下的無限柔情。葉榮鐘育有二子三女，長女葉蓁蓁出生時身體就很差，加上葉榮鐘因工作的關係，常到處遷徙，時而南、時而北，別離的機會很多。尤其 1940 年葉榮鐘調任東京分社長時，全家遷往日本，因戰爭關係，人手不足，必須把她留在台灣給外婆帶，葉榮鐘見女兒到車站送行時依依不捨的表情，不禁悲從中來，在車中寫了〈別女〉七律一首：

萬方多難悵臨岐，覓食他鄉事可悲。有限光陰消逆旅，無多骨肉忍分離。  
風塵那得忘憂地，桑梓愁當絕米時。一笑驛亭緘別淚，傷心未便使兒知。

62

人生最苦莫過於生離死別，但迫於生計必須就職外地：“萬方多難悵臨岐，覓食他鄉事可悲”。雖然心中有許多的不願，也無可奈何：“有限光陰消逆旅，無多骨肉忍分離。”；只好強顏歡笑，安慰女兒，私底下傷心的淚水還是奪眶而出：“一笑驛亭緘別淚，傷心未便使兒知”。他非常疼愛葉蓁蓁，因此在特殊場合寫了不少與之有關的詩，如：《人止關同蓁兒作》、《送蓁兒飛日》、《蓁兒在東京結婚喜賦》、《蓁兒弄瓦喜賦》、《送翠玲外孫女飛日》、《蓁兒來信謂翠玲外孫女相念》，凡是生日、結婚、生女……，只要和蓁蓁有關的他都會賦詩，只是納悶，葉蓁蓁不幸於 1967 年 10 月病逝東京，葉榮鐘並沒有賦詩，或許是太悲傷，儘量不去碰觸此問題吧！不過從他寫給女兒、外孫女的多首作品中，不但讀者可感受到那股

<sup>61</sup> 參廖振富〈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2 卷，同註 52，頁 355。

<sup>62</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49。

濃濃的親情，也可看出他沒有傳統男人「重男輕女」的觀念。

長子葉光南 1961 年台灣大學化工系畢業後，1963 年赴美留學，留美期間葉榮鐘寫了很多家書給他，除了閒聊家中的大小事外，也常將寫作的心得與感觸和兒子分享。父子分隔兩地，除了借魚雁往返外，有時也難奈相思之苦，只好借詩歌抒發自己對兒子的思念，1966 年 2 月 28 日夜深人靜，忽然憶起遠方的兒子，思念之餘寫下了〈雨夜懷貫兒〉：

淒風冷雨釀春寒，燈下攤書到夜闌。忽憶佳兒天際外，錦衣何日慰衰殘。

63

寒夜颼颼，對親人的思念更甚，想到遠在異國為前途打拚的長子，除了祝福外，莫過於希望他早日衣錦還鄉，重享天倫之樂。

本著「不有真情不作詩的原則」，葉榮鐘擅長在淺白如話的詩句背後，蘊藏溫馨的情致。因此不論是夫妻患難相依的溫潤情懷，或是面對兒女的慈眉善目，讀來都有沁人脾胃的感人效果。

### (三)對師友的追念

#### 1.對師長的感念

##### (1)施家本

施家本，字肖峰，為鹿港抗日名孝廉施仁思之哲嗣。幼時家貧，但天資穎異，曾擔任鹿港公學校的教職，是葉榮鐘公學校二年級的導師，對葉榮鐘一生的影響非常大。由於他的提攜，葉榮鐘才得以獲林獻堂等人的青睞，並伸出援手來幫助他留學東瀛。在 1960 年 7 月所寫的〈重讀櫟社第一集肖峰詩草〉詩中，可看出葉榮鐘對恩師的感恩之心，真摯的情感洋溢在字裡行間：

雛鶯學轉憶當年，隨處遊蹤是稱筵。口授新詩猶記得，遺篇重讀一潸然。

---

<sup>63</sup> 葉榮鐘著〈家書——寫給旅美子女的信（1963-1978）〉《葉榮鐘年表》，同註 17，頁 95。

“離鶯學囀憶當年”：他感激少年時施家本對他的教誨，讓他的學識因而豐富起來，他說：“他輸給我們的知識，雖然是片斷的沒有系統的，但我們透過他的媒介，纔能夠呼吸外界新鮮的空氣，也纔能接觸到時代的潮流。”<sup>65</sup> 由於施家本在精神和人格上的啓發，葉榮鐘的民族思想得以覺醒，奠定他日後活躍在民族社會運動的決心，施家本功不可沒，所以日後重讀恩師的遺作時，睹物思人，勾起了無限的回憶，不禁淚流滿面不能自己。1965年7月葉榮鐘以「凡夫」為筆名寫了〈詩人施家本——記一個未完成的天才〉一文表達對恩師的追念與感激，並為老師命運的抑塞感到嘆息。對於施家本在日據時代短短一生，尙未及施展長才即含恨而終，葉榮鐘感慨的說：

以他的才氣和人緣，是不難在所謂御用紳士圈裡得勢，進而弄到『煙酒批發』或『阿片小賣』等特權來安定生活的，但他卻能君子固窮，無所染指。

66

施家本一生坎坷不遇，卻能過著清苦的日子，如沒有堅定的民族意識是不容易的，他對葉榮鐘的影響非常大，難怪面對浩瀚的師恩，葉榮鐘只能自謙「凡夫」了。徐復觀曾做文章形容葉榮鐘的個性“淡泊名利，重行誼，尚節概，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自己的文化，更有那一份熱情豪氣”<sup>67</sup>這不也是施家本的翻版嗎？

## (2) 林獻堂

林獻堂（1881-1956），台中縣霧峰鄉人，諱大椿，號灌園，是前清舉人東候補道台林文欽的長子。他一生行誼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作非分之想，不屑作鑽營爭取之事。誠如葉榮鐘說的：

林氏一生行誼，可以說是一個不忮不求、庸言庸行中國傳統的君子。<sup>68</sup>

林獻堂是1910年加入櫟社，他對櫟社的活動非常熱心，也使櫟社從一個遺老性

<sup>64</sup> 葉榮鐘《少奇吟草》，同註2，頁216。

<sup>65</sup> 葉榮鐘著〈詩人施家本〉《台灣人物群像》，同註31，頁295。

<sup>66</sup> 葉榮鐘著〈詩人施家本〉《台灣人物群像》，同註31，頁299。

<sup>67</sup> 參徐復觀〈悼念葉榮鐘先生〉引自《葉榮鐘年表》，同註17，頁163。

<sup>68</sup> 葉榮鐘著〈林獻堂先生簡歷〉《台灣人物群像》，同註31，頁35。

質的社團，轉變為許多社員積極參與台灣民族運動，櫟社因此染上一層濃厚的政治色彩，社運亦因之鼎盛，林幼春題名碑記曰“提攜羽翼又灌園之力為多”<sup>69</sup>。葉榮鐘二次接受林獻堂資助赴日讀書，回台後又擔任他的秘書，甚至 1941 年也在他的引進下加入櫟社成為第二代社員。葉榮鐘追隨林獻堂四十年，林獻堂對他亦父亦師亦友的情誼，是他一輩子難忘，所以《少奇吟草》中有多首詩與林獻堂有關，當中也有不少是互相酬唱之作。其中 1961 年 3 月〈灌公年譜編成感作〉，是葉榮鐘對林獻堂最崇高的禮讚，其一：

功業寧須記，三台盡口碑；滄桑資閱歷，憂患是生涯。孽子孤臣恨，池魚檻虎悲；書成長太息，庸筆負深期。

其二

爭取民權日，流言播四郊；分庭抗異族，團結籲同胞。羅網漫天佈，晨鐘特地敲；初懷雖不遂，心血豈徒拋。

其三

文協開風氣，先生遠慮周；虛懷徵眾議，折節挹時流。夷夏千秋別，斯文一線留；衣冠仍漢族，賴有管公謀。

其四

群倫推領袖，本色是書生。重厚根天性，寬仁出至誠。高飛緣底事，客死最傷情。深意吾能識，臨終喚小名。<sup>70</sup>

這四首五言律詩，寫盡了林獻堂一生為台人奔波請命之事。“群倫推領袖，本色是書生。重厚根天性，寬仁出至誠”：在整個日據時代他扮演台灣民族運動領導者的角色，他是一位有良心的知識份子，也是一位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政治大哥」<sup>71</sup>。他不像一般政客不擇手段地作政治投機，在日人統治半世紀中他始終堅持一種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並且對祖國的政治認同亦是明確不移的，舉凡一

---

<sup>69</sup> 鍾美芳〈櫟社的組織與活動〉《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上)《台北文獻》，第 78 期，同註 1，頁 281。

<sup>70</sup> 葉榮鐘著〈灌公年譜編成感作〉《少奇吟草》，同註 2，頁 216-217。

<sup>71</sup> 葉榮鐘、林快青〈林獻堂的事蹟與台灣抗日運動對談會記錄〉《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31，頁 197。

切政治社會運動凡是出於民族意識而且符合民族良心的，他都願意參與。其一生為台灣人爭取福祉，與台灣同胞甘苦與共的心，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萬萬沒想到回歸父祖之國後，屬於「祖國派」的他，竟落得離鄉背井，漂泊異國，抑鬱以終。“高飛緣底事，客死最傷情”道盡林獻堂內心的感慨與悲哀，有家歸不得的苦悶。“深意吾能識，臨終喚小名”：四十年的相處，他對葉榮鐘的疼愛及倚重一如己子，難怪臨終前還頻頻呼叫葉榮鐘的名字。林獻堂對葉榮鐘的一生行為處世影響非常大，因此葉榮鐘記述林獻堂的詩文也特別多，字裡行間處處可見他對林獻堂的愛戴及敬意。

### (3)林幼春

林幼春（1880-1939），名資修，號南強，出生於福州，早年有神童之譽，在台灣詩壇上與胡南溟、連雅堂並稱日據時代三大詩人。<sup>72</sup>與林癡仙、賴紹堯是櫟社的發起人。葉榮鐘認識林幼春，是在1918年接受林獻堂資助赴日之前，但接觸較頻仍是葉榮鐘從東京回台，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後，當時林幼春是文協的協理，對葉榮鐘格外垂青，因此他倆成了忘年之交。<sup>73</sup>作詩方面葉榮鐘曾拜他為師，在技巧上也多所請益，1939年所寫的〈哭幼春先生〉一詩可看出他倆的師徒情誼：

看天忍淚更何言，碩果於今並不存。病骨卅年肩眾望，詩才一代仰彌尊。  
常將倒屣迎寒士，曾見昂頭入獄門。近許傳箋稱弟子，傷心豈獨為私恩。

74

林幼春學問淵博，才思敏捷，由於身體孱弱，平生寫作不多，但他的詩名卻倍受台人及日人的青睞，楊雲萍盛讚他是「台灣三百年來最卓絕的詩人之一」<sup>75</sup>，如此優秀的人才竟英才早逝，讓人不勝惋惜，所以葉榮鐘說：“看天忍淚更何言，碩果於今並不存”，幼春先生二十餘歲就患肺病，孱弱多病，一直是同志中引以為憾的。對他的詩才，葉榮鐘認為「夫子之牆九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除

<sup>72</sup> 鍾美芳著〈櫟社的成員分析〉《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下）《台北文獻》，第79期，同註1，頁19。

<sup>73</sup> 葉榮鐘著〈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台灣人物群像》，同註31，頁239。

<sup>74</sup> 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2，頁141。

<sup>75</sup> 廖振富〈台灣中部地區的古典詩人及其作品〉《國文天地》第16卷9期（台北市：2001年2月號），頁57。

了敬佩還是敬佩。”常將倒履迎寒士，曾見昂頭入獄門”：幼春先生對後進之士的提拔不遺餘力，尤其是寒門子弟，像葉榮鐘與楊遠都曾受他的提攜，林幼春和林獻堂都屬「祖國派」人士，對祖國的政治認同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民族運動的陣營裡，他可以說是“魯殿靈光，民族精神的燈塔”<sup>76</sup>。由於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介入太深，因此在「治警事件」時被捕入獄，對入獄充滿昂然不屈的瀟灑意態，甚至其在獄中所作之詩充分顯示其不惜一死與殖民政權相抗的意志，這是堅定的民族意識使然，所以葉榮鐘說他是「台灣民族詩人」<sup>77</sup>。”近許傳箋稱弟子，傷心豈獨為私恩”，對幼春先生的逝世，不只是弟子葉榮鐘難過，也是全台人的損失。對幼春先生的感念之心，一直是耿耿於懷，所以 17 年後再次祭拜林幼春墓時所寫的〈謁南強先生墓〉詩，詩中仍充滿感懷之思，“縱使音容難再接，葵傾不改舊時衷”、“可憐獮祭三更後，得句憑誰為點金”<sup>78</sup>，他對恩師才華的嚮往，並不因時間的久遠而減弱，如今最感傷的是文章做成後已沒人爲他潤飾了

## 2.對好友的哀悼

當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的一群曾爲台灣出生入死的好友，陳炳、林茂生、林連宗、王添燈……等，他們都是文化人或作家，很不幸的都在此事件時被捕被槍斃，爲此他強忍心中的悲憤，暗地裡用血淚寫出那驚心動魄的時代中無言的憤怒與喧囂，一系列弔念「二二八」受難朋友的詩，反映對台灣人才斷喪的惋惜與悲憤，如〈哭若泉兄〉，這是針對好友陳炳而寫的：

一命嗚呼枉死城，沉冤千古豈能平。慣將強項招猜忌，恥作奴顏乞苟生。  
猶憶苦言侵客夢，難忘佳句賦離情。惶惶舉世爭緘口，不禁臨風哭失聲。

大公台託傾心血，險阻艱難廿一年。事業留人供宰割，遺軀入地或安全。  
莫因慘史疑光復，頗信天堂奏凱旋。舉國輿情都憤激。茫茫恨海幾時填。

79

<sup>76</sup> 葉榮鐘著〈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31，頁 243。

<sup>77</sup> 葉榮鐘著〈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台灣人物群像》，同註 31，頁 237。

<sup>78</sup> 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 2，頁 206。

<sup>79</sup> 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 2，頁 184。



陳炘（1894-1947），號若泉，大甲人，早在日本慶應大學讀書時，就加入新民會<sup>80</sup>，畢業後再到美國深造，專攻金融經濟，是台灣人留美的先驅。愛做詩，但從不參加詩社或擊鉢會。返台後參加台灣文化協會並擔任講師工作，又於1925年與林獻堂創立了大東信託公司，存心要和台灣的日人金融資本家分庭抗禮，而且是有意識的要侵襲日人的特權，葉榮鐘稱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抗日份子”<sup>81</sup>。國府時期理應被新政府獎勵的陳炘，竟然被陳儀與御用紳士之流一起逮捕，令人有玉石混淆的感覺。究其原因可能是國府時期他發起創設大東公司，因成立之迅速與資金之龐大，給新來的統治者陳儀精神上莫大的威脅，加上與國民黨江浙財團利益衝突而遭忌，後雖被釋放，但二二八事件後的3月11日竟“一命嗚呼枉死城，沉冤千古豈能平”，不知去向，有人說他被暗殺了。“惶惶舉世爭緘口，不禁臨風哭失聲”，獲悉陳炘落得如此哀淒的下場，葉榮鐘心中的悲痛自不在話下。早期他們都是新民會的一員，接著又是台灣文化協會、大東信託公司、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到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台灣光復致敬團代表，一路走來他和葉榮鐘交情匪淺，是同一戰線，皆以爭取台灣人民的福祉為目標，沒想到如此的民族鬥士，竟殞落在二二八事件中，和陳炘如此多年交情的葉榮鐘，對其英年早逝能不扼腕嗎？”舉國輿情都憤激。茫茫恨海幾時填”除了哭弔陳炘的死於非命，也替二二八事件中冤死的靈魂，提出強烈的控訴。

另一位他的好友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也是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他是穿著睡衣被逮捕，捉去後就一去不回，不知去向，真正死因至今猶為懸案。哀悼好友的驟逝，葉榮鐘寫了〈弔耕南先生〉：

國事遙知志已灰，無端函電苦相催；平生講學稱淵博，亂世高明犯忌猜。  
差不多官高一切，莫須有罪遍三台；滿城風雨人爭避，何必自投羅網來。

82

林茂生（1887-1947），號耕南，屏東東港人。1916年自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畢業，是台灣第一位文學士。在留學東京期間，與台灣留日學生相處，頗受歡迎。1915

<sup>80</sup> 葉榮鐘著〈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活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年8月），頁108。

<sup>81</sup>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31，頁449。

<sup>82</sup> 葉榮鐘著《少奇吟草》，同註2，頁184。

年春，居住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成立了「高砂青年會」<sup>83</sup>，林茂生被推為首任會長。“平生講學稱淵博”：1916年返台後他執教台南長老教會中學，又兼教於台南師範學校及台南高等商業學校。並參加文化協會，被選為評議員，是重要分子之一，也是講習會及夏季學校的講師。不過日人對台人同樣是高學歷者仍懷歧視，待遇不平等，林茂生對此心懷不平<sup>84</sup>，所以1927年再度赴美留學，1928年11月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是台灣人第一位博士。返台後任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一生作育英才無數。葉芸芸據吳濁流的回憶轉述說：林茂生在日據時期抗日並不積極，因他一心巴望日本當局垂青賞識，畀予高的教職，生怕觸怒總督府，壞了生平大願，所以連初期文化協會的啓蒙文化活動也不熱中，為此吳三連等人還曾在《台灣青年》等刊物上撰文指責林茂生的不是。然而終日據時期他並未如願得到高的職位，“亂世高明犯忌猜”：一俟光復，他雀躍不已，趕忙向百姓及祖國表態，惟恐晚搭了「光復號」的巴士，終於如願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同時也是台灣省教員甄選委員會委員。除了授課外，他還擔任《民報》的社長，《民報》勇於揭露當時政治社會的黑暗，為民喉舌，對於權勢當局的貪污、社會上的不公不平，毫不客氣地加以指責批評，使得林茂生得罪當道，為行政長官陳儀所不諒解，這可能就是 he 受害的原因之一。第二個原因可能是為了搶做台大文學院院長與對手有糾葛，被借刀除去了。第三個原因，據吳濁流《台灣連翹》所描述的“林的失蹤並非由於「民報」的關係，而是因林與美國駐台領事卡氏有關係，涉嫌參加台灣由美託管的運動。”<sup>85</sup>國府時期他是台灣人當中學術聲望最高的人物，究其死因，只能說：“差不多官高一切，莫須有罪遍三台”。二二八事件後陰影籠罩全台，到處一片哀號，“滿城風雨人爭避，何必自投羅網來”：林茂生因沒有急流勇退，遂導致3月11日中午被幾個著中山裝佩槍的特務到他家帶走後，就下落不明了。對於這位早在文化協會時期就共事的好友，竟落此下場，葉

---

<sup>83</sup> 李筱峰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市：自立晚報，1991年2月第一版六刷），頁24。「高砂青年會」後來易名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揭褻「涵養愛鄉心情，發揮自覺精神，促進台灣文化的開發」的宗旨，林茂生、蔡式毅、陳炳等人都曾擔任過會長。

<sup>84</sup> 當時台灣除了政治操縱在日本人手中外，工作上、職業上，管理階層也都以日人為主，無論民間或官方，只要是日本人經營的機構、企業，台灣人頂多是低級職員或店員，大公司如：三井、三菱等企業，台灣人根本跨不進去。薪資上也是如此，同工不同酬，任憑台灣人學歷高，工作效率高，也不能與日本人相提並論，因為他們視台灣人為次等國民。

<sup>85</sup> 以上有關林茂生資料參考戴國輝·葉芸芸著《愛憎二·二八》（台北市：遠流出版，2002年9月1日初版十三刷），頁345-348。及葉榮鐘著〈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同註31，頁459。

榮鐘聞噩耗當然是悲痛異常，唏噓不已。

蒙難的台灣社會菁英，雖然每個人的背景不一樣，最後卻有一個共同的結局，每一條英靈的消逝，都隱埋著椎心泣血的悲劇，這段令人隱隱作痛的過去，是台灣近代史上的辛酸與血淚。”人物中洲失此才，誰將策馬繼登台。輪困膽藉危難見，旋踵禍隨名位來。”<sup>86</sup>、“鼎鑊自甘誠不愧，事機坐失責難逃。可憐商界稱重鎮，浪藉遺屍沒野蒿。”<sup>87</sup>這些詩句是葉榮鐘對逝去的菁英份子悲痛的緬懷及對這時代血淚的控訴。

### 三、葉榮鐘漢詩總評

葉榮鐘和同時代的許多知識份子一樣，他們喜歡漢詩，因為除了可借寫詩遣懷外，漢詩往往是保存漢族文化命脈的具體象徵，詩中保存了深厚的種族意識，是一種對抗日本同化的利器。綜觀葉榮鐘《少奇吟草》的詩作，他秉持櫟社先賢們的苦心孤詣與情操，用漢詩記錄了台灣歷史的傷痕、個人特殊的際遇，由早期民族意識的熱情寫到晚年台灣本土意識的萌芽、從對妻子的款款深情寫到身為人父對子女的關懷、從對師長的尊敬寫到情同手足的友情。他的作品不泥古、不雕琢，用平白如話的句子，一句句寫出自己的真情厚意。感人肺腑的詩句中，有葉榮鐘的民族氣節、也有兒女私情、更有諷刺當道、規勸世俗的內容。他賦予詩歌豐富的情感，有血、有淚、有歡笑，也有悲哀，他創作的用心獲得黃得時讚賞曰：

葉先生的詩是有血、有淚、有魄力、有抱負，字裡行間洋溢著熱烈的民族精神，非那些吟風弄月，擊鉢催詩，無病呻吟，僥一時之虛譽者可比。<sup>88</sup>

確實葉榮鐘帶有生命的詩句，往往傳誦千里，像「放膽文章拼命酒」、「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不但寫出了葉榮鐘的「豪情快語」，也道破了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傲骨的本色，更寫出了他們內心的無奈。陳芳明對葉榮鐘的詩句也是讚譽有加，他說：

他的詩，足以概括日據時期以降台灣文學運動先驅者的傲骨，由於有了他

<sup>86</sup> 葉榮鐘著〈弔連宗兄〉《少奇吟草》，同註2，頁185。

<sup>87</sup> 葉榮鐘著〈哭王添燈兄〉《少奇吟草》，同註2，頁185。

<sup>88</sup> 黃得時〈辛酸五十，淚血寫滄田〉《葉榮鐘年表》，同註17，頁183。

們的拚命與放膽，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才開創了豪情的傳統，……他表現在文學運動上的熱情與孤高，確實為後人留下可貴的榜樣。<sup>89</sup>

生長在動亂時代的葉榮鐘，目睹台灣光復前後暗鬱的現實，他用詩記錄了當時的社會風氣與政府作為，也用詩表達他熱愛鄉土，熱愛國家的情感。整整六十年的累積，猶如一部詩史，提供我們探討及反思的材料，因此林瑞明說：「葉榮鐘確是台灣人本色，『台灣詩史』當之無愧。」<sup>90</sup> 出生霧峰的廖振富在〈不有真情不作詩〉一文中曾就葉榮鐘詩作的真情，感動之餘也稱許葉榮鐘對詩壇的貢獻：

作為二十世紀的台灣文化人，葉氏一生跨越日治與國民政府統治兩大階段，他的詩作完整見證了時代的傷痕與悲痛，呈現了一個有風骨、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心靈深度與精神風姿。而他內心的抑鬱、苦悶也迴盪在詩集的字裡行間，引領我們重新認識上一個世紀台灣人的悲情。<sup>91</sup>

身為二十世紀的台灣文化人，葉榮鐘的詩作完整見證了時代的傷痕與悲痛，呈現了一個有風骨、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心靈深度與精神風範。《少奇吟草》提供了包括文學、歷史、古蹟風物等多元的豐富遺產，為台灣文學的欣賞與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與文本，他在漢詩的成就是不容忽視的。

## 第二節 散文

### 一、葉榮鐘散文的寫作背景

葉榮鐘除了擅長寫詩外，也從事散文創作，內容極廣，有對生命、文學、現實的關懷，也有對政治社會的批評與議論。他的散文不但注意到文學性與藝術性，也兼具載道的功能，作品很多，像：《台灣人物群像》、《半壁書齋隨筆》……等，本文研究的範圍以《半壁書齋隨筆》為主。葉榮鐘的散文集《半壁書齋隨筆》共有上、下兩冊，上冊又叫《半路出家集》，下冊又名《小屋大車集》。在〈自序〉

---

<sup>89</sup> 宋冬陽著（陳芳明筆名）〈後記〉《放膽文章拚命酒》（台北市：林白出版社，1988年元月15日初版），頁235。

<sup>90</sup> 林瑞明〈探索葉榮鐘的文學〉《櫟社百週年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文學館，2001年12月8-9日，台中縣霧峰鄉台灣省諮議會議事堂，頁9。

<sup>91</sup> 廖振富〈不有真情不作詩—讀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台灣日報》民國90年4月12日。

一文中他幽默的述說取名「半路出家」的含意：

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生於割台以後，所受的全是日本教育，半生耳濡目染，盡是日本式的漢文。滿腦袋落伍思想，一肚皮不合時宜，猝然碰到光復，手忙腳亂，應付無方，其不焦頭爛額者幾希。俗人半途改行做和尚，叫做「半路出家」，一向習慣於寫日文的人，一旦改寫國文，情形也是一樣，所以我就把這本雜文集，取名《半路出家集》。<sup>92</sup>

他謙虛的說自己學得的漢文，是粗淺的、不合時宜的，加上中國典籍讀的不多，所以用日本式的漢文寫文章，有如半途出家的和尚，故取書名曰《半路出家集》。對此徐復觀反駁說：

他用中文所寫的散文不僅沒有夾雜著「日文臭」的不調和氣味，並且在簡樸中表現綿密，在平淡中表現生動，不裝腔作勢，不塗脂抹粉，觀察入微，常能「小中見大」，這實際是一種大方而高雅的散文。<sup>93</sup>

徐復觀說的沒錯，葉榮鐘已近古稀之年，沒有在大陸住過或受過教育，且日據時期從事文化工作，寫的讀的又大都是日文，究其中文文筆如此流暢的原因，應和其好學不倦的大量閱讀書籍有關。不過，葉榮鐘這席話卻道出了和他同時期跨越語言與世代的作家的悲哀與無奈。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旋即進駐接收台灣，此時無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動。戰後對台灣的作家而言，衝擊非常大，因為他們必須從原來的大和民族主義的思考調整為中華民族主義的思考<sup>94</sup>，而這兩種思考是全然不同，且互相敵對的。更嚴重的是全新的語言政策，1946年來台接收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頒布廢止使用日文的禁令，許多已經習慣日文書寫的作家，被迫停筆，造成許多台灣的作家在戰後變成無聲的一代，這是另一次傳統語言的斷裂。

日治時期無論你日文的文筆有多好，到了國府時期，都是手忙腳亂、焦頭爛額，成了不合時宜、思想落後的一群，不能適應的就被淘汰，願意接受挑戰的，

---

<sup>92</sup> 葉榮鐘著〈《半路出家集》原序〉《半壁書齋隨筆》(上)，(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年初版)，頁378。

<sup>93</sup> 徐復觀著〈悼念葉榮鐘先生〉1978年12月11日發表於《中國時報》。

<sup>94</sup> 參陳芳明先生〈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第十五卷第十期，(1999年8月)，頁168。

就一切都從頭開始，其悲慘是可想而知的。難怪葉榮鐘在 1964 年 8 月 31 日寫給旅美的兒子葉光南的信說：

台灣人因過去五十年間的歷史關係，一般人對於國文的力量較差，致受輕視而吃大虧。但我有自信，台人之才能絕不弱於任何民族，若能努力從事定有可觀。余現在不以老朽自棄，而孳孳以寫作為念者，第一是欲留一點記錄性文字以供將來修史者之參考；另一點是不願被人歧視台人為不學無術之土包子。<sup>95</sup>

於是葉榮鐘本著少年時求學的勤勉精神，加上在日本人壓迫下從事民族運動的毅力，用「鐵筆」寫了許多的文章，除了將他個人的經歷紀錄下來外，也為台灣人出一口氣吧。他擅長把一些細微的、平凡的、容易被人忽視的人事物，點點滴滴紀錄下來，尤其是現代人不知曉的古早故事，很自然的穿插在文章裡，時而幽默嘲諷，時而嚴正批判，寫出來的文章頗能引人入勝。對於一個受日本教育的作家而言，他的漢文能力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了，難怪張良澤推崇為「台灣文學史上，他的中文隨筆當屬第一。」<sup>96</sup>

下冊《小屋大車集》的命名原因，在其〈序言〉中說得很清楚，緣於本省光復後，社會上流行著兩句俗話：「房子越住越小，車子越坐越大。」借以比喻一個人由顯榮漸至沒落。<sup>97</sup>原來葉榮鐘自彰銀退休後，薪俸斷絕，生活必須節儉，為了減少開支換了小屋，出門也由原來有三輪車代步，改為安步當車，如此的生活變異他很快就適應了，不過他也因此感慨的說：

芸芸眾生，大都是甘心逆來順受，屈服於暴力之下，而去隨遇而安。這就是在廿世紀的今日，所謂極權政治還能夠大行其道的原因。<sup>98</sup>

「隨遇而安」是人類的本能，也是人類消極的藉口，因為自古以來，真正能為爭取自由而犧牲性命的，除卻一些特別傑出的人物外，並不太多，因此很多人用「隨遇而安」來為自己辯解，台灣人更甚。對此葉榮鐘內心的無奈與隱憂，可引用陳

---

<sup>95</sup> 葉光南、葉芸芸主編〈家書——寫給旅美子女的信（1963-1978）〉1964年8月31日《葉榮鐘年表》，同註17，頁89。

<sup>96</sup> 張良澤《我的文學歷程—四十五自述》（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年2月15日台灣版第一刷），頁292。

<sup>97</sup> 葉榮鐘〈《小屋大車集》原自序〉《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91，頁325。

<sup>98</sup> 葉榮鐘〈《小屋大車集》原自序〉《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91，頁327。

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中的一段話來解釋：

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帶來了強勢的中原文化；他們鄙視台灣的殖民經驗，並且將之形容為「奴化教育」。尤其是在 1950 年以後，……更加強化其既有的以中原取向為中心的民族思想教育，同時以武裝的警備總部為其思想檢查的後盾。為了配合反共國策，國民政府相當周密地建立了戒嚴體制。這種近乎軍事控制式的權力支配方式，較諸日本殖民體制毫不遜色。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將這個階段概稱為再殖民時期。<sup>99</sup>

掙脫日人的殖民後，台人又陷入另一個痛苦的深淵，對於國民政府不合理的政策與制度，台人還是逆來順受，默默承受了，這是否意味著台灣人深根蒂固的奴隸個性使然，令人懷疑感慨。《小屋大車集》一書，不但讓我們看出葉榮鐘的生活演變，同時也暗示本省知識分子在大時代轉變中的悲哀。

至於「半壁書齋」的由來，在〈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中他詳實的訴說在那段非常時期，住屋問題的窘境，他以灑脫的筆調，超然的情懷，把簡陋的生活，當作自我磨練及鞭策的原動力。1937 年他在台北下奎府町（現今長安東路），租賃一間日式房子為居處，因為房子不大，沒有書齋，就把走廊延長起來加蓋一間小書齋，可是這小書齋東西的磚牆高度僅及一半，上半截只得用木板來把牠堵起來，藉以遮蔽風雨太陽，他就把這小房子命名為「半壁書齋」，作為讀書之用。但事實上，取名「半壁書齋」在其內心有更深的涵義，他說：四十多年前曾在《民國名人詩抄》中讀到國父孫中山先生〈過漢口弔劉道〉的七律一首，內有「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尚餘遺策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sup>100</sup>的詩句，其中「半壁」給他的印象特別深刻。七七事變後，南京淪陷，偽華北臨時政府成立，整個中國大陸只剩下東南半壁，日本軍閥造成的「半壁」，使他聯想起國父的「半壁」，這就是他賦與名稱的由來及涵義。從此「半壁」時時鞭撻他的鬥志，加強他的民族意識，所以終其一生他都不想改掉這個名稱。從「半路出家」到「小車大屋」，再到「半壁書齋」我們可讀出葉榮鐘是用一種自諷的幽默，以看似輕鬆實則沉痛的筆致，去尋求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

<sup>99</sup> 參陳芳明先生〈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第十五卷第十期，（1999 年 8 月），頁 164。

<sup>100</sup> 葉芸芸〈編後記〉《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 91，頁 335。

## 二、葉榮鐘散文的創作內容

《半壁書齋隨筆》是葉榮鐘經過長期蟄伏，重整筆硯之後，陸續發表在各報刊之間的文章，他延續了日治時代擔任記者敏銳的觀察力及勤奮不懈的精神，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時事做最貼切的評論。此隨筆上下冊收錄了 57 篇文章，加上《美國見聞錄》的 40 篇，及雜文（原收錄在《三友集》的）21 篇，總計有 118 篇，從批評社會政治文化陋習到關懷升斗小民疾苦，從記錄民俗文化舊慣以致於對美國式的現代物質文明的敘感，書中依然捕捉得到五四運動、文化協會、啓蒙運動知識份子的歷史色彩。無論生活的回憶，世相的諷刺，民主的談論，政治的縱講，經濟的回顧，民俗的描畫，以及對故鄉鹿港的種種懷念，他始終秉持著真誠的心靈，來觀照人生，體悟世事，寫他周遭的一切，以感悟為軸心，筆隨情走，實踐他對文學的主張——“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此書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文人的風花雪月，篇篇都與生活和時代有關，他用犀利流暢的筆調，展現其清晰的理路與深刻的思想，在抒情敘事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葉榮鐘深厚的學養及對現實社會及人文精神的關懷。由於葉榮鐘的散文內容非常廣泛，且呈多樣性，今僅就其中給筆者印象較深的內容來探究。

### (一)社會現實的批判

葉榮鐘是個兼具感性情懷與理性思維的作家，在隨筆中他一直堅持著知識份子的良知，文學是他積極介入社會的重要媒介，因此作品中呈現社會意識的主題很多。他將平日所觀察到的各種社會現象，作為寫作的題材，並進行深入的剖析與探討，進而提出他個人的心得與見解，所以這些作品除了呈現出強烈的現實意味外，也充滿理性批評的筆調。其內容多半切合時事，論述的範圍非常廣從做醮拜拜、算命卜卦……等迷信陋習，到從政者為取悅選民、遷就俗論，以趨炎附勢、譁眾取寵為能事，以致喪失理想等社會怪相，都提出來論述。施懿琳、楊翠就曾為文稱讚曰：

葉榮鐘的時代感與問題意識是尖銳的，他所列舉的社會議題，都是當時代新興的社會議題，而且這些問題是有相當的延展性的，如不求改善，將會



日益嚴重。……<sup>101</sup>

1964年4月所寫〈悵惘的回憶〉一文，從過度的迷信、環境的髒亂，到遷就眾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競選風氣，引發葉榮鐘對台灣太過民主的質疑？他說：

台灣現在已不再是日本的殖民地，我們也不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了。光復後經濟繁榮，工業發展，物質生活確有長足的進步。但在另一方面，卻是垃圾滿街，污泥滿壑。這和絢爛輝煌的大廈高樓，與柏油的高級路面，成為強烈的對照。教會林立，學園棋布，而迷信的毒霧，卻瀰漫於各個角落，這不是一幅絕妙的諷刺圖畫嗎？<sup>102</sup>

據說我們也是民主國家，而且是被譽為亞洲的「民主櫥窗」。「民主」就是以民為主，一切以民的好惡為準繩，民眾要迷信、愚蠢、污穢，一一唯命是從？……因為既要選民的票，自然要聽選民的話，……遷就眾愚的作風，在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競選風氣下，似乎無法矯正，說不定還會每況愈下呢。……<sup>103</sup>

脫離日本統治不過三十年的光景，然而一切以人民的好惡為準繩的「民主」，竟是縱容民眾迷信、愚蠢、污穢……。從過去被強迫的「守紀」，到現在自主的「胡為」，他批判如此的民主假象，已造成台灣的亂象；人民的無知造成對民主的濫用，政府官吏的虛矯敷衍，往往假民主之名行滔天的罪惡，再再令人哀嘆，他感慨的說：

日人統治下的五十年，是台人屈辱的歷史。但是現在有些事情，竟比那一段包羞忍辱的時期，更加愚昧、更加野蠻。<sup>104</sup>

日據末期，台灣的社會無論衛生、守紀、守時，甚至宗教的信仰上，都已步上現代化的軌道。沒想到國民政府統治台灣以後，表面上是行民主政治，但為了贏得選票，不擇手段，甚至製造種種愚民的假象，這一切的亂象，使葉榮鐘對「民主

---

<sup>101</sup> 施懿琳·楊翠〈六〇年代彰化縣文壇再現生機〉《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頁353。

<sup>102</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悵惘的回憶〉《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91，頁25。

<sup>103</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悵惘的回憶〉《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91，頁26。

<sup>104</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悵惘的回憶〉《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91，頁26。

自由」存疑，為何台灣人一定要在高壓下才能夠守法？實施民主就忘了法治，隨性胡作非為，難道這就是台灣人的奴性嗎？不過這裡要強調的是，他反對的不是民主本身，是假借民主之名，行愚民之實的政客，他為普羅盲目被煽動所做出來的行為感到悲哀；再者他懷念日據時代的是法治，是當時較有秩序的環境，絕對不是殖民主日本。他用犀利簡捷的文字，揭露民主的假象，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悲哀的現實〉諷刺中國人視錢如命的劣根性。從菲律賓華僑遇害，十三歲的兒子先財物後父屍的冷酷無情，到春秋時代齊桓公的兒子先王位後父屍的現實，再看黛玉葬花被視為痴憨行徑，讓人聯想到現今台灣的社會，人們的生活態度，漸傾向「唯利是圖」的現實主義，人情的冷漠，再再令人擔憂，他說：

人類若祇在現實主義的泥濘裡打滾，那前途是可悲的，是令人不堪設想的，那是和動物的社會祇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這樣的社會，也無所謂真理，也無所謂文化，只有冷冰冰硬硬（綑綑）的現實，還成個人住的社會嗎？<sup>105</sup>

對曾致力於台灣文化改造運動的葉榮鐘而言，看到日益現實、功利的台灣社會，百姓的思想如此庸俗勢利，他內心是何等的無奈與悲嘆。他用鄙夷的筆調寫出「理想喪失」、「殺雞取卵」、「得過且過」等字，無非是在鍼砭世態人情、社會風尚，感傷世風日下。因此他呼籲台灣的民眾，別再因“過份重視現實而蔑視一切的生活態度”<sup>106</sup>，要踏實謙卑為懷，別再一味的追求「財勢兩全」，否則禮之道，就成了「富斯濫矣」<sup>107</sup>。他用沉重的筆致，一針見血的指出現代台灣人的缺點。

〈勞動觀念與職業意識〉文中他旁徵博引古今中外勞工們的敬業態度，發現「勞工神聖」的勞動觀念是美國繁榮鼎盛的原因；他也讚美早期的台灣農民，勤儉耐勞、不畏辛苦的努力耕種，一步一腳印為生活、為台灣而打拚。葉榮鐘不也是用這種精神在耕耘它的文學天地嗎？反觀現在的人們優越感作祟，亟待一步登天，常不自覺的在職怨職，以致無法靜下心來，忽略唯有認真做事才是根本，才能心安理得，並勝任愉快。他希望國人多多學習美日的敬業精神，他說：

美國人的勞動觀念，日本人的職業意識，應該是我們要多多學習的長處，

---

<sup>105</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悲哀的現實〉《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49。

<sup>106</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悲哀的現實〉《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49。

<sup>107</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婚禮〉《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169。

但是我們卻是仍舊耽溺著封建的遺毒，而自己陶醉——其實這是自討煩惱啊！<sup>108</sup>

台灣的經濟要再重振往日的雄風，一定要多採他人之長，以補自己的短處，且要拋棄舊封建時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遺毒，學習正確的勞動觀念，才是成功的竅門。葉榮鐘擅長利用大家熟悉的人事物，很自然的把道理從反面或側面、高處或底層切入，讓讀者看了有所會心，他的話中充滿耐人咀嚼的智慧，更有博雅的知見。

## (二)對宗教的評論

台灣傳統社會的宗教信仰、生活習俗，多半具有根深柢固的保守力，緊密的融入民間的生活與信念中，迎神賽會的鋪張、婚喪禮俗的奢侈，幾可使中下階層的人家，傾家蕩產。從童年親睹神棍斂財、陋習愚民，直到晚年憶起仍表痛心。葉榮鐘對於民間的迷信及百姓的無知有感而發談了很多，〈新興企業——寺院〉、〈迷信之風不可長〉、〈為破除迷信而戰〉、〈便民與慣民〉、〈宗教與儀式〉等文，揭露了台灣傳統社會一些不良習俗——神棍、迷信、鄉愿。他深知迷信可以使人生活腐化，身心衰頹，國家文化落後，他告誡後人：

日據時期，日本統治者對於台灣人的宗教信仰問題，在民國四年以前是採取放任主義。日本統治台灣的根本方針是愚民政策，所以迷信、賭博、吸鴉片等凡足以使台灣人生活腐化、身心衰頹的陋習，日本人無寧是樂觀其成的。<sup>109</sup>

葉榮鐘相信社會上一切混亂、腐敗、矛盾、落伍的現象，與「文化不毛，思想貧困」有關係。日據時代日本人知道利用百姓對宗教的狂熱與知識的無知來控制台灣、掠奪台灣，萬萬沒想到事隔二、三十年後的今日，台灣民眾對宗教、術士的狂熱非但沒有減，反而變本加厲，甚至還盛行於上流社會，“求神問卜，算命看相，正是一種「定心丹」，好像他們每日吃「荷爾蒙」一樣，不時要借江湖術士之口，說些吉利話來安頓空虛的心靈。”<sup>110</sup>這樣的現象，不但對科學文明是一大

<sup>108</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悲哀的現實〉《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46。

<sup>109</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便民與慣民〉《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 91，頁 213。

<sup>110</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為破除迷信而戰〉《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 91，頁 182。

諷刺，對台灣的進步發展也是阻礙重重，影響很大，他以反諷筆法，指出台灣人迷信、好頭銜、虛名的舊慣。雖然生活困苦，但仍願意花錢於祭神供奉，很少真正就現實生活進行具體改善。他回想小時候在家鄉，儘管家道已中落，生活都捉襟見肘了，然而父母親爲了表示虔誠，也不惜花費龐大金錢，硬是打腫臉充胖子。針對今昔百姓的迷信與無知，葉榮鐘惋惜的引西德來台傳教牧師的話說：

我們（指台灣）的智識份子，尤其是所謂上流人物，自己民族的偉大的文化，任其荒廢，而徘徊於迷信與現代化之間。<sup>111</sup>

生長在民風保守、迷信氣息濃烈的年代裡，葉榮鐘沒有同流合污，反而能洞悉迷信對國民的危害，他的文章裡隱含改造社會惡習的批判傳統論述，批判台灣人不合時宜的傳統文化、不良的風俗習慣，他語重心長的警告國人，若不進行社會改革，將傳統的惡習導正，台灣人將無力與其他國家民族並駕齊驅。他認爲：

迷信的流行不但和政府所標榜的「科學民主」是南轅北轍，對於經濟、治安以至於教育文化也是大有妨害的。<sup>112</sup>

因此他針對當時社會的陋習，諸如做醮拜拜、相命卜卦、寺院的浮濫，提出改善之道，並呼籲台灣的媒體別爲虎作倀，因爲：

目前迷信的風氣正在囂張的現狀下，報紙的渲染，無異給迷信以免費的廣告，所發生鼓勵的反作用，是不能不加以顧慮的，尤其是電視的現場播送效果更大。如果報紙不加報導，電視不予播映，一定可以收釜底抽薪的效果。<sup>113</sup>

令人訝異的是這段文字如果放到現今社會來閱讀，仍然十分貼切地反映此時此地人類共通的劣根性，並不因時間有所改變。兩個截然不同的年代，四十年的隔離，竟罹患同樣的病症，也適用相同的解藥。葉榮鐘一針見血地指出弊端，並提出正確的改進之道，如此的先知先覺，不是深愛台灣的人，不是具有高瞻遠矚的人，是無法辦到的。

---

<sup>111</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爲破除迷信而戰〉《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 91，頁 182。

<sup>112</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迷信之風不可長〉《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 91，頁 170。

<sup>113</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便民與慣民〉《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 91，頁 217。

### (三)故鄉的追憶與感懷

出生鹿港的葉榮鐘，十八歲就離開家鄉遠赴日本求學，學成歸國後，因為投身民族社會運動，南征北討的，必須遠離伴隨他成長的家鄉，過著漂泊異鄉的生活，然而熱愛鹿港之心，始終未變，因此寫了不少懷鄉之作，從〈憶童年的農曆過年〉、〈記鹿港中元的民俗〉、〈鹿港查晡〉、〈鹽灘滄桑〉、〈莊太岳作鹿港竹枝詞箋釋〉到〈談烏魚〉、〈也談故鄉鹿港的點心〉，鹿港是他文學創作的原鄉，在他的散文隨筆中，他曾經如是告白：

說來真夠叫人傷心，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離開鹿港將近半世紀，但終忘不掉所謂有「搖籃血跡」的故鄉。我們的少年時代，鹿港雖然已在走下坡路，但在我們的心目中，當時的景況，仍然是值得驕傲和留戀的。<sup>114</sup>

可見鹿港在葉榮鐘的心目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具有養育、撫慰、保護、憐憫等多重的意義。真誠淳厚的思鄉情懷，時常在作品中流露出來，讀來分外親切感人。不管時局如何的變遷，鹿港對他都有一股難以割捨的血脈相連之感。他云：

現在的鹿港已成廢墟，無復當年景況，但是兒時的記憶，卻能歷久常新，無寧說她現在愈是坎坷不遇，使我對她過去的光榮日子愈覺得可懷念也說不定。<sup>115</sup>

身為鹿港子弟的他，對故鄉有著一股濃得化不開的鄉土情懷，他關心故鄉的一切，那是他兒時的記憶。看到鹽灘的滄桑，勾起了他內心對鹿港衰微的無限感慨，他寫道：

鹿港由「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黃金時代演變到開闢鹽灘的衰運，……究其原因有自然因素，也有人為的因素。自然因素是港口淤塞，人為因素是割台。日人據台以後，本省的對外貿易改觀，日台貿易取代唐山貿易，同時基隆、高雄也取代安平、鹿港、淡水三個通商港口的地位。<sup>116</sup>

鹿港這個民風淳樸的傳統小鎮，它抵擋不了日本人引進來以工業經濟為基礎的現

---

<sup>114</sup> 葉榮鐘著〈談烏魚〉《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 91，頁 72。

<sup>115</sup> 葉榮鐘著〈記鹿港中元的民俗〉《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 91，頁 69。

<sup>116</sup> 葉榮鐘著〈鹽灘滄桑〉《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 91，頁 87。

代資本主義，眼看往昔的風華不再，它逐漸式微、沒落，葉榮鐘對此深表關切。然而從漢學的角度來看，他以身為鹿港人為榮，因為鹿港人的漢學素養及書法是廣受大家肯定的，他驕傲的說：

台灣詩社之多，當然有其自然發生的種種原因，但是由鹿港人啟迪引發或贊襄助成的當不在小數。由這一層來推論，在日據時期，對於漢文的保存，他們也可以說是與有力焉的一份子。<sup>117</sup>

寫春聯可以說是先父一年一度的勞動服務，他雖不利於行，卻無礙其坐著寫字。我平時從未見過先父練習書法，但寫出來的春聯卻很到家，他在逝世以前所寫的春聯，有一幅橫披貼在神明棹上面的屏朶，寫著「神之格思」四個大字。……雖不敢說是鐵劃銀鈎，到底青年時代下過功夫，字體敦篤圓活頗有書卷氣。<sup>118</sup>

除了對鹿港人才華的肯定外，他也為讀者介紹了許多鹿港的民俗風情、鹿港點心、地理環境、節慶典故，更剖析了鹿港人的氣質特徵，他說：

鹿港人的氣質，其最大的特徵是「安分守己」既不善吹牛拍馬又拙於爭權奪利。這至少可以給人一種安全感而樂於利用。他們保守成性所以最怕出風頭，大多數是「與名取實」的作風，高帽子大可以讓給人家去戴，自己寧願坐在後台服務。<sup>119</sup>

「安分守己」，這不是對葉榮鐘最貼切的形容嗎？葉榮鐘的一生不管是實際參與民族社會運動，或是退休後的寫作生涯，他總是默默的付出，不求回報；或是為人抬轎，不喜歡出風頭。然而此種不爭名奪利的個性，竟被人譏評為「保守消極沒有雄才大略」，林芳年在〈悼葉榮鐘氏〉一文中曾就葉榮鐘的性格分析說：

葉氏具有腳踏實地的性格，是一個默默做事的秘書人才，林獻堂幕下有幾位幹練的幕僚，但找不出像葉氏那樣穩紮穩打可靠的機要高手，有人評葉氏的性格保守消極，沒有雄才大略，或許這是他的缺點，惟換句話，這也

<sup>117</sup> 葉榮鐘著〈鹿港查晷〉《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91，頁79。

<sup>118</sup> 葉榮鐘著〈憶童年的農曆過年〉《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91，頁65。

<sup>119</sup> 葉榮鐘著〈鹿港查晷〉《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91，頁79。

是他的醇厚善良，一個忠實工作人員的好榜樣。<sup>120</sup>

印證鹿港人的特質後，原來葉榮鐘腳踏實地、默默付出、與世無爭的性格，是與生俱來的。難怪經過一番叱吒風雲的日子後，他能安於平淡，過著朝九晚五的公務員生活，更在金融界退休後，本著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孳孳以寫作為念，青燈黃卷、獨秉巨筆，若不是天性使然，如何完成別人眼中的笨工，如何為後世子孫及將來修史者留下一些記錄性的文字，他的鹿港人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 (四)美國見聞錄

在《半壁書齋隨筆》裡葉榮鐘有許多寫景記遊的作品，用語簡潔生動，尤其寫景淡雅溫和，但總別有所指，例如參觀美國弗里爾美術館，這是一所以收藏豐富、精品眾多而馳名的美術館，他說：

這所美術館所收藏的東西，大部份是近東、遠東的古美術品，尤以中國的古物最多也最精。上自殷周時代的銅器和玉器，下至元、明、清的磁器繪畫，中間還有春秋以後到漢代的銅鏡和珠玉，六朝到唐代的佛像、石刻、殉葬土偶、宋代的繪畫和瓷器，琳瑯滿目，美不勝收。<sup>121</sup>

行文之間夾雜著無限的感慨，原來屬於我國的稀世珍寶，因為國家太弱，執政者無能、昏庸，保護不來，讓列強為所欲為，囊括殆盡，如今已成為他人的囊中物。在他飽含情思的筆鋒下，歸結處總別有所悟，這種撼人心弦的寫作方式是葉榮鐘寫作的特色之一。

此書除〈祖國河山的一角〉、〈談日月潭〉、〈東埔溫泉重遊記〉是屬島內的遊記，其餘四十篇是美加的見聞，刊在《半路出家集》第二輯的《美國見聞錄》裡，分「紀行」及「敘感」兩部份。上篇「紀行」，寫葉榮鐘夫妻兩人於1974年4月27日由台北赴美，至9月17日返抵東京為止，遊歷美國各地所見所聞，計有三十篇；下篇為「敘感」，探究美國社會、文化、經濟諸問題，並做為我國之借鏡。他用諧謔筆調來寫，不刻板，純屬發議。「紀行」除按照遊程寫印象外，較特殊的地方是他巧妙地將詩歌與隨筆結合，往往在一篇文章的結束用詩歌來點

<sup>120</sup> 林芳年〈悼葉榮鐘氏〉引自《台灣文藝》，第63期（1979年3月），頁244。

<sup>121</sup> 葉榮鐘著〈弗里爾美術館〉《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91，頁209。

綴，張良澤評此部分曰：

行文夾敘夾議，敘則引例事實，議則有感而發；興來則綴詩以紀盛，故讀來趣味橫溢。<sup>122</sup>

譬如參觀完聯合國總部，他有感寫了“萬國衣冠此會盟，欲揉武力策和平。大邦莫漫誇三極，一票同權無重輕。”<sup>123</sup>短短 28 字就將他參觀聯合國總部時的所見所感，描寫的淋漓盡致。巡禮了華府、林肯紀念堂、國會後，寫了〈華府道上〉、及〈詣林肯紀念堂〉，“華府清和四月天，心香一瓣詣先賢。人間不少無辜淚，誰繼斯人解倒懸”。<sup>124</sup>林肯解放黑奴一事，和葉榮鐘等人當年為台人爭取權力是如出一轍的，因此參觀林肯紀念堂時他感觸特別深，並對林肯的功業寫出了自己的評論，他說：

由功利主義的立場來講，奴隸解放對於林肯並不能說是最大的功業。倒不如他在蓋茲堡所作的一篇簡短的演說辭，把民主政治的精髓，濃縮為「民有、民治、民享」三語，而使民主政治的意義更加明確，觀念更加切實。不但對於美國民主政治的貢獻頗大，即對世界民主主義思想的普及，也有不可磨滅的功績。<sup>125</sup>

其實這段話已說明民主政治就是葉榮鐘一生所服膺的，從 1921 年加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開始，歷經大大小小的運動，也受了不少的委屈，雖然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讓他做了逃兵，轉入金融界，然而懷抱歷史責任感的他，在退休後更加發憤著書，想想如果不是對民主的信仰，他又何必汲汲營營做這些笨工呢？大可學習一般人含飴弄孫、安享天年即可。

“異國初臨別有天，起居遽變理當然”<sup>126</sup>從台灣到美國華府，飛越了半個地球，不同的除了半天的時差外，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更是明顯。看到美國大雜燴式的文化，除了新鮮好奇外，心思縝密的他也忙著捕捉東西文化的差異點，並試著去解讀它。在〈弗里爾美術館〉一文中他肯定美國各種基金會對社會的貢獻，

<sup>122</sup> 張良澤〈葉榮鐘先生作品概述〉《台灣文藝》，第 63 期，1979 年 3 月，頁 224。

<sup>123</sup> 葉榮鐘著〈參觀聯合國總部〉《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291。

<sup>124</sup> 葉榮鐘著〈初遊華府〉《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207。

<sup>125</sup> 葉榮鐘著〈初遊華府〉《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206。

<sup>126</sup> 葉榮鐘著〈初至美國〉《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200。



他解釋之：

基金會也就是美國統治階級培養接棒人的重要機構。美國有錢人對於錢的看法和花法似乎與我們大不相同，尤其是與那些甘心為兒孫作馬牛的傢伙，更不可同日而語。他們能夠高瞻遠矚，為國家、為社會甚至為人類，同時也為自己運用其財力。……他們的作法也是一種把由社會賺來的錢還給社會的還原作用，這種觀念我們似乎特別缺乏。<sup>127</sup>

基金會的設置表達了美國人「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觀念，反觀一向以儒家仁愛思想為教育宗旨的我們，在高唱「推己及人」、「天下為公」的理想時，實際行動的有多少人？他肯定「大我」的追求，是讓美國在短短二、三百年間能躍升為民主國家老大的重要原因。

「敘感」是他遊美國的綜合觀感，他用客觀理性的筆調，探究美國社會、文化、經濟等問題，從〈美國的法律與自由〉，寫到〈美國的交通〉、〈美國的老人問題〉、〈美國人的宗教觀念〉……計十篇，是以探討問題為主的散文，尤其是探究西方科學與人文及其與中國文化異同的問題，並深入思考整理出個人獨到的見解。在研讀這部份的文章，令我震驚異常，為什麼一個 74 高齡的老者，能寫出如此貼切的「現代感」，如果寫的內容是關乎中國也就算了，然而這一篇篇探討異國的法律、自由、交通、種族、宗教、民族性的文章，如果沒有廣博的中外歷史觀，與對時事的正確了解，那能做如此精湛的剖析，像討論美國境內的種族問題時，對猶太人的緣起、亡國，以至復興，進而如何影響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可說是瞭如指掌。他認為美國人今天擁有的特質：「勤勉」、「向上心」、「競爭心」就是受猶太人的影響形成的。<sup>128</sup>

美國是一個非常重視基本人權的國度，其獨立宣言規定「一切的人生來就擁有不可讓授的自由而且平等的權利，……」<sup>129</sup>，因此美國個人主義很發達，個人的秘密受到法律的保障，同時民主主義的秩序也普遍被接受，無論何時都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利。葉榮鐘很推崇美國人在個人主義及民主主義間的拿捏，他分析道：

……確實個人主義很發達，個人的秘密也受到法律的保障，民主主義的秩

---

<sup>127</sup> 葉榮鐘著〈弗里爾美術館〉《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211。

<sup>128</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美國的種族問題〉《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347。

<sup>129</sup> 葉芸芸主編、葉榮鐘著〈美國人的法律與自由〉《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305。

序已普遍被接受，無論何時都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利。……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根底的哲學，那就是一切劃一化，平均化的思想，自由之國美國也是世界中標準化最前進的國家。……平等當然要反特權、反優越，……<sup>130</sup>

全國上下力行平等化的結果，讓美國民主政治生根發達，並躋身世界大國行列。反觀我們的民主政治，處處仍可看到特權的存在，雖然守法是民主政治起碼的條件，然而我國的法律是為老百姓而訂的，往往官越大，就越不守法，難怪他會語重心長的說：

我們的民主政治，還未上軌道，需要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予以培養發揚。就中必需高官名流，具有領導作用的人物，開誠佈公以身作則，大力提倡。

131

葉榮鐘認為國內只要有特權的存在，要談民主不啻沐猴而冠，只是騙人的戲法。我們今日要實行民主，除了百姓要自覺與自律，官吏及社會上的名流，也要以身作則，充分發揮示範的作用，再加上言論機關的誘導啓發，推波助瀾下，成功之日就指日可待了，葉榮鐘散文的思辨特色在此文表露無遺。

看完這部份的文章，我們會發現葉榮鐘在欣賞美國的古蹟名勝、風俗民情之後，常會和人物聯繫在一起，像參觀威爾遜總統遺像，他就想到威爾遜「十四條和平原則」給他的影響：

威爾遜的十四條和平原則，不但使我的不滿情緒受到安慰，政治意識受到鼓勵，同時給我在思想上開了眼界，接受一個國際的新觀念。<sup>132</sup>

他由照片聯想到半世紀前的往事，感激之餘，對威爾遜在民主主義上的貢獻，再次給予肯定。在葉榮鐘的隨筆中，我們可發覺他的寫作重點在人文，對於人文關懷與世途的發展他很注重，因此筆鋒中常有其不可自己的感情、家國之痛，及對未來的期盼。

一百多天的美加之旅，不同的山水、不同的人文、不同的民族性，讓他明顯感覺到中西文化的差異，對於美國大雜燴式的文化內容，他雖然讚嘆，但不能全

---

<sup>130</sup> 葉榮鐘著〈美國的連鎖店與平等生活〉《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367。

<sup>131</sup> 葉榮鐘著〈也談民主精神〉《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99。

<sup>132</sup> 葉榮鐘著〈參觀威爾遜總統遺像〉《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228。

然接受；反觀中國文化和異邦比起來，某些地方有明顯的沒落，令他感嘆、沉痛。然而現實的經歷使他對中國傳統的文化有更深的體會，同時也明白身為炎黃子孫的我們，肩負著五千年的文化，所應懷抱的責任與期許。

## (五)民族性格的剖析

台灣數百年來舊有的社會文化所形成的意識型態與心理結構，經過長期積澱而日益僵化，剖析民族性就是對傳統文化從事深廣的省思，對老舊迂腐的積習，能反省並批判，從而推陳出新，如此台灣文化才有可能煥然一新。

葉榮鐘所關懷的範圍，並不限於社會現實的層面，他也用內在的求索來思考台灣人的性格。人性雖然複雜，然而經他細微的觀察後，通過幽默、誇張的筆調輕描淡寫後，益發凸顯出他的主題，反而更能引發讀者的興趣與省思。〈從男人燒飯談起〉，他以幽默誇張的口吻，探討現今社會男女權的問題，他認為女權的高漲，除了是順應世界的潮流外，也是男性咎由自取。「男人燒飯」的問題，不過是女性反抗男性的象徵而已。現今社會不乏男人利用女人的裙帶關係，升官發財，或甘戴綠帽利用女人吃軟飯者。對這種男人，他用諷諭且帶幾分寬厚語氣說：「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在〈「待娶」的男士注意〉中，他告訴天下「待娶」的男士，時代變了，以前是「待嫁」女兒心，現在男士也要「待娶」了，不能再沉迷過去男人至上的時代，現代新好男人是尊重女性，讓女性立於平等地位的，他說：

男人數千年來，支配家庭，主持社會，經營國家，但事到今日，四面碰壁，一塌糊塗。理應知難而退，恭請女性登台，換換口味，變變花樣，也不失為通權達變的明智抉擇。<sup>133</sup>

葉榮鐘甚至肯定女人有力挽狂瀾的能力，能為人類鋪出一條康莊大道來。女人已不再是弱者了，現在是男女平權的時代了。

〈養女問題〉談的是風土民俗。風俗是一特殊的文化儀式，任何的風俗禮儀背後都有複雜的文化心態，內藏著各式複雜的生命形態或經濟文化形態的結構。

---

<sup>133</sup> 葉榮鐘著〈「待娶」的男士注意〉《半壁書齋隨筆》(上)，同註 91，頁 124。

<sup>134</sup>藉此文可發現經由葉榮鐘對風俗的理解、對文化心理的剖析，可激發讀者提出反思。文中葉榮鐘由養女的由來談起，早期台灣人有“寧看土面，不看人面”<sup>135</sup>的習性，寧可由土地去討生活，也不屑做奴婢去仰人的鼻息，所以台灣早期沒有養女制度，此制度是由祖國傳入的。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生齒日繁，生活發生問題，貧賤之家往往爲了養活男孩，不得不把女兒賣給人家去當婢女，這是「重男輕女」的習俗作祟。養女當時被稱做「查某嫻」或「苗媳婦」，直至民國初年因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理由，宣佈「查某嫻」的買賣無效，此後才改名叫「養女」；名稱雖改，然而養女的意義和過去「查某嫻」是沒二樣的，養女往往被「家族情分」所惑，使無依無靠的她們容易受騙並模糊其心靈的自覺。另一要正視的問題是養女與娼妓二者之間有很微妙的關係，往往是「養女其名，娼女其實」<sup>136</sup>，其癥結在於「賣笑」與否。今天我們的國家正朝向「民主自由」而努力，若跳開「人權尊重」不談，就沒有什麼可言的了。然而當時台灣的女性朋友對於自身應擁有的人權，不但認識不深，連欲求都不夠，當然就談不上廢娼問題了。對此問題葉榮鐘提出自己的看法：

說來說去，問題的關鍵，仍須社會，尤其是女性，對人權的尊重有深切的認識才行。女性的民意代表可能都是各地婦女會的領袖，她們一面呼籲保護養女，一面對於人格受蹂躪心身受虐待的賣笑業者只知譴責而不知憐憫的作風，似乎有些牛頭不對馬嘴。<sup>137</sup>

生長在領台時期的男士，理應受日本大男人主義的影響，貶低女性；然而由上面幾篇談論女性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葉榮鐘頗具婦女解放意識。在當時的社會他不但思想走在時代尖端，且時時關心社會人生和民族的命運，對於不合理、不平等、非人道的制度，他都會仗義執言，不但勇氣可嘉，其思想之先進，更令人咋舌。尤其面對問題時，能直指問題的癥結所在，避免用偏頗的言論來評論。語言平淺，不詰屈聱牙，樸實自然，平易近人是葉榮鐘的寫作特色。

〈魏公子傳〉寫魏公子繼承偌大的家產後，因喜好附庸風雅，竭盡能事的揮

---

<sup>134</sup> 許俊雅〈文化傳統與歷史選擇—談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的文化內涵〉《台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台北市：南天書局，1997年10月初版一刷），頁11。

<sup>135</sup> 葉榮鐘著〈養女問題〉《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91，頁127。

<sup>136</sup> 葉榮鐘著〈養女問題〉《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91，頁129。

<sup>137</sup> 葉榮鐘著〈養女問題〉《半壁書齋隨筆》（下），同註91，頁132。

霍，出手大方令人驚訝，然而坐吃山空，不但很快的花光了所有的財產，且染了一身惡疾，下半輩子竟因久病知醫，成為江湖郎中，藉替人醫些痔瘡透腸等雜症，賺取蠅頭小利以渡其屈辱的餘生。葉榮鐘文章所傳達的訊息，無非是在警惕世人，「萬貫家財不如一技在身」、「勤儉才是美德」。魏公子不知守成，萬貫的家財也禁不起毫無節制的濫用，以致晚來淒涼悲慘。經由理性思維的提昇，不論是外發的關懷或內斂的思考，都使葉榮鐘的作品內涵更為豐富、深刻，提供讀者思想的啟發，更耐人咀嚼。

現實社會確實存在著黑暗與醜陋，葉榮鐘擅長利用文學作品來揭發之，批判之，讓世人了解事實真象。他更積極地發揚人性的善良面，及人生的光明面，負起啓迪鼓舞讀者心智的責任。在葉榮鐘流暢的文筆中，我們看到他的個性與人格，及他對人生自然社會的真知灼見；文詞中處處潛誦著他對社會與自然世界人事景物的關懷和拳拳熱切的情愫。葉榮鐘善於觀察、分析，尤其善於從平凡中尋求其內含的思想意義，達到隨意而發，隨情運筆，行文灑脫不羈的境界，對於讀者性靈的提升、心智的成長有其教育功能。

### 三、葉榮鐘散文總評

王詩琅認為要寫出言之有物、讀之有味的隨筆不容易，因為這一類的文章是一種全人格總和的表露，作者不但要有良好的文學天稟和修養，且要有豐富的經驗，高深的學識，高邁的思想，否則寫出來的內容不是空洞，便是索然無味。<sup>138</sup>他讚美葉榮鐘說：

舉凡本省的重要變故或大事，大都曾身歷其境，或參與其事；非但有豐富的經驗，成熟的思想，且善日文，能中文，擅舊詩，學通古今，其高深的學識與才華，素為儕輩所共欽。<sup>139</sup>

他的著作中還能夠體會得到的就是不但文章好，觀念新，一點也沒有冬烘氣；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他對事物的判斷或看法很正確，不但《半路出家集》、《小屋大車集》或其他任何的文章，都大義凜然，顯示這一老知識份

---

<sup>138</sup> 參王詩琅編著《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12月初版），頁169。

<sup>139</sup> 王詩琅編著《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同註137，頁170。

子的態度，任何人都會感受得到；……他寫的無疑地也正是這一時代具有良知良識的人士之鏡子、心聲。<sup>140</sup>

林靈也在〈剖開新舊時代社會弊病的堅實刀柄〉文章中，讚美葉榮鐘說：

葉榮鐘先生的文章，就像一把老刀，鋒利的刃口，同時剖開了寄生在兩個時代裡的社會弊病；堅實的刀柄，則敲醒了長期以來只知「向前看」，進而漠視老一輩人的論述，並主觀地判定它們不合時宜且不值一讀的我。<sup>141</sup>

確實葉榮鐘的一生不爭名逐利，有的就是在讀書寫作以及工作過程中去找尋那一份歡愉的感受，他的散文隨筆，深具時代意義，不但能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現象，以作為歷史回顧的省思外，也積極體現了中國讀書人的良心與社會責任。誠如葉石濤說的：

大凡一個有成就的作家必須確信他的工作對於人類社會有所貢獻而能孜孜不倦，堅忍不拔的寫下去，以反映時代和社會；作家必須是時代的晴雨計。<sup>142</sup>

葉榮鐘從十幾歲寫到 78 歲病危前才不得不停筆，足足一甲子的寫作生涯，數不盡的文章。他用敏銳的觀察力，把他所處的時代，社會的病竇挖掘出來、解剖出來，赤裸裸的寫出屬於那個時代的真相來，他的文學作品反映現實生活的一切，他把真實帶入他的作品裡。

讀完葉榮鐘這些隨筆，覺得他的作品最大特色就是平實，不誇張、不咆哮、不炫奇，沒有風花雪月，沒有煽情感眾，他用摯誠純真的筆調寫出有理性、有理想的文章。他結合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文學的精華，並融合知識分子與文學家的強烈使命感，苦心孤詣寫出充滿人文色彩的文章。他秉持自己「第三文學」的理念“腳立台灣的大地，頭頂台灣的蒼空，不事模倣，不赴流行，非由台灣人的血和肉創作出來不可。”<sup>143</sup>。他站在台灣的豐沃土壤中寫出了台灣特殊歷史命運、

---

<sup>140</sup> 王詩琅〈不斷進步的知識人——敬悼葉榮鐘先生〉《自立晚報》1978年11月26日星期日。

<sup>141</sup> 林靈〈剖開新舊時代社會弊病的堅實刀柄〉《半壁書齋隨筆》，同註91，頁390。

<sup>142</sup> 何欣著〈葉石濤的文學觀〉《當代台灣作家論》（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12月初版），頁42。

<sup>143</sup> 葉榮鐘〈（卷頭語）：「第三文學」〉《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2年初版），頁292。

特殊文化、及社會的真相，並且廣徵博引古今中外一些歷史、時事來做比較，來勉勵台灣人。在他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那股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心，他對社會國家的關懷，讓讀者心有戚戚焉。在他平實淳樸的文章裡，我們看到他誠懇、踏實、強韌的崇高心境；無疑地他清雅平順的散文，也為日漸庸俗化的台灣社會注入一股清流。

# 第六章 結 論

## 第一節 研究成果

葉榮鐘是日據時代民族社會運動重要的一員，也是資深的老報人，他身兼詩人、散文家、評論家、歷史家，與社會運動家，他跨越了文學與史學、傳統與現代。他見證了台灣從「前現代」進入「現代」的重大歷史變遷，他是跨越世代的歷史見證者，也是代言人。他用漢詩、雜文、評論、日記、歷史著作等方式記錄了二十世紀台灣的人、事、物，陳昭瑛說「葉榮鐘的著作具有不可抹滅的歷史價值，也具有不容取代的獨特地位」。<sup>1</sup>然而台灣文學史上，談論他的資料並不多，且重心大都放在民族運動、社會運動方面，但因民族運動的路線及認同問題，歷史對他的定位並不明確；文壇論及他的著作也都是片斷的，不夠完整，他沒有像賴和與吳濁流一樣，因能寫出一部部抗日的小說，而具有崇高的地位，因此除了熟稔台灣文學史的人外，一般人認識他的很少。因此本論文重點除了將目前可見有關葉榮鐘的資料、作品、參與的民族運動事蹟重新整理外，將針對其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進行歸類、分析，重新釐清他在文壇上的地位。茲將研究成果簡述於下：

第一章：「緒論」部分：第一節說明筆者以葉榮鐘為研究主題的動機，及透過葉榮鐘生平及文學的研究，欲達成的目標；第二節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文獻檢討，介紹已累積的研究成果，將其有誤或不足之處，以為本論文寫作之參考；第三節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是採取編年方式，對葉榮鐘在民族運動方面及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上，給予肯定，並還給他在歷史上應有的定位與價值；第四節是鋪陳本論文的架構。

第二章：「感時憂國的葉榮鐘」：分兩個部份來討論，第一節是葉榮鐘的生平，第二節是葉榮鐘的文學寫作歷程。生平部分：筆著藉由各處可尋的文獻資料，將葉榮鐘從出生至離世的生平重新整理還原，並編列出葉榮鐘的一生年譜放在附錄

---

<sup>1</sup> 陳昭瑛〈誰召同胞未死魂：葉榮鐘《早年文集》的志業與思想〉《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晨星出版，2002年初版），頁47。



一。本節將由他的家庭背景開始，求學生涯、葉榮鐘的個性、葉榮鐘的感情世界、與日人交往、葉榮鐘的民族自覺、葉榮鐘與台灣民族政治運動、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等九個階段來敘述，逐一勾勒其生平歷程，以為研究他文學創作的背景資料。由於葉榮鐘在日據時代是民族社會運動重要的一員，所以本節重點放在他與民族政治運動的關係，從他參與台灣議會設置運動開始，歷經治警事件、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東亞共榮協會，到郁達夫座談會，都是他實際參與的活動，除了敘述事件的經過，也探究這些活動的歷史意義，及葉榮鐘在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章：「葉榮鐘的文學寫作歷程」：針對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知識份子的政治舞台消失，葉榮鐘也被迫轉入金融界，然而身負歷史使命感的他是如何利用退休後的歲月從事寫作的工作，為他那一代人留下歷史的見證，也為後世子孫留下寶貴的資料。筆者將以葉榮鐘作品發表情況，及他與《晨鐘》、《南音》的關係做論述的主題。首先依葉榮鐘的筆名論述他的作品發表情況，了解這些筆名的涵意，並反應出當時的文壇狀況。進而了解他在各個階段的寫作情形：大戰結束之前，他中、日文並用，所寫的文章大都發表在《台灣民報》與《南音》，多屬文論的性質，且與當時的新舊文學論戰息息相關，從中可看出他個人特有的文學觀念及特色，這是他寫作的第一個高峰期。戰後至國民政府遷台，這段日子他幾乎都在替林獻堂等人代筆，寫些和政治經濟有關的建言書。封筆時期，他的遭遇如何，心情如何，做一個探討。退休後，他到處搜集資料，孜孜不倦的以寫作為志，這是他第二個寫作的高峰期。《晨鐘》、《南音》與葉榮鐘息息相關，因此特別介紹之。《晨鐘》是他啼聲初試，尤其珍貴。《南音》他是接生婆之一，眼看它成長、茁壯，一路上走來葉榮鐘功不可沒。加上有許多〈卷頭語〉都出自他的手筆，所以對這本雜誌的介紹較詳盡。退休後他專心著作，完成了許多的作品，現已合集名為【葉榮鐘全集】，收集的文字有 215 萬字之多。計有：《台灣人物群像》、《葉榮鐘早年文集》、《日據下台灣社會運動史》（上、下冊）、《半壁書齋隨筆》（上、下冊）、《葉榮鐘日記》（上、下冊）、《少奇吟草》、《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葉榮鐘年表》、《彰化銀行六十年史》等書，共九集十二卷。

第四章：「葉榮鐘的文學創作」：分漢詩與散文兩個重點論述。詩歌方面：葉榮鐘用詩紀錄他一生的歷史與感懷，由詩作中，我們看到其人、其事、其時代關懷，及詩作的藝術特色。筆者將其一生所寫的六百餘首的漢詩，就其內容分為三

大類：一、是時代的關懷：包括對殖民體制的控訴、對知識份子的批判、對國運的哀嘆，及二二八事件的傷痛，詩中真實地反映台灣人民在戰前與戰後的生活疾苦面，以及在社會動亂下，人心不安的生活景況，尤其對二二八的控訴，讀來令人心酸、憤怒。二、是真情的流露：其中有對妻子的款款深情及父子情深，詩中透露出葉榮鐘的感情世界，是如此的細膩、專情，與慈愛。三、是對師友的追念，分為師長的感念與對好友的哀悼。對恩師的感恩與懷念、對好友遭遇的不平與感傷，充滿字裡行間，他是位感情豐富的血性男子。散文方面：葉榮鐘樂觀的人生態度、清麗的文字和緊湊的結構安排，使他的文章具有一股強烈的感染力，深深牽動讀者的心弦。他擅長從周遭的人事物出發，發揚人性的光輝，繼而昇華為普遍的、人類共有的人性，通過他的作品使人類能向真、向善、向美。筆者以《半壁書齋隨筆》為主，從文章的內容著眼，分析其散文創作的主题，分「社會現實的批判」、「對宗教的評論」、「故鄉的追憶與感懷」、「美國見聞錄」、「民族性格的剖析」等五部份，藉這些主题可了解葉榮鐘的見聞、世界觀，並看出他的藝術技巧。文章中他以含蓄而內斂的文字，表達出他生命中的歡愉與痛苦。在他的散文裡我們讀到最動人的質素，對世事的洞明和人情的體察。小至細微的生活瑣事，大至對土地的情感、生命、學術和真理的探尋，無論寫景敘事，都非常老練成熟。文末他用詩來做一篇文章的總結，是他的特色之一，詩歌與散文的結合，更表現出他高超的藝術手法，並提昇了作品的美感。

第五章是「葉榮鐘文學理論」。日治時期投入台灣政治社會文化運動頗深的葉榮鐘，由於所處的時代背景紛雜，讓他們這群知識分子無法超脫世事，必須懷抱社會使命感，去追逐問題，不斷思索，想盡辦法解決，他們研究學問的目的是要用之於社會，剖析與解決當時的問題，正因為他們不斷追逐問題，才有可能在三〇年代那樣蒼茫而艱難的時代背景中，開創出新文學的花朵。由於他有如此的胸襟，因此能在各方人馬各執己見的論戰中，綜合各方的優缺點，採取較為客觀持平的看法，陸續提出具有個人色彩的文學觀，包括作詩的態度、羅馬字運動、戲劇觀、第三文學，以及對五四運動的看法。

作詩的態度：身為「二世文人」的葉榮鐘，自幼就接受漢學的薰陶，及長又拜林幼春、傅鶴亭為師學習漢詩的寫作技巧，42歲時更在林獻堂的介紹下加入櫟社，他以傳統的詩觀為基礎，進而提出了「不有真情不作詩」的作詩理念。當他看到一般舊詩人的墮落、言不由衷的歪詩、擊鉢吟的「言之無物」，乃為文大

加撻伐，批評舊詩人的陳腔濫調與墮落。他提出作詩應有的基本主張：1.反對擊鉢吟無病呻吟的詩作。2.作詩須忠於心靈的感觸。好的詩人是本著「有真情才作詩」的態度作詩，如此才能寫出膾炙人口的好詩句來。

戲劇是人生的縮寫，是文化的表達，也是以大眾為對象的表演藝術，尤其在民智未開的地區，戲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明白其重要性的葉榮鐘認為理想的新劇是能使觀眾得到慰藉和共鳴，也能提高觀眾的生活意識。除了表面上有其娛樂效果外，更能達到潛移默化的教育目的，於是提出一套對戲劇的看法：他認為一齣好的戲，劇情的編排要像小說一樣具有文學的魅力；演員在舞台上表演時，舉手投足間不但要有雕刻的美，甚至要與背景燈光融為一體，表現出繪畫的美；說白的聲調要如音樂般有旋律的美、動作也要優雅表現出舞蹈的律動美，如此這齣「劇」才能完善，達到真、善、美的效果。提倡新劇的葉榮鐘並沒有捨棄舊劇，他認為新舊劇各有優缺點，應互相調節取捨，如此才能創造一種內容豐富，形式優美的“真正的新劇”。

日據時代台灣社會知識水準低落，教育不普及，百姓不識字，文盲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台灣話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百姓只靠口述，不能書寫，而中國傳統的漢字是象形文字，雖美但不好學，且其發音和台灣話也不同，須先了解其意，再翻成中國白話文來寫，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和外國文字沒兩樣，因此急待一種簡單又快速的文字來解決此一問題。這是當時的文化背景也是葉榮鐘提倡羅馬字的動機，因此他建議採用蔡培火提倡的羅馬字，以二十二個英文羅馬字母拼綴，譯成閩南語口語的表音文字，再以幾個特殊符號來區別聲調，如此幫忙不識字的民眾，期能在最短時間內學會，並能很快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上。不過葉榮鐘認為提倡羅馬字，只是一時權宜之計，是一種輔助工具，是不能取代本國原有的文字或語言，他只想藉羅馬字幫助島民識字來改善生活。接著葉榮鐘又談到台灣話文語數補充和語言統一等問題，由於台灣完全是一片沙漠的曠地，要能很快滋培它，他也不反對移入中國的語文及作品，但前題是不可忽視台灣的主體性。

中國的五四運動對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有其一定程度的衝擊，造成許多人只要是屬於五四的產品就趨之若鶩。葉榮鐘支持新思想、新文學，但他並不盲從，尤其五四運動後，一般文學家對五四所提出的理論及論調多是推崇備至，且競相模仿。然而葉榮鐘對中國新文學理論，並非全盤接受，他對大陸文壇的評價，有褒

有貶，時有獨到的見解，從他寫的《中國新文學概論》一書中可明顯的看出。書中他針對五四運動的成敗得失，提出了不一樣的想法，筆者整理後歸納出三個特色來，第一：他認為白話文並非始於五四，早在一千八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就用白話文寫書了。第二：他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成果並不可觀，因為五四的產品量雖多，但質卻不精，甚至一些作品已失去文學的意義了。第三：他反對文學的功利目的，主張用純粹的文學眼光去看待文學，不能抱著利用的態度；且文學的革命要從思想和技術上著手，非字面上的改變而已。

葉榮鐘認為文學藝術最重要的任務是改造社會，故取材不應脫離現實，而顯得天馬行空、不著邊際，引不起讀者的興趣。為了消除島內的文盲、提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他提出了「文藝普遍化」及「大眾文藝」，他期待以台灣自己的風土、人情、歷史、時代做背景產生有益的大眾文藝。因此他提出了「第三文學」，此文學既不屬於「貴族文學」、也不等同「普羅文學」，是超越階級走「新中間路線」，不分你我，大家腳立台灣的大地，頭頂台灣的蒼空，不事模倣，不赴流行，只要是台灣人的血和肉創作出來文學，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它是完全站在台灣的主體位置來思考的文學主張。他的「第三文學」和黃石輝的「鄉土文學」，最大的差別在於具有左翼色彩的黃石輝，他將訴求焦距放在無產大眾，而葉榮鐘則將視角放在屬於台灣特殊文化與社會環境的「全集團的特性」。

第六章則是全文總結，說明藉由本論文的書寫，觀照了台灣史上最波瀾壯闊的日據時代與國府時代，並重建葉榮鐘在台灣文化與文學上的地位。

## 第二節 評葉榮鐘在台灣文化與文學上的地位

葉榮鐘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走的路線，一直是他受人質疑的地方，有人說他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只想依靠文化啓蒙來合法的達成民族自決，並說他始終使用奴隸的阿諛及哀怨叩頭的方式與日本帝國主義在打交道或相互勾結<sup>2</sup>，因此對葉榮鐘在政治上的評價並不高。從 1920 年受林獻堂影響，正式加入台灣民族運動行列後，葉榮鐘和林獻堂、陳炳、蔡培火、陳逢源等人是屬堅持合法運動的右翼自治溫和派，為了抵抗日本政府的專橫，他們的策略是籠絡日

---

<sup>2</sup> 參第一章註 3，頁 4。

本人中的進步分子，以爭取台灣人的權利。就拿台灣議會運動來說，在第一次請願書上，他們開宗明義的寫著「謹按大日本帝國乃立憲法治國，而台灣則歸屬帝國版圖之一部分。」<sup>3</sup>，表面上他們表示熱愛殖民母國，但這只是一種手段，是他們在不和殖民者正面衝突的原則下，發展出「求同存異」的戰略，他們在思想上利用與日本「求同」建立起其行動正當的基礎，很技巧的把自己的政治訴求與日本帝國的國格聲譽結合在一起。希望在不被殖民政府視為非法叛亂活動的情況下，爭取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絕不是政治改革理想的妥協。因為處在殖民主高壓統治之下，好惡過於分明，往往會礙事，惟有能屈能伸，知進退，不讓敵人洞悉我們的意志，才能出奇制勝。

而事實也證明啓蒙於 1920 年代的抗日政治社會運動，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趨強硬，日軍部及台灣總督府開始強化對國內、島內政治社會運動的統治，不斷展開彈壓，凡能喚起民眾意識的有組織性的運動，到了 1930 年代初都一一崩解時，只剩下葉榮鐘、林獻堂等人籌組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因為它採取溫和改良的方式，是以促進地方自治制度的改正、實施為目標，屬於日本殖民體制內的改革派，因此得以在細縫中求生存，繼續為台灣人的福祉而努力。綜觀葉榮鐘所參與的政治團體與組織，基本上都是在日本殖民地體制內許可範圍內成立，有一些甚至在日本許可的邊緣遊走，他們不走非法路線或轉入地下活動，無疑是要求日本憲法實行於台灣，取消台灣的殖民體制以及對台灣人民差別待遇，由本論文我們可看出，前半生他積極參與社會文化活動，為爭取台灣人的權利及尊嚴而努力；後半生他退出政治舞台，隱忍做個旁觀者並發憤著書，他一生都在為台灣的命運而奮鬥。筆者認為不管左翼、右翼，採取的方法是溫和抑或激進，所走的路線、所採的方法，可能不盡相同，然而結果都是為增進台灣人的福祉而努力，無非就是希望台灣有個璀璨美好的未來。所以我們不能因為他沒有激烈的行動，嚴厲的抗議名詞，就貶低或忽略他的歷史地位。

日據時代的葉榮鐘，愛他生長的土地、他的同胞，他期待建立屬於台灣人自己的文化，所以他陸續提出了「文藝普遍化」、「大眾文藝」、「第三文學」等論點，尤其第三文學特色是超越貴族與普羅，也超越自身原有的立場，立足本土的歷史

---

<sup>3</sup> 葉榮鐘著〈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年8月30日，初版），頁134。

特性與風土人情，他重視台灣人民社會群眾主體性的思想，顯而易見。從第三文學的理論，我們可以窺知葉榮鐘在政治上是反對左派階級意識的，甚至在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言論中，他也強烈批判日本資本帝國主義對台灣人民的壓迫。如果真要質疑他對台灣本土的資產階級，為何沒有給予評論，筆者認為這應和他追隨台灣大地主林獻堂有關，他受知於林獻堂，當過他的秘書，傳統的儒家倫理觀念告訴他忠於主子的定義，更何況林獻堂又視他如己子；再者日據時期出身大地主的林獻堂，如果不獻身於民族運動，他可以養尊處優，過著安逸的日子，然而他竟願意自掏腰包，熱心參與並領導民族運動，其愛台灣之心是不容懷疑的。如果撇開這點不談，葉榮鐘絕對有其獨立主體性及先驅性的思想，甚至他已跳脫當時的資本主義及左翼思想的窠臼，他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上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

一般論者都以散文、詩、小說、戲劇並列為四大文類，然而大多數的學者對台灣文學的研究，焦點多集中於小說上，對小說家的評價較高，尤其能寫出一部部反抗殖民、反抗霸權的小說家地位更是崇高，因此對沒有寫小說的葉榮鐘來說就較吃虧。從葉榮鐘寫漢詩、寫散文、寫隨筆的功力來看，他絕對有能力寫小說，然而終其一生都沒有寫，筆者深入了解後歸納出他沒寫小說的四個原因：1. 一直以來他與林獻堂、陳炳等人都是屬於合法運動的右翼自治溫和派，為替台灣人從日本殖民母國爭取更多的權利與空間，他們隱忍以退為進，檯面上他們是靠攏殖民母國的，為顧全大局，當然就不能寫出反殖民反帝國的抗議小說，只能將內心的忿怒與不滿訴諸漢詩。2. 和他受儒家教育有關，在〈我的讀書經驗〉一文中透露出其緣由。從小書房教育灌輸他的是儒家教育，儒學觀念認為讀書人志在聖賢，非經傳不讀，小說屬於街談巷語的消遣作品，是不准讀的。再者葉榮鐘自己也說“讀書人如果淪落至寫小說賣錢來維持生活，那一定是走到山窮水盡的末路才迫不得已而為之的。”<sup>4</sup>這也是他沒有寫小說的原因之一。3. 葉芸芸在〈關於父親的日記〉文中也有傳達出他沒有寫小說的訊息，1931-1942年期間，“他熱情活躍於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無暇抑或是無心寫日記也是可以想像的”，日記都無暇寫了，更遑論小說。1942年以後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人的生活艱難困苦，“精神上之無有出路恐怕才是最大的煎熬。這種心靈的磨難或許只有寄情於『詩』!?”

---

<sup>4</sup> 葉榮鐘〈我的讀書經驗〉《半壁書齋隨筆》，頁 109-110。

難以寄託於日記或其他形式的筆墨”。<sup>5</sup>詩能直接寫出內心的感受，比起小說，應有最直接的撫慰及宣洩效果，所以終其一生詩一直是他的最愛。4.出生貧困家庭的葉榮鐘，結婚後白手起家，靠的是自己的雙手，要扶養二男三女，食指浩繁可想而知，加上葉太太體弱多病，現實生活的壓力，讓一家之主的他不得不小心，所以對於抗議的小說，當然就不願染指了。另一個重要因素，應是葉榮鐘性情與理想使然也，散文與詩比較主觀，作者可直接、無所假借的讓主觀、自我流露呈現，葉榮鐘對社會改革及文化的推動極富強烈的使命感，對社會現實充滿理想熱誠，其感情是主觀的直接的，所以他會選擇藉由詩、散文來表達其情感；反觀小說的文體是須假借人物、故事、情節、結構等加以經營，在他充滿現實生活的壓力及忙於社會文化改革運動之下當然無暇去從容經營。雖然他沒有寫小說，但他選擇用寫史的方式，真實的記錄當時的一切，尤其寫作的年代恰逢 1961-1971 的白色恐怖時期，仍有許多禁忌與顧忌，據葉芸芸透露，“就在葉榮鐘先生寫作運動史與年表的這段期間，他是受到政治的注意的。”<sup>6</sup>在如此不安、落寞地環境中，他依然有不朽的貢獻，除了散文集外，更寫了一部五十萬字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如果不是具有艱苦卓絕的毅力，加上深厚的文學功力，是無法完成的。所以筆者認為好的文學是不分文體的，只要是紀錄台灣人奮鬥軌跡與心路歷程的文學，都屬於台灣文學。

戰前葉榮鐘活躍於台灣的政治及文化運動，他以溫和漸進的方式改造台灣社會。戰後他和大多數的台灣文化人一樣，在時勢的壓迫下潛沈專心以著述為務。透過【葉榮鐘全集】，他寫出了他反抗日本殖民政權的經驗，也反映了他在國民黨政權下的不妥協精神，他的字裡行間充滿了微言大義，他的傲骨與風範，都在他的全集中徹底表現出來。在思想禁錮的日據時代及沉悶高壓國府時期，葉榮鐘能心懷歷史的責任感，冒著政治上的危險，用比正統學者更正派的淵博頭腦來深思並明辨，用資深記者的歷練文字，寂寞地寫著那段被湮滅的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史，為時代留下見證，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的貢獻及重要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沒有他的記載，一些歷史可能就被塵封了。國府時期曾擔任過民政廳長，且做過

---

<sup>5</sup> 葉芸芸〈關於父親的日記〉《葉榮鐘日記》（台中市：晨星出版，2002年3月31日初版），頁1212。

<sup>6</sup> 藍博洲〈編後記〉《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89年，初版），頁391。

省府委員的楊肇嘉就曾說葉榮鐘是他最好的秘書，人很好，字很漂亮。<sup>7</sup>林瑞明對他多重角色的扮演也肯定的說“葉榮鐘有各種不同的身分，每一階段都恰如其分地扮演了歷史長劇中的角色”<sup>8</sup>洪銘水也說：“葉榮鐘可以說是一位左腳踏在傳統，右腳邁向現代，跨越世代的歷史見證者與代言人。”<sup>9</sup>尤其今日台灣瀰漫在「哈日」與「媚日」軟骨症候群時，歷史學者戴國輝就指出此時最需要“睿智老報人、藹然風範者——葉榮鐘先生的全集，當為燭照及激勵來尋出正路的。”<sup>10</sup>葉榮鐘的眼光是長遠的，行動是確實的，從他一系列的文學理論與主張，就可看出他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在引導台灣人走向現代化，又不致迷失本土性，他對台灣文學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他是有良知、愛鄉土、愛國家的睿智老報人，是台灣文化史的功臣，是「遠識高文」之士，一代典型。相信隨著接踵而來的研究，他會是歷史星空中的一顆巨星。

---

<sup>7</sup> 參〈六然居的世界——媳婦心中的肇嘉先生〉《台灣史料研究》第22號（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3年3月），頁178-201。這是楊肇嘉的媳婦楊陳秦接受張炎憲、張啓明、陳鳳華等人的專訪時，回憶公公對葉榮鐘的描述所說的。

<sup>8</sup> 林瑞明〈探索葉榮鐘的文學〉《櫟社百週年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文學館，2001年12月8-9日，台中縣霧峰鄉台灣省諮議會議事堂。

<sup>9</sup> 洪銘水〈葉榮鐘論「五四」新文學「第三文學」的提出〉《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91（2002）年初版），頁23。

<sup>10</sup> 戴國輝〈葉榮鐘先生留給我們的淡泊與矜持〉《臺灣人物群像》（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年初版），頁8-9。



## 葉榮鐘（1900-1978）年譜

紀年	事蹟	備註
1900年 光緒26年 明治33年 1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7月23日出生於鹿港，父葉成奇（字文奇），母王鸞。</li> <li>● 西元1850年祖父葉光炳由福建泉州府晉江縣石獅遷臺，定居在鹿港杉行街。</li> </ul>	
1908年 光緒34年 明治41年 9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入書房（名曰金門館的小廟）拜黃舜田為師，讀三字經與論語。</li> <li>● 入鹿港公學校。</li> <li>● 祖母、父親相繼過世，家道開始衰落。</li> </ul>	
1909年 宣統元年 明治42年 10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施家本為其公學校的導師，教漢文課程，葉榮鐘受其影響非常大。</li> <li>● 與前清秀才王秋田學習國文，讀論語與尺牘句解。</li> </ul>	
1913年 民國2年 大正2年 14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由施家本處得知林獻堂等人捐資興建台中中學的消息，梁任公來台訪問所做的詩詞，及梁任公在《新民叢報》的議論。</li> </ul>	
1914年 民國3年 大正3年 15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鹿港公學校畢業，接著修一學期的高等科，因家貧休學。</li> <li>● 先到彰化一間鴉片所當秤煙的，後轉到員林西醫館當藥局生，開始對蕉農所掀起的青果問題發生興趣。7月轉入鹿港做日人片岡醫生的藥局生。</li> </ul>	
1915年 民國4年 大正4年 16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到台中一家日人經營的「新盛俱樂部」撞球場做計點員，日語有了長足的進步。</li> <li>● 南部焦吧哖發生台人武力抗日的「西來庵事件」，每日剪貼《台灣新聞》漢文版記事，民族意識逐漸萌芽，深以受日人差使為悲，精神非常苦悶，不久藉農曆七月中元返鹿港，擅自離職。</li> <li>● 在施家本引導下開始讀《東周列國傳》等小說，藉以解悶並增加歷史知識。</li> </ul>	
1916年 民國5年 大正5年 17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因施家本的引介，在鹿港龍山寺，跟隨光明和尚學習和歌。</li> <li>● 入文廟夜學，與莊遂性叔叔莊士勳學漢學，讀《左傳》。</li> <li>● 就職於辜顯榮經營的「食鹽配運館」，在此曾受日人欺侮，開始思索台人要如何防止日人暴虐。</li> </ul>	
1917年 民國6年 大正6年 1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與洪炎秋、莊垂勝等人創設《晨鐘》雜誌，每月發行一冊，共發行六、七期而停刊。</li> </ul> <p>詩：〈中秋夜望月〉。</p>	

<p>1918年 民國7年 大正7年 19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由施家本引薦，認識林獻堂、林幼春、林癡仙，並在林幼春前執過弟子禮，對詩多所請益。</li> <li>● 受林獻堂資助赴日留學，入東京神田正則英語學校及研數學館兩預備學校就讀，並住在林獻堂東京巢鴨「雨聲庵」，直至11月中，因「雨聲庵」賣掉才搬至神田明神下的茨城館和洪炎秋同住。</li> </ul>	
<p>1919年 民國8年 大正8年 20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辭退林獻堂的資助，轉而接受辜顯榮的資助，並住在大和行。</li> <li>● 在大和行結識日人荻野輝也，在其影響下開始接觸托爾斯泰和德富蘆花的作品。</li> </ul>	
<p>1920年 民國9年 大正9年 21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9月，台灣留學生與滯日先輩百餘人，聚集東京神田中國青年會館，開會決定提出「撤廢六三法案請願書」（後來改變方針成「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於林獻堂的鼓舞下簽名請願書，正式加入台灣民族運動的行列。在會中對陳炳、吳三連等人留下深刻印象。</li> </ul>	
<p>1921年 民國10年 大正10年 22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從日本回國後，任職彰化縣溪州林本源製糖會社，因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被革職，轉任林獻堂秘書兼通譯，開始為台灣民族運動奔波。</li> <li>● 夏天，吳三連率領第一次東京留學生文化演講隊回台，葉榮鐘擔任中部接待工作，此後與吳三連熟識。</li> <li>● 以社友的身份參加櫟社的活動。</li> </ul> <p>著作： 1月15日〈求之於己〉《台灣青年》第二卷第一號。（原文日文）</p>	
<p>1922年 民國11年 大正11年 23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施家本逝世。</li> <li>● 五月，隨林獻堂至各地演講，報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經過，在清水認識楊肇嘉。</li> </ul>	
<p>1923年 民國12年 大正12年 24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12月16日發生「治警事件」。受林獻堂之託，由追分站乘海線火車赴臺北，潛訪「大阪朝日新聞」蒲田特派員，託他將消息轉知東京神田正雄社長，向日本朝野呼籲，能早日解除台灣總督府的封鎖措施，並於翌日赴基隆懇託「因幡丸班輪」之臺籍船員帶三件信函，在船抵神戶時投郵，寄給東京之同志，葉榮鐘成功地將「治警事件」傳出島外。另外還到大稻埕大安醫院找蔣渭川，轉達林獻堂之意—希望蔣渭川不要貿然發動群眾示威運動（當時蔣渭水已被拘押），以免節外生枝，造成同胞更多的流血與犧牲，後來該示威運動被取消了。</li> </ul>	
<p>1924年 民國13年 大正13年 25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與林獻堂、楊肇嘉、邱德金被推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代表。</li> <li>● 夏，在霧峰林獻堂處獲見丘念台（丘琮）一面。</li> <li>● 為反擊辜顯榮等人的「全島有力者大會」，民族運動人士在台北、台中、台南等地舉行「無力者大會」，台中部份由葉榮鐘致開會辭，林獻堂主持大會。</li> </ul> <p>著作： 詩： 雨夜懷人。無題。對酒。步月。暮春感作。</p>	

<p>1925 年 民國 14 年 大正 14 年 26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2 月 11 日與林獻堂、楊肇嘉等人赴日本作第六次請願運動。回台後赴全台各地遊說演說。</li> <li>● 3 月 28 日返台，赴全台各地遊說演說。</li> <li>● 4 月 19 日，與莊遂性、陳虛谷、丁端圖陪同林獻堂赴二林庄演講，得到熱烈迴響，並促成 6 月 28 日二林農民組合成立。</li> <li>● 6 月 7、8 二日到新竹與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石煥長、王敏川、蔡培火、陳逢源、莊遂性、陳虛谷等人做為期兩天的文化演講。</li> </ul> <p>著作：</p> <p>詩：惜春。春雲。新蟬。萊園賞月。夏日田家雜詠。午睡。賣冰妓。大暑。竹蓆。時鐘。詠靈芝。觀劇。暴風雨。秋燕。新菊。初夏。感懷。騎馬郊行。關嶺雜詠。寄某校書。夜泊明月館。相思花。合歡花。木棉橋。搗衣澗。落花徑。</p>	
<p>1926 年 民國 15 年 大正 15 年 27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4 月，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為撰寫《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來臺搜集資料，葉榮鐘擔任矢內原與林獻堂之翻譯，並陪矢內原至竹山考察「竹林事件」。</li> </ul>	<p>此書 1930 年出版，但台灣禁售</p>
<p>1927 年 民國 16 年 昭和 2 年 28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文協左傾，舊幹部籌備組織政黨時，葉榮鐘提議改為「台政革新會」。</li> <li>● 8 月，接受林獻堂資助，葉榮鐘二度赴日留學，就讀東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林獻堂偕次子林猷龍作為期一年的歐美旅遊）</li> <li>● 9 月開始每週四到東京帝大旁聽矢內原講授「臺灣糖業帝國主義」課程。因上此課認識高天成，兩人在這段時間交往甚密。</li> <li>● 冬，當選文協分裂後重建之「東京新民會」的理事。</li> </ul> <p>著作：</p> <p>詩：車發門司驛。別府路上。</p>	
<p>1928 年 民國 17 年 昭和 3 年 29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日本東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讀書。</li> </ul> <p>著作：</p> <p>9 月 5 日〈一封信寄斗兄〉</p> <p>12 月 9 日〈談談昭和新聞〉《台灣民報》</p>	
<p>1929 年 民國 18 年 昭和 4 年 30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春，林獻堂與林猷龍由美國返回東京，葉榮鐘與林獻堂、林猷龍、林雲龍（林獻堂三公子）、胞侄林六龍、外甥呂靈石等一同住在高圓寺別墅。</li> <li>● 秋，每週日與蔡培火至八景板矢內原家中聽矢內原講解聖經，此後葉榮鐘開始接觸基督教教義，直到次年畢業學成歸台為止。</li> </ul> <p>著作：</p> <p>1 月 8 日〈墮落的詩人〉《台灣民報》（用葉天籟為筆名發表）第 242 號</p> <p>5 月 5 日〈為「劇」申冤〉，《台灣民報》，第 259 號</p> <p>5 月 12 日〈關於羅馬字運動（一）〉《台灣民報》，第 260 號</p>	<p>矢內原後來成為日本無教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p>

	<p>5月19日〈關於羅馬字運動(二)〉《臺灣民報》，第261號</p> <p>5月26日〈關於羅馬字運動(三)〉《臺灣民報》，第262號</p> <p>6月2日〈敬覆淑子〉，《臺灣民報》，第263號</p> <p>7月21日〈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臺灣民報》，第270號</p> <p>8月4日〈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臺灣民報》，第272號</p> <p>8月11日〈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臺灣民報》，第273號</p> <p>8月18日〈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臺灣民報》，第274號</p> <p>8月25日〈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臺灣民報》，第275號</p> <p>11月10日〈戲曲與觀眾(上)—答紫鵲女士—〉《臺灣民報》，第286號</p> <p>11月17日〈戲曲與觀眾(下)〉《臺灣民報》，第287號</p> <p>11月7日《中國新文學概觀》(1930年6月由東京「新民會」出版)。</p> <p>著作：</p> <p>詩：慰子英失戀。無題。月下。月夜感作。無題。落花。月夜。車過熱海。宿修善寺。七夕修善寺客舍夜坐。枕上偶成。徬徨。有憶。驛亭。漫步銀座有感。聽雨。斷腸詞。除夜聞鐘。</p>	
<p>1930年 民國19年 昭和5年 31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5月中旬自日本東京中央大學畢業。</li> <li>● 返台籌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8月17日在台中市成立，葉榮鐘擔任書記長，籌劃聯盟在全島24個地方巡迴演說會，他是重要辯士之一。</li> <li>● 8月27日與楊肇嘉、蔡式毅拜訪日總督，提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宣言及決議文，並要求儘速修正現行地方自治制度。</li> <li>● 9月7日與林柏壽、楊肇嘉等十五人當選為地方自治改革案之起草委員。</li> </ul> <p>著作：</p> <p>6月7日〈地方自治和知識階級的任務〉《台灣新民報》(以「蒲牢生」為筆名發表)</p> <p>7月5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趣旨書〉《台灣新民報》</p> <p>7月10日〈關於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新民報》(代楊肇嘉執筆)</p> <p>8月23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宣言〉《台灣新民報》</p> <p>10月4日〈自治聯盟之聲明書——對改選協議員〉《台灣新民報》</p> <p>10月11日〈掃雲精舍隨筆〉《昭和新報》(以「掃雲」為筆名發表)</p> <p>詩：三溪園口占。荒川觀櫻。歲暮感作。</p>	

<p>1931 年 民國 20 年 昭和 6 年 32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2 月 22 日與蔡式穀拜訪蔣渭水，提出解散「台灣民眾黨」的意見。</li> <li>● 4 月 26 日與鹿港施織織女士結婚。</li> <li>● 8 月 16 日「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召開全島第一次代表大會，葉榮鐘做事務報告，並朗讀大會宣言。</li> <li>● 8 月 25 日在臺中寺舉行蔣渭水追悼會，因輓聯問題與臨監日警官發生衝突，結果被檢束而關入台中警察署 4 小時。</li> <li>● 12 月 12 日與莊遂性、郭秋生、黃春成等十二人徵求林獻堂及林幼春意見後，籌組「南音社」，創辦《南音》文藝雜誌。</li> </ul> <p>著作：</p> <p>1 月 10 日〈自治運動的進展〉《台灣新民報》（代楊肇嘉作）</p> <p>1 月 31 日〈台灣地方自治改革案〉《台灣新民報》（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作）</p> <p>2 月 7、14、21、28 日〈台灣地方自治制改革要項〉《台灣新民報》（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作）</p> <p>2 月 28 日〈台灣地方自治制改革的建議案與請願書〉《台灣新民報》</p> <p>2 月 28 日〈台北支部設立問題與舊民眾黨的解散〉《台灣新民報》</p> <p>4 月 7 日〈關於新黨組織問題〉《台灣新聞》（以「大江」為筆名發表）</p> <p>8 月 22 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全島大會大會宣言〉《台灣新民報》</p> <p>11 月 14、21、28 日及 12 月 5 日〈呈給總督的——關於地方自治及其他的建議書〉《台灣新民報》（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作）</p> <p>詩：題織君柳陰雙燕交舞刺繡圖。閩中雜詠。時事感作。示內子。草山途上。苗圃偶成。監房中。海濱。寄懷天南並似稻江諸友。聞燕北戰事。</p>	
<p>1932 年 民國 21 年 昭和 7 年 33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長女葉蓁蓁出生於台中。</li> <li>● 2 月 14 日參加林獻堂長子林攀龍發起組織的霧峰「一新會」，以促進農村文化廣佈自治精神為宗旨。</li> <li>● 2 月 25 日參加「南音」在台中開的社務會議。</li> </ul> <p>著作：</p> <p>1 月 1 日奇〈發刊詞〉《南音》</p> <p>1 月 15 日奇〈卷頭言：「大眾文藝」待望〉《南音》</p> <p>1 月 15 日擎雲〈文藝時評：屈話就文〉《南音》</p> <p>1 月 15 日奇〈喫煙室——獻堂先生亦會錯誤〉《南音》</p> <p>2 月 1 日奇〈卷頭言：前輩的使命〉《南音》</p> <p>2 月 1 日奇〈喫煙室——C 判事的疑問〉《南音》</p> <p>2 月 1 日擎雲〈文藝時評：關於魯迅的消息〉《南音》</p> <p>2 月 1 日凡夫〈歸到她的懷抱裡去！〉《南音》</p> <p>2 月 22 日奇〈卷頭言：勿講假話〉《南音》</p>	

	<p>3月14日奇〈卷頭言：人類的呼聲〉《南音》</p> <p>4月2日奇〈卷頭言：作詩的態度〉《南音》</p> <p>5月25日奇〈卷頭言：智識分配〉《南音》</p> <p>5月25日掃雲〈文藝時評：和尚與娶妻〉《南音》</p> <p>6月13日奇〈卷頭言：「第三文學」提倡〉《南音》</p> <p>6月13日掃雲〈文藝時評：論斷髮〉《南音》</p> <p>7月25日奇〈卷頭言：再論「第三文學」〉《南音》</p> <p>7月25日一葉〈「會面」結婚論〉《南音》</p> <p>7月25日掃雲〈文藝時評：文藝時評的態度〉《南音》</p> <p>10月13日掃雲〈文藝時評：關於布袋戲——讀林炳耀氏的〈台灣人形劇調〉〉《南音》</p>	
<p>1933年 民國22年 昭和8年 34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7月23日在台中市樂舞台戲院舉行「現行不完全地方制度改革促進全島住民中部大會」，由葉榮鐘致開會辭揭幕，並發表演說，題目是：「非常時期與臺灣地方自治之改革」。</li> <li>● 10月2日與楊肇嘉、葉清耀同赴朝鮮做為期三星期的地方自治制度考察，因葉清耀腦溢血提早結束，接著與楊肇嘉轉往日本，於11月中旬返臺。</li> </ul> <p>著作：</p> <p>6月15日〈給反對地方自治諸君的公開狀〉《台灣新民報》（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身分作，原文日文）</p> <p>6月29日〈駁斥地方自治改革反對論〉《台灣新民報》（原文日文）</p> <p>詩：示病妻。「朝鮮遊草」計16首：（中秋夜海上望月2首。海上。金剛山途上4首。望毗盧峰。毗盧峰上口占2首。九龍淵瀑布。贈田板君。神溪寺。江原途上懷歸3首）</p>	
<p>1934年 民國23年 昭和9年 35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2月11日替林獻堂起草致清瀨一郎（日眾議院議員）渡邊暢（日貴族院議員）之電文，請他們協助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1,170人簽署）在貴、眾兩議院提出。</li> <li>● 4月20日與林獻堂、陳炯、莊遂性、洪元煌、張煥珪等人討論如何答覆前總督伊澤多喜男關於臺灣統治失政問題，葉榮鐘負責執筆，分四項1.民族歧見2.待遇不平等3.經濟壓迫4.教育不平等來討論。</li> <li>● 8月29日與張星健及腳夫黃某一同登上新高山（今之玉山）。</li> <li>● 9月2日在大東信託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有志磋商會，決議中止請願活動。</li> <li>● 10月7日出席台灣統治意見書起草委員會，葉榮鐘負責教育、社會兩大問題的執筆，餘由林呈祿負責。</li> <li>● 10月7日在「一新會」日曜講座講演「新高登山談」。</li> <li>● 加入「東亞共榮協會」，並擔任《東亞新報》的漢文編輯長。</li> </ul>	

	<p>著作：</p> <p>1月1日發表〈「藝」的練達是先決問題〉《台灣新民報》</p> <p>4月發表〈朝鮮地方制度考察報告書〉《台灣新民報》（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作</p> <p>10月〈教育問題〉（日文手稿）</p> <p>10月〈對本島人社會待遇的改善〉（日文手稿）</p>	
1935年 民國24年 昭和10年 36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地方制度的改正公布後，引發「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存續問題之爭論，8月召開第四次全島大會時宣佈解散。</li> <li>● 「東亞新報」停刊。年底正式進入《臺灣新民報》，職位是通信部長兼論說委員。每週須寫一篇日文社論。</li> </ul>	
1936年 民國25年 昭和11年 37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1月15日因工作關係，全家遷居臺北市，租屋在御成町。</li> <li>● 3月林獻堂發生「祖國事件」，事發後避難東京，台灣的事由葉榮鐘來善後。</li> <li>● 11月23日以《臺灣新民報》名義籌辦「郁達夫座談會」，座談內容有：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郁達夫個人寫作經驗及中日文化交流等。葉榮鐘將郁達夫日文稿子翻譯成中文後，在《新民報》連載。</li> </ul>	
1937年 民國26年 昭和12年 3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新民報》因財政困難減薪二成，為節省開銷，全家搬遷至下奎府町，新居空間有限，勉強搭蓋一間依牆的書房，取名「半壁書齋」。</li> <li>● 7月7日中日蘆溝橋事變發生。</li> </ul> <p>著作：</p> <p>2月28日〈《台灣民間文學集》可以給予高評價〉《大阪朝日新聞》（原文日文）。</p> <p>5月18日蒲牢〈殘喘——從「祈雨」談到「祭政合一致」〉《臺灣新民報》</p> <p>5月22日蒲牢生〈殘喘——從「神風」談到「雷震子」〉《臺灣新民報》。</p> <p>詩：病中。閑居。近感。疊前韻。聞蟬。籠鳩。南都兄招飲江山樓。海水浴場即事。贈虛谷兄。七夕憶舊。車中見月。三十八生辰自述。寄遂性兄。秋夜感懷寄北平老冉。咖啡館即事。陪井出先生與天南、平山、詩琅、莽舟諸君飲於江山樓。生涯。中秋夜攜家人步月。雨夜奉寄灌園先生。蓬萊閣聽曲。無題七首。詠英皇愛德華八世。</p>	
1938年 民國27年 昭和13年 39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2月27日長男葉光南出生，乳名一貫。</li> </ul> <p>著作：</p> <p>詩：見落葉有感。西子灣口占。秋感奉寄灌公。敬次幼春先生村居瑤韻。讀依菊詩書後。書懷示虛谷兄。</p>	

<p>1939 年 民國 28 年 昭和 14 年 40 歲</p>	<p>著作：</p> <p>詩：「歸中雜詠」：（與諸親友燕飲。元旦即事。聽玉雲唱南管。過綠川。遣內子率兒輩歸梓。歸北過大甲溪口占）。索居漫興。四十生辰自述。步我軍原韻 並示燕京諸友。自題半壁書齋。得依菊書以詩答之。哭幼春先生。後索居漫興。奉寄灌園先生東京。逢源兄招飲席上賦呈渭雄。除夕感懷敬步灌園先生瑤韻。除夕感懷。春日遊菜園。讀嘉信感作。</p>	
<p>1940 年 民國 29 年 昭和 15 年 41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2 月繼吳三連之後接任《臺灣新民報》東京支局長。</li> <li>● 4 月全家遷往東京。</li> </ul> <p>著作：</p> <p>詩：舟上偶成。都門雜詠。寄內。別女。海上夜起示內子。偕諸友侍灌園先生遊箱根因有社務車到強羅旋即別歸。步灌園先生祝賀會道謝原韻。都門喜晤玉斗玉廉兩兄。玉斗玉廉兩兄入京虛谷兄招飲松喜席上有懷負人。侍灌園先生外苑觀月。步若泉先生卜居瑤韻。都門喜晤炎秋兄。敬步靖軒先生時事感懷瑤韻。草花。李陵。感事用竹軒先生瑤韻。雨中。「輕井澤雜詠」：（高崎驛望清水觀音銅像。車中所見。車中望妙義山。熊平道上。輕井澤。千瀧望淺間山。山莊夜話。鬼押出。高原途上。北輕井澤）。敬和灌園先生留別瑤韻。敬和灌園先生航海中懷留東詩友會諸友瑤韻。</p>	
<p>1941 年 民國 30 年 昭和 16 年 42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11 月由於戰時生活困難及葉夫人不適應東京的氣候常生病，全家返台，並轉任《興南新聞》（原新民報改名的）台中支店長。</li> </ul> <p>著作：</p> <p>5 月 14 日蒲牢生〈好榜樣，強烈的刺激——觀看文學座的「陳夫人」〉（原文日文）</p> <p>詩：庚辰除夕。辛巳元旦書懷步植亭先生韻。負人近有買山小隱之舉卻寄。敬步灌園先生瑤韻。辛巳歲暮感懷敬步灌公瑤韻。迎年菊。雪夜。近感。小住。妻病。讀灌公李香蘭詩戲呈。雨後。新柳。園花。春寒。香山困雨。不看櫻花感賦。淺間山。「懷友詩」：（洪元煌氏。周定山氏。張煥珪氏。張景源氏。陳若泉氏。楊基先氏）。慰夔龍君喪子。敬和鶴亭老師小立瑤韻。鶴亭老師古稀壽辰賦此遙祝。</p>	
<p>1942 年 民國 31 年 昭和 17 年 43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3 月經林獻堂推薦，正式進入櫟社為社員。</li> </ul> <p>詩：壽灌園先生偕其夫人還曆。偕諸友過稻香村呈元煌先生。步文葵原韻贈肇嘉先生。刺竹。曝書。晚霞。作詩。插足。隨諸友重過稻香村再呈元煌先生。「霧社雜詠」：（隨行戶田侍從霧社。眉溪。留人峽。霧社。櫻臺。明治溫泉雜詠）。</p>	



<p>1943 年 民國 32 年 昭和 18 年 44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2 月受日本軍方徵召，以《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身份赴菲律賓，兼任馬尼拉《華僑日報》編輯次長，為期一年。</li> </ul> <p>著作：〈寄性兄六箋——寄自馬尼拉 1943-1944〉</p> <p>詩：寄懷負人。夜得負人讓友空便感作。</p>	
<p>1944 年 民國 33 年 昭和 19 年 45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全台六份報紙由總督府統合併為《臺灣新報》，委由《大阪每日新聞》經營。4 月中旬依約解職由菲律賓返台，以原《新民報》社員資格擔任《臺灣新報》文化部長兼經濟部長。</li> </ul> <p>舉家遷居臺北市大龍峒（現在大同區）。</p>	
<p>1945 年 民國 34 年 昭和 20 年 46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次女葉芸芸出生。</li> <li>● 4 月辭掉《台灣新報》的工作，全家疏散到台中北屯區軍功寮鄉間，過了四個月的山野生活。</li> <li>●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16 日遷回臺中市。</li> <li>● 9 月 10 日響應陳炳發發起，林獻堂、莊遂性……等人組成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葉榮鐘出任總幹事。10 月 25 日接收官員抵台後自動解散。</li> <li>● 主持籌備臺中市第一屆臺灣光復節慶祝大會。</li> <li>● 參與組織「臺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隨林獻堂多次拜會陳儀、葛敬恩、黃朝琴請求設法營救流落海外——日本、大陸、海南島，原被日軍徵用，現生活無著之台灣青年。</li> <li>● 林獻堂、黃朝清等人，擬以原新民報同仁為主，籌辦《中報》，葉榮鐘預定擔任總編輯，但終未辦成。</li> <li>● 替「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林獻堂、張煥珪等人起早之文件、文告。計有：〈為保全公共建造物事勸告同胞兄弟〉、〈為救濟滯日台僑呈湛侯秘書長書〉、〈慶祝光復大會開會理由〉、〈為呈請中央政府設法救援在日台僑〉、〈關於補助台民產米成本之陳請書〉、〈亟請台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委員書〉、〈「中報」創刊緣起〉、〈關於本省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建言書〉。</li> </ul> <p>詩：敬步傅夫子見寄瑤韻。又。疊前韻再酬傅夫子。疏開吟。</p>	
<p>1946 年 民國 35 年 47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1 月，主持臺中市「被徵海外傷亡少年追悼會」。</li> <li>● 任省立台中圖書館的編譯組長，兼研究輔導部長，莊遂性任館長。</li> <li>● 參與籌備設立彰化「臺灣基督教大學」。</li> <li>● 8 月 29 日到 10 月 5 日，隨林獻堂、丘念台領導的「臺灣光復致敬團」到大陸，在南京謁中山陵，並赴西安遙祭黃陵。團員有：林獻堂、葉榮鐘、李建興、林叔桓、黃朝清、姜振讓、陳炳、鍾番、張吉甫、林為恭、陳逸松等。顧問丘念台，祕書林憲、陳宰衡、李德松。</li> </ul> <p>著作：</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被徵海外傷亡少年追悼會祭文〉、〈被徵海外傷亡少年追悼會弔辭〉、〈被徵海外傷亡少年追悼會輓聯〉、〈台灣經濟建設的原則〉、〈為籲請</li> </ul>	

	<p>政府寬貸徵收米糧以蘇民困事敬陳〉、〈台中縣參議會請求救濟米荒呈文〉、〈陳博士新彬先生弔辭〉、〈招設台灣基督教大學（假稱）緣起〉、〈林獻堂氏代表台灣光復致敬團一行發表談話〉、〈台灣光復致敬團鳴謝狀〉、〈台灣光復致敬團「祭黃陵文」〉、〈台灣光復致敬團南京拜會名單〉。</p> <p>詩：乙酉八月十五日。兒病一芸兒。中秋在長安。南京謁中山陵。臺灣同鄉集會雞鳴寺賦呈。遊華清池不浴而返。祭黃陵過耀縣。焦山口占。遊太湖橫雪公園。冒雨赴木瀆。</p>	
<p>1947 年 民國 36 年 48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參與創辦「聯合月刊」，2.28 事件之前出版創刊號，由于右任題字。</li> <li>● 臺北 2.28 事件消息傳至臺中，在中央書局召集「輿論調查會」，葉榮鐘與林獻堂、謝雪紅、黃朝清、莊遂性、吳振武、林西陸等人組成「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葉榮鐘擔任宣傳部長，莊遂性為主任委員。</li> <li>● 事件後莊遂性一度被捕，兩人遂自省立臺中圖書館去職，此乃葉榮鐘一生之唯一官職。</li> <li>● 12 月 21 日，與丘念台、林獻堂等組織「東寧學會」，擬從事文化啓蒙運動，促進臺胞認識祖國消除省籍隔閡。</li> <li>● 12 月接到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任命書，被遴選為省參議會議員，未報到就任。</li> </ul> <p>著作：〈白部長的印象〉</p> <p>詩：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感懷瑤韻。三月二日。步讓友書感原韻。哭若泉兄。弔耕南先生。弔連宗兄。弔王添燈兄。車過竹北有感。哭子玉兄。哭天賞君。</p>	
<p>1948 年 民國 37 年 49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三女葉青青在台中出生。</li> <li>● 因林獻堂的介紹進入彰化銀行。歷任調查科長、秘書室兼人事室主任、協理、董事會主任秘書。</li> <li>● 五月，接到臺中市政府通告，「東寧學會」被取締為非法組織，不得活動。</li> <li>● 婉拒青年黨與民社黨聯合提名推薦為監察院委員。</li> </ul> <p>著作：</p> <p>〈呈請省政府修改大戶餘糧收購辦法，建立糧食根本對策以蘇民困〉、〈呈為三十六年度一、二期大戶餘糧收購問題，擬具挽救辦法敬希案納由〉、〈致丘念台信兩柬〉。</p> <p>詩：蘭陽途上。颶風。萬般。</p>	

1949 年 民國 38 年 50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秋，林獻堂赴日治療頭昏宿疾。</li> </ul> 著作：〈林獻堂致陳誠建言書〉。	
1950 年 民國 39 年 51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次男葉蔚南在台中出生。</li> </ul> 著作： 詩：贈吳臺北市長三連。憂患。五十誕辰感作。霪雨兼旬小園花草狼藉不堪。 「園蔬四品」：（白菜。蘿蔔。甘藍。蕃茄）。敬和灌園先生遁樓觀雪 瑤韻。	
1951 年 民國 40 年 52 歲	著作： 詩：敬和灌老先生東京都宴何應欽上將岡村寧次大將。遊九分子金礦。近況 敬寄灌園先生東京。中秋夜家園坐月。寄灌公東京乞薔薇種苗。水滸傳 讀後。	
1952 年 民國 41 年 53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林獻堂辭退彰銀董事長職務。</li> <li>● 夏 5 月，赴日探望林獻堂，7 月 2 日返臺。</li> </ul> 詩：恭祝灌園老先生暨水心夫人古稀雙壽。車窗見春耕。扶桑雜詠。賀灌園 先生彰銀贈壽像步幼蘭女士原韻。	
1953 年 民國 42 年 54 歲	著作： 詩：醉月樓席上敬步安岡正篤先生瑤韻。登祝山。由宜蘭赴新店途上。 「南行雜詩」：（重遊開元寺。謁鄭王祠。孔子廟。過安平。四重溪。 早發四重溪。過恆春。墾丁附近。船帆石。鵝鑾鼻）。秋夜書懷。挈眷 遊烏來。觀瀑。步負人山莊夕坐原韻。癸巳除夕。	
1954 年 民國 43 年 55 歲	著作： 詩：北投夜坐。與同事遊大湖法雲寺。恭逢 蔣總統六八壽誕。	
1956 年 民國 45 年 57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9 月 8 日林獻堂在日本逝世，享年 76 歲。</li> </ul> 詩：銀婚有感。「廬山（櫻溫泉）遊草」：（人止關。過霧社。廬山晚眺。 夜起。露天浴。破曉）。人止關同蓁兒作。	
1957 年 民國 46 年 58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編《林獻堂先生榮哀錄》。</li> </ul> 詩：謁南強先生墓。謁懶雲墓。過濁水溪。仙草路上。關嶺路上猩猩紅。孔 園口占（園在關子嶺）。遊珊瑚潭。望海。過櫟社碑。萊園雅集分韻得 侵字。	
1958 年 民國 47 年 59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長女葉蓁蓁赴日留學。</li> </ul> 著作： 詩：遊霧社見梅櫻盛開有感。歲暮感懷。萊園聽鶯。鳳凰木。月下美人。內 子因事赴北留守有感。送蓁兒飛日。旅舍夜讀。車上口占。過大甲溪見 岩隙早梅。	

<p>1959 年 民國 48 年 60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長女葉蓁蓁在東京與故友張梗之子張東亮結婚。</li> </ul> <p>著作：</p> <p>詩：六十感懷。病眼。颱風。</p>	
<p>1960 年 民國 49 年 61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計有追思錄、遺著、年譜，共三冊。</li> </ul> <p>著作：</p> <p>〈杖履相隨四十年〉〈林獻堂先生年譜〉</p> <p>詩：作詩。車窗見鳳凰木盛開。歸鄉觀賽神感舊。蓁兒在東京結婚喜賦。送內子飛日。重讀櫟社第一集肖峰詩草。中秋夜月被雲掩。</p>	
<p>1961 年 民國 50 年 62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長男葉光南自臺灣大學化工系畢業。</li> </ul> <p>著作：</p> <p>〈政治改革芻議〉（替羅萬車代筆）</p> <p>詩：灌公年譜編成感作。歸鄉雜詠。石門記遊。墾丁行。遊屏東山地門。重遊日月潭涵碧樓晚眺。索居漫興三續。寄定山社長。望雨。籠中雞。忽聞。食烏魚。見灌老庭前試馬玉照喜作。重逢。哀哀美麗島。</p>	
<p>1962 年 民國 51 年 63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外孫女張翠玲在東京出生。</li> </ul> <p>著作：</p> <p>〈黑貓〉、〈被剪記〉、〈我的讀書經驗〉、〈勞動觀念與職業意識〉、〈從男人燒飯說起〉、〈臺灣的文化戰士——莊遂性〉。</p> <p>詩：長夜。長夜詩成悼念灌公不已。內子壽筵上作。春雨郊行。一片。暑中漫興。與幼岳論詩。悵惘。車中。小園。車中見相思樹花盛開。蓁兒弄瓦喜賦。郊行。賀虛谷賢伉儷金婚。</p>	
<p>1963 年 民國 52 年 64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編《羅萬車先生哀榮錄》。</li> </ul> <p>著作：</p> <p>〈羅萬車先生事略〉、〈新年談賀片〉、〈悲哀的現實〉、〈抄書談貪污〉、〈論「看相」〉、〈「無聊」的脅威〉、〈宗教與儀式〉、〈「馬斯可迷」〉、〈環境與公德心〉、〈被剪記〉、〈復古調〉、〈近感五則〉、〈也談民主精神〉、〈謔詩〉、〈百年樹人〉。</p> <p>詩：釣魚不獲。肇嘉先生賢伉儷金婚以詩申賀。</p>	
<p>1964 年 民國 53 年 65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9 月，開始撰寫《彰化銀行六十年史》。</li> <li>● 《霧峰林家——臺灣拓荒之家》作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博士（J.S.Meskil1），來臺灣做田野調查一年（1964-1965），定期來訪談搜集有關資料，由東海大學林震泉助教擔任翻譯。</li> </ul> <p>著作：</p> <p>〈中藥〉、〈「待娶」的男士注意〉、〈婚禮〉、〈悵惘的回憶〉、〈銀行的服務競賽〉、〈化學火災〉、〈宇宙地質學〉、〈也談故鄉鹿港的點心〉、</p>	

	<p>〈紅包考古學〉、〈談烏魚〉、〈強項的韓國新聞人〉、〈戀愛成功·家庭圓滿〉、〈半路出家集——自序〉、〈偉大人物的丰度〉〈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記辜耀翁〉、〈悼高天成博士〉、〈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我的青少年時期生活〉。</p> <p>詩：送翠玲外孫女飛日。索居漫興四續。廬山溫泉夜起。廬山雜詠。車過後龍溪。煙雨樓曉望。步省吾六十生日有感原韻。</p>	
1965年 民國54年 66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半壁書齋隨筆第一輯《半路出家集》由臺中市中央書局出版。</li> </ul> <p>著作：</p> <p>〈魏公子傳〉、〈台灣藝姐〉、〈祖國河山的一角〉、〈道德底特權階級〉、〈我看電影的故事〉、〈記日本「昭和經濟恐慌」〉、〈本省地名〉、〈養女問題〉、〈憶童年的農曆過年〉、〈記鹿港中元的民俗〉、〈鹿港查晡〉、〈鹽灘滄桑〉、〈詩人施家本〉。</p> <p>詩：栽花。春日漫興。「梨山雜詠」：（和平。谷關。達見。青山。梨山。賓館。農場。孤樹。夜景。曉望）。遊鐵砧山。遊毗廬寺。左營四首。</p>	
1966年 民國55年 67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從彰化銀行退休。</li> <li>● 準備撰寫《日據下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開始搜集資料，並閱讀各類相關書籍，</li> </ul> <p>著作：</p> <p>〈談退休〉、〈釋大租權〉、〈日本的「老人問題」〉、〈談日月潭〉、〈髮〉、〈新聞廣告的效用〉、〈火〉、〈談日本出版事業及讀書風氣〉、〈談日本的社會趨勢〉、〈日據時代台灣的日本警察〉、〈迷信之風不可長〉、〈價錢公道，服務周到〉、〈明智的領導者林獻堂先生〉。</p> <p>詩：車過大安見野梅盛開。懷貫兒。十六份站見杜鵑。綦兒來信謂翠玲外孫女相念。自勵。雜感四首。春柳。寂寞。結婚紀念日示內子。垂釣。讀荊公詩。退休示內子。</p>	
1967年 民國56年 6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3月，由中市中央書局出版半壁書齋隨筆第二輯《小屋大車集》。</li> <li>● 5月，開始編寫《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年表。</li> <li>● 6月，校訂《彰化銀行六十年史》及序文。</li> <li>● 8月，校訂《鶴亭詩集》。</li> <li>● 10月17日葉綦綦病逝東京。</li> </ul> <p>著作：</p> <p>〈新興企業——寺院〉、〈我唱平劇的故事〉、〈為破除迷信而戰〉、〈談女子教育〉、〈土匪舊聞抄〉、〈記落地掃與詩意藝閣〉、〈談讀書風氣〉、〈同里寫銘旌〉、〈婦女與讀書〉、〈綦兒最後的信〉、〈小屋大車集自</p>	

	<p>序)、〈我所知道的丘念台先生〉、〈林獻堂與梁啓超〉、〈革命家蔣渭水〉、〈灌老與矢內原先生的交誼〉。</p> <p>詩：初夏偶成。郊居。初秋即事。梨山途上。冬青。風雨中。</p>	
1968年 民國57年 69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彰化銀行六十年史》出版。</li> <li>● 2月，完成編寫《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年表，全文五萬字。並開始撰寫《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li> <li>● 3月20日完成第一章〈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之濫觴〉初稿。</li> <li>● 4月12日完成第二章〈六三法案撤廢運動〉初稿。</li> <li>● 6月10日完成第三章〈海外臺灣留學生的活動〉初稿。</li> <li>● 10月27日完成第四章〈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初稿。</li> </ul> <p>著作： 〈傅鶴亭先生小傳〉、〈矢內原先生與台灣〉、〈林呈祿一生忠義〉、〈初期台灣議會運動與總督府之態度〉、〈吳三連氏〉、〈開發讀書技術〉。</p>	
1969年 民國58年 70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2月11日完成第五章〈「治警事件」始末〉初稿。</li> <li>● 6月1日完成第六章〈臺灣文化協會〉初稿。</li> <li>● 8月20日完成第七章〈臺灣民眾黨〉初稿。</li> <li>● 10月21日完成第八章〈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初稿。</li> <li>● 12月20日完成第九章〈農民運動〉初稿。</li> </ul> <p>著作：〈莊太岳作鹿港竹枝詞箋釋例〉</p>	
1970年 民國59年 71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3月11日，完成《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最後一章〈臺灣人唯一的喉舌—臺灣民報〉初稿，共計三年的寫作歷程暫告一段落，隨即開始修改工作。</li> <li>● 依蔡培火之意見，用蔡培火、吳三連、林柏壽、陳逢源、葉榮鐘五人聯名，以〈日據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為題，從4月1日起在《自立晚報》連載。</li> </ul> <p>著作：〈也談翻譯〉</p>	
1971年 民國60年 72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1月10日《日據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在《自立晚報》連載全文刊登完，共278回，五十萬餘字。</li> <li>● 堅拒《自立晚報》購買版權之企圖，但蔡培火及吳三連堅持以五人聯名共撰，書名更為《臺灣民族運動史》，交由《自立晚報》出版單行本。</li> </ul> <p>著作：〈後記——台灣民族運動史〉、〈致蔡培火絕交書〉。</p>	

<p>1972 年 民國 61 年 73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以《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年表為基礎，擴大編寫包括臺灣、日本、大陸及國際四個部分的大事年表，從 1895 年至 1945 年，日本領台五十年間。</li> <li>● 戴國輝及池田敏雄自日本來訪。</li> </ul> <p>著作：〈林獻堂的事蹟與台灣抗日運動對談會記錄〉。</p> <p>詩：柳絮。十月二十五日。感事。節候。</p>	
<p>1973 年 民國 62 年 74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次男葉蔚南畢業世界新聞專科。</li> </ul> <p>著作：</p> <p>詩：癸丑元旦即事。小園時見白頭鵠。機車。以詩代東寄楠田氏。秋郊漫興。落葉。</p>	
<p>1974 年 民國 63 年 75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4 月偕夫人同赴美國、加拿大、日本做為期半年的探親訪友旅遊。有機會閱讀、思考、並與友人討論臺灣與大陸之前途問題，是難得的機會。（當時台灣仍在戒嚴狀態）</li> <li>● 在美期間，曾應邀到 J.S.Meskill 教授家中作客。</li> <li>● 在日本期間，發現林獻堂之戰後日記六冊，由林以德夫人保存。分別與戴國輝及池田敏雄所主持之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座談學術交流。</li> <li>● 10 月中旬返台，下旬開始撰寫《美國見聞錄》。</li> </ul> <p>著作：</p> <p>〈初至美國〉、〈超級市場〉、〈初遊華府〉、〈佛里爾美術館〉、〈縣立小公園〉、〈大熊貓〉、〈甘迺迪中心〉、〈華盛頓故居〉、〈參觀威爾遜總統遺像〉、〈美國人的法律與自由〉、〈美國的交通〉、〈對台灣前途問題之思考〉。</p> <p>詩：感事。</p> <p>「美加記遊」：（初至美國。超級市場。華府道上。詣林肯紀念堂。觀古物有感。遊小公園。大熊貓。甘迺迪中心。獅城觀鸚鵡戲。雨後獅城所見。華盛頓故居。觀威爾遜肖像。遊白宮。加拿大途上。尼加拉瀑布。多倫多觀古堡。舟遊千島。加拿大國會。隔河望法屬市容。遊農業部苗圃。國會前觀衛兵表演。別莊生。海灘書所見。文化城波士頓。臺灣留學生。夜登帝國大廈。華爾街教堂。華爾街證券交易所。中央公園聽交響樂團演奏。美國火車。壽誕口占。朴夫人遇刺。哥大校園看「思索的人」像。聯合國總部。訪問美國人的家庭。哈大觀玻璃花。自由女神）</p>	

<p>1975 年 民國 64 年 76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戴國輝教授托一日本學生帶來書籍及林獻堂日記之影印本，在海關被押收。</li> <li>● 為康寧祥主持之黨外雜誌《臺灣政論》寫專欄，介紹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人物。</li> </ul> <p>著作：</p> <p>〈美國是兒童的天堂〉、〈文化城波士頓〉、〈波士頓的水族館和美術館〉、〈哈大燕京圖書館〉、〈美國人之浪費〉、〈由波士頓赴紐約〉、〈自由女神〉、〈首都美術博物館〉、〈參觀聯合國總部〉、〈訪問美國人之家庭〉、〈由紐約回華盛頓〉、〈生日的感想〉、〈耶大校園一週記〉、〈關於林獻堂先生的日記〉、〈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革命家蔣渭水〉、〈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彰銀改組前後〉。</p>	
<p>1976 年 民國 65 年 77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編輯《楊肇嘉先生榮哀錄》。</li> <li>● 受林快青的推薦，與王詩琅同時被人壽保險發展委員會聘任為研究員，唯僅數月即被財政部取消。</li> </ul> <p>著作：</p> <p>〈釋台中文化城〉、〈急公好義的楊肇嘉先生〉、〈明智的領導者林獻堂先生〉、〈紐約公共圖書館〉、〈美國的種族問題〉、〈美國人的宗教觀念〉、〈美國的連鎖商店與平等化生活〉、〈發揮報紙功能 克盡報導責任〉、〈東埔溫泉重遊記〉。</p> <p>詩：晚秋遊東埔溫泉。</p>	
<p>1977 年 民國 66 年 78 歲</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7 月中旬，因食道癌進入台北榮民總醫院開刀治療。</li> <li>● 半壁書齋隨筆第三輯《美國見聞錄》，由中市中央書局出版。</li> <li>● 完成《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li> </ul> <p>著作：</p> <p>〈美國人的「女人至上」〉、〈美國的老人問題〉、〈文化運動的回憶〉、〈鬥癌記——《美國見聞錄》代序〉、〈便民與慣民——迷信之風不可任令繼續滋長〉、〈明日黃花話選舉〉。</p>	



1978 年 民國 67 年 79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8 月，再赴榮民總醫院檢查，發現癌細胞轉移肝臟。</li> <li>● 10 月，病況再度惡化進入臺中順天綜合醫院治療。</li> <li>● 11 月 2 日正午與世長辭，享年 79 歲。</li> </ul> <p>著作：〈食道樂〉、〈敬覆鍾光亞先生〉、〈詩醫賴懶雲〉。</p> <p>詩：病後（參《葉榮鐘日記》1 月 17 日作）。三連兄賢伉儷金婚蒙贈紀念冊詩以賀之。無題。</p>	
---------------------------	---	--

註：

1. 本年譜是以葉光南、葉芸芸所編《葉榮鐘年表》為架構，再參考【葉榮鐘全集】，摘取與本論文有關的生平事蹟；著作部分，散文是以《葉榮鐘早年文集》、《半壁書齋隨筆》為主，漢詩參考《少奇吟草》，每篇著作皆依其完稿時間逐一核對後排列出來。其中有少部份與《葉榮鐘年表》有相左處，臚列於下：
  - 1937 年 2 月 28 日記載〈《台灣民間文學集》可以給予高評價〉以日文在《大阪朝日新聞》出版，《葉榮鐘年表》記載的是出版於《台灣新民報》。（參《葉榮鐘早年文集》頁 311）
  - 1943 年：〈寄懷負人〉、〈夜得負人讓友空便感作〉兩首《葉榮鐘年表》未列入。（參《少奇吟草》頁 175、176）
  - 〈詩醫賴懶雲〉年表未列入，筆者依《葉榮鐘日記》1978.4.21 記載列入 1978 年。（參《葉榮鐘日記》頁 1184）
  - 〈釋台中文化城〉據《葉榮鐘日記》應是 1976 年完成的，《葉榮鐘年表》未列入。（參《葉榮鐘日記》頁 1069-1077）
  - 〈歡場〉、〈書憤〉、〈烏來有感〉、〈前途和定山韻〉、〈感事〉、〈歲寒雜詠〉這六首詩收錄在《少奇吟草》未定稿部份，未註明寫作時間，筆者翻閱《葉榮鐘日記》也沒有記載，所以未列入年譜中。（參《少奇吟草》頁 255-257）
2. 從 1913 年至 1978 年，除了 1955 年找不到資料外，其餘都有或多或少的事蹟或著作可尋，筆者翻遍其【全集】都沒有這一年的記錄。

參考書目：

- 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89（2000）年，初版。
- 葉榮鐘《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91（2002）年，初版。
-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社會運動史（上）》，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89（2000）年，初版。
-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社會運動史（下）》，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89（2000）年，初版。
- 葉榮鐘《半壁書齋隨筆（上）》，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89（2000）年，初版。
- 葉榮鐘《半壁書齋隨筆（下）》，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89（2000）年，初版。
- 葉榮鐘《葉榮鐘日記（上）》，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91（2002）年，初版。
- 葉榮鐘《葉榮鐘日記（下）》，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91（2002）年，初版。
- 葉榮鐘著·葉芸芸、藍博洲主編《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 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89（2000）年 初版。
- 葉榮鐘《少奇吟草》，台中市：晨星出版，民 89（2000）年，初版。
- 葉光南、葉芸芸主編《葉榮鐘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91(2002)年，初版。

## 參考書目

### 葉榮鐘的著作

- 葉榮鐘〈求之於己〉(原文日文)《台灣青年》，第二卷第一號，1921年1月15日。
- 葉榮鐘〈談談昭和新聞〉《台灣民報》第二百卅八號，(昭和3年)1928年12月9日。
- 葉天籟(葉榮鐘筆名)〈墮落的詩人〉，《臺灣民報》，第二百四十二號，1929年1月8日。
- 葉榮鐘〈爲「劇」申冤〉，《臺灣民報》，第二百五十九號，1929年5月5日。
-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一)〉，《臺灣民報》，第二百六十號，1929年5月12日。
-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二)〉，《臺灣民報》，第二百六十一號，1929年5月19日。
-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三)〉，《臺灣民報》，第二百六十二號，1929年5月26日。
- 葉榮鐘〈敬覆淑子〉，《臺灣民報》，第二百六十三號，1929年6月2日。
- 葉榮鐘〈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號，1929年7月21日。
- 葉榮鐘〈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二號，1929年8月4日。
- 葉榮鐘〈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三號，1929年8月11日。
- 葉榮鐘〈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四號，1929年8月18日。
- 葉榮鐘〈戲曲成立的諸條件—評江肖梅氏的「病魔」〉，《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五號，1929年8月25日。
- 葉榮鐘〈戲曲與觀眾(上)—答紫鵑女士—〉，《臺灣民報》，第二百八十六號，1929年11月10日。
- 葉榮鐘〈戲曲與觀眾(下)—答紫鵑女士—〉，《臺灣民報》，第二百八十七號，1929年11月17日。
- 葉榮鐘〈臺北支部設立問題與舊民眾黨的解散〉《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三號，(昭和六年)1931年2月28日。
- 奇(葉榮鐘筆名)著，〈發刊詞〉，《南音》，創刊號，(昭和7年)1932年1月1日。
- 奇，〈卷頭言：「大眾文藝」待望〉，《南音》，第一卷第二號，(昭和7年)1932年1月15日。
- 奇，〈獻堂先生亦會錯誤(喫煙室)〉，《南音》，第一卷第二號，(昭和7年)1932年1月15日。
- 擊雲(葉榮鐘筆名)著，〈文藝時評〉，《南音》，第一卷第二號，(昭和7年)1932年1月15日。
- 凡夫，〈歸到她的懷抱裡去〉，《南音》，第一卷第三號，(昭和7年)1932年2月1日。
- 奇，〈卷頭言：前輩的使命〉，《南音》，第一卷第三號，(昭和7年)1932年2月1日。
- 奇，〈C判事的疑問(吸煙室)〉，《南音》，第一卷第三號，(昭和7年)1932年2月1日。
- 擊雲(葉榮鐘筆名)著，〈文藝時評〉，《南音》，第一卷第三號，(昭和7年)1932年2月1日。
- 奇，〈卷頭言：勿講假話〉，《南音》，第一卷第四號，(昭和7年)1932年2月22日。
- 奇，〈卷頭言：作詩的態度〉，《南音》，第一卷第六號，(昭和7年)1932年4月2日。
- 奇，〈卷頭言：知識分配〉，《南音》，第一卷第七號，(昭和7年)1932年5月25日。

- 掃雲（葉榮鐘筆名）著，〈文藝時評〉，《南音》，第一卷第七號，（昭和7年）1932年5月25日。
- 掃雲（葉榮鐘筆名）著，〈編輯後言〉，第一卷第七號，（昭和7年）1932年5月25日。
- 奇，〈卷頭言：第三文學提倡〉，《南音》，第一卷第八號，（昭和7年）1932年6月13日。
- 掃雲（葉榮鐘筆名）著，〈編輯後言〉，第一卷第八號，（昭和7年）1932年6月13日。
- 掃雲（葉榮鐘筆名）著，〈文藝時評〉，《南音》，第一卷第八號，（昭和7年）1932年6月13日。
- 一葉（葉榮鐘筆名）〈「會面」結婚論〉，《南音》，第一卷第九、十號合刊，（昭和7年）1932年7月25日。
- 奇，〈卷頭言：再論「第三文學」〉，《南音》，第一卷第九、十合刊，（昭和7年）1932年7月25日。
- 奇，〈卷頭言：再論『第三文學』〉，《南音》，第一卷第九、十號合刊，（昭和7年）1932年7月25日。
- 奇，〈編輯後言〉《南音》，第一卷第九、十號合刊，（昭和7年）1932年7月25日。
- 掃雲（葉榮鐘筆名）著，〈文藝時評〉《南音》，第一卷第九、十號合刊，（昭和7年）1932年7月25日。
- 葉榮鐘〈話匣子〉《第一線》1935年（一期）。
- 葉榮鐘〈蔡兒最後的信〉《台灣文藝》，第63期，1979年3月。
- 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年，初版。
-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社會運動史（上）》，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年，初版。
-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社會運動史（下）》，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年，初版。
- 葉榮鐘《半壁書齋隨筆（上）》，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年，初版。
- 葉榮鐘《半壁書齋隨筆（下）》，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年，初版。
- 葉榮鐘著·葉芸芸、藍博洲主編《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年，初版。
- 葉榮鐘《少奇吟草》，台中市：晨星出版，2000年，初版。
- 葉榮鐘《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2年，初版。
- 葉榮鐘《葉榮鐘日記（上、下）》，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2年，初版。
- 葉光南、葉芸芸主編《葉榮鐘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2年，初版。

### 日治時期的報紙、期刊

- 一村著〈容我也來忠告一聲〉《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一號，1929年7月28日
- 一村著〈寄葉君的一封信〉（上）《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四號，1929年8月18日
- 一村著〈寄葉君的一封信〉（中）《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五號，1929年8月25日
- 一村著〈寄葉君的一封信〉（下）《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六號，1929年9月1日
- 王詩琅〈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代序〉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代序〉《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3 小說選集二》1978年2月18日。
- 王錦江〈一個試評——以「臺灣新文學」為中心〉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江肖梅著〈答葉榮鐘氏的「為劇申冤」〉，《臺灣民報》，第二百六十一號，1929年5月19日。

江肖梅著〈戲曲辯論一再答葉榮鐘氏一〉，《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六號，1929年9月1日。

江肖梅著〈戲曲辯論一再答葉榮鐘氏一〉，《臺灣民報》，第二百七十七號，1929年9月8日。

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讀黃石輝君的高論—〉《婁子民、王詩琅、黃天橫輯集》東方文化書局復刊。

李應章〈蔗農爭議的問顧〉《台灣民報》第一百三十八號，昭和二年一月二日。

林仲輝〈訪代議士永井柳太郎氏有感〉《台灣青年》第一卷第二號，漢文之部

林鳳岐〈我的改造臺灣鄉土文學的提案〉《婁子民、王詩琅、黃天橫輯集》東方文化書局復刊。

前非〈台灣民報怎麼樣不用文言文呢？〉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南屏〈勸告榮鐘君〉第 267 號，昭和 4 年 6 月 30 日。

負人〈台灣話文雜駁〉《南音》。

茲舟〈台灣民報創刊詞〉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記者〈地方自治制的考察〉《臺灣民報》第一百三十八號，昭和二年一月二日。

記者〈農產振興與產業組合〉《臺灣民報》第一百三十八號，昭和二年一月二日。

記者〈過去一年間的臺灣思想界〉《臺灣民報》第一百三十八號，昭和二年一月二日。

記者〈過去及現在的臺灣政治運動〉《臺灣民報》第一百三十八號，昭和二年一月二日。

記者〈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趣旨書〉《台灣新民報》，第三百二十號，昭和五年七月五日。

記者〈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宣言〉《台灣新民報》，第三百二十七號，昭和五年八月廿三日。

記者〈台灣地方自治制改革案提示於太田新總督〉《台灣新民報》，〈台灣地方自治制改革要項(一)〉《台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號，昭和六年二七日。

記者〈台灣地方自治制改革要項(三)〉《台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二號，昭和六年二月廿一日。

記者〈震動全國的大問題！對民眾黨被解散各地的反響如是！〉《台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三號，昭和六年二月廿八日。

記者〈台灣地方自治制改革的建議案與請願書〉《台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三號，昭和六年二月廿八日。

記者〈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全島代表大會〉《台灣新民報》，第三百七十八號，昭和六年八月廿二日。

張我軍（一郎）〈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張我軍（一郎）〈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張我軍（一郎）〈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張我軍（一郎）〈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檣中的破舊殿堂〉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張我軍（一郎）〈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張深切〈『臺灣文藝』的使命〉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張維賢〈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得時〈民間文學的認識〉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臺灣民報》第一百三十八號，昭和二年一月二日。
- 郭秋生〈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下）〉《婁子民、王詩琅、黃天橫輯集》東方文化書局復刊。
- 郭秋生〈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上）〉《婁子民、王詩琅、黃天橫輯集》東方文化書局復刊。
- 郭秋生〈臺灣話文的新字問題（下）—謹呈黃純青先生—〉《婁子民、王詩琅、黃天橫輯集》東方文化書局復刊。
- 郭秋生〈臺灣話文的新字問題（上）—謹呈黃純青先生—〉《婁子民、王詩琅、黃天橫輯集》東方文化書局復刊。
- 郭秋生〈讀黃純青先生的『臺灣話改造論』（下）〉《婁子民、王詩琅、黃天橫輯集》東方文化書局復刊。
- 郭秋生〈讀黃純青先生的『臺灣話改造論』（上）〉《婁子民、王詩琅、黃天橫輯集》東方文化書局復刊。
- 陳忻〈文學與職務〉《台灣青年》創刊號（1920年7月16日漢文之部）。
- 陳逢源〈對於台灣舊詩壇——巨大的炸彈〉（下）《南音》第一卷第二號，昭和七年一月十五日。
- 陳逢源〈對於台灣舊詩壇——巨大的炸彈〉（上）《南音》第一卷第三號，昭和七年二月一日。
- 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紫鶯女士著〈「戲曲成立的諸條件」的商榷—致葉榮鐘的一封信—〉，《臺灣民報》，第二百八十三號，1929年10月20日。
- 黃石輝〈替台灣文學說好話—祝『南音』發刊〉《南音》創刊號，昭和七年一月一日。
-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黃春成〈談談南音〉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黃師樵〈新文學運動與白話字運動〉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黃純青〈與郭秋生先生論臺灣話改造論〉《婁子民、王詩琅、黃天橫輯集》東方文化書局復刊。
- 黃得時〈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黃朝琴〈漢文改革論〉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楊青矗〈斯民命運實堪憐〉《自由廣場》2001年2月28日。
- 楊雲萍〈「人人」雜誌創刊前後〉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楊雲萍〈台灣小說選序〉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楊肇嘉〈自治運動的進展〉《台灣新民報》，第三百四十六號，昭和六年一月十日。
- 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筆流水賬—〉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台灣民報》第 67 號，大正 14 年月 26 日。
- 蔣渭水〈今年之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臺灣民報》第一百三十八號，昭和二年一月二日。
- 蔡孝乾〈五年來的台灣〉《台灣民報》第 67 號，大正 14 年月 26 日。
- 蔡培火〈我在文化運動所定的目標〉《臺灣民報》第一百三十八號，昭和二年一月二日。
- 蔡培火著《給日本國民》轉引自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市：帕米爾書店，1985 年 7 月初版）
- 賴明弘、林越峰、江賜金記錄〈第一回台灣全島文藝大會記錄〉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3.15。
- 點人〈南國的使者—我希望「南音」如此—〉《南音》第一卷第二號，昭和七年一月十五日。。

### 專書部分

- 王詩琅著《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 年 12 月，初版。
- 王曉波著《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台北市：帕米爾書店，1986 年 11 月初版。
- 王曉波著《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市：東大圖書，1988 年 12 月初版。
- 古野直也著謝森展譯《台灣代誌——探尋台灣的歷史》，台北市：創意力文化，1996 年 2 月，初版二刷。
- 古野直也著謝森展譯《台灣代誌——總督府到總統府》，台北市：創意力文化，1996 年 2 月，初版二刷。
- 古繼堂著《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市：文史哲出版，1996 年 10 月，初版三刷。
- 史明著《臺灣人四百年史》台北市：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 年 4 月，初版。
-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市：帕米爾書店，民 74（1985）年 7 月，初版。
- 何欣著《當代台灣作家論》，台北市：東大圖書，1983 年 12 月，初版。
- 李筱峰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市：自立晚報，1991 年 2 月第一版六刷。
-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市：台原出版社，1993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刷。
- 林莊生著《懷樹又懷人》，台北市：自立晚報社，1992 年 8 月第一版一刷。
-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市：允晨文化，1993 年 8 月初版。
-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台中縣文學發展史》，豐原市：中縣文化中心，民國 84 年 6 月。
-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民國 86 年 5 月。
-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下），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民國 86 年 5 月。
- 盛清沂、王詩琅、高樹潘《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1988 年 10 月再版。

- 莊淑芝《台灣新文學觀念的萌芽與實踐》，台北市：麥田出版社，1994年7月。
- 許文彬《日治時期霧峰萊園巡禮暨史料彙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中縣政府指導，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策畫，1999年6月15日初版。
- 許俊雅著《台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台北市：南天書局，1997年10月初版一刷。
- 陳芳明著《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市：麥田出版，2002年，初版。
- 陳昭瑛《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4月。
- 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市：聯經出版，1998年12月，初版
- 陳義芝主編《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99年，初版。
- 傅錫祺著《櫟社沿革略》，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52年2月。
- 彭瑞金著《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高雄市：春暉出版，民86（1997）年，初版。
- 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文學界雜誌社，民國82年，再版，附錄：臺灣文學史年表。
- 戴國輝、葉芸芸著《愛憎2.28》，台北市：遠流出版，2002年9月1日，初版十三刷。
- 鍾美芳著《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北市：臺北文獻委員會，台北文獻第78期。
- 鍾美芳著《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北市：臺北文獻委員會，台北文獻第79期。
- 鍾肇政著、莊紫蓉編《台灣文學十講》，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第一刷。
- 嚴茂林著《從蔣渭水看台灣》，宜蘭縣：嘉麟印刷局，1981年9月10日初版。

### 學位論文

- 李文卿《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2001年6月。
- 李貞瑤《陳逢源之漢詩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2年6月。
- 吳奕蒼《日治時期鹿港地區新文學研究》，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1996年6月。
- 張志相《張深切及其著作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6月。
- 張桂華《苦悶時代下的文學——1932年《南音》的文學訴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6月。
- 陳韻如《郭秋生文學歷程研究》，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 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6月。
- 戴振豐《葉榮鐘與台灣民族運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年6月。

### 戰後期刊論文

- 尹章義〈捨我其誰的史家和客觀環境的互動〉轉引自葉榮鐘著《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89（2000）年，初版。
- 毛一波〈林癡仙之詩〉《台灣文獻》第6卷第1期，民國44年3月27日
- 王詩琅〈不斷進步的知識人——敬悼葉榮鐘先生〉《自立晚報》1978年11月26日。
- 羊子喬〈戰前的台灣新詩〉《國文天地》16卷5期，2000年10月。
- 呂正惠〈被歷史命運播弄的人們——論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轉引自陳義芝《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
- 呂正惠〈陳芳明「再殖民論」質疑〉《聯合文學》206期，2001年12月號。
- 呂訴上〈台灣新劇發展史〉轉引自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下），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6年5月。

- 宋冬陽（陳芳明筆名）〈放膽文章拚命酒——論楊逵作品中的反殖民精神〉《放膽文章拚命酒》，台北市：林白出版，1988年元月15日初版。
- 宋澤萊〈論林敏文文學的重要性——繼黃石輝、葉榮鐘之後又一深化台灣文學的旗手〉《台灣新文學》，第8期，台中市：台灣新文學雜誌社，86年8月。
- 李喬〈戰後台灣小說的文化批評〉《國文天地》16卷5期，2000年10月。
- 汪毅夫〈台灣近代文學史事編（1840-1923）〉《台灣近代文學叢稿》海峽文藝出版社 1990年
- 林芳年〈悼葉榮鐘氏〉《台灣文藝》，第63期，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9年3月。
- 林柏維〈認同模糊與派系分流：以1920年代文化運動的走向主張為主軸〉，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1年。
- 林瑞明〈人間楊逵〉《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1996年7月。
- 林瑞明〈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文學結社及其精神〉《文訊——文學社團特輯》文訊出版社，1987.4.10。
- 林瑞明〈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精神〉《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1996年7月。
- 林瑞明〈探索葉榮鐘的文學〉《櫟社百週年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文學館，2001年12月8-9日，台中縣霧峰鄉台灣省諮議會議事堂。
- 林瑞明〈臺灣新文學運動理論時期之檢討〉（1920-1923）《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1996年7月，初版。
- 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歷史月刊》，2000年11月號。
- 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1996年7月，初版。
- 林銘章〈葉榮鍾（1900-1978）〉《傳記文學》第七十二卷第一期，民國87年1月。
- 林衡哲〈台灣現代文學之父——賴和〉《復活的群像》，台北市：前衛，1994年6月。
- 林靈〈剖開新舊時代社會弊病的堅實刀柄〉《半壁書齋隨筆》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89（2000）年，初版。
- 施淑〈文協分裂與三〇年代初臺灣文藝思想的分化〉《兩岸文學論集》，台北市：新地文學，1997年。
- 施淑〈日據時代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兩岸文學論集》，台北市：新地文學，1997年。
- 施淑〈書齋、城市與鄉村〉《兩岸文學論集》，台北市：新地文學，1997年。
- 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台灣古典詩壇的影響〉《從沈光文到賴和》，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年6月。
- 施懿琳〈周定山《一吼劫前集》中的大陸經驗與感時情懷〉《從沈光文到賴和》，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年6月。
- 施懿琳〈彰化應社研究〉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主辦，《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1994.11.25-27，清華大學國際會議廳，新竹。
- 施懿琳〈臺灣詩人陳虛谷的創作理念及其實踐〉《中正中文學術年刊》創刊號，1997年11月。
- 洪炎秋〈悼念葉榮鐘先生〉《台灣文藝》，第63期，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9年3月。
- 洪銘水〈葉榮鐘的《少奇吟草》——跨越語言一代文化人的見證〉《台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台北市：文津出版，1999年12月。原載《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五冊，自立晚報社出版，1990年10月。



- 洪銘水〈葉榮鐘論「五四」新文學「第三文學」的提出〉《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91（2002）年，初版。
- 胡民祥〈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 年 8 月。
- 胡民祥〈臺灣文學作品與社會生命〉《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 年 8 月。
- 胡民祥〈臺灣新文學運動時期—「臺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台灣文化》，第二期，1985 年 9 月。
- 徐復觀〈悼念葉榮鐘先生〉《中國時報》，1978 年 12 月 11 日。
- 張良澤〈葉榮鐘先生作品概述〉《台灣文藝》，第 63 期，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9 年 3 月。
- 張建隆〈醫民醫國——詩人——吳新榮〉《復活的群像》，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 年 6 月。
- 莊幼岳〈《少奇吟草》原序〉《少奇吟草》，台中市：晨星出版，民 89（2000）年，初版。
- 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台灣文學二十年集 1978-1998》，台北市：九歌，民國 87 年初版。
- 許俊雅〈延斯文於一線—日據時期臺灣傳統詩歌〉《臺灣文學散論》—原刊《中央日報》長河版，1990 年 5 月 28 日。
- 許雪姬〈林獻堂先生日記〉《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二十期。
- 陳文芬〈葉榮鐘全集 見證台灣近代史〉《中國時報》，2000 年 7 月 24 日文化藝術版。
- 陳芳明〈三〇年代台灣作家對現代性的接受與抗拒〉，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台灣省政府主辦，《第三屆通俗與雅正學術研討會》，2001.10.19-20，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13 樓國際會議廳，台中。
- 陳芳明〈三〇年代的文學社團與作家風格〉《聯合文學》184 號，2000.2，聯合文學，台北。
- 陳芳明〈文學左傾與鄉土文學的確立〉《聯合文學》183 號，2000.1，聯合文學，台北。
- 陳芳明〈以筆代劍：後殖民的國族認同困境——解析張深切晚年自傳〉，《20 世紀台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研討會》，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1 年。
- 陳芳明〈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聯合文學》126 號，1995.4，聯合文學，台北。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78 號，1999.8，聯合文學，台北。
- 陳芳明〈先人之血，土地之花—日據時期臺灣左翼文學的背景〉《放膽文章拚命酒》，台北市：林白出版，1988 年元月 15 日初版。
- 陳芳明〈初期新文學觀念的形成〉《聯合文學》179 號，1999.9，聯合文學，台北。
- 陳芳明〈皇民化運動下的四〇年代文學〉《聯合文學》187 號，2000.5，聯合文學，台北。
- 陳芳明〈島嶼文學的豐收——試論阿盛散文〉《放膽文章拚命酒》，台北市：林白出版，1988 年元月 15 日初版。
- 陳芳明〈啓蒙實驗時期的文學〉《聯合文學》180 號，1999.10，聯合文學，台北。
- 陳芳明〈現代性與本土性：以《南音》為中心看三〇年代台灣作家與民間想像〉，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1998.11.21-22，清華大學國際會議廳，新竹。
- 陳芳明〈殖民地傷痕及其終結〉《聯合文學》191 號，2000.9，聯合文學，台北。
- 陳芳明〈殖民的傷痕、世紀的回眸—日據時期台灣經典小說選讀〉《聯合文學》180 號，1999.10，聯合文學，台北。
- 陳芳明〈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聯合文學》185 號，2000.3，聯合文學，台北。

- 陳建忠〈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再探「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20 世紀台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研討會》，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1 年。
- 陳昭瑛〈誰召同胞未死魂：葉榮鐘《早年文集》的志業與思想〉《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晨星出版，2002 年初版。
- 陳盈達〈萬感填胸不可攔——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詩人葉榮鐘〉《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1 年 12 月 2 日，明台高中。
- 陳淑娟〈賴和漢詩的臺灣自主性思想研究〉《彰化文獻》。
- 黃美玲〈賴和創作中新舊文學並存的意義〉《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學報》，第十九期，89 年 8 月。
- 黃英哲〈孤獨的野人——張深切〉《復活的群像——台灣卅年代作家列傳》，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 年 6 月。
- 黃得時〈辛酸五十年，淚血寫滄田——我與民族鬥士葉榮鐘先生〉《台灣文藝》，第 63 期，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9 年 3 月。
- 黃琪椿〈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思想的接受與大正民主思潮〉《20 世紀台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研討會》，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1 年。
- 黃韻如、陳凱音〈人間楊逵〉《臺灣文藝》154 期 1996 年月出版。
- 黃蘊綠〈台灣文學的研究與發現——試析呂赫若的「皇民文學」〉《台灣新文藝》
- 楊宗翰〈典範的生成？——關於臺灣文學史「再現賴和」〉《國文天地》16 卷 2 期，2000 年 7 月。
- 楊逵口述、劉依萍整稿〈談抗日時期的臺灣新文學〉《文訊月刊》第七、八期。
- 楊翠〈裂縫與出口——試探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結構：以賴和、林幼春為例〉《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1 年 12 月 2 日，明台高中。
- 葉石濤〈戰前的台灣小說〉《國文天地》16 卷 5 期，2000 年 10 月。
- 葉石濤〈舊文人·新知識份子——葉榮鐘〉《文學台灣》，1998 年 7 月。
- 廖振富〈不有真情不作詩——讀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台灣日報》民國 90 年 4 月 12 日
- 廖振富〈台灣中部地區的古典詩人及其作品(下)〉《國文天地》，16 卷 9 期，2001 年 2 月。
- 廖振富〈台灣中部地區的古典詩人及其作品(上)〉《國文天地》，16 卷 8 期，2001 年 1 月。
- 廖振富〈林獻堂詩與近代台灣〉《竹塹文獻》第十三期，1999 年 11 月。
- 廖振富〈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2 卷，台中：東海大學文學院，2001 年 7 月。
- 趙淑德〈林獻堂（1881-1956）臺灣民族運動領導人、詩人、文化人〉《中外名人傳》第 43 期。
- 盧大中〈楊逵「光復前」小說的悲劇意識探索〉《臺南師院學生學刊》第 16 期，民國 84 年
- 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臺灣文獻》第 11 卷第 3 期，台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戴國輝〈葉榮鐘先生留給我們的淡泊與矜持〉《臺灣人物群像》，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89(2000) 年，初版。
- 戴國輝著〈郁達夫與台灣〉《歷史月刊》，2002 年 9 月。
- 戴寶村〈遠識高文的政治·文化人——葉榮鐘〉《復活的群像》，台北市：前衛，1994 年 6 月。
- 鍾肇政〈台灣文學的坎坷歲月——從石濤的榮耀說起〉《國文天地》16 卷 5 期，2000 年 10 月。
- 藍博洲〈編後記〉《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市：晨星出版社，民 89 年，初版。
- 藍適齊〈1920 年代台灣「求同存異」的論述與實踐——以台灣議會運動為例〉《20 世紀台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研討會》，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1 年。

魏可風專訪〈站在邊緣的觀察者—陳芳明談《台灣新文學史》〉《聯合文學》178 號，1999.8，聯合文學，台北。

龔鵬程〈戰前台灣小說所反映的農村社會〉緒論，《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五期。

〈台灣文化協會的電影隊——「美臺團」〉《台灣文獻》第 45 卷第四期 台北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